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 1955 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四卷说明	VII - X VI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3—20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4
第二部分 “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 “青年美国”的态度	9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12
第四部分 向宗教谄媚	14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19
弗·恩格斯。普鲁士宪法的破坏	21—2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	23—25
弗·恩格斯。普鲁士银行问题	2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 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	27—29
弗·恩格斯。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	30—32
弗·恩格斯。普鲁士宪法	33—41
卡·马克思。驳卡尔·格律恩	42—45
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	46—65
(一)	46
(二) STATUS QUO〔现状〕和资产阶级	50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	66—69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71—198
序言	75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77—137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77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	88
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	118
甲、货币	118
乙、劳动的剩余	127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138—198
第一节 方法	138
第一个说明	139
第二个说明	143
第三个说明	144
第四个说明	145
第五个说明	147
第六个说明	149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153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158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172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80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191
弗·恩格斯。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	
现状	199—206
卡·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207—222
弗·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223—275

一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诗歌	223—243
二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244—275
弗·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	276—281
卡·马克思。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 ...	282—284
弗·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285—29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297—315
弗·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 ...	316—318
弗·恩格斯。英国的雇主和工人。致“工场”杂志的 工人编辑	319—321
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	322—35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357—374
弗·恩格斯。宪章派土地纲领	375—377
弗·恩格斯。宪章派为 1847 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	378—380
弗·恩格斯。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381—384
弗·恩格斯。瑞士的内战	385—393
弗·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	394—402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	403—404
弗·恩格斯。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 民主主义的胜利	405—40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论波兰。1847 年 11 月 29 日 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 的演说	409—412
马克思的演说	409

恩格斯的演说	410
弗·恩格斯。纪念 1830 年波兰革命	413—415
卡·马克思。驳阿·巴泰尔斯	416—417
卡·马克思。拉马丁和共产主义	418—419
弗·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	420—422
弗·恩格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	423—426
弗·恩格斯。宪章派的鼓动	427—429
弗·恩格斯。“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 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 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 浴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	430—437
弗·恩格斯。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	438—440
弗·恩格斯。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	441—443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 年 1 月 9 日发表 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	444—45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61—504
(一) 资产者与无产者	465
(二)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479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491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491
(甲) 封建的社会主义	491
(乙)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493
(丙)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495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498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99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502
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	505—515
弗·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516—523
卡·马克思。2月6日的“社会辩论报”论民主协会	524—527
弗·恩格斯。三个新宪法	528—53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 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演说	534—541
马克思的演说	534
恩格斯的演说	537
弗·恩格斯。致“改良报”	542—544
弗·恩格斯。巴黎的革命	545—548
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	549—554
卡·马克思。给“改革报”编辑的信	555—557
卡·马克思。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	558—560
弗·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	561—562

补 遗

弗·恩格斯。英国谷物法史	563—568
--------------------	---------

附 录

马克思所做的关于1847年8月5日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	571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572—577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	578—580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民主协会 1848年2月20日 会议的报道	581
致“北极星报”编辑、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朱利安· 哈尼先生	582—583
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们和临时政府委员们.....	584—585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48年3月3日的决议	586—587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年3月8日会议记录	588—589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年3月9日联席会议记录	590—591
注释	595—63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35—643
人名索引	644—663
期刊索引	664—666
译后记.....	667

插 图

弗·恩格斯对 1847年4月11日联合省议会在柏林开幕时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	37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一版的封面.....	73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一页，载有卡·马克思所著“‘莱茵 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和弗·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 德国社会主义”篇首部分	208—209
“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扉页	463
“共产党宣言”原稿的一页	483
“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的封面（30页本）	492—493

第四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收集了他们在 1846 年 5 月至 1848 年 3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完成。从此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工人阶级的已经形成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成了工人阶级在争取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正如弗·伊·列宁所说,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

在收入本卷的著作中,对构成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主要之点,已经有了阐明。由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理论概括,愈益明确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缔造者——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的原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原理。

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许多国家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已成熟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际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巩固了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联系,他们对宗派主义和各种幼稚的乌托邦的思想影响进行了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结果,1847年夏天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争取建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

本卷开头第一篇文章“反克利盖的通告”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流派之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这些流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为自己敷设了通向无产阶级群众的道路。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克利盖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言词,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新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嘲笑了克利盖之类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空想和玩弄辞藻的把戏,尤其是嘲笑了克利盖想把美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描绘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企图,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唯物主义的冷静态度(按照弗·伊·列宁的评价)肯定了这类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真正进步内容。“马克思的辩证的和革命式的批判,去掉了庸俗学说的外壳,剥露出‘攻击土地私有制’在‘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内核。”(“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三卷第25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利盖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批驳,魏特林的观点阻碍了德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

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问题”这篇我们所得到的不完全的手稿里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正合

反动的封建专制集团的心愿。在这篇著作里恩格斯根据对德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况的分析,拟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策略。

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论中,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美学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基础。恩格斯尖锐地指责了在文学中的一切小市民的狭隘性、多愁善感、庸俗、市侩气、小心翼翼地向有产者谄媚的行为。恩格斯强调说,进步的作家和诗人应当是进步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喉舌,应当歌颂“倔强的、威严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想用小市民的尺度来衡量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的创作的企图进行了致命的批评。恩格斯在评述歌德的创作中,做出了研究文学的复杂现象的范例,揭示了作家的世界观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指出了歌德著作中的矛盾方面,说明了它们的真正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

1847年夏天问世的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这部哲学兼经济学的著作里,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在报刊上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础;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的创见。

“哲学的贫困”是为了反对蒲鲁东主义而写的。蒲鲁东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和空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它力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又要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马克思证明,要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

的任何计划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就给整个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以打击,抱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们企图用细小的改良的纲领引诱工人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同时,在“哲学的贫困”中捍卫并发展了新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比自己先前的著作更全面更深刻地论证了他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和把真实的现实描写成“绝对观念”的体现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反,他把观念、抽象、逻辑范畴看成是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辩证过程的反映。

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在阐明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在揭示“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内容时,指出它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本卷第 197 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他证明,在阶级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对抗性矛盾,使阶级斗争尖锐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使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革命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见本卷第 198 页)。

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后来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一天才著作中对这门科学做了详细的研究。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经济的现实,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经

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短暂性。

马克思从新的真正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了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阐明了大机器工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方面:竞争、资本主义的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技术方面的每一项巨大的发明都使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加剧起来。马克思强调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危机、群众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免的伴侣;他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实质,大体上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见本卷第155页)。

在“哲学的贫困”里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地租等学说的一些初步原理。马克思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深刻思想,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措施。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以及“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里,提出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原理。50年代末马克思建立了这一理论的完备形式。在这以前所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等)里,马克思还使用“劳动价值”,“劳动价格”这样一些概念,正如恩格斯后来在给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些概念“从晚期著作的观点来看,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后来马克思确定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概念代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概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把他关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

历史意义的结论加以具体化,同时指出经济斗争、罢工、工人同盟(工会)在团结和以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具有阶级觉悟,社会主义的觉悟,应当了解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的革命作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应当由“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的群众变成“自为的阶级”(见本卷第196页)。马克思表述了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的重要原理,并且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的意义。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在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和法国民主主义报纸“改革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通讯。在政论性的文章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这一报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国际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报上评论当时的一切巨大事变,对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加以论证,并同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进行斗争。

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揭露了打着基督教社会主义旗帜的普鲁士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人物迷惑人民群众的勾当。在马克思的文章“拉马丁和共产主义”、“驳阿·巴泰尔斯”和恩格斯的文章“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拉马丁先生的宣言”里,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遭到了严厉的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关于共产主义的臆想遭到了驳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

·阿·克特根的信和“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弗·恩格斯发表在“改革报”上的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通讯,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和文献里,都包含着要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力量实行国际合作和团结一致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但同时也批判了后者的落后观点和幻想。在“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一文中恩格斯写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见本卷第423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坚决地驳斥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国小资产阶级活动家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观点。

在恩格斯所著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所著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里,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狭隘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尤其是他们对德国的集中和统一的必要性的无知。在同海因岑的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并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11月29日关于波兰的演说和他们1848年2月22日关于波兰问题的发言里,在恩格斯的“奥地利末日的开端”、“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以及其他著作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宣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他们赞同工人阶级坚决援助波兰、意大利、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做法,表述了著名的原理:“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见本卷第410页)。

恩格斯的“普鲁士宪法”、“法国的改革运动”、“瑞士的内战”、“1847年的运动”等文是分析革命前夕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环境

和政治情况的。恩格斯在“巴黎的革命”一文中评论了 1848 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提出了为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

本卷中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手稿,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制定形成中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而进行的工作。恩格斯在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的草稿中,从理论上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某些极其重要的纲领性的和策略性的原则。在恩格斯的这篇著作里拟定了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应实行的措施。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包含着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公式。这个对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来说是正确的公式,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过时了,因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的和跳跃式的发展规律,预先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时间在不同的国家里是各不相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的这个过时的原理,为弗·伊·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国家或大部分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一新的原理所代替。

本卷中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是他们在 1848—1849 年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内所完成的一切科学和政治创作的最高成就。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它完整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的基础。“在这部著作里极其清楚而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作为最完备最精深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

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使命的学说。”(“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 32 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定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他们以此武装了无产阶级,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了整个“宣言”,弗·伊·列宁称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 389 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却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的实质。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见本卷第 489 页)。

“共产党宣言”中给国家的实质下了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定义。“宣言”的作者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见本卷第 491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的工具之后强调说,工人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应当利用政权为极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制服一小撮剥削者的反抗,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阶级指出了—个伟大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他们预见到,共产主义革命将消灭任何剥削和阶级对立,消灭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压迫,这一革命将导致建立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见本卷第 491 页)。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有先见之明地预言说,工人阶级的胜利不仅会达到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而且会使人类摆脱民族间的对抗和敌对关系,摆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各民族间的血腥的战争。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它工人阶级就不能夺得政权和实现社会的改造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时指出,必须使无产阶级争取最近目的的斗争服从于它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的利益,必须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任务相结合。他们论证了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各个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援一切革命的 and 进步的运动,同时对运动的弱点和缺点提出批评。

“宣言”的作者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号召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斯大林)

* * *

本卷收集了全集第一版没有编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27 篇著作。其中弗·恩格斯的三篇文章的俄译文于 1940 年刊载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4 期上,他的另外三篇在以前历次发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著时都未编入过的文章,刊载在 1955 年“历史问题”杂志第 11 期上;其余的几篇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点在各该篇末已注明。

在本卷的附录中编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还有一系列反映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的文献。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6年5月—1848年3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反克利盖的通告¹

在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载勒尔、魏特林、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出席参加的会议上,关于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

海尔曼·克利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²

大家(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并附论据。

决 议

(1)“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

(2)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

(3)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4)本决议连同论据将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5)本决议送交“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一份,要求该报在最近几号上将此决议连同论据一发表。

恩格斯、菲·日果、路易·海尔堡、

卡·马克思、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沃尔弗

1846年5月11日于布鲁塞尔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人民论坛报”第13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告妇女书”的文章。

(1)“妇女是爱的祭司”。

(2)“送我们到这里来的是爱”。

(3)“爱的使徒”。

(a)文学的插曲:“闪闪发光的仁慈的眼神”;“真理的声音”。

(b)虚伪粗鄙的向妇女 *captatio benevolentiae*(讨好的企图):

“你们即使穿着女王的服装也仍旧是妇女……你们也没学会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哄人。你们的心肠太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不幸的孩子饿死在母亲手里。”

(4)“可爱的小宝宝的未来”。

(5)“相亲相爱的姊妹啊”。

(6)“啊,请听一听我们的话,假使你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背叛爱”。

(7)“爱的”。

(8)“用爱”。

(9)“为了爱”。

(10)“我们向你们乞求(泣诉)的最神圣的爱的事业”。

(c)美文学和圣经上的庸俗论调：“妇女命定生产人类的儿女”，这等于指出：男人不能生孩子。

(11)“充满爱的心灵必然发展成共性的圣灵”。

(d)插曲式的 Ave Maria[福哉，马利亚][⊙]：“女人们，你们有福了，你们三倍地有福了，因为你们命定要给早已预言过的幸福王国以第一次圣化。”

(12)“相亲相爱的姊妹们”。

(13)“不是爱而是恨”(资产阶级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

(14)“啊，亲爱的！”

(15)“把爱送上宝座”。

(16)“由互爱而结合起来的积极的人们”。

(17)“爱的真正祭司”。

(e)美学的插句：“假如你们胆怯的心灵还没有忘记作出几次美妙的飞翔”(这是能否实现尚待证明的魔术)。

(18)“爱的世界”。

(19)“恨的王国和爱的王国”。

(f)欺骗妇女的企图：“因此你们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影响，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就会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

(g)旨在压倒理智声音的哲学喇叭声：“让全人类永远安然自得，这就是你们活动的最终目的。”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 天主教祷告的头一句。——编者注

(20)“你们的爱”。这是向妇女要求“最热烈的”爱的借口,以便她们“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这一要求是既下流的,又非分的。

(h)遁逃曲:“成千上万被遗弃的孤儿正在消灭他们所处的可怕的环境”。这里“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孤儿”消灭“环境”,还是“环境”消灭“孤儿”?

(i)新共产主义政策的表白:“我们不想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让高利贷者保留已经拥有的财产吧,我们只想防止继续盗窃国民财产的行为,防止资本以后剥夺劳动的合法财产。”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应该是:“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可能,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根据这种说法,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资产者,包括克利盖十分憎恨的纽约资产者在内。)
“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 14 亿英亩国有土地)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那末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亲手来给自己建设不可侵犯的家园了”。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工商业务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可是,为了迎接上述幸福时刻的到来,克利盖已在准备做如下一种乡下牧师式的宣教:“那时我们就能教导人们和睦相处,彼此减轻一切生活上的负担和困难,并且

(21)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每村都恰

好占地 160 英亩)。

克利盖在结束对已婚妇女的号召时说：“首先你们要向

(22)自己亲爱的丈夫，

恳求他们放弃旧的政策……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孩子，恳求他们为了他们的(蠢人的)孩子们醒悟过来”。其次，他又向“少女们”就：“但愿对于

(23)你们的爱人来说

土地解放是他们人格的试金石，请不要轻信

(24)他们的爱，

当他们没有发誓忠实于全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少女们举止稳重，那末他就会向她们保证，她们的孩子

(25)“也会和她们(指“天国的鸟”)一样成为富于爱情的人”，

他在结束他那单调的歌曲时又重复谈到

(26)“爱的真正祭司”、“伟大的共性王国”和“圣化”等。

“人民论坛报”第 13 号——“答索尔塔”：

(27)“它(共性的伟大精神)象爱之火，在教友的眼中燃烧”。

(28)“女人如果没有她能爱、能为之献出自己的颤抖的心灵的男人，那她还成什么样子呢？”

(29)“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

(30)“母爱”。

(31)“对人的爱”。

(32)“爱的所有最初的声音”。

(33)“爱的光芒”。

(j)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服从于它(敏感的心)的跳动”。

(34)“在金钱声中,爱的声音沉寂了”。

(35)“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

这样,单是在这一号报纸中,约略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到35种表现的爱。按照这种谈爱的废话,克利盖在“答索尔塔”一文中和在别的地方都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懦弱:他向高利贷者谄媚,答应不动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他发誓说并不想“破坏对家庭生活、国家和民族的依恋”,只想“实现这种依恋”。说共产主义不是“破坏”,而是要使现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实现”的这种懦弱而虚伪的说法,从头到尾贯串在每一号的“人民论坛报”中。克利盖和政治家们争论时所持的立场跟这种虚伪和懦弱是相吻合的。他认为(第10号上)写文章反对类似拉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就是违背共产主义。因此,象蒲鲁东、卡贝、德萨米这样的人,一句话,所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只是“有名无实的共产主义者”。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已经远远抛开了白尔尼,正象法国共产主义者远远抛开了拉梅耐一样,这一点是克利盖在德国、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

这种爱的呓语将会如何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经衰弱,将会如何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贫血,——关于这一点,克利盖自

己也该想一想。

第二部分

“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 对“青年美国”³的态度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那些地方以外,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词句来装饰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论坛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

“他们(即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全人类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 160 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 14 号上所载的“答孔策”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

“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 160 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 160 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

于是，为了把土地留做“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 160 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将和其他人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 160 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

14 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 160 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 875 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五口人计算，一共有 4375 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 25 年增加一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 40 年。这 14 亿英亩在 40 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

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 44 亿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十个人中有一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岛就有 700 万赤贫者。我们在第 13 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违背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 52000 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

他在第 10 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

“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

这就是我的小屋，
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
这就是我的家园，
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

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师傅和农民吧！用这 14 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我们再引一段话来看看克利盖究竟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经济关系的：

“每一个人必须在每一种行业里至少学会这样一种技巧，使他（万一有什么不幸使他离开人类社会）必要时可以不要旁人的帮助而能生活一个时候。”

不消说，“大谈”其“爱”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人民论坛报”第 13 号刊载了“答索尔塔”一文。

(1) 克利盖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不习惯在抽象的不毛之地上玩弄逻辑的戏法”。但每一号“人民论坛报”都证明克利盖正是用哲学的和情感的词句玩弄“戏法”，虽然不是“逻辑的”戏法。

(2) 克利盖用下面非逻辑的“戏法”来表达“每一个人单独生活”（简直是废话）的论点：“现在整个人类只是体现在个体中。”

(3) “事物现状的终止”必然取决于“人类创造精神的意旨”（这种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4)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这样的：“他身上带有人类的烙印（现

在对谁不能这样说呢?) ,按照人类的目标来确定自己的目标(似乎人类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目标的人!) 并且只是为了有可能将目前和未来的他全部献给人类 ,才力图完全成为他自己”(在一种虚幻的怪影面前的完全自我牺牲和自卑自贱)。

(5)对个人跟人类的关系问题也是用下面的夸张的蠢话来表达的:“我们大家就如同我们个人的活动一样 ,只是人类内部深处所发生的伟大运动的征兆。”“人类内部深处” ,这究竟是哪里呢? 这样说来 ,具体的人只是虚幻世界“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征兆”和标记。

(6)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他使这种“伟大精神”“在圣餐杯中发出色彩奇异的光辉”并象“圣灵”一样“在教友眼中发光”。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被这样变成“探求”圣灵和圣餐 ,当然 ,克利盖也可以说 ,“只需要认识”这种精神 ,就能“用爱把所有人团结起来”。

(7)在这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未做出以前 ,是把共产主义和圣餐^①混为一谈:“征服世界的精神 ,支配风暴和雷雨的精神(!!!!) ,治好盲人和麻疯病患者的精神 ,让世人同喝一种酒(我们要喝各种各样的酒) 和同吃一块面包(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更高的) 的精神” ,“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精神 ,就是共性精神”。如果这种精神确实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 ,那就完全不能理解 ,按照克利盖的说法怎么来解释私有制的长期存在。的确 ,这种精神还没有被“认识” ,所以它仅仅在克利盖个人的想象中是“永恒的

① 俏皮话:《Kommunismus》——“共产主义” ,《Kommunion》——“圣餐”。——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和无处不在的”。

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对“共性的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实现时最不需要的东西。

第四部分 向宗教谄媚

不言而喻,克利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正是浸透了宗教思想的那种心情的大言不惭的表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如何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其结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堕落。

在第 10 号上登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和“海尔曼·克利盖致哈罗·哈林”等文章中说,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

(1)“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克利盖却没有发现,这些基督教的幻想只是现存世界虚幻的反映,因此它们的“现实性”已经表现在这一现存世界的丑恶的关系中。

(2)“为了这个爱的宗教,我们要求:饿的人有饭吃,渴的人有水喝,裸体的人有衣穿”。一千八百年来这种要求已经重复得令人厌烦然而毫无成就。

(3)“我们教会人们表现爱”,为了

(4)“领悟爱”。

(5)“在他们的爱的王国不可能有任何鬼怪”。

(6)“他的(人的)最神圣的要求就是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的社会中,对这些人他决不保留其他任何东西,除了

(7)他那无限的爱”。可以设想,在这种无限性中,爱的理论达到了最高点,似乎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高的东西了;然而事实上却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东西。

(8)“这种爱的热情的流露,舍己为人的决心,对共同体的神圣的渴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最隐蔽的宗教,这种宗教只是缺乏相应的外部世界借以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了”。但是,现在的“外部世界”显然是使克利盖完全有可能把他的“最隐蔽的宗教”、他的“神圣的渴望”、他的“舍己为人的决心”、他的“热情的流露”,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9)“难道我们就不能严肃地对待长期受抑制的宗教心的激动,不能为彻底实现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兄弟友爱的乐园而斗争吗?”于是克利盖就开始为严肃地对待心的激动而斗争,但这个心不是寻常的、卑鄙的,而是宗教的;这个心不是因现实的贫困而变得残酷的,而是充满幸福的幻想的心。他象牧师一样在这里替别人说话,就是说替“穷人”说话,来证明他的“宗教心”。因此他一开始斗争时,就向人表明,他本人并不需要共产主义,他之所以参加斗争只是由于他对“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宽宏大量的、自我牺牲的、含糊不清的忘我精神,因为这些人需要他去帮助。在孤寂和忧郁的时刻,这种崇高的情感就充满这位善良人的心,成为他消除万恶世界一切不幸的灵丹。

(10)克利盖在结束他那激动人心的冗长的演说时说:“对于不

支持这种政党的人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人类的敌人。”这种十分过激的词句似乎和“舍己为人的决心”以及对一切人的“爱的宗教”相矛盾。但它确是这种新宗教的完全必然的结论,因为新宗教和别的宗教一样,也极端仇视并迫害自己的敌人。政敌在这里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异教徒,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党所反对的敌人已变成了对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类”有罪的应受惩治的罪人。

(11)在给哈罗·哈林的信中说道:“所有穷人都在玛门的压迫下痛苦呻吟,我们号召他们起来反对玛门,当我们把可怕的暴君从他的古老的王座上推倒时,我们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使早就预言的乐园终于来临。”为了对现在的金钱权力充满义愤,克利盖首先就得把金钱权力变成玛门偶像。这个偶像一定会被打倒,至于怎样打倒,那暂时还不知道。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缩小为单独的起义,打倒这个偶像以后,就会有预言家(“我们”)出现,为的是“教会”无产阶级以后该怎样做。这些预言家将“教会”当时很不了解本身利益的徒众,怎样“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而且并不是为了什么“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主要是为了实现圣书的预言,使一千八百年前一些空想家的预言不致落空。这种采取预言的作法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第8号上“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安得列阿斯·迪奇”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例子:

(a)“无产者,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

(b)“千万颗心愉快地跳动着去迎接实现誓言的伟大时代”,即“伟大的爱的王国……期待已久的爱的王国的来临”。

(c)在第 12 号“答神甫的敌人科赫”中说：

“永恒救世的福音被人急速地口口相传”甚至“手手相递”。“急速传播福音”这种奇迹以及关于“永恒救世”的这种胡说，完全符合另一种奇迹，即古代传道师的早已遭到摈弃的预言却出乎意料地开始由克利盖实现了。

(12)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第 8 号“什么是无产阶级？”一文中。下面是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无产阶级，这就是人类。”简直是故意说谎，这样说来共产主义者倒似乎想消灭人类。“人类”这一答复不正象西哀士对“什么是第三等级？”⁴的答复吗？这一点正说明了，克利盖是用模糊不清的外壳来掩盖历史事实。克利盖马上又对美国抗租运动做了一番虚假的描述作为新的论据。“最后，如果这个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他必需在一定的面具下出现，刚才还宣称无产阶级就是人类，而现在人类却变成无产阶级的一种身份了）“声明要求永远握有全部土地作为自己不可分割的财产又怎样呢？”我们看到，极简单的实际运动变成了象“人类”、“不可分割的财产”、“永恒性”等空洞的字眼，因此也就不会超出“要求”的范围。除了一般的形容词象“被压迫的”等等，还加上宗教的形容词“可诅咒的”。克利盖只是用一些神话和圣经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

“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

“永世徬徨的犹太人”。

结尾时他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难道人类应该永远象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大地上徬徨吗？”可是这个“人类”中的一部分安居在大地上这件事却正是他的眼中钉！

(13)克利盖宗教的本质极明显地反映在下面的话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应限于仅仅关心我们自己下贱的人格，我们是属于人类的。”对于脱离了“人格”并且与人格对立的“人类”（人类于是变成形而上学的臆想，而照克利盖的说法甚至变成宗教的臆想）的这种可耻的令人讨厌的奉承，这种真正极端“下贱的”奴隶般的自卑，就是克利盖的宗教以及其他任何宗教的结论。这种宣传卑谄求宠和轻视自己的学说，完全适用于勇敢的……僧侣，但永远不会适用于坚强的人们，特别是在斗争的时候。所差的只是使这些勇敢的僧侣阉割自己，去掉“下贱的人格”，以便使他们深信“人类”是能再生产自己的。如果说克利盖只能可怜地表现一下多情善感，想不出更好的东西，那末他在每号“人民论坛报”上反复搬弄他的“拉梅耐神父”，看来就是最机灵的做法了。

几乎每一号“人民论坛报”上都有那种乞求工作的话，这说明克利盖的无限怜悯和无限自我牺牲的宗教所引起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例如第8号上写道：

“工作！工作！工作！”

“在所有这些贤达的先生中，难道每一个人都认为供养忠诚的家庭并把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从穷困绝望中拯救出来，是徒劳无益的吗？例如，梅克伦堡人约翰·施泰恩到现在还没有工作，他愿意为资本家卖命，只要能够糊口就行了。难道这个要求在文明社会里是过分的吗？而巴登人卡尔·盖沙特勒呢？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看来十分忠诚善良，我保证他是忠诚的化身……此外，一位老年人和许多别的青年人也都在为

谋生而恳求工作。凡是能帮助他们的人,请赶快帮助他们,否则有朝一日,当你们特别需要睡觉的时候,良心的谴责会使你们失眠的。诚然,你们可以说:成千上万的人都恳求工作,我们终不能帮助他们所有的人。噢,你们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们是利己主义的奴隶,你们毫无心肝,不愿意这样做。假如你们不愿意帮助所有的人,至少也得证明你们还有一点人类情感的残余。尽你们的所能帮助那些孤苦的人吧。”

噢,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能够超出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实践方面,这就是新的宗教所宣扬的自卑自贱和自甘堕落的实际表现。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克利盖在他的报刊上所发表的言论带有什么性质,从上面所引证的那些地方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谈几点。

克利盖作为一个预言家,因而也就必然作为埃萨伊⁵秘密同盟——“正义同盟”的代表发言。因此,既然他不是代表“被压迫者”发言,他就是为了“正义”发言,不过这种正义不是一般的正义,而是“正义同盟”的正义。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他歪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发展,其实他对于这种发展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说般的阴谋。关于这一点每一号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答哈罗·哈林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同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克利盖作为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他首先向妇女们呼吁,他并不认为她们卑劣到竟能抗拒充满爱的心,然后,他作为“儿子”,作

为“兄弟”，作为“亲爱的兄弟”“用温顺的字眼象儿子似地”向新出现的鼓动者们呼吁，最后他作为人又向财主呼吁。他刚一到纽约，就写信给所有德国富商，用他那爱的纸炮吓唬他们，却不愿意过于露骨地承认他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有时用“人”，有时用“人们的朋友”，有时用“傻瓜”来署名。“我的朋友们，你们相信吗？”对于他的丑角式的妄言没有人理睬。除了克利盖本人外，谁也不感到奇怪。他往往用“万岁！共性万岁！平等万岁！爱万岁！”一类的感叹词句来装饰我们所熟悉的引证过的关于爱的词句（见第 12 号“答科赫”）。他把令人困惑的实际疑问和疑虑（见第 14 号“答孔策”）解释为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固执。作为真正的预言家和爱的宣传者，他以仿佛受骗的纯洁心灵对嘲笑者、不信神的人和旧世界的人表现了极端疯狂的愤怒，就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了奇妙地变成“有福的天国居民”而求助于他的甜蜜的热爱。在第 11 号题为“春天”一文中，他怀着这种灰心而伤感的情绪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嘲笑我们，但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虔信宗教的人，要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6 年 5 月 11 日

1846 年 5 月以石印单行本发表

署名：恩格斯、卡·马克思等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石印单行本译的

弗·恩格斯 普鲁士宪法的破坏

普鲁士有一条于 1820 年 1 月 17 日颁布的法律,那就是国王未得三级会议(大家都知道,在普鲁士迄今尚无这种会议)批准,不得借任何国债。这一法律就是担保普鲁士人总有一天会获得 1815 年就答应给他们的宪法的唯一保证。由于并不是普鲁士国外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一法律,所以 1823 年政府很顺利地在美国借到了 300 万英镑,这是第一次破坏宪法。1830 年法国革命以后,普鲁士政府既要被迫地加紧准备当时看来即将爆发的战争,可是又没有钱,于是勒令官办企业“海外贸易协会”⁶借款 1200 万塔勒(合 170 万英镑);这笔款当然是由政府担保,供政府使用的,这是第二次破坏宪法。小的破坏,象通过该企业借款几十万镑,就不必提了,如今是普鲁士国王第三次严重地破坏宪法。由于这一企业看来已经信用扫地,国王就授权同样是完全由政府专营的机关普鲁士银行发行纸币 1000 万塔勒(合 135 万英镑),除去三百三十多万作为保证金,六十多万弥补日益增长的银行开支外,实际上等于“间接借款”600 万塔勒,约合 100 万英镑。政府将对这笔借款负责,因为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私人资本家是普鲁士银行的股东。普鲁

士人,尤其是资产阶级,是最关心宪法的,看来他们决不会任其发展而不提出坚决的抗议。

弗·恩格斯写于 1846 年 5 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6 年 5 月 30 日“北极星报”第 446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给古·阿·克特根的信⁷

致古·阿·克特根并请传阅

几天以前转来你们的信,现在匆匆答复如下: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德国共产主义者必须结束他们中间一直存在到现在的隔离状态,建立经常的联系;我们也同意,必须建立一些举办讲演和辩论的机构,因为共产主义者必须首先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个清楚的认识,如果不经常举行一些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会议,便无法完全达到这点。你们认为必须广泛发行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便宜的通俗作品和小册子,这个意见我们也完全同意。上面两件事情应该马上积极进行。你们认为必须规定定期交纳会费的制度;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主张用这笔会费补助著作家以保证他们象样的生活。我们认为,会费只能用来印刷宣传共产主义的便宜的传单和小册子以及支付通讯(包括向国外发出的通讯)费用。必须确定每月会费的最低数字,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切知道,有多少钱可以用到公共用途上。其次,请你们务必把你们那里的共产主义团体的成员的名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同谁打交道,正象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一样。最后,我们等候你们把每月用于公共用途的会费数额通知我们,以便能够尽早开

始印刷几种通俗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不能在德国出版,这是显而易见,无需证明的。

你们对联邦议会、普鲁士国王、地方等级会议等等确实还抱有很大幻想。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通告才会发生影响,而实际上德国没有这样的政党。请愿只有当它同时又是一种威胁、而且还有紧密团结的组织起来的群众作后盾的时候,才会发生效力。你们唯一能做的(只要当地的条件有利于这样做),就是举行有大量的、声势可观的工人签名支援的请愿。

我们认为,目前就召集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还不是时候。只有当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团体,所有斗争办法都集中起来以后,召集各团体的代表举行大会,才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明年以前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在这以前,共同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通讯联系。

我们已经开始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侨居国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通信。只要我们得到关于英法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就会告诉你们,在我们经常的通信当中,我们了解到的一切也将随时告诉你们。

请把可靠的地址告诉我们(今后不要再用“古·阿·克特根”这样的全名,这样会把寄信人和收信人都暴露出来)。

来信请用下面完全可靠的地址:

布鲁塞尔,博登布鲁克街,菲·日果先生。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菲·日果,斐·沃尔弗同上

维尔特问您好,他现在在亚眠。

如果你们实现了请愿的意图,那只会使共产主义的政党公开暴露自己的弱点,并把政府要特意监视的人的名字全部泄露。要是你们的工人请愿书连500个签名也弄不到,那最好就象特利尔的资产者所打算做的那样,发动一次累进所得税的请愿;要是当地的资产者连这种请愿都不愿参加,这也无妨,那你们就经常去参加他们的公开的示威游行,巧妙地同他们一起行动,抛掉道地德国人的端庄、轻信和好心肠,签名支持资产者要求出版自由、宪法等等的请愿。如果做到这一点,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会有一个新纪元到来。我们的办法就会愈来愈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就会更加尖锐。在党内,必须支持一切使党前进的因素,但不能陷入无聊的、伦理性的辩论。此外,为了进行通讯工作,你们应当选出一个常务委员会,草拟和讨论寄给我们的书信的草稿,定期召开会议。否则就会乱七八糟。你们应该选出一个你们认为最适当的人来草拟信稿。个人的意见应当完全抛掉,它们会把事情搞糟的。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当然应该通知我们。

敬礼

上面签名的几个人同上

1846年6月15日于布鲁塞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1846年6月15日

第一次载于1933年2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普鲁士银行问题

大概你们已经知道,普鲁士国王想印钞票的意图肯定是不能实现了。两个掌管国债的官吏拒绝在新钞票上签字,因为他们认为,发行新钞就是再次增加国债,因而这件事应由三级会议负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显示他能随心所欲地弄到钱,现在想出了一个更胜一筹的妙计。他想弄到的不是 1000 万,而是 3000 万:2000 万纸币和 1000 万可靠、稳固的金币和银币。他打算靠发行股票来募集 1000 万资本,“这些股票显然不需要付红利,仅仅付 3.5% 的年息;而且为了使股票不致被人用来投机倒把,只有在持有者死后,股票才能转让”!!! 能把这种纸张叫做股票吗?为什么不能呢?普鲁士国王陛下已经宣布,这些纸张就是股票,并且他还梦想找到一大批愿意掏出 1000 万塔勒来购买这些既不能转让、年息又固定为 3.5% 的股票愚蠢资本家呢!而且他这种梦想正是产生在资本家可以从铁路股票的投机中获得更大利润的时候。如果国王如数找到了这些傻瓜,从他们那里借到 1000 万硬币,那他就要发行 2000 万纸币,从而使国债总共增加 3000 万。这真是一个随心所欲弄钱的好办法!连 1000 万也搞不到手,还想追求 3000 万!

弗·恩格斯写于 1846 年 6 月末
载于 1846 年 7 月 4 日“北极星报”第 451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
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鲁塞尔的德国
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
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

亲爱的先生！

欣悉您在诺定昂的选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英国的宪章派庆贺这次辉煌的胜利。正当自由贸易原则在立法上取得了胜利⁸的时候，自由贸易派大臣⁹在举手表决时却由于宪章派大多数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⁹。亲爱的先生，我们认为，这件事说明了英国工人阶级十分清楚，在自由贸易原则取得胜利后他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已经充分了解，现在，当资产阶级实行了他们的主要措施，当他们只需用果断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内阁来代替目前软弱的妥协的内阁就能成为贵国公认的统治阶级时，资本和劳动即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伟大斗争就要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今后战场将由于土地贵族退出斗争而廓清。而斗争也只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来进行了。敌对双方各有自己的由本身的利益和地位所决定的战斗口号。资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用一切办法扩展贸易并由郎

① 约·凯·霍布豪斯。——编者注

卡郡的棉纺织业巨头组织内阁来实行这种措施”；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¹⁰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国工人充分了解到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他们知道，从第三种力量即贵族被彻底击垮后，宪章主义鼓动的新时期就开始了；尽管资产阶级的报刊在玩弄“缄默诡计”，今后宪章运动应该而且将要起显著的作用；最后，他们也知道，在这些新条件下，他们面临着新的任务。他们打算在下一一次大选时参加投票选举，这证明他们是完全了解这些新任务的。

亲爱的先生，您在诺定昂选举时发表的卓越的演说中，那样鲜明地描绘了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关于这点我们应该特别向您表示祝贺。

由于托马斯·库伯这个伪装的体面人物发表了诽谤性的声明，所有宪章派组织都自发地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对您的信任，我们对此也表示庆贺。宪章派只有把那些戴着假面具的资产者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才能取得胜利，因为这些资产者是为了窃取声誉而把自己伪装成宪章派，同时他们又向资产阶级的作家（例如，布莱辛顿伯爵夫人、查理·狄更斯、道·杰罗尔德和库伯的其他“朋友”）阿谀奉承，并散布象“不抵抗”论这种只有老太婆才需要的腐朽可耻的学说，以求博得资产阶级的宠信。

亲爱的先生，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您和您的助手们在领导“北极星报”¹¹方面所表现的高贵而开通的风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声明，唯有“北极星报”这一英国报纸（或者把我们仅从“北极星报”中才知道的“人民杂志”除外）了解英国各党派的真正状况，只有它在实质上是真正民主的，只有它没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偏见，只有它

同情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在现代这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北极星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表达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见,所以它是真正值得大陆上的民主主义者阅读的一一的英国报纸。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扩大“北极星报”在大陆上的发行额,并尽可能争取在更多的大陆报纸上发表它的译文。

亲爱的先生,我们以在德国的许多德国共产主义者同国外民主主义者进行联系的公认代表的身份,谨向您表达这些敬意。

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代表

委员会 恩格斯

菲·日果

马克思

1846年7月17日于布鲁塞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46年7月25日“北极星报”第454号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弗·恩格斯 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¹²

现在两院正在举行会议。贵族院在处理了新出现的弑君者约瑟夫·昂利案件之后,照例就无事可做了。而众议院则正忙于核对本院的当选议员名单,并想趁此机会表明一下它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在1830年革命后这个时期内,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露骨的厚颜无耻和对社会舆论的蔑视。至少有 $\frac{3}{5}$ 的议员是内阁的亲朋好友,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大资本家、商人、巴黎交易所的铁路股票投机家、银行家和大工业家之流,就是他们的恭顺奴仆。现在的立法权比以前的任何立法权都更加体现出拉菲特在七月革命后第一天所说的话:“从今以后,统治法国的将是我们银行家了。”这是大金融贵族和 haute bourgeoisie〔资产阶级巨头〕统治法国的最显著的证明。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土伊勒里宫,也不是贵族院,甚至也不是众议院,而是巴黎交易所。真正的大臣并不是基佐和杜沙特尔这些先生,而是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和巴黎其他的大银行家,这些人的巨大财富使他们成为本阶级最有权势的代表人物。他们操纵着内阁,而内阁在选举的时候也关心仅使那些效忠于现存制度和受这个制度的恩惠的人当选。他们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很大成绩。政府的庇护、各种方式的贿赂,再加上大资本家对为数有限(不到20万人)而多少又都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选民

的影响,应时而来的谋杀国王的企图在有钱人当中引起的恐惧,以及人们相信路易-菲利浦的统治不会超过目前两院的任期(到1851年满期)等等,以上这些因素足以在大多数选举会上压倒一切重要的反对派。现在,既然这个宝贵的众议院已经召集起来了,这些人就要适当地关怀一下自己。独立的选民纷纷请愿并提出抗议,反对内阁阁员的当选;他们断言并一再证明或者准备证明,政府官吏在选举时几乎到处肆意破坏法律;他们证明,在选举过程中采取了贿赂、收买、恫吓和各种各样的包庇行为。但是大多数议员对这些事实从来不加注意。当每个反对派议员对这类丑恶行为提出坚决抗议时,口哨声、喧嚣声和“进行表决,进行表决!”的喊声便迫使他们缄默下去。于是一切违法行为便被符合法律的表决掩饰起来。大财阀们陶醉于自己的权势,但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权势已为期不长,所以赶紧抓住目前这个时机加以充分利用。

不难想象,除了这个资本家小集团之外还普遍存在着一个反对目前政府和这个政府所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中心是巴黎,在这里,大财阀对选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塞纳河区的14个议员当中,只有两个议员拥护内阁,而其余12个议员都是反对派。巴黎的大多数资产阶级选民都是属于梯也尔和奥·巴罗派的。这些选民力求结束路特希尔德一帮人独揽大权的局面,恢复法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也许还要争取一些不大的选举改革。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的作坊主、小店主等更加激烈,他们要求实行能够给他们选举权的选举改革,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属于“国民报”派或“改革报”派¹³,并且和包括着相当大一部分工人的民主主义政党相接近。这个政党又分为若干个派别,而其中人数最多的(至少在巴黎是这样)一个派别,是由共产主义

者组成的。这些不同的派别都在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当然每个派别都是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不过不久以前开始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是值得一提的。一个工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抨击这个制度的首脑,但抨击的不是路易-菲力浦,而是“高利贷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¹⁴。这本小册子的成就(它已出了近20版)证明,打击的对象选择得非常恰当。路特希尔德大王不得不两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抗一位只有身上衣服是唯一财产的无名之士的抨击。公众对这场论战极感兴趣。现在,pro[赞成]和contra[反对]的小册子已经出版了近30种。人们对于路特希尔德及其他大财阀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照一家德国报纸的说法,路特希尔德应该引以为戒,最好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离巴黎这个沸腾不息的火山较远的地方去。

弗·恩格斯写于1846年9月1日左右

载于1846年9月5日“北极星报”第460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

弗·恩格斯 普鲁士宪法

这个期待已久的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¹⁵终于问世了！如果相信“泰晤士报”、“地球报”¹⁶和一些法国德国报纸的说法，普鲁士总算已加入立宪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北极星报”已经充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所谓宪法不过是给普鲁士人民设下的一个陷阱而已，其目的是要剥夺已故的国王[⊙]在需要人民的支持时所许给人民的那些权利。事情正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企图利用这个所谓宪法来搜刮金钱，同时又不必向社会舆论作什么让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各国的民主报纸，象法国的“国民权”和“改革报”，甚至政府的“辩论日报”¹⁷，都同意这种看法。从手足双缚的德国报刊吞吞吐吐的言论中，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普鲁士的进步人士已识破了他们“坦率宽厚的”国王的狡猾意图。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国王能不能实现他的计划？中央等级会议会不会那样愚蠢或那样胆怯，以至它不给人民提供广泛的自由，反而保证给国王提供新的贷款，好让他有可能无限期地维持目前的统治制度？

我们的答复是：不，中央等级会议不会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这样做。

普鲁士现存的统治方式,是由普鲁士贵族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贵族以前的势力、财富和影响已大大丧失,再不能象从前那样支配国王了。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摆脱束缚着他们的工商业发展的重负——贵族。这样一来,代表着国家中央政权、受到大批各级文武官员的支持而又掌握着军队的国王,就能够时而迎合贵族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资产阶级,时而又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贵族,并尽量使这两者的势力保持均衡。差不多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了君主专制这个阶段,在较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让位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了。

在德意志最发达的邦——普鲁士,至今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统治和摧毁封建贵族残余的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资产阶级。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的因素所面临的状况是,在工业和文明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其中一个因素(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必然会日益增长,而另一个因素(贵族)则必然趋于没落、破产,其势力亦必将日益丧失。譬如,当普鲁士的贵族和大地主的状况由于本世纪初和法国进行破坏性的战争,随后又由于英国的谷物法使他们不能进入英国市场,以及他们在一项主要产品——羊毛的生产方面和澳大利亚进行竞争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每况愈下的时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发展了生产力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普鲁士的工厂工业就是在对法战争和禁止英国工业品向大陆市场输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和平重新恢复时,新兴的工业家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为他们实行保护关税(1818年)了。跟着很快就建立了一种几乎完全

是为了增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关税同盟¹⁸。但最主要的是,在近 30 年和平时期内各个工商业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竞争,迫使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必须加以抉择,或者是让外国的竞争把自己彻底挤垮;或者是仿效自己的邻国,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直到 1840 年,资产阶级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当新国王在 1840 年登基时,他们便认为这是一个表明 1815 年以来普鲁士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最好时机。至于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运动怎样顺利地发展起来,怎样扩展到王国的各个地区,最后又怎样把整个资产阶级、大部分农民、甚至连不少的贵族都席卷进去的情况,这里都不必说了。代议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法官终身制和陪审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至少在王国里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这样)很清楚,这些措施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措施,他们才有希望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取得他们所大力争取的对立法的影响。比较贫困的那部分贵族认为,立宪制度也许会保证他们在立法机关中取得一个符合于他们利益的地位;他们认为,这个新制度无论如何也不会象现时的制度那样使他们破产。抱着这种想法来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是普鲁士本部和波兹南那些特别苦于自己的产品没有销路的贵族。

资产阶级本身的处境日益困难。他们把自己的工业、采矿业以及航运业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他们成了关税同盟所控制的全部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他们的财富激增,人数也增加很多。但是英国的工厂工业和采矿工业在最近 10 年到 15 年当中的巨大发展,使普鲁士资产阶级面临着致命的竞争。每逢英国市场上商品过剩时,关税同盟所辖各区便有大量英国商品出现,这些商品的售

价使德国人比英国人更为吃亏,因为英国人在商业繁荣时期从美洲市场和其他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鲁士人除了在自己的税界内出售自己的商品外,根本无处销售。普鲁士的船只几乎没有进入外国港口的可能,但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却可以和普鲁士的船只一样开进普鲁士的港口。所以,虽然普鲁士的资本较少,但是要给这些资本找到有利的用途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经常处于困境;工厂、机器和商品慢慢地、但不断地在落价;这种普遍的不安曾一度为近八年来在普鲁士盛行的铁路股票投机所中断。铁路股票的投机由于抬高了租金的价值而加速了物价的跌落,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投机并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相当稀少,而且商业又不发达。不过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比较起来,这种投机活动获得利润的机会还是多些,因此稍微有一点资本的人都去进行这种投机。这种投机照例很快就发展到狂热程度,并以危机告终;普鲁士金融市场承受这种危机的重压差不多已有十二个月了。这样,资产阶级在今年年初便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金融市场上现款空前缺乏;工业区对政府拒绝实行的保护关税的要求比以前更加迫切了;各个港埠要求制定航海条例作为解救它们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但最严重的是粮价开始上涨,使国家处于饥饿的边缘。所有这些引起不满的情况同时而且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受着极端穷困的折磨;棉纺织厂关闭;在广大的莱茵工业区内几乎全部工人失业;大部分新收获的马铃薯毁坏了;粮食贵得象在荒年一样。显然,对资产阶级来说,从低能的国王、软弱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权并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每个革命时期都一再出现这样一件稀奇事:当运动的领导

价使德国人比英国人更为吃亏,因为英国人在商业繁荣时期从美洲市场和其他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鲁士人除了在自己的税界内出售自己的商品外,根本无处销售。普鲁士的船只几乎没有进入外国港口的可能,但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却可以和普鲁士的船只一样开进普鲁士的港口。所以,虽然普鲁士的资本较少,但是要给这些资本找到有利的用途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经常处于困境;工厂、机器和商品慢慢地、但不断地在落价;这种普遍的不安曾一度为近八年来在普鲁士盛行的铁路股票投机所中断。铁路股票的投机由于抬高了租金的价值而加速了物价的跌落,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投机并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相当稀少,而且商业又不发达。不过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比较起来,这种投机活动获得利润的机会还是多些,因此稍微有一点资本的人都去进行这种投机。这种投机照例很快就发展到狂热程度,并以危机告终;普鲁士金融市场承受这种危机的重压差不多已有十二个月了。这样,资产阶级在今年年初便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金融市场上现款空前缺乏;工业区对政府拒绝实行的保护关税的要求比以前更加迫切了;各个港埠要求制定航海条例作为解救它们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但最严重的是粮价开始上涨,使国家处于饥饿的边缘。所有这些引起不满的情况同时而且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受着极端穷困的折磨;棉纺织厂关闭;在广大的莱茵工业区内几乎全部工人失业;大部分新收获的马铃薯毁坏了;粮食贵得象在荒年一样。显然,对资产阶级来说,从低能的国王、软弱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权并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



弗·恩格斯对 1847 年 4 月 11 日联合省议会在柏林开幕时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讽刺画
(1847 年 5 月 6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作为附页发表)

阶级所处的境地非常有利于把运动引导到底的关头，日暮途穷的政府常常是被迫向这个领导阶级求援。例如，1789年在法国，饥饿、商业萧条和贵族的内哄，可以说推动了资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正在这个时候，政府由于自己财源枯竭而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从而为革命奠定了基础。1847年普鲁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正当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形势所迫而几乎不得不去改变统治制度的时候，国王由于囊中空虚也被迫召开了普鲁士的三级会议，从而亲自为改变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如果当时金融市场稳定，工厂全部开工（这只有在商业繁荣，销路畅通，因而工业品能在英国高价出售时才能做到）而粮食又很贱的话，三级会议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激烈地反对国王了。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在革命日益迫近的时期，社会的进步阶级总是占有一切优势的。

在1845年、1846年间，我曾经一再向“北极星报”的读者指出，普鲁士国王的财政状况是非常紧张的；同时我也让他们注意国王的大臣们企图帮助他摆脱困难的各种诡计，我还不止一次地预言，这一切必然要以召开三级会议而收场。可见，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情，也不是象现在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挥金如土的国王的慈悲表现。只有极端的贫困和破产才促使国王采取了这一步骤，这是普鲁士的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会不会答应提供新的贷款，从而让国王继续实行他的旧政策，把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再搁置七年。

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曾根据各个阶级的状况证明了这点，现在我们再拿三级会议本身的成员来证明一下。三级会议中有：

上层贵族代表和下层贵族代表 311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 306 名。

由于国王宣布他要用赐封新贵族的办法来增加上层贵族代表的名额(共 80 个),我们不妨把贵族的代表再增加 30 名;这样,贵族代表或执政党总共就有 341 名。从这个数目中除去下层贵族的自由派分子,即除去普鲁士本部的全部贵族、波兹南²/₃ 的贵族以及莱茵、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等地的一些贵族代表,譬如说,一共除去 70 名在选举中同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采取一致行动的自由派代表,那末双方的对比关系就会如下:

贵族即执政党的代表——271 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的代表即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376 名。

这样一来,即使偏僻地区的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中有 30 个或 40 个人投政府的票,自由派仍然会多得 25 票到 50 票。所以只要自由派再努力些,他们将来就不难提出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要求来对抗每一个收敛金钱的要求。此外,毫无疑问,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将支持资产阶级,并且将从外面施加压力(这是非常需要的)来增加三级会议内反对派的勇气和声势。

所以,尽管普鲁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但是,它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和陪审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它是 1789 年在普鲁士的重演。所以,即便是只有资产阶级直接关心现在已开始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运动对人民的利益也远不是没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旦建立起来,特殊的独立的民主运动马上就会开始。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而人

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决战”。法国和英国各民主主义政党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点。

还必须指出一种情况。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将使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北方国家同盟将瓦解。掠夺波兰的主要国家奥地利和俄国将同欧洲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因为普鲁士会把所有那些建立了立宪制的较小的德意志各邦吸引到自己方面去。由此可见,这个不足道的宪法使^{3/4}的德意志从死气沉沉的东欧阵营转到进步的西欧阵营,使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本变化。1846年2月,波兰最近一次起义爆发了¹⁹。1847年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召开了他的三级会议。波兰复仇的日子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2 月末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7 年 3 月 6 日“北极星报”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第 489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署名:恩

卡·马克思 驳卡尔·格律恩²⁰

“特利尔日报”²¹登了一篇标有“柏林 3 月 20 日”字样的文章，评论了我那本尚在印刷中的小册子“蒲鲁东先生的经济矛盾体系中的矛盾，或哲学的贫困”。柏林记者以为，“莱茵—摩塞尔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发表的那些关于这本小册子，关于蒲鲁东的著作²²及其译者格律恩先生的活动的报道，出自我的手笔。他一再沿用布鲁塞尔记者即上述报道的作者用的称呼，尊我为“前‘莱茵报’²³的编辑”。我们这位朋友“凭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大肆诬蔑。我看，不仅是他的诬蔑，就是他的全部写作生活，都可以“凭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来行事。我承认，他在“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方面是久经考验的；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但在这一次他的这一长处却没有“指靠得上”。

这个所谓的柏林记者只要看一下我在“批判的批判”²⁴里对蒲鲁东提出的意见，就会相信，虽然他所攻击的那篇报道可能寄自布鲁塞尔，但那篇报道却把蒲鲁东和格律恩先生“看作有同样价值的人物”，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我写的。

我批评蒲鲁东的文章是用法文写的。蒲鲁东可以自己来答复这篇批评。他在他那本书没有出版以前写给我的信里，并没有表

示,如果我要进行批评,他会委托格律恩先生及其伙伴为他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译者”,这位柏林朋友就只好写下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从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得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因此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不过这里必须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取得了一些“知识”,尤其是取得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并且一下子就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充实了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啊!

柏林记者或者说冒牌的柏林记者把我当成了布鲁塞尔记者或者上述记者,他说:

格律恩“不幸先于‘前‘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博士向德国公众介绍了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也许就因为这一点才会受到报复”。

无疑地,我们这位朋友是竭尽了牵强附会的能事!我愿意 *sub rosa*(私下)告诉他,在我看来,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同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之间,除了一些人名和日期而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但是同时我要对他说,我没有兴趣“向德国公众介绍”我在研究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倒乐于把我一年以前写的详细评论格律恩先生的大作的手稿放到一边;现在只是由于这位柏林朋友的逼迫,才不能不把它交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²⁵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²⁶一书的补充。

至于这篇手稿一直未能发表的原因,也许会作为“德国出版界的现状”的续评在另一个地方向读者加以说明。但是单独发表这篇与书报检查令毫不抵触的对格律恩一书的评论,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唯一的一点点障碍是我们认为这本书不值得专门进行批判,只是在评述所有平庸鄙陋的德国社会主义作品的过程中提到格律恩先生的时候,才不能不提到这部作品。然而现在,当这位柏林朋友发表了他的文章以后,再单独发表这篇评论,就多少有点滑稽了:它将表明,“德国公众”是怎样“熟悉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是多么渴望和多么善于取得“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由此还可看出,即使我想阻碍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进展,我是否需要用此下策,在报纸上发表小块文章,进行无足轻重的攻击。最后,这位柏林朋友也不能不向大家证明,假如我真的打算象他所理解的那样“向德国公众介绍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并且真的害怕有个先行者同我竞争,那我就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命运祈祷:“但愿上帝不要让我碰上一个先行者,不然最好就让格律恩先生做我的先行者吧。”

对于我“狂妄不羁地自以为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这种说法,我还再说几句话。

除了格律恩先生,谁还能把这顶帽子硬扣在我的头上呢?格律恩先生(参看他的“建筑基石”²⁷的卷头语)认为,我在“德法年鉴”²⁸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和蒲鲁东现在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猜中了世界最后的谜语。他现在又把蒲鲁东捧为具有真正观点的人,可是他也曾经恭维过我,说我(参看格律恩的“新轶文集”²⁹)“摧毁了立宪派和激进派的观点”。格律恩先生先给我灌够了毒药,然后可以振振有词地责备我,说我中毒了!但是请这位柏林朋友放心吧!我

还安然无恙。

卡尔·马克思

1847年4月3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1847年4月8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28号和1847年
4月9日“特利尔日报”第9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特利尔日报”并曾与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核对

弗·恩格斯 德国的制宪问题³⁰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它日益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谈阔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经受检查的书刊上它也可以倾吐肺腑,畅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

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自封为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 社会主义者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德国大部分盗用“共产主义者”名义的著作家。后者比前者更坏,如果他们之间可以比较好坏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这些 *soi-disant* (所谓的) 共产主义著作家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党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他们也不代表党的利益。相反地,他们维护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卫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已经讲过,德国的 *soi-disant* [所谓的] 共产主义作家大都属于这一种人) 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 由君主专制过渡到现代的代议制根本不能消灭广大人民的贫困, 只不过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获得政权而已。他们又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说, 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利用它的资本压迫人民群众最厉害, 因此它是作为人民群众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 *par excellence* [真正的] 敌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懒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比较一下, 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发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他们没有认真思考, 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党的活动家总是力图达到实在而具体的效果, 总是代表整个阶级共同的特定利益, 如果他们真是党的活动家, 那他们至少会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反对者(从“改革报”的编辑们一直到极端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战的, 特别应该注意到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老卡贝是怎样进行这种论战的。他们早应该看出, 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经常接触到迫切的政治问题, 而且甚至象选举改革草案这一类往往不代表无产阶级直接利益的政治措施, 他们也决不会傲慢地等闲视之。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活动家, 而是德国的理论家。在他们看来, 要紧的不是实际的利益和效果, 而是永恒的真理。他们所努力保护的利益, 是一切“人”的利益; 他们所力图达到的效果, 只限于哲学上的“收获”。这样, 他们只需使自己的新观点符合于自己的哲学良心就可以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说, 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 正是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阶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座, 不论资产阶级遭到了怎样的攻击, 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

在法国,十七年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因此,法国无产者、他们的党的领袖和他们的著作界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是对统治阶级、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攻击。这是肯定的革命行动。下面一些事实表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多么清楚:出版物和社团无数次地被起诉,集会和宴会遭到禁止,资产阶级利用警察对改革派³¹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百般吹毛求疵的迫害。而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它甚至是现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转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给法国共产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监禁和流放,但是它给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的,却无非是书报检查机关的赞扬而已。法国无产阶级论战的革命热火一到了德国理论家的冰冷的胸膛里,就冷却到书报检查机关所准许的程度,而革命的热火经过这一番阉割之后,就恰中德国各邦政府的心意,它们就利用它共同去反击进攻的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 *status quo*(现存秩序,现状)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倾向。可是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责备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对代议制、陪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府、官僚和贵族。

德国共产主义者该解脱他们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责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

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己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俗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完全不同于反动的贵族,譬如说法国的正统主义者或“青年英国”³²对它的攻击,同样也完全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德国现状的代表者根本无法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不如说是针对这种现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末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我们只是这一反对派大军中最先进的支队,同时,由于我们并不掩盖自己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打算,所以这个支队的地位也最为明显。

随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召开,在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中出现了—个转折点。这种现状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消灭,都要取决于这届议会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那些态度很不明确、彼此间界限混乱不清但在思想方面又各不相同的党派,就必须弄清楚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和应该采取的策略了:它们应该彼此划清界限,开始进行实际活动。这些党派中的最年轻的共产党不能规避这一必要的任务。它也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战斗计划和手段。第一个步骤就是揭露那些力图钻进它队伍里来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它应该尽快地完成这一步骤,因为它已足够强大,用不着同那些败坏它

声誉的同盟者合作。

(二)

STATUS QUO [现状]和资产阶级

下面要讲的就是德国的现状。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虽然它对各邦政府也有某些影响,可是只要双方的利益一发生冲突,在贵族地主的影响面前,它这种影响就要退避三舍。法国和英国是城市统治着乡村,而德国却是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统治着商业和工业。不仅德国的君主专制的各邦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君主立宪的各邦如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在文明方面比西方各国落后。在西方各国,人民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商业和工业,而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则是农业。英国不仅不输出任何农产品,它还需要经常从国外输入农产品;法国输入的农产品至少和它输出的相等。这两个国家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当德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初建立的时候,也就是说1815年的时候,农业所占的比重比现在还大,而且由于推翻法兰西帝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德国农业区的人,所以这种比重当时还有增无已。

也象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贵族,即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

建制度。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随着(农业阶级之外)从事工业的阶级的形成和(乡村之外)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

这个新形成的、同贵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贵族的农民并存的阶级,不是今天在各个文明国度里已掌握统治权、在德国正在争取统治权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德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贵族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妥协的结果,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在构成这个阶级的时候,妥协的双方是按照彼此的地位加入进来的:代表较重要的生产部门的贵族把较高的职位留给自己,而小资产阶级则满足于较低的地位,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推荐自己人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凡是官僚机构受到直接监督的地方,例如德国立宪制各邦,贵族和小资产者也是按照这个样子分享这种监督权力的;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贵族大占便宜。小资产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打倒贵族,甚至连和它处于平等地位都做不到;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削弱贵族。要把贵族打倒,需要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资产阶级。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由竞争和财产集中。小资产者代表内地和沿海的商业、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些经济部门在有限的区域里发展着,需要的资本数额不大而且周转缓慢,它们所引起的竞争只是地方性的、微弱的。资产者代表世界贸易、全世界范围内商品的直接交换、银钱业、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大工厂工业——这些

经济部门需要尽可能大的地盘、最大数额的资本和最快的资本周转率,它们所引起的竞争是普遍的、剧烈的。小资产者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资产者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小资产者发现,只要他能在间接影响国家立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省政机关,同时又做自己本地市政机关的主人,那他的处境就十分安全了。资产者如果不直接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小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德国的帝国城市,资产者的典型产物是法国的代议制国家。小资产者哪怕得到统治阶级些微的让步,就变得保守起来;而资产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统治地位的时候则是革命的。

德国资产阶级对那两个分享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态度如何呢?

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有一些豪富的银行家,可是就没有大资本家阶级,更谈不到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³³,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以致在1818年普

即中世纪时德国的一些直接受皇帝管辖而不受诸侯管辖的城市。——译者注
14—17世纪时,德国北部有过一个政治性及商业性的组织,叫做汉撒同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垄断德国北部的贸易。加入这个同盟的城市就叫做汉撒城市。——译者注

鲁士政府被迫为它们制定了保护关税。1818年的这项普鲁士关税率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式承认。它承认(固然是满怀不平、非常勉强地)资产阶级已成为国内不可缺少的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下一个让步就是成立关税同盟。尽管德国大多数邦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本来只是从国库和政治方面考虑的,可是结果这件事情对谁也不象对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那样有利。虽然关税同盟在某些方面也给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带来了一些零星的好处,但是整个说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兴盛、竞争的活跃以及过去的生产工具被排挤,关税同盟给他们带来的害处毕竟要多得多。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发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鲁士。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的高峰,可是它毕竟把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了一些资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铁路网。至少它把事情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现在它要末继续向前迈进而成为统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经是德国的领导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正式统治着德国的阶级之所以日益无力,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日益强大。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贵族越来越穷了,它负的债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赎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费用提高了,并且给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赎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钱财来弥补的。俄国和美国的竞争限制了贵族的谷物销路,澳洲的

竞争以及南俄罗斯的一度竞争,限制了它的羊毛销路。生产费用越高、竞争越剧烈,就越清楚地暴露出贵族已不能够有利地经营自己的庄园和采用农业方面的最新成就了。和上一世纪法国与英国的贵族一样,德国的贵族只是利用文明的发展在大城市中摆阔佬架子,任意挥霍自己的财产。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教养和文化教养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豪富和挥霍方面展开了竞赛;在资产阶级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处处都要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种竞争和竞赛也和其他任何竞争一样,结果总是更富有的一方获得胜利。土贵族向宫廷贵族转化,结果破产来得更快、更无法避免。构成贵族收入的那3%是抵抗不住构成资产阶级利润的那15%的。收入3%的贵族只好去典押不动产,向贵族信贷机关借钱,以便能够支付适合于贵族那个等级的开支,而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快地破产。有些乡绅很聪明,逃避了破产,他们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地主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地主—企业主阶级。这个阶级在农业经营方面没有封建主那些幻想,也不象贵族那样疏忽大意,它把农业当做实业、当做工业来经营,并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专门知识和劳动。它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处得很好,所以在法国这个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并且还按照自己财富的多寡参加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经营的是农业。

可见,贵族已经软弱到这样一种地步,就连它本身也已经部分地转到资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小资产者比贵族还软弱,它更远不能和资产阶级抗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它的琐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时代即中世纪后期,也只能建立地方性的组织,进行地方性的斗争,取得地方性

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贵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而全面的政治统治它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达到过。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它连表面上的一点历史主动性也丧失了。它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间背腹受敌,既受到前者政治优势的压制又受到后者雄厚资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住在大城市里的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多少有些胆怯地依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较贫穷的特别是住在小城镇里的小市民,他们恪守现存秩序,并以它特有的全部惰性力支持贵族。资产阶级越发展,小资产者的处境就越坏。这后一部分小资产者也逐渐开始明白,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是逃不掉破产的,而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虽然也很可能遭到这种破产,但他们至少还有可能向前迈一步,跨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破产越是不可避免,他们就越是转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当资产阶级刚刚一取得政权的时候,在小资产者中间就会重新发生分裂。小资产阶级为每一支资产阶级的队伍准备了后备军,此外它还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下院或法国的众议院以及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资产阶级用它的资本的猛烈炮火和林立的股份公司把小资产者压得越紧,这一群群毫无纪律、装备很坏的小资产者就越是束手无策,他们的逃窜也就越发乱无秩序。最后,要末他们就集合在无产阶级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我们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和极端需

要钱的时刻,勇敢地下决心和贵族断绝关系而投靠于资产阶级。

可见,小资产者和贵族一样不能成为德国的统治阶级。相反地,他们也日益屈从于资产阶级。

剩下来的还有农民和无产阶级。

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民仅仅指小农户、小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而言,不包括短工和雇农。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凡是由于没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致农民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地方,例如在瑞士山区各州和挪威,封建时代以前的野蛮、地方的局限性、愚昧而怪诞的顽固和迷信、愚忠和愚善这些东西同时也就占居统治地位。凡是除农民之外存有贵族继续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德国,农民就完全和小资产者一样,处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面夹攻的地位。他们要想使农业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强大的工商业的侵害,就得投靠于贵族。他们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贵族特别是资产阶级地主的竞争所压倒,就得投靠于资产阶级。他们到底归附哪一边,这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德国东部的富裕农民对雇农还保有一些封建权力,他们各方面的利益都和贵族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不会真的和贵族一刀两断。德国西部由于贵族的庄园被分割而出现的小土地占有者和东部处于世袭统治之下而且有的还要服徭役的小农,这两种人受贵族的直接压迫太厉害了,或者说他们和贵族之间的对立太尖锐了,所以他们不能不站到资产阶级那一边。普鲁士的各个省议会证明,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可见,很幸运,农民的统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农民自己也

很少想到这件事,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大部分置身于资产阶级支配之下。

而无产者,即 vulgo(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我们很快就要详细地论述他们。这里我们只指出他们成分不一的情况。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而且又散居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谅解并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雇农和短工维护贵族或雇用他们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师傅为转移。工厂工人听凭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由此可见德国工人群众对夺取公共事务领导权是如何没有准备。

我们把前面讲过的总结一下。贵族已经衰败不堪,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太软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统治阶级。剩下来的就只有资产阶级了。

德国现状可悲之点主要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门变成全民族的 *par excellence*(主导)

生产部门,从而自己也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10世纪以来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切等级和阶级——贵族、农奴、徭役农民、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帮工、工场工人、资产者和无产者——肩并肩地存在着。他们之中那些靠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某个生产部门的代表者的等级和阶级,即贵族、自由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者,按照各自的人数、财富和在全国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瓜分政治统治权。前面已经讲过,这样瓜分的结果,贵族分得的最多,小资产阶级分得的最少。资产者的正式身份只是小资产者,而真正的农民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因为他们自身势力微弱而且分散在其余的阶级中间。这种以官僚为代表的制度是德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软弱无能、死气沉沉和乌烟瘴气在政治上的反映。在国内,和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就是德国的分割状态:德国分成38个地方的和省的邦,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又分成若干独立省;在对外关系上,这种制度对外来的压榨和打击显得可耻的无能。这种普遍的可悲状态的根源就是普遍缺少资本。贫穷的德国的每一个阶级从一开始就带有小市民的庸碌的标记,和其他国家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们又穷又落后。从12世纪以来,德国的上层和下层贵族同家财豪富、心胸开阔、无忧无虑、凡事坚决果断的法、英贵族比较起来,显得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德国帝国城市和汉撒城市的市民同14、15世纪造反的巴黎资产者相比,同17世纪的伦敦清教徒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偏狭短浅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的最大的工业家、银行家、船主同巴黎、里昂、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巨头比较起来,也是多么小资产阶级气呵!甚至德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浑身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气息。可见,小资产阶级虽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低微,可是它至少有一点能够聊以自慰,即它是德国的典

型阶级,它把自己那种自甘屈辱和为日常琐事操心的特点也传染给其他阶级了。

这种可悲的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末同样,只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在德国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够摧毁现状的阶级呢?有的,有这样一个阶级,尽管和英国、法国的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还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可是到底它是存在着的,具体说来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在各个国家里,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在官僚君主制度下所建立起来的妥协,都被它摧毁,并通过这种办法首先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在德国,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把大部分(起码是这样)地主—

企业主、小资产者、农民、工人、甚至某些贵族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的阶级。

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是唯一明确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现状的党,只有这个党不局限于抽象原则和历史演绎,而要求实行非常明确肯定、具体易行的措施;只有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至少在地方和省的范围内是这样),只有它多少算有个行动计划。一句话,这个党是带头和现状做斗争并直接参加消灭它的活动的党。

可见,资产阶级的党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党。

因此,问题就仅仅在于资产阶级是否已到了必须通过消灭现状夺得政权的地步,和软弱的敌人比较起来,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现状?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工厂主。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铁路收入依靠它,因而交易所的生意也有一大部分要依靠它。不依赖于工业的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谷物、羊毛出口商和一小伙外国工业品进口商。因此,工厂主的要求就是整个资产阶级和目前依附于它的那些阶级的要求。

工厂主又分做两类:第一类进行原料的初步加工,出售的是半成品;第二类买进半成品,制成成品供应市场。属于第一类的是纺纱厂厂主,属于第二类的是织布厂厂主。第一类在德国还包括制铁业的企业主……[⊖]

要想能够利用新发明的辅助工具,修筑良好的道路,买到便宜

⊖ 手稿缺4页。——编者注

的机器和原料,雇到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就必须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要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把一切工业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就需要有依赖于内地工业的、商业繁荣的沿海城市。这个原理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阐明。可是,在只有英国人不怕任何竞争的今天,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适用于一切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部门而且经常随着工业状况而改变自己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普鲁士的现政府不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加入关税同盟的各邦政府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一套制度只能由执政的资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和实行。这也说明德国资产阶级不能再没有政权了。

在德国尤其需要这样一套保护关税制度,因为那里的工场手工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规定出一套完整的保护关税办法,工场手工业就经不住英国机器的竞争,而所有到现在为止还靠工场手工业谋生的那些资产者、小资产者、工人也都要遭殃。这就使德国资产者完全有理由情愿用德国的机器把工场手工业的残余消灭掉。

可见,保护关税是德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而且只能由资产阶级自己来实现。因此,单从这一点看来,它也应该掌握国家政权。

工厂主不能充分有利地利用他们的资本,这不仅是因为关税不够高,而且还因为有官僚政治存在。如果说在关税立法方面他们所碰到的是冷淡,那末在和官僚的相互关系上他们所碰到的是政府方面公然无忌的敌视。

官僚政治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统治小资产者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散居在小城市或乡村里,他们的利益超不出最狭隘的地方范围,因此他们的眼光必然象他们狭隘的生活条件一样短浅狭隘。

他们不能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见识而言,他们也不可能使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彼此协调起来。各种利益犬牙交错这种最古怪的现象(我们只要想一想行会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就够了),正是发生在小资产阶级欣欣向荣的那个文明发展阶段上。这样,小资产者和农民就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他们不得不接受监护,以免陷于极度混乱或让无数次的诉讼弄得倾家荡产。

可是,小资产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资产者难以忍受的束缚。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官吏们的监督和干涉已经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德国工厂主为了尽可能摆脱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使用的手段是贿赂,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无法怪罪他们。但是这种手段只能替他们减去少许的负担;这一则是他们无法向自己接触到的一切官吏行贿,再者行贿也不能使他们不支付额外开支,不能使他们不付给律师、建筑师、机械师报酬以及由监督所引起的一些其他开支,行贿更不能使他们避免预料不到的忙闲不均现象。工业越发展,“忠于职守的官吏”就越多,这些人或者只是由于狭隘,或者是出于官僚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总是百般苛刻地刁难工厂主。

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摧毁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只要国政和立法一转到了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官僚就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迫害资产阶级的人变成了它的恭顺的仆从。过去那些专门为了便于官吏对付工业资产者的规章和诏令退位了,新制定的规章是便于工业家对付官吏的。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资产阶级的派系都直接关心工厂工业的最迅速的高涨,而工厂工业在官僚的吹毛求疵的制度下是不能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就更需要尽快地摧毁官僚机构的势力。

使关税体系和官僚机构服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最迫切希望实现的两项措施。可是它的需要远远不止于此。它要根本改变差不多德国所有各邦政府的整个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纯粹是用来维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一向力图加以摧毁的社会制度的。贵族和小资产者得以共存并处的条件,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而在德国各邦,只有前者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就拿普鲁士的现状来看吧。小资产者能够听命于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官僚制度,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和个人托付给“独立的”、即具有官僚式独立性的法官阶级胡乱摆布,而这个阶级因此也就保护他们不受封建贵族、有时也不受行政机关官僚的侵犯,但资产者就不能够这样做。在有关财产的诉讼方面,资产者所需要的是至少必须保证公开审理,而在刑事诉方面,除公开审理而外还要求实行陪审制,把司法置于资产者代表人物的经常控制之下。小资产者可以同意贵族和官吏不受普通的裁判,因为小资产者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屈辱表现,是完全和他们的低微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可是不使本阶级在社会和国家中取得首位就非溃灭不可的资产者,却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小资产者可以把地产方面的立法权让给贵族独揽而不致损害自己的宁静生活;他们应该这样,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城市中的利益不受贵族的影响和侵犯,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资产者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贵族任意地调整乡村的财产关系,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就需要尽量地对农业的经营也采取企业方式,需要建立一个农业企业家的阶级,需要自由出售和自由支配地产。由于地主免不掉要抵押不动产取得贷款,资产者就有可能利用这一点迫使贵族同意资产阶级可以干预有关地产的立法,至少在典

押法方面可以干预。小资产者的营业规模不大,资本周转缓慢,顾客人数不多面也不广,因此糟糕的普鲁士旧商法并没有使他们吃大苦头,他们甚至还很感谢它给予他们的那一点点保障,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种商法就是无法忍受的了。小资产者所进行的交易非常简单,大商人之间很少做这种买卖,小资产者的交易差不多总是零售商的买卖或者是生产者直接卖货给消费者,所以小资产者就很少遭到破产,并且很容易遵守普鲁士的旧破产法。这种法律规定,用债务人的财产抵偿债务的时候,期票债务应该比其他票据的债务优先偿还;可是通常全部财产都下了司法人员的腰包。这些法律的制定首先是为了处理债务人财产的司法官员的利益,其次也保护所有非资产者的利益不受资产者的侵犯。这些法律特别保护贵族,因为贵族把谷物送交买主或代售者的时候总是收到或向他们索取期票;而凡是每年仅仅出售一次货物,收进期票就算完成全部交易的人,也都受到这些法律的庇护。在与商业有关的人们中间,受到保护的仍然是银行家和批发商,而工厂主的利益却被大大地忽视了。资产者只是和商业家打交道,他们的顾客遍布各地,他们从世界上每个角落收进期票,所以他们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处理各种交易的制度,他们随时都有遭到某种破产的危险。这样的资产者碰到这些荒唐的法律,只有垮台。小资产者关心本国总的政治情况只是为求平安无事;由于他们切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他们看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资产者是和极遥远的国家通商,或者要和它们竞争,如果不对本国的对外政策保持最直接的影响,就不能够获得巨大发展。小资产者能够容许官僚和贵族向他们征税,这和他们服从官僚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资产者最关心的是在分配社会负担的时候尽可能地少损害他们的利润。

总之,小资产者可以满足于用自己的消极和顽固来对抗贵族和官僚,并且靠本身特有的 *vis inertiae*〔惰性力〕保持对社会权势发生某些影响,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他们要使自己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使自己的利益在立法、行政、司法、税务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成为首要的利益。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它就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使一切其他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

而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目前需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才能免于溃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到保护关税和资产阶级同官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时已经指出了。可是这一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却是目前德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状况。

1845年英国工业的繁荣和由此而产生的铁路股票投机,对法国和德国发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兴旺时期都要强烈得多。德国的工厂主做了赚钱的买卖,而德国整个商业活动的高涨也随之而开始。农业区的人们在英国找到了销售自己的谷物的良好市场。普遍的繁荣活跃了金融市场,便利了借贷,把许多数额较小的资本吸引到市场上来,而这些资本在德国有很多几乎是找不到用场的。^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3月—4月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1929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以下各页手稿缺。——编者注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

自从普鲁士国王急需现钱和贷款因而不得不发布二月三日圣论³⁴以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已不怀疑,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以“仁政”见称的过去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统治,已临近末日,虽然它竭力挣扎而且国王也发表了威胁性的御前演说。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可以看作这就是自己统治开始的日子来到了。这个圣论本身也无非是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承认,虽然这种承认还笼罩着波茨坦的浓密的烟雾。但联合省议会只轻轻一吹,大部分烟雾就消散了,而所有这些基督教德意志的怪影,也会很快绝迹的。

但是,既然中等阶级开始居于统治地位,那末首先就该要求把德国以及关税同盟的整个贸易政策,从德意志各邦君主、他们的大臣以及对工商业问题一窍不通而又高傲的官吏等这些外行手里接收过来,交给熟悉这一行并和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去掌握。换句话说,不管是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问题还是自由贸易问题,都应该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

柏林联合省议会向政府表明,资产阶级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最近关于关税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明显而又尖锐地向施潘道政府制度³⁵的代表表明,他们不能理解物质利益,因此也不可能捍卫和支持这些利益。单只克拉柯夫事件³⁶就足以把神圣同盟中的威廉^①

及其大臣当做最无知的蠢汉或罪恶深重的出卖国家福利的叛徒加以痛斥了。但是使陛下及其大臣阁下感到可怕的是,现在讨论的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话,唯独没有赞扬君主和大臣(不管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的才干和洞察力的。

资产阶级内部也正在工商业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坚持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的一派没有问题是势力最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如不采取一些硬性措施来维护和鼓励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就不能保住自己的阵地,巩固起来并取得绝对权力。如果不防止外国工业的侵入,十年之内他们就会垮台。很可能就连这种防止也不会使它长期得到真正的好处。他们等得太久了,在他们尊敬的君主多年来包裹他们的襁褓里躺得太乖了。他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包围,别人赶过了他们,占去了他们最好的阵地,而他们却乖乖地挨着“拳头”,从来也拿不出足够的勇气摆脱自己那些虽然蠢笨但是极为仁慈的长官和上司。

现在情形就不同了。现在德意志各邦君主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既然资产阶级还有时间和可能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保护德国工业和德国商业就是他们唯一能够借以支持的基础。资产阶级想(这是应该的)从德意志各邦君主那里得到的东西,也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和资产阶级同时并存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叫做无产者的人们——工人,无产阶级。

试问,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因此得到更高的工资,吃穿更好一些,居住条件更有益于健康吗?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休息和学习吗?他们会得到一些钱来更合理、更注意地教养自己的子女吗?

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的资产者先生们,从来也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把工人阶级的福利摆在首位。照他们说来,保护工业制度实行以后,工人会过真正的天堂生活,德国就会因而变成无产者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人之地。但是自由贸易派却说,只有实行他们的制度,无产者的生活才会象“在上帝怀抱里”那样自在快活。

这两派中还有很多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话是真话。但这两派中比较聪明的人都很清楚,上面那些话不过是一种骗局,目的只是为了迷惑群众,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

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这样一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保护关税派还是自由贸易派,乍一看来,对无产者好象都是完全无所谓的。

但是,前面已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根除以封建贵族为代表的中世纪残余和“天生的”现代寄生虫,而且也是为了毫无阻碍地揭示自身的内在本质,所以连工人阶级也想为资产阶级取得无限的统治权出一把力。

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只有到贫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级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级,或者只

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

那时候,战场上就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障碍物,也不会有任何附带的次要的任务,敌对双方的阵地就会很明确。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

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象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倒。

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6 月初
载于 1847 年 6 月 10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4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

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³⁷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上半年
1847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刊行于
巴黎和布鲁塞尔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 1847 年版译的，并参考
了 1885 年、1892 年德文版、1896
年法文版所做的订正

卡·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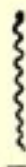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 Karl Marx.



PARIS.
A. FRANK,
69, rue Richelieu



BRUXELLES.
C. G. VOGLER,
2, petite rue de la Madeleine.

1847

“哲学的贫困”第一版的封面

序 言

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

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鲁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

卡尔·马克思

1847年6月15日于布鲁塞尔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预言家受到的裁判要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读者必须甘愿和我们一起经过“创世记”的贫瘠而阴暗的杂学的领域,然后才和蒲鲁东先生一起升入超社会主义的缥缈而富饶的境地(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前言第3页第20行)。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使用价值。这些产品具有的互相交换的性能,则称为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呢?……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很仔细地阐明(交换)价值观念的起源,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论述。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二章)

蒲鲁东先生打算先给我们说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区别”,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我们必须和蒲鲁东先生一起来谈谈这种神秘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我们作者的意见,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们就得求助于工业生产。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种工业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怎样呢?个人需要很多东西,可是“不能单独生产这些东西”。需要满

足的各种需求,就决定要生产多种东西(不生产就没有产品);要生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就已经决定参加这项生产的不止一个人。既然认为从事生产的不止一个人,那末这就完全决定了生产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鲁东先生所假定的那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全盘的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

然而蒲鲁东先生喜欢绕圈子。我们就跟他一起转吧,转来转去总是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去。

为了摆脱每个人单独生产的状态并达到交换,蒲鲁东先生说:“我就求助于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从事各行各业的合作者,虽然按照蒲鲁东先生的假定我们(和其他一切人)这时还没有摆脱鲁滨逊式的那种和社会隔绝的孤独状态。合作者和各种不同的业务,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含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

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仔细地阐明”的。

同样,蒲鲁东先生也可以把整个事态倒转过来而仍然不损害他的结论的正确性。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这和蒲鲁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前言第1页)正好相反。

假定分工是已经知道的事情的蒲鲁东先生,怎样用分工来说明他始终不知道的交换价值呢?

“个人”开始“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建立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合作者们如果接受这种区别,那末要蒲鲁东先生“操心”的只是记录一下既成的事实,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标明和“列入”“价值观念的起源”。但是他总还应该把这个建议的“起源”讲给我们听听,此外也应该给我们讲讲这位单独的个人,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对于交换的这个第二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换价值应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会找到很现成的回答:假定有人曾“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二次方。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

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对于交换的这个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又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也会找到现成的回答:可以假定曾经有人“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德行、爱情等都变成交换价值,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三次方,即最后一次乘方。

可见,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事事适用,它能答复一切和说明一切。特别是在要从历史上来说明“某种经济观念的产生”的时候,蒲鲁东先生就会假定一个人,这个人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去完成这个产生的动作,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把交换价值的“产生”当做一个既成事实;现在我们只要阐明一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就行了。且听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揭明了价值的二重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样明确地阐明价值的矛盾的本性;我们的批判就从这里开始……只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种惊人的对照是不够的,经济学家们惯于把这种对照看成非常简单的事情,应当指出,在这种虚构的简单中却隐藏着深奥的秘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弄清这个秘密……用术语来说,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

假如我们已经领会了蒲鲁东先生的思想的话,那末他要肯定

的就是如下四点：

(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惊人的对照”，形成互相对立。

(2)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互相矛盾。

(3)无论是两者的对立或是矛盾，经济学家都既没有看出也不认识。

(4)蒲鲁东先生的批判从终点开始。

我们也从终点开始，并且为了消除蒲鲁东先生对经济学家们的责难，我们就让两个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来讲讲话。

西斯蒙第：“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概论”布鲁塞尔版第二卷第162页³⁸）

罗德戴尔：“一般地说，国民财富（使用价值）是随着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上升）的增加而减少，如果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下降而减少，那末国民财富通常会相应地增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译，1808年巴黎版³⁹）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

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论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谈。

“由于交换价值和财富（使用价值）的概念混淆不清，有人就竭力断言，只要减少商品的数量，即减少生活所必需的、有用的或能享受的东西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财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孔斯坦西奥译，让·巴·萨伊注，1835年巴黎版第二卷“论价值和财富”章⁴⁰）

我们看到，蒲鲁东先生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出”对立和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矛盾的深奥秘密。现在再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在这些经济学家们以后又是怎样说明这个秘密的。

如果需求不变,那末产品的交换价值随着供给的增长而下降,换句话说,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低。viceversa [反过来说],越是求过于供时,供应的产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高;换句话说,供应的产品越少,产品也就越贵。产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假定某种产品不仅极为稀少,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对它没有需求,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也是多余的。相反地,假定某种产品有千百万个,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那末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的。

这些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为了弄清蒲鲁东先生的秘密,在这里我们还得重述一下。

“因此,按这一原则彻底推究下去,就可以得出世界上最合逻辑的结论:凡属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但是最困难的是,实际不会容许有这两种极端,因为一方面人类生产的任何产品决不会在数量上增加到没有止境的地步,另一方面即使最稀少的东西也会有某种用处,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按性质来说经常力图互相排斥,但两者必然是互相联系的。”(第一卷第39页)

蒲鲁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需求,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他说,“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这种说法实际上正是表明,稀少就是交换价值。“极端稀少和毫无

用处”,这是纯粹的稀少。“价格不可估量”,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限度,即纯粹的交换价值。他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样,交换价值和稀少就成了同义的术语。蒲鲁东先生得出这个臆造的“极端的结论”,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他以为得出了新的结论,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发现了他当初的假定而已。也就是用这种同样的手法,他才把使用价值和纯粹的众多混为一谈。

蒲鲁东先生在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间划了等号以后,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发现实际不会容许有这种极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蒲鲁东先生以为,不可估量的价格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没有购买者,可是只要他撇开需求不谈,那就永远找不到购买者。

另一方面,蒲鲁东先生所谓的众多好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他完全忘记了正是人创造了这种众多,忘记了决不忽略需求是符合人的利益的。不然蒲鲁东先生怎么能够断言,极有用的东西价格应当非常低廉甚至一钱不值呢?相反地,他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提高极有用的东西的价格和交换价值,就必须限制这些东西的众多,缩减这些东西的生产。

从前法国种植葡萄的人要求颁布一条法律来禁止开辟新的葡萄园,这和荷兰人烧毁亚洲的香料和铲除摩鹿加群岛的丁香树如出一辙,他们就是想减少众多来提高交换价值。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奉行了这个原则,他们以法律规定,一个师傅只可以雇用多少帮工、使用多少工具。(见安德森“商业史”⁴¹)

蒲鲁东先生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证明众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过的),就把使用价值和供给、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谈。为了使这个对照更加明显,他就换了一个术语,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斗争就转移到另一个战场,现在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

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调和呢?怎样使它们取得一致呢?能不能在它们中间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

蒲鲁东先生大声说,当然有,这就是决定的自由。价格是需求和供给之间、效用和意见之间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不会代表永恒的公平。

蒲鲁东先生进一步扩大这个对照:

“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缩减你的费用。”(第一卷第41页)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需求或交换价值和意见当作同一个东西,他就只得这样说:

“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只要自由意志存在,怎么能解决这个对立呢?不牺牲人,怎么能牺牲自由意志呢?”(第一卷第41页)

因此,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这两种可说是不能比较的力量之间,在效用和意见之间,在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斗争。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看问题吧。

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难道需求者不也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既然他供给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也代表,象蒲鲁东先生所说,效用或使用价值吗?

另一方面,难道供给者不也需求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因此他不也就成了意见的代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的代表或交换价值的代表吗?

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蒲鲁东先生称为使用价值的东西,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称为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我们就只举施托尔希的话为例吧(“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48、49页⁴²)。

根据施托尔希的意见,我们觉得需要的东西就叫做需要,我们给予价值的东西就叫做价值。大多数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们可以满足意见所产生的需要。关于我们需要的意见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东西的效用(只是表现这些东西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自然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实际上,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的差别就非常之大!

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归根到底,供给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消费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

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

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认,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一句话,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

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

因此我们在供给和需求中,一方面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资金和购买的愿望。

蒲鲁东先生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两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也就促使他说:“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这正是蒲鲁东先生的假定),他就不得不出卖。蒲鲁东先生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他却同意我们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又都是生产者从别处取得的产品,并且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他并不是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责成他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生产。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

织的产物。

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同样,再举另一个例子来说,对公证人的需要难道不是以一定的民法(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的存在为前提吗?

蒲鲁东先生并不满足于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中去掉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要素。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情况并不是这样。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蒲鲁东先生去掉了生产费用和竞争以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把需求和供给的公式弄得荒谬绝伦。

他说:“供给和需求无非是两种仪式,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接触,并促进两者之间的调和。这是两个电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会发生接合,又名交换。”(第一卷第49、50页)

同样可以说,交换只是使消费者和消费品互相接触所必要的一种“仪式”。同样也可以说,一切经济关系都是直接消费借以进行的一些“仪式”。供给和需求(恰如个人交换一样)就是某种生产的关系。

那末,蒲鲁东先生的整个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

供给。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费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费用就是这样构成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

“(交换)价值是经济结构的基石”。“构成”价值是经济矛盾体系的基石。

蒲鲁东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全部发现——“构成价值”是什么呢？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

象亚当·斯密发现分工一样,蒲鲁东先生也自以为发现了“构成价值”。当然这个发现中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东西”,但是也应该承认,在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发现中都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东西。蒲鲁东先生虽然感觉到他的发现非常重要,但是“为了使读者对他自以为独创的东西放心,并为了迁就那些由于懦弱而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们”,他极力缩小这个发现的意义。但是当评价他的每一个前辈在确定价值方面所作的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

认并大声宣称,在这方面,最大最多的一份应归功于他。

“亚当·斯密已经模糊地看出了价值的综合观念……但是在他那里,这种价值观念完全是直觉的,而社会并不因信仰直觉就改变自己的习惯;只有事实的权威能使社会信服。必须使二律背反获得更明确的表现,而让·巴·萨伊就是这个二律背反的主要解释者。”

总之,亚当·斯密有模糊的直觉,让·巴·萨伊有二律背反,蒲鲁东先生则有构成着的和“构成了的”真理,这就是发现综合价值的完整历史。但是不要弄错,所有其他的经济学家,从萨伊到蒲鲁东,都只不过踟躅在二律背反的老路上。

“四十年以来,这么多有思想的人都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而煞费苦心,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价值之间虽然没有任何共同点和任何度量单位,但也在被比较。这就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不接受平等的革命理论,却不顾一切地力图证明的一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说呢?”(第一卷第68页)

突然受到这样追问的后人首先就会对年代感到困惑。他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李嘉图和他的学派不就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吗?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李嘉图的体系,创始于1817年。李嘉图是复辟时期⁴³以来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领袖。李嘉图的学说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典型的整个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说呢?”他们总不会说蒲鲁东先生完全不知道李嘉图,因为蒲鲁东谈起过李嘉图,谈得不少,还常常引用他,可是结果却把他的学说说成是“废话连篇”。如果后人有一天过问这件事,他们也许会说,蒲鲁东先生怕激起读者的反英情绪,所以情愿自己充当李嘉图观念的负责发行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蒲鲁东先生却硬把

它当作“将来的革命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鲁东先生却把它当做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无论如何，后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了。我们干脆撇开后人不谈，让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前辈李嘉图来对质一下。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著作中总括他的价值学说的几段话：

“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虽然它对交换价值是绝对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奥译自英文，1835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页）

“东西本身一旦被认定为有效用，那末这东西就从两个来源，即从东西的稀少和从获得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劳动量中取得交换价值。有些东西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稀少。因为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所以它们的价值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珍贵的雕象和绘画等就属于这类东西。它们的价值只取决于想占有这种物品的人的财富、趣味和癖好。”（同上，第一卷第4页和第5页）“但是这种商品在市场上每日流转的大多数商品中只占极少部分。因为人们想占有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靠劳动获得的，只要我们愿意为生产这些东西花费必需的劳动，它们的数量就会不仅在一个国家中，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增加到几乎无可限量的程度。”（同上，第一卷第5页）“因此，当我们谈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则时，我们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第一卷第5页）

李嘉图引用亚当·斯密的话，他认为亚当·斯密“很精确地规定了一切交换价值最初的来源”（参看亚当·斯密著作第一卷第五章⁴⁴）。然后他又补充说：

“这（即劳动时间）就是一切东西（除了人的劳动不能随便增加的东西以外）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个学说对政治经济学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门科学中,再没有比‘价值’这个名词的含义不精确和含糊不清而造成更多的错误和意见分歧的了。”(第一卷第8页)“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那末这种劳动量的任何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在生产时花费了这种劳动的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任何减少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第一卷第8页)

李嘉图接着责备亚当·斯密,说他:

(1)“除劳动以外又给价值提出了别的尺度:有时是粮食的价值,有时是用这种东西可以购买的劳动量”等。(第一卷第9、10页)

(2)“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原则,但是对这个原则的运用却只限于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前的社会的原始和粗野的状态。”(第一卷第21页)

李嘉图极力证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而资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比较量决定的)只起暂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他创立了有名的地租论,把资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最后,他在资本里除了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接着又发挥了整套的工资和利润理论,并且证明,工资和利润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没有忽略资本积累、资本在性质上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工资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这些问题就是李嘉图所注意的主要问题。

他说:“节省劳动(无论是节省制造物品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还是节省为形成这种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所必要的劳动)常常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值^①。”

① 大家知道,李嘉图用“制造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商品价值。但是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因此也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的交换形式造成这样的情况:这种价值不是直接被表现在劳动量上,而表现在其他的商品量上。李嘉图把表现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无论是不是货币都一样)上的商品价值叫做这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第一卷第 28 页)“因此,只要一天的劳动一直使甲得到同量的鱼,使乙得到同量的野味,那末无论工资和利润的变化怎样,资本积累所起的作用怎样,相互交换时价格的自然率始终是一样的。”(第一卷第 32 页)“我们把劳动看做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但是我们也不想否认,商品的市场价格偶而也会暂时脱离商品的这个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的。”(同上,第一卷第 105 页)“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费用来调节,而不是象一般所说的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第二卷第 253 页)

罗德戴尔勋爵根据供求规律,或者说根据供多于求或供少于求的规律探讨交换价值的变化。他以为,物品的价值在物品的数量减少或需求增加时就会提高;这个价值因物品的数量增加或因需求减少时就会下降。因此,物品的价值在八种不同原因的影响下都会发生变化,其中四个原因和物品本身有关,另四个原因和货币或作为这种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其他商品有关。下面是李嘉图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规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间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们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减。”(第二卷第 259 页)

我们让读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语言和蒲鲁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较一下。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

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代社会当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见本章第三节“构成价值的应用”)

现在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结论。

——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

——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

这些结论是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或决定的价值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呢？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结果也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李嘉图,第二卷第253页)

当然,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家,象德罗兹、布朗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语言的礼节来证明他们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高明,从而得到天真的满足;如果他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词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事物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①。如果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

① 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844

蒲鲁东先生推崇为原则的价值规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抗。但是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

因而,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

我们就拿一种产品例如麻布来说。这种产品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劳动量。无论参加制造这种产品的人们的相互地位起什么变化,这种劳动量始终是一样的。

再拿别的产品例如呢绒来说,并假定生产呢绒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生产麻布的劳动量相等。

如果这些产品互相交换,那就是相等的劳动量在交换。这种等量的劳动时间的交换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当呢绒和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们以

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⁴⁵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论点的。拉萨尔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虽然工资实际上经常有接近最低额的趋势,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上述论点(见“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前在呢绒上所占有的一份。

蒲鲁东先生的谬误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做结果。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把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那末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

暂且假定,一个首饰匠的劳动日和一个织布工人的三个劳动日是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首饰品对纺织品比值的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供求变动的暂时结果,就必然是由于两种生产的劳动时间有所增减。如果不同的劳动者的三个劳动日相互的比例是1 2 3,他们产品的相对价值中的一切变化也会是这个比率,即1 2 3。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

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

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间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化的时间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质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粹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最后,如果说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他打算在“将来的时代”中普遍实现的“平均化”的刨子用到机器劳动中早已实现的这种平等上。

蒲鲁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说中引伸出的一切“平等”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上面这点,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行了。

如果一个缪伊^①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缪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末衣服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换句话说,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现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

毫无疑问,蒲鲁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他说:“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说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费用和工资也混为一谈了。

“工资是什么?这是粮食等的成本,这是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是构成财富的各要素的均匀配合。”

工资是什么?这就是劳动价值。

① 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约合1800公升。——编者注

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鲁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两者混而为一。

蒲鲁东先生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进而找出工人们应分得的产品正确比例,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劳动的相对价值。为了确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除了把一定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总额当做它的等价物外,他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这就等于说,似乎整个社会仅仅是由以工资形式领得自己的产品的直接劳动者所组成。此外,他还把各种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日的价值相等当做既成事实。总而言之,他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找出劳动者的平等报酬,他把工资的平等当做已解完全确定的事实,是为了根据这种平等去找出商品的相对价值。多么奇妙的辩证法!

“萨伊和追随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指出说,劳动是一种其本身价值尚待确定的东西,是象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如果把劳动当做价值的原则和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堕入循环论证中了。我可以说,这些经济学家的这种说法表现了极大的疏忽。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比喻说法。它和资本的生产率一样,是一种臆想。劳动在生产,资本有价值……所谓劳动价值,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劳动象自由一样……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它的性质在其对象中是确定的,换句话说,劳动通过它的产品而成为实在的东西。”

“然而何必坚持呢?因为经济学家(读做蒲鲁东先生)既要改变事物的

名称 *vera rerum vocabula* (事物的真正名称) ,就是默认自己无能,逃避问题的讨论。”(蒲鲁东,第一卷第 188 页)

由此可见,蒲鲁东先生把劳动价值变为产品价值的“实际原因”,因为他以为工资(“劳动价值”的正式名称)构成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正因为如此,萨伊的反驳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事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大事议论语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例如,他老是摆出一付学者的面孔,反对把 *servus* (奴隶) 这字解释起源于 *servare* (保护) 那种陈旧的说法。这种语文学的议论具有深刻的意义,神秘的意义,这些议论构成蒲鲁东先生论证的重要部分。

由于劳动^①被买卖,因而它也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也有交换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物一样。

劳动“值”多少取决于食物的贵贱,取决于劳动人手供求量的大小等等。

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质由对象来确定,而且对象

① 在 1876 年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劳动”后面添上了“劳动力”一词。1896 年的法文版上也加上了这一词。——编者注

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

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们要买它呢?“由于人们认为劳动中隐含着价值”。但是当人们说某个东西是商品时,那这里所指的就已经不是购买它的目的,就是说,不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的效用,不是指想拿它做什么用了。它成为商品是由于它是交易对象。蒲鲁东先生的一切议论总结起来不外是:劳动不是作为直接的消费对象才被购买。当然不是的,人们购买它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象购买机器一样。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蒲鲁东先生也可以这样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商品,因为购买任何商品只是为了它的某种效用,而决不是由于它是一种商品。

蒲鲁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笼统地认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下。他预感到,这样说就是承认工资的最低额是直接劳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现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个倒霉的结论,他就掉转头来说,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了自己就曾经把劳动的价值当做尺度;他忘了他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买卖和交换各种产品的交易对象——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作为工人收入的直接源泉——劳动的基础上。他忘了一切。

为了挽救他的体系,他决心牺牲体系的基础。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基!][⊖]

⊖ 尤维纳利斯“讽刺集”。——编者注

现在我们得出了“构成价值”的一个新的定义：

“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首先我们说,在“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个简单的用语中已经包含着产品互相交换的某种关系的概念。把这种关系叫做“比例性关系”,除了名称以外,意思根本没有改变。产品的价值无论怎样涨跌,丝毫不会使这种产品失去它和构成财富的其他产品形成某种“比例性关系”的那种特性。

这个新术语并没有新概念,要它做什么呢?

“比例性关系”使人联想到许多其他的经济关系,例如生产的比例性,供求之间的适当比例等;而蒲鲁东先生在以训人的口吻解释交换价值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一切的。

首先,由于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每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比较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比例性关系就是表示在一定时间内所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换的产品的相对量。

让我们再看一看蒲鲁东先生从这个比例性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比例性关系。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他说: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费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就会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

大家出去散步。

被蒲鲁东先生当做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中所得出的结果,大概只能用下面这种规律来说明:

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应当永远象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就让蒲鲁东先生来担任制定和贯彻这样一个规律好了,这里我们并不要求他提出证据。可是他如果想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不是立法者的身份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那末他就应当证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时间恰好表明了商品的效用的程度,而且表示了商品对需求的比例性关系,因而也表明了商品对财富总额的比例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品按照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供求就会永远保持平衡,因为生产费用被认为是表示供求的真正关系的。

蒲鲁东先生确实力图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根据这个理论,生产奢侈品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社会有多余时间来满足某种奢侈的需要。

至于这种论点的证据,蒲鲁东先生是这样说的:根据他的观察,生产量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化费劳动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

蒲鲁东先生从杜诺瓦耶先生那里借用了采捕(如采集果子、牧放、狩猎、捕鱼等)这一最简单、花费最少的工业作为例子;人类的“第二个创造的第一天”就是从这种工业开始的。他的第一个创造的第一天则记载在创世纪中,它告诉我们上帝是世界上第一个工

业家。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鳊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鳊鱼饲料的奴隶。

生活用品的价格几乎不断上升,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几乎不断下降。就拿农业来说,最必需的东西,如粮食、肉类等的价格不断上涨,而棉花、食糖、咖啡等的价格却以惊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就在真正的食品中,如朝鲜蓟、龙须菜等奢侈品在今天要比最必需的食品便宜。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最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价格的相互关系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完全相反。整个中世纪中,农产品比工业品便宜;近代,两者之间的情形倒过来了。但是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效用自中世纪以来减少了吗?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

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最普遍的消费品。马铃薯引起了瘰疬;棉花大规模地排挤亚麻和羊毛,虽然羊毛和亚麻在大多数情况下,

即使从卫生观点来说,也比棉花更有用。最后,烧酒占啤酒和葡萄酒的上风,虽然大家都承认把烧酒当作食品是有害的。整整一个世纪,各国政府竭力抵制欧洲的鸦片,然而毫无效果,经济取得了胜利,消费得听它的命令。

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如果说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说,烧酒由于生产费用低廉而到处风行,这件事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说,马铃薯比肉对他们更有益,这就是和现状妥协,结果,这就是和蒲鲁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

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现在我们再回到蒲鲁东先生的命题上来。生产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既不表现它的效用程度,那末早就由包含在物品中的劳动时间所确定的这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就决不能调节供求的正确关系,即蒲鲁东先生现在所说的比例性关系。

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

换中至少收回生产费用。这种变动是经常的,所以资本也就不断地出入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

“正是由于这种变动,资本才按照适当的比例(而不是超过这个比例)投入各种有需求的商品的生产中去。利润随着价格的涨落而升降于一般水平上下,因此,随着某一生产部门中的不同变化,资本时而流向那里,时而又从那里流出。”——“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大城市的市场,那末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市场如何正常地如数供应各种国内外商品,不管这里的需求由于爱好或人口数量的变动有什么变化;市场上很少发生供应过多、商品充斥或供不应求、物价飞涨的现象。我们应当承认:在各个生产部门间按照精确的适当比例分配资本的原则所起的作用,要比平常所想象的巨大得多。”(李嘉图,第一卷第105、108页)

如果蒲鲁东先生承认产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来确定,那末他同样也应当承认,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什么意义下把“比例性”说成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的结果才算正确。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蒲鲁东先生称为“比例规律”的这个用时间来衡量的尺度如何变为比例失调的规律。

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李嘉图已指出这个事

实,他说:

“由于生产日益便利,因而过去生产的某些东西的价值也就不断下降。”(第二卷第 59 页)

西斯蒙第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是现代工商业的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说:“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总是由取得这种东西所必要的劳动量来确定;但不是实际花费的劳动量,而是在今后生产资料可能改进的情况下将要花费的劳动量。这种劳动量虽然很难作精确的确定,但它总是由竞争加以正确地确定……这一劳动量就是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议价的基础。出卖者也许会说,这种东西花费了他十个工作日;但如果购买者知道这种东西以后花八个工作日就能生产出来,如果竞争给双方提出确凿的证明,那末这种东西的价值就会缩减到八个工作日,市场价格也就会固定在这个水平上。当然出卖者和购买者都知道这种东西是有用的,是有人需要的,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种东西,那也就卖不出去;但是规定这种东西的价格却和它的效用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概论”布鲁塞尔版第二卷第 267 页)

千万不要忽视,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额又是由竞争来规定。我们暂且假定没有竞争,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方法来规定为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最低额。那时将会怎样呢?按照蒲鲁东先生的理论,要以一种物品换取六倍多同样的物品,只要把别人一小时能生产的用六小时来生产就行了。

如果我们不论好坏总是要什么关系,那末我们得到的就不会是“比例性关系”,而是比例失调的关系。

劳动的不断跌价只是一个方面,只是用劳动时间估价商品的一个结果。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释。

但是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会不会至少引起蒲鲁东先生为之神往的那种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呢?

恰恰相反,它使单调而清一色的垄断在产品领域中占统治;正如大家看到和知道的,这种垄断已经侵入了生产工具的领域。只有某些生产部门,例如棉纺织工业会很快地进步。这种进步的自然结果就是使棉纺织工业产品价格迅速下降;但是随着棉花价格的下跌,亚麻的价格就必然会比棉花昂贵。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棉花排挤亚麻。亚麻就这样几乎从整个北美被驱逐出来,结果并不是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而是棉花的统治。

此外,这个“比例性关系”还有什么呢?除了那种希望商品能按比例生产(这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好心人的善良愿望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不论什么时候,好心肠的资产者和仁慈的经济学家总喜欢表示这种天真的愿望。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

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共同存在,时时刻刻能互相进行交换(这就是蒲鲁东所谓的不断交换性能),时时刻刻能互相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论财富的本性”,见德尔编的文集⁴⁶)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te 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195页⁴⁷)

Fuit Troja!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个人交换或者只适宜于过去几世纪的小工业和它特有的“正确比例”,或者适宜于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贫困和无政府状

态。

归根到底,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即蒲鲁东先生当做将来再生公式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鲁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

但是,“平均主义地”应用这个公式至少不应该归功于蒲鲁东先生吗?是他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量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吗?应当由他来责备共产主义者(这些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家伙,这些“顽固不化的笨蛋”,这些“天国的梦想家”),责备他们在他以前没有发现这样“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吗?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⁴⁸,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⁴⁹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⁵⁰)中最重要的几段话,并且我们将要在这上面多花些时间,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其次是我们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

“弄清基本原则是得出真理的唯一方法。我们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本身的根源。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源,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

(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as it at present exists) 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们经济学家的领域中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们,那就可以摆脱他们经常喜欢搬用的什么空想家、空论家那套废话。只要经济学家们不想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种公认的真理和原则,那末他们就决不能推翻我们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见布雷上述著作第 17、41 页)“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It is labour alone which bestows value)……每个人对于他用正当劳动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有不容置辩的权利。如果他占有了他自己的劳动果实,那末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因为他丝毫没有侵犯别人这样做的权利……一切关于高贵和低贱以及主人和雇佣工人的概念,都是由于忽视基本原则及因之而产生的财产不平等(and to the consequent ri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所引起的。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那末这些观念就不可能根除,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制度也不可能推翻。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枉费心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的这种反常情况;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指出:政府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它不是创造者,而相反地是被创造者,总而言之,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the offspring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同上,第 33、36、37 页)

“平等制度不仅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十分公正……每个人都是一个环节,而且是一连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连串的头只是一个观念,而末端也许是一匹呢绒的生产。因此,虽然我们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感觉,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劳动必须比另一个人的劳动得到较多的报酬。发明家除了得到正当的金钱报酬以外,经常还会获得我们只给予天才的那种赞誉……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性质来说,严格的公正的要求是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all exchangers should be not only mutually but they should likewise be equally benefited)。人们之间可以交换的东西只有两种,即劳动和劳动产品。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全部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If a just system of exchanges were acted upon, the value of all articles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entir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equal values

should always exchange for equal values)。如果帽匠化一个工作日生产一顶帽子，鞋匠化同样的时间做出一双鞋子（假定两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值是相同的），他们把这两种产品进行交换，那末他们从这种交换中所得到的利益就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这时一方所得的利益不会是对方的损失，因为两者都提供了同等的劳动量，而且都是使用同等价值的材料。但是如果在上述所假定的相同条件下，帽匠用一顶帽子换得两双鞋子，那末显而易见，这种交换是不公正的。帽匠骗得了鞋匠一个工作日，如果帽匠在所有的交换中都这样，那末他用半年的劳动就会得到别人一年的劳动产品。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的价值（the workmen have given the capitalist the labour of a whole year, in exchange for the value of only half a year）。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而决不是由人们所说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平等产生。交换的不平等以及买卖价格的差异，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资本家永远是资本家，而工人永远是工人，一面是暴君阶级，另一面是奴隶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财主们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只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同工人以无易有（nothing for something）……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纯粹是一幕滑稽剧：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非是一种无耻的（虽是法定的）抢劫而已（The whol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capitalist is a mere farce: it is, in fact, in thousands of instances, no other than a barefaced though legalised robbery）。”（同上，第 45、48、49、50 页）

“只要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不平等，那末企业主的利润就永远是工人的损失；只要社会分成资本家和生产者，只要生产者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资本家靠从别人劳动中榨取利润来养肥自己，那末交换就不会平等……”

布雷先生接着说：“显然，不论建立什么统治形式……不论怎样宣扬道德和友爱……互惠和交换的不平等是不相容的。交换的不平等是财产不平等的源泉，它是吞噬我们的无形的敌人（No reciprocity can exist where there are unequal exchanges. Inequality of exchanges, as being the cau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 is the secret enemy that devours us）”（同上，第 51、52 页）

“从考察社会的目的和任务中我可以得出结论说，不仅一切人都必须劳动，这样才能进行交换，而且相等的价值必须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其次，为了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成为另一个人的损失，价值必须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然而我们知道：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资本家和富人的利益永远是工人的损失；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交换的不平等继续存在，在一切的统治形式下，穷人将完全听凭富人摆布。平等交换只有在普遍劳动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证……平等交换会使财富逐渐地由现在的资本家手里转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同上，第 53—55 页）

“只要这种不平等交换制度继续存在，即使政府的一切赋税和一切捐税都取消，生产者还永远会象现在一样地贫穷、无知，劳动过重……只有彻底改变制度，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换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证人们有真正的权利平等……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们努力才能自救），就能永远打碎束缚他们的锁链……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错误的，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错误的（As an end, the political equality is there a failure, as a means, also, it is there a failure）。

“在平等的交换下，一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那时候每一次交换只不过是劳动和财富的转移，不需要任何牺牲。因此，虽然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仍然可以靠节约致富，但是他们的财富只是他们自己劳动的积累。那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和别人交换，或者送给别人，但是只要停止劳动，他就不能长时期继续保持富裕。随着平等交换的建立，财富就会失去它现在所具有的那种自行更新和再生产的能力；它再也不能弥补消费带来的损失，因为已消耗的财富只有用劳动再生产出来，否则它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利润和利息，在平等交换制度下是不可能再存在的。那时无论生产者或分配者将会得到相等的报酬，每种生产出来并供应给消费者的产品的价值，将由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总额来确定……

“因而，平等交换的原则，按其本性来说，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同上，第 67、88、89、94、109—110 页）

驳斥了经济学家们反对共产主义的议论以后，布雷先生继续说：

“如果要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乎我们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否则，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同上，第 134 页）

“整个这一进程只要求最简单的合作形式……生产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确定产品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总是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如果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工作一个星期，而另外一个人只工作半个星期，那末前者所得的报酬就会比后者所得的多一倍；但是前者多得的报酬并不损害后者的利益，后者的损失决不会对前者有利。每个人都以自己所得的工资来交换同样价值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生产部门所得的利益，都不会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损失。每一个人的劳动才是他的利益或损失的唯一标准……”

“……消费所需要的各种不同产品的数量，每个物品和其他物品（各种不同劳动部门所需要的工人数目）所比较的相对价值，总之，凡和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中央和地方贸易局（boards of trade）来确定。这种核算在整个民族中实行，就象在现存制度下在私人公司中实行一样，并不费什么时间，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个人构成家族，家族构成乡镇，就象在现存制度下一样……城乡居民的分布不管有怎样的弊病，也不会马上取消……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继续享有任意积蓄和按照自己的愿望去使用这种储金的自由……我们的社会可说是由无数最小的股份公司（在这些最小的股份公司中，大家劳动、大家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产品）所构成的一个大股份公司……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同上，第 158、160、162、168、194、199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页)

我们现在只要用几句话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违背了我们的意志,取蒲鲁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

某甲的一个工时交换某乙的一个工时。这就是布雷先生的基本定理。

假定某甲工作十二小时,而某乙只工作六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只要用六小时就能交换某乙的六小时,这样某甲的其余六小时就会剩下来。他怎样处理这六小时的劳动时间呢?

或者根本不做处理,这样他就白白劳动六小时,或者在其他的六小时不干活,以便取得均衡,再不然,最后的一着就是他把这自己用不着的六小时也一起卖给某乙。

这样某甲到底比某乙多得了什么呢?是劳动时间吗?不是的。他只过多得了空闲的时间,他只得在六小时中间无所事事。为了使这种无所事事的新权利不仅在新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且受到重视,这个新社会就必须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来看,某甲比某乙多得的空闲时间,对某甲来说该是一种真正的收获吧!并不是这样。最初只工作六小时的某乙经过经常的和有规律的劳动以后,便达到某甲在开始时用过度的劳动所得的结果。每个人都想做某乙,于是就会发生为争夺某乙的地位而展开竞争,即展开偷懒的竞争。

那末相等劳动量的交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现社会中所有

的一切经济关系,只是没有劳动的竞争。

但是不然,我们错了。要拯救新社会,即某甲和某乙的社会,只有一个方法。某甲可以自己消费掉他所剩下的六小时劳动的产品。但是一旦他不需要交换他的产品,那末他就不需要为交换而生产了,我们原先所说的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这个前提,也就完全垮台了。只有停止一切交换才能拯救平等交换,那时某甲和某乙就都会变成鲁滨逊。

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

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没有组成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顽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们都很知道,减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时间⁵¹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大工业的性质就要求一切人的劳动时间都完全一样。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因此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结论上了。

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

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

但是可敬的资产者的良心却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只要是资产者,他就不能不把这种对抗关系当作不允许任何人损人利己的、以和谐与永恒的公平为基础的关系。在资产者的心目中,没有阶级对抗个人交换也可以存在;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毫无关系的。资产者想象中的个人交换和实际中存在的个人交换是大不相同的。

布雷先生把可敬的资产者的幻想变成了他想实现的理想。他刷新个人交换,清除个人交换中的一切对抗因素,他以为这样就找到了他希望社会采用的“平均主义的”关系。

布雷先生没有看到,这个平均主义的关系,即他想应用到世界上去的这个具有纠正作用的理想本身,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因此,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这个影子重新成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决不是梦想中的一个变了形的社会,而是现代社会的实体^①。

① 和任何其他的理论一样,布雷先生的这个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受它假象蒙蔽的拥护者。在伦敦、设菲尔德、里子以及英国其他的许多城市中都曾设立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所(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rs)。这些交换所吸收了大

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

甲、货币

“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

所以金银成了由蒲鲁东先生……“构成的价值”的最初应用。蒲鲁东先生是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比较量确定价值的方法来构成产品的价值,因此,他只要证明金银价值的变动总是由于生产金银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就可以了。可是蒲鲁东先生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在谈及金银的时候,是把它们当作货币而不是当作商品。

如果还有逻辑的话,那末他的全部逻辑就是:他以变戏法的手法把金银做为货币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一切商品。当然,在这套戏法中,幼稚多于狡猾。

任何有用的产品的价值既然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那末这种产品就永远具有交换性能。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在“交换可能性”上已达到我所要求的条件的金银就是证据。所以,金银就是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即蒲鲁东先生思想的体现。他在选择例子上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金银除了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的

批资本以后都遭到可耻的破产。这批拥护者对它们也就永远失去了兴趣。蒲鲁东先生可要注意这个警告!(马克思原注)

大家知道,蒲鲁东并没有接受这个警告。1849年他在巴黎也企图开办一个新的交换银行。但是这个银行还没有开始正常活动就垮台了。对蒲鲁东的审讯掩饰了这个银行的垮台。——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特性。因此,如果把金银当做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应用,那末要证明由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一切商品都将具有不断交换性能,都将成为货币,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蒲鲁东先生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只有金银才能成为“构成价值”的典型?

“习惯赋予贵金属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是纯粹契约的职能。任何别的商品,虽然可能有些不便,也都能同样可靠地实现这个作用;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并且举出了不少例子。贵金属被公认作为货币使用,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货币的这种特殊职能(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类似情况)又该怎样解释呢?……货币似乎已经从一种系列中脱离出来,要重建这种系列并把货币重新引到它的真正的原理上去,这是否不可能呢?”

蒲鲁东先生这样提出问题,那就已经预先假定了货币的存在。蒲鲁东先生应该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如果蒲鲁东先生对这种关系有个明确的概念,那他就不至于把货币当做例外,当做人尚不知或需要确定的系列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要素。

相反地,他会认为这个关系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两者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会承认,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但是他究竟怎么办呢?他首先把货币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要素。

既已承认特殊的交换手段的必要性,即货币的必要性,剩下的

就只是说明为什么这个特殊的职能属于金银,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商品。这是一个次要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当用生产关系的总体体系来解释,而应当用金银作为一种物质所固有的特性来解释。由此可见,如果经济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象蒲鲁东先生所斥责他们那样,“超出自己所学的领域,去研究物理学、力学和历史等”,那末他们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问题已经不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了。

蒲鲁东先生说:“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没有理解到使贵金属享有特权的那种经济原因。”

谁也没有(不是没有根据的)看到和理解到的经济原因,蒲鲁东先生却看到了,理解了,而且传给了后代。

“没有人注意到,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在宗法时期,金银作为交易对象出现,而且还一锭锭地互相交换,然而当时它们已经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并且比其他商品占显著的优势。君主们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即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商品,不论交易中有什么动荡,这种商品都能保持一定的比值并在各种支付中被人接受……再说一遍,金银的特点就是由于它们有金属的本性,开采困难,尤其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它们作为商品早就获得了稳固性和确实性。”

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从他上述的话里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金银最早成为货币。这就是蒲鲁东先生伟大的启发,这就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发现过的真理。

如果蒲鲁东先生想用这些话说明,人们对开采金银所必要的时间比生产其他商品所必要的时间知道得更早,那末这又是他慷慨地奉送给读者的假定之一。如果我们想遵循这种宗法时期的学问,那我们就要奉告蒲鲁东先生,生产日用必需品(例如铁等)所必

要的时间是知道得最早的。至于亚当·斯密的古弓那就更不必说了。

既然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蒲鲁东先生怎么还能说价值的构成呢?价值不是由单独生产某种产品所必要的时间构成,而是与同一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一切其他产品的数量成比例。因此金银价值的构成是以许多其他产品的价值已经构成为前提的。

可见,并不是商品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构成价值”的状态,相反地,而是蒲鲁东先生的“构成价值”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货币的状态。

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由于某些经济原因,金银经过构成价值的状态,比一切其他产品就更具有成为货币的优越性。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考察这些经济原因。

这些经济原因是:“力求占居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在宗法时期”已经取得的“显著的优势”以及同一事实的其他的转弯抹角说法,这种转弯抹角的说法只能增加我们的困难,因为蒲鲁东先生在解释一个事实时添加了许多枝节,从而使需要说明的事实越来越多了。但是蒲鲁东先生还没有讲完他的所谓经济原因。下面就是那种至高无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

因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

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究竟是君主占有了金银,盖上自己的印章使它们成为普遍的交流手段呢,还是普遍的交流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盖上印章并授与政治上的神圣?

人们过去和现在给银币盖上的印记,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而是表明它的重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只和钱币的成色有关,这种成色表明一块银币中含有多少纯金属。

伏尔泰用他那总是健全的理智说:“一个银马克所含的唯一价值是一马克的银子,半磅银子重量为八盎斯。只有重量和成色构成这种内在的价值。”(伏尔泰:“约翰·罗的制度”⁵²)

但是,一盎斯金子或者银子值多少呢?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算“大柯尔培尔”商店的克什米尔呢上印着“纯毛”的商标,但是这种商标根本没有说明克什米尔呢的价值。而毛呢究竟值多少,这始终还是一个问题。

蒲鲁东先生说:“法国皇帝菲利浦一世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土尔银币中掺进了三分之一的杂质。他以为他既占有铸造钱币的垄断权,也就能象一切垄断产品的商人处理自己商品那样地处理钱币。菲利浦和他的继承人被人责难伪造钱币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一种从商业惯例的观点来说非常正当、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却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想法认为,既然供求调节价值,那末人为地使物品稀少或完全掌握它们的生产,就可以提高物品的估价及价值,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金银,正如它适用于粮食、酒、食油、烟草一样。然而菲利浦的欺诈只要一引起怀疑,他的钱币就会跌到真正价值上去,从而他也就失去了他指望从臣民那里赢得的一切。所有类似的企图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首先,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钱币,那末

他就会遭到损失。他在最初发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伪造的钱币以捐税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些利益失掉。但是菲力浦和他的继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损失,因为他们把伪造的钱币一投入流通,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遍改铸钱币。

其次,如果菲力浦一世真象蒲鲁东先生那样推论,那末他的推论“从商业观点来说”就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菲力浦一世或者蒲鲁东先生只是根据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一点,便以为金子的价值完全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改变的,那末这只表明他们的商业才能很差。

如果菲力浦皇帝命令把一缪伊粮食叫做二缪伊粮食,那他就成了骗子。他就是欺骗了一切收租的人,一切收一百缪伊粮食的人;由于他的好意,这些人本来可以收一百缪伊粮食,现在只能收五十缪伊了。假定皇帝欠人一百缪伊粮食,那他现在只要还五十缪伊就行了。但是在贸易中,一百缪伊粮食一点也不会比从前五十缪伊有更多的价值。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无论是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所增减。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们在谈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力浦一世并不象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创造了金银,他只是创造了钱币的名称。你把法国的克什米尔呢充作亚洲的克什米尔呢也许会欺骗一两个购买者,但是一旦骗术被拆穿,那末你的所谓亚洲的克什米尔呢的价格就会回跌到法国克什米尔呢的价格。菲力浦一世在金银上盖印了假标记,这种伎俩只能在未被揭穿前骗一骗人。象别的老板一样,用冒牌商

品欺骗顾客只能蒙混一时。他迟早一定会感到贸易规律的严峻。蒲鲁东先生想证明的是这一点吗？不，不是这一点。在他看来，使货币获得价值的不是贸易，而是君主。实际上他证明了什么呢？他证明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你：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克。

但是这并没有把价值取决于劳动量这个问题推进一步。重新变成从前那一个马克的这两个马克的价值，究竟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还是由供求规律来确定？这个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蒲鲁东先生接着说：

“甚至也应当注意，如果君主不伪造钱币，但有权把钱币的数量增加一倍，那末金银的交换价值由于比例性和均衡的原因，立刻会跌价一半。”

如果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们的这个共同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末这也只是有利于他们的供求学说，对蒲鲁东先生的比例性却完全无补。因为根据这个观点，无论在双倍的金银中包含的劳动量如何，只要需求不变而供应增加一倍，那末金银的价值就会跌价一半。也许“比例规律”这一次是偶然和很受轻视的供求规律一致起来了吧？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正确的比例性的确伸缩性很大，随时都可以变化、配合和移项，下一次很可能又和供求关系一致起来。

“任何商品，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至少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金银所起的作用便是根据；其实这是不了解金银的作用。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

我们知道,蒲鲁东先生选择货币作为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的实际应用的例子,只是为了偷运他那一套关于交换可能性的理论,即为了证明每个按生产费用来估价的商品都必须成为货币。如果不是下面一个小小的缺陷,这一切都是很好的。这个缺陷是: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只要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无论纸币、金币、白金或铜币)的数量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由生产费用所确定)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当然,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的。这是由于在国际贸易中,甚至金银也只是以产品的身份作为交换手段,而不是以货币的身份作为交换手段;这就是说,金银失去了蒲鲁东先生认为构成金银特性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即“经过君主的神圣化”的特点。李嘉图非常理解这个真理,他把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作为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并且指出:“金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只是与生产它们并把它们投入市场所必要的劳动量相适应”,但是他又补充说,确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实物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只是供求规律。

“虽然纸币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但是如果数量有限,那末纸币的交换价值就会和票面金额相同的硬币的价值或这种钱币所包含的金属的价值一样大。由于这一原则,即由于货币数量有限,那末磨损了的钱币如果它以前含有法定的重量和成色,就可以按照它应有的价值流通,而不是按照它实际所含有的纯金属的份量的价值流通。因此,在不列颠的货币史中我们常常看到,硬币从没有随它们的质地下降程度而贬值。这是因为硬币从来不随其内在价值的减少而增加数量。”(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

让·巴·萨伊对李嘉图这些话的看法如下:

“我觉得，这个例子应当足以使作者相信：一切价值的基础都不是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而是和该商品的稀少相对比的那种对商品的需要。”⁵³

在李嘉图的心目中，货币已经不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的一种价值，而让·巴·萨伊正根据这一点把货币作为例子，想使李嘉图相信其他的价值也不能由劳动时间来确定。我说，这些被让·巴·萨伊当作价值完全由供求确定的例子的货币，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就成了由劳动时间来构成……价值的 *par excellence*（最好的）实例。

总而言之，如果货币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那末它就更不能和蒲鲁东先生的正确的“比例性”有什么共同之处。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如何。

“流通中的货币决不会多得无用，因为如果减少货币的价值，那就是在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货币的数量，而如果增加它的价值，那也就是在减少它的数量。”（李嘉图）

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这种政治经济学真是一团糟。”

“一个共产主义者（通过蒲鲁东先生的嘴）可笑地叫道：可恶的金子！同样也可以说：可恶的小麦！可恶的葡萄！可恶的绵羊！因为一切商业价值都和金银一样，必须得出它的精确而严格的确定。”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使绵羊和葡萄具有货币的特性,这种思想并不新奇。在法国,在路易十四那个世纪就有这种思想。在这个货币开始成为万能的时代,人们抱怨其他一切商品的跌价,热烈地期待有一天“一切商业价值”都可以得到精确而严格的确定,成为货币。在法国最老的经济学家之一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我们就已经发现有这样的话:

“那时,由于恢复了公正价值的商品作为无数竞争者出现,货币就会被引到它的自然界。”(“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德尔编,第422页)

可见,资产阶级最初的幻想也正是他们最后的幻想。

乙、劳动的剩余

“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荒谬的假设: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增加一倍……好象一切物品的价格并不是物品间的比例,好象人可以使比例、比率或者规律增加一倍!”(蒲鲁东,第一卷第81页)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陷入这种谬误,是由于他们不会应用“比例规律”和“构成价值”。

不幸得很,在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著作(第一卷第110页)中也能看到这种荒谬的假设:“如果工资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不仅如此,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同时还可以找到它的说明。

“当说到一切物品价格的涨跌的时候,通常总是把某种商品除外的,这种商品通常是货币或劳动。”(“京都百科全书,或知识大辞典”1836年伦敦版第六卷中西尼耳所著“政治经济学”条⁵⁴。关于这种说法,也可参阅·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以及图克“价格史……”1838年伦敦版⁵⁵)

现在我们来谈谈“构成价值”和其他比例性(它们唯一的缺点

是缺少比例)的第二种应用,并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在这里的做法是不是比企图把绵羊说成货币更幸福些。

“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个定理是经济学家们公认的。这个原理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和绝对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经济科学总结的比例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请经济学家们原谅,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们的理论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蒲鲁东)

为了证明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蒲鲁东先生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有“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普通的人的理性,而是丧失理智的理性。蒲鲁东先生责备经济学家们不了解这种集合体的个性。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责备别的经济学家,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他的一段话来和蒲鲁东先生的话作对照:

“人们给被称为社会的精神实体(the moral entity)——即文法的存在(the grammatical being),硬加上一些实际上只存在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们的想象中的属性……这就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许多困难和可悲的误解。”(托·库伯“论政治经济学的要素”1826年哥伦比亚版⁵⁶)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道:

“劳动剩余这一原理对于个人之所以正确,只是由于这一原理产生于社会,社会因此以自己的规律加惠于个人。”

蒲鲁东先生是否只是想说明,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孤独的个人的生产?他是否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没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指出几百个没有求助于蒲鲁东先生的那种神秘主义但却表明了这种简单真理的经济学家。例如萨德勒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

“联合劳动产生出个人劳动决不能达到的结果。因此,随着人类在数目上的增加,人类联合劳动的产品将远远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简单加算所得出的总额……今天,无论在机械技术中或科学工作中,一个人一天所做的事情比孤独的个人一生所做的还要多。全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数学定理,如果应用到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上来就会错误。至于劳动即人类生存的伟大支柱(the great pillar of human existence),那末可以说,共同努力的产品要远远超过个人的和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一切。”(托·萨德勒“人口的规律”1830年伦敦版⁵⁷)

我们再回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他说,劳动剩余在作为人的社会中得到了说明。这种人的生活所服从的规律,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规律相对立的;蒲鲁东先生想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经济方面的新发现决不会给发明者带来和他贡献给社会相等的利益……大家知道,铁路企业为企业主提供的财富远不如为国家提供的多……兽力车运输的运费(包括装卸费用在内)平均每吨公里为18生丁。有人算过,照这种比率,普通的铁路企业就得不到10%的纯利,这和兽力车运输企业的结果差不多一样。但是假定铁路运输的速度和兽力车运输的速度是4比1;由于对社会来说时间就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运费一样,铁路运输所提供的利益就是兽力车运输所提供的400%。然而这种对社会来说非常现实的巨大利益,对运输企业主来说却决不能按同样的比例获得实现:运输企业主使社会得到400%的利益,而自己却连10%的利益也得不到。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假定实际上铁路运费提高到25生丁,而兽力车运输的运费仍然是18生丁,这时铁路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货生意。所有的发货人和收货人都将重新使用旧时的行李车,必要时甚至使用马车。机车就会被弃置不用,400%的社会利益将因35%的私人损失而牺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铁路运货迅速所带来的利益完全是社会的,每人所得到的利益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不要忘记,目前只谈运货问题),而损失对于消费者却是直接的具体的。假定社会只有100万人,那末等于400的社会利益对个人来说就是万分之四,而消费者遭受的33%的损失却决定了3300万的社会亏损。”(蒲鲁

东)

蒲鲁东先生还可以用原始速度的 400% 来表明四倍的速度 ; 但是他拿速度的百分比和利润的百分比来比较 , 并且在这两种单独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但相互不可比的比数之间来确定比例 , 这就是不管百分比指的是什么 , 而在百分比之间求比例。

百分比终究是百分比。10% 和 400% 是可以相比的 , 两者的关系就象 10 和 400 一样。因此蒲鲁东先生就断言 , 10% 的利润只及四倍速度的四十分之一。为了装饰门面 , 他又说 , 对社会来说 , 时间就是金钱 (time is money)。他之所以犯这个错误 , 是因为他模糊地想起在价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 就急急忙忙把劳动时间和运输时间等同起来 , 就是说他把某些司炉、车务员以及乘务员 (他们的劳动时间确实和运输时间完全一致) 和整个社会混为一谈了。这样 , 速度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 , 他有充分理由说 : “400% 的利润将因 35% 的损失而牺牲。”他先以数学家的姿态确立了 this 个奇特的原理 , 然后又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给我们解释这个原理。

“如果社会只有一百万人 , 那末等于 400 的社会利润对个人来说就只是万分之四。”就算是这样 ; 可是问题不在于 400 , 而在于 400% ; 400% 的利润对个人来说不多不少恰好是 400%。无论资本多少 , 而红利总是按 400% 的比率来计算。蒲鲁东先生究竟要做什么 ? 他把百分比当做资本 , 似乎唯恐他的混乱思想表现得不够清楚 , 不够“明显” , 所以继续说 :

“而消费者遭受的 33% 的损失却决定了 3300 万的社会亏损。”对一个消费者是 33% 的损失 , 对一百万个消费者来说仍旧是 33% 的损失。蒲鲁东先生既不知道社会的资本总额 , 又不知道

当事人个人的资本额,他怎么能确切地说,损失为 33%的时候,社会亏损会达到 3300 万。蒲鲁东先生还不满足于把资本和百分比混为一谈,而且更进一步,把投入企业的资本和对资本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数目混为一谈。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假定在实际上”有一笔确定的资本。社会利润是 400%,要在一百万个每人曾拿过一个法郎的参与者之间分配,那末每人可得四个法郎,而不是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 0.0004 法郎。同样,每个参与者遭受 33%的损失,社会亏损是 33 万法郎,而不是 3300 万法郎($100 \cdot 33 = 1000000 \cdot 330000$)。

蒲鲁东先生专心致力于他的作为人的社会的理论,忘记了用 100 来除,因此蒙受了 33 万法郎的损失。但是每人得到 4 法郎的利润,对于社会来说就是 400 万法郎的利润。因此,社会还留下 367 万法郎的纯利润。这种精确的计算所证明的和蒲鲁东先生企图证明的恰恰相反,就是说,社会的损益和个人的损益决不是成反比的。

纠正这种简单的纯粹算术上的错误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我们同意蒲鲁东先生以铁路为例所得出的速度和资本的关系,去掉算术上的错误,会得出什么结果。假定说,运输加快四倍,运费也增加四倍,那末这种运输的利润,不会少于那种速度慢四倍而运费只有四分之一的兽力车运输的利润。这就是说,如果兽力车运输要 18 生丁,那末铁路运输就得 72 生丁。根据“数学的严密性”,蒲鲁东先生的假设的结果就会是这样,——当然这里也得去掉他在计算中的错误。可是他却非常突然地告诉我们说,如果铁路运输不要 72 生丁,只要 25 生丁,它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货生意。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重新用行李车甚至马车来运输。我们

唯一要忠告蒲鲁东先生的,就是他在“进步的联合体的纲领”中不要忘记用 100 来除。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忠告很难希望得到倾听,因为蒲鲁东先生如此醉心于他那种适合于“进步的联合体”的“进步的”计算,他甚至大声疾呼地喊道:

“我在第二章中讲到解决价值的矛盾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有用的发现给予发明者的利益(不论他怎么做)都比给予社会的利益少得不可比拟;在证明这一点方面,我已做到数学的严密性!”

现在,我们回到作为人的社会这一臆想上来,这个臆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如下一个简单的真理:每种新的发明都使产品的交换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是它凭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发明者,他的利润在竞争的影响下不断下降到利润的一般水平。蒲鲁东先生有没有照他所想的那样证明了这个论点呢?没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责难经济学家们没有证明这个论点。为了证明事实恰好相反,这里只要引用李嘉图和罗德戴尔的话就够了。李嘉图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罗德戴尔则是供求确定价值的一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两人都阐明了同一个论点。

“我们使生产越来越方便,因而以前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不断降低,虽然我们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一旦我们利用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力从事以前人做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价值也就随着降低。如果推动一个面粉磨要用十个人的劳动,后来发现可以利用风力或水力节省下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时磨子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会随节省的劳动量成比例地下降;而社会将因获得这十个人的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而更为富裕,因为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丝毫不会减少。”(李嘉图)

现在再看看罗德戴尔是怎么说的:

“资本的利润经常是这样获得的：或者由于资本代替了人类必须亲手去做的一部分劳动，或者由于资本做了超乎人力之外和人所不能为的那种劳动。如果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价格比较起来，机器所有者通常得到的利益是微薄的，这也许会使人怀疑我们的看法是否正确。例如，一架蒸汽抽水机一天内从煤坑中抽出的水比三百个人用水桶背水还要多；而且毫无疑问，抽水机花的费用要少得多。一切其他的机器也都如此。机器代替人的双手进行劳动，而代价却非常低廉……假定说，有个发明家发明了一架代替四个人劳动的机器并获得专利权；由于他有这种特权，所以除了被他的机器代替的那部分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竞争以外，他不可能有别的竞争。显而易见，在特权的有效期间，这些工人的工资就是发明家出售产品时定价的标准；这就是说，发明家为了保证产品的销售，他的索价只要略低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的工资就行了。可是这个特权一满期，同样的机器就会出现，和他的机器展开竞争。那时他就必须根据共同的原则调节他的索价，要根据机器增多这一情况索价。使用资本所获的利润……虽然它也是被代替的劳动的结果，到底并不是由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调节，而是象在所有其他情形下一样，由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竞争来调节，而竞争的强弱总是由某项用途的资本的供应量和对该项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来确定。”

总之，只要新的生产部门的利润高于其他部门，那末资本就经常会涌向这个部门，直到利润率跌至一般水平为止。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铁路的例子很难阐明作为人的社会这样一种臆想。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仍然勇敢地继续发表他的议论：

“这一点一经说明，要解释为什么每个生产者的劳动必然给生产者一种剩余，是再容易不过的。”

再接下去，就是有关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这是富有诗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数学证明的严密性而疲惫不堪的读者得到休息。蒲鲁东先生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给予作为人的社会，并且用以下的话来歌颂他的功绩：

“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闲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二次创世的第一天)起,他的产品,即他的财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产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发明机器,发现物体的新的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来说消费就是生产,因此每天的消费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

蒲鲁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他无论在逻辑上或政治经济学上都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训我们说: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并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但是只要普罗米修斯一谈起生产和消费,他就完全变成可笑的人物。对他来说消费就是生产,他在第二天消费的是前一天生产的东西,因此他经常有一天的储备;这多余的一天就是他的“劳动的剩余”。但是既然今天消费昨天生产的东西,那末在没有前一天的最初第一天,普罗米修斯为了使以后有一个工作日作为储备就必须做两天的工作。但是在第一天,当时既没有分工、又没有机器,除了火以外也不知道别的自然力量,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剩余的呢?因此,如果问题扯到“第二次创世的第一天”上去,那就寸步难行了。这种说明现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它使蒲鲁东先生完全有权说:

“我已用理论和事实证明一切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一原理。”

所谓事实,就是那大家知道的累进算法;所谓理论,就是那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蒲鲁东先生接着说:“但是这个象算术定理那样正确的原理,还远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的。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的产品随着集体劳动的进步而不断增

加,其结果必然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以前一样,但生活却日益富裕。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上某些阶层日益富裕,而另一些阶层则死于贫困。”

在 1770 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人口是 1500 万,其中生产人口是 300 万。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力大约相当于 1200 万人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总额是 1500 万。所以生产力和人口的比例是 1 : 1,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 4 : 1。

在 1840 年,人口没有超过 3000 万,其中生产人口是 600 万,但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已达 6 亿 5000 万人的生产力,和总人口的比例是 21 : 1,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 108 : 1。

可见,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间增加了 2700%,即 1840 年每天所生产的是 1770 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人在 1840 年时并不比 1770 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问题就是说,英国人即使没有生产这种财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话,没有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财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

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

如果在理论上,象蒲鲁东先生那样,只是对劳动的剩余的公式加以平均主义的解释而不必注意现代的生产条件,那末在实践中,只要把现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也就够了,不必改变现代的生产条件。这样的分配当然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

可是蒲鲁东先生决不是一般所设想的悲观论者。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都归结为比例性,所以在现在实存的普罗米修斯中,即在现代社会中,他不能不看到他所宠爱的那个观念在开始实现。

“但是财富的日益增加(即价值的比例性)到处都是统治的规律;当经济学家们用公共福利日益增长和最贫困阶级的状况也获得改善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申诉的时候,他们在不自觉中宣布一项真理,这个真理是对他们的理论的谴责。”

实际上,所谓集体财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而不是每一个别资产者的财富。经济学家们只不过证明了: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的财富已经增长并应继续增长。至于工人阶级,那就大有问题;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谓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得到改善还是疑问。经济学家们为了替自己的乐观主义作辩护,就拿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工人为例,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难得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人的情况。这个繁荣时期和危机及停滞时期的“正确的比例”关系是3:10。也许经济学家们所谈的改善是指那些为了使同行的150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岛的几百万工人吧?

至于临时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临时分享的事实已由经济学家的理论加以说明。这一事实是这个理论的确证,而决不是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对理论的“谴责”。如

果有什么东西应当受到谴责的话,毫无疑问,那就是蒲鲁东先生的体系,象我们所指出的,它不管财富的增长却要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只有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蒲鲁东先生才能应用价值的正确比例性的原则,即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的原则。正是由于竞争使工资时高时低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内(即使微不足道)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可能死于贫困。这就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幻想的经济学家们的全部理论。

蒲鲁东先生节外生枝地长期纠缠于铁路、普罗米修斯和应当在“构成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改组新社会的问题之后,现出十分庄重的神情,他激动地以教训人的口吻大声喊道:

“我恳求经济学家们暂时摆脱心灵深处那些迷惑他们的成见,不要考虑他们既得的或者希望获得的职位,不要考虑他们为之献身的利益,也不要考虑他们所追求的称赞和诱惑他们虚荣心的声誉,反躬自问一下,到目前为止,以我所说明的前提和结果这一环节来说,任何劳动必然留下一些剩余这个原理曾出现在他们面前吗?”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使我们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

形而上学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维和认识的方法。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指脱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它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始源，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译者注

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⁵⁸。

蒲鲁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⁵⁹。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

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词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

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三卷⁶⁰)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泡制。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畴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

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

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⁶¹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

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①。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① 这对 1847 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竭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定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智慧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第二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的话从来没有说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

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 ;最后 ,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 ,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 ?但是 ,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 ,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 ,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 ,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 ;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 ,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 ,即使有 ,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 ,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 ,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煞。他没有这样做 ,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 ,埋怨一切 ,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 :“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 ,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 ,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蒲鲁东 ,第二卷第 102 页)

在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

用的矛盾的实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续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象中

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就象它们作为后果可以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交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

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

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当做过去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是把目的和人换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历史”⁶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

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

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①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

①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此处是“劳动阶级”。——编者注

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

比 ;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 ;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 ,好好工作 ,少生孩子 ;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 ;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 ;他们愿意实现理论 ,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无疑问 ,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 ,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 ,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 ,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 ,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 ,其实 ,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 ,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 ,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 ,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 ,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 ,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 ,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 ;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 ,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深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 ,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 ,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 ,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

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一系列的经济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
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第93页)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
(第一卷第 94 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一卷第 94 页)

应当解决的任务 { 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一卷第97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

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題。萨伊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⁶³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虽然这样,但蒲鲁东先生仍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说,似乎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特吧; *sum cuique* [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毫无疑问是由于我那本书⁶⁴的标题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特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一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评价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

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谁的争论,那末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市局社会史试论”1783年巴黎版⁶⁵)

在结束这一场文献的涉猎的同时,让我们指出一点:我们明确地否认所谓“所有的经济学家常常更多地强调分工的有益方面”。只须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蒲鲁东先生那里,从分工这种被看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中怎样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第一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 ;因此 ,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 ,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 ?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 :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 ?界限。界限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 ,也不是辩证的历史 ,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 ,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 ,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 ;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 ?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 ,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 ,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 ,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

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 :“自灵魂被损害以来 ,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 ,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 但是 ,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 16—18 小时 ,所以 ,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 ,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 ,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 ,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 ,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 ,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 ,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 ,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肯定地说，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辩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他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

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分工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它把权力原理带入劳动领域……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一点。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以为这种现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谱”。

(1) 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 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 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 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 “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属于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题——它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

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工场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问。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

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工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杂费开支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部门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

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简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结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经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⁶⁶)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 *vice versa* [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

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 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现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还用得着说吗？

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 18 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 1825 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 18 世纪中，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

尤尔博士说道：‘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罗拉）…… 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 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

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高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一些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代工厂里我们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须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渐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减轻，而其余如针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工厂的工作中几乎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须由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他说愈是有主见，愈是难于

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机械体系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两种能力,如果人们在青年时期就把它们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顺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平平常常经过短期训练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调配他,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但在平均化原则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调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内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重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同水平而分工的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得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一卷第一章⁶⁷)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

勒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

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竞争的好的方面	}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
竞争的坏的方面		“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般的想法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必然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应当解决的任务 {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全部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①。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对象,月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润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 14 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组织和特权即将废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末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

① 傅立叶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 1847 年 1 月 1 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法国在 1789 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 2500 万人的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 18 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末 19 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

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 18 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 19 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 18 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真正现实以外的]^①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 17 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象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

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复。”

① 原意是:“不信教国家中的”。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这一头衔的称呼。——编者注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

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

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⁶⁸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

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实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说:“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收捐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

和平民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纳税。”⁶⁹

至于捐税、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税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

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税,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推论,这些短短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评论,甚至是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专讲这些问题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二卷第 269 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

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
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
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
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
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
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

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现实曾为虚构所
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
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二卷第 265 页)

有四十个埃巨的人 大概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
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
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
的。”⁷⁰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
人束缚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许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
上,土地所有权始终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鲁东先生的 *horror
vacui*(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
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或者,换句话说,地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
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伏尔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温顺、勤劳的农民,每年收入 40 个埃巨。
埃巨(éu)是法国 18 世纪以前的带名,价值三金镑。——译者注

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漠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地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逐渐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地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愈多的土地,价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经营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当所有者执行神秘的义务,以社会集体的代表者的身份对待耕者的时候,土地经营者却命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地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必须具备所有权的全部魔力,才能从耕者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已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一创造者。地租,或者更恰当地说,土地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额,就是地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 *deus ex machina* [从机器里出来的神]^① 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以便从耕者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地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重复应予说明的范畴,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②。

① 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这句话的转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② 用所有者(*propriétaire*)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propriété*),用收租者(*rentier*)的干预来说明地租(*rente*)。——编者注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来决定地租,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必要性,产生了地租;蒲鲁东关于地租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把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

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象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①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②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可能发生象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已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

①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话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② 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

一部分收入^①。在封建租佃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耕者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地租。可是,一出现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经营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经营者的耕者。劳动者沦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象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地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地,正象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

① 在1885年的德文版中,没有最后的两句,而在前面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数字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占有者。”——编者注

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或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 20 个法郎,那末,原值 10 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 20 个法郎。

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产生而绝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经营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 10 个法郎的地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 10 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 20 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末,平均市场价格就是 15 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

价格应为 20 个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 15 个法郎,那末地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分配都不可能,因为地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 10 个法郎生产的一公石谷物能卖 20 个法郎时,地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掌握以代替捐税,我们是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一公石谷物要按 20 个法郎支付,然后再把取自消费者的多余的那 10 个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走到第一个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地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

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目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地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地租的实质。”(第二卷第 265 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地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资本的利息比其他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间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土地的本性多少是永恒的缘故。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

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贵的,但自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贵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 and 经营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地租。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长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生产更加完善”的后果)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

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17世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参看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⁷¹)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当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第一卷第110、111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

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资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某些利润超过一般水平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贫困的加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要的发明——self-acting mule(自动骡机)^①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如果说用来反对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的加强是同盟和罢工的唯一结果,那末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莱昂·福适先生在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当然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波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调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们无法操纵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英

① 自动纺纱机。——编者注

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贫困 ;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第一卷第 261、262 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波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波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没有工人打先锋,他们就对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组织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门之外,说这是 ticket-meeting(凭票入场的集会),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把会上的发言大登特登。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 年和 1845 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 1844 年和 1845 年是 1837 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波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并没有权力操纵工资,因为产品价格不决定于厂主,其所以不决定于厂主,则是因为厂主没有权力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工人们了解到,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主人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建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

贫困的加剧。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鲁东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贫困加剧呢?不是。他对波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一卷第 334、335 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迫使议会批准了这种法律。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愈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会议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⁷²。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①在给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① 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破坏工业的正常工作，妨碍厂主满足订户的要求，扰乱商业和加速采用机器，这样，你们的一部分劳动就会毫无用处，机器将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你们一定会徒劳无益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劳动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绝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

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⁷³,拥有会员 80000 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

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①。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① 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⁷⁴

弗·恩格斯 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 资产阶级的现状

英国的戏院应该把“扬恶学校”⁷⁵这个剧目从节目单上勾掉了,因为事实上最大的扬恶学校已经出现在巴黎的众议院。最近四、五个星期内那里发生的和宣扬出来的丑事之多,真是议会辩论记录上前所未有的。你们记得,邓科布先生曾经提议在你们光荣的下院的门前刻上这样一句题词:“在此四壁之内,进行着最卑鄙齷齪的勾当。”现在有人足以和你们的那一群资产阶级立法者相媲美了。这里人们的所做所为会使英国的那一伙恶棍自愧不如。古老的英国的脸面得到了保全:德·日拉丹先生赶过了罗巴克先生,杜沙特尔先生打破了詹姆斯·格莱安先生的记录。

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最近几个星期内所揭发出的丑事全部列举出来。我决不谈那好几十件已交付法庭审理的行贿案,决不谈那位企图用不无妙处的手段把高等骗子的一套做法带到土伊勒里宫去的侍从武官圭丹先生。我也不想向读者详细地讲述那位前陆军大臣、法国贵族居比耶尔将军的丑事,这位将军曾托辞必须向内阁行贿才能取得开业许可而骗取了一个矿业公司的40张股票,他泰然自若地把这些股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目前他正为这件事在贵族院受审。我不讲这些事情,我只从众议院的两三次会议里选择几个典型的事例,你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想见一般了。

众议院议员，“新闻报”编辑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无论在众议院里还是在他的报纸上都支持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最近一个时期他变成了内阁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可是不久以前他还是这个内阁的支持者。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可是却毫无原则。从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起，他就不顾羞耻地采取各种手段谋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是这位先生曾强迫“国民报”的著名编辑阿尔芒·加莱尔和他决斗，结果加莱尔被他用枪打死，他因而给自己铲除了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象这样一个拥有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的人物，政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但是德·日拉丹先生的支持卖得（他的支持向来是出卖的）可不便宜。德·日拉丹先生和内阁进行交易已不止一次，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使双方心满意足。同时德·日拉丹先生总是准备着随风转舵的。由于预料到可能和基佐内阁决裂，他就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或通过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和代理人，尽量地搜集各种肮脏的交易、贿赂、舞弊等等的情报。他从这次会议上各党派之间进行的辩论看出，基佐和杜沙特尔倒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他是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威胁政府，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的话，他将把满腔的怒火全部对它发泄出来。基佐先生用极为轻蔑的词句拒绝和这个新的党派达成任何妥协。这个党退出了多数派，并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来和它为难。在众议院辩论财政以及其他问题的时候，揭发出来的丑事太多了，以致基佐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位同僚推下台去。可是补缺的人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一个党派感到满意，内阁与其说巩固了倒不如说削弱了。后来就发生了居比耶尔事件，这件事使多数派的人们也都对是否还能够替

基佐先生保住位置发生了某些怀疑。这时候,德·日拉丹先生看出内阁已彻底瓦解,毫无力量,他终于认为该把自己那个装满丑事秘闻的潘多拉的盒子⁷⁶拿出来,通过揭发那些甚至会动摇众议院之“腹”⁷⁷对内阁的信任的丑事,彻底击溃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内阁。

首先,他指控内阁曾以8万法郎的价钱出卖过一个贵族封号,但是收了钱以后却没有履行诺言!贵族院认为“新闻报”上讲的这些话侮辱了自己,请求众议院准许把德·日拉丹先生交付贵族院法庭审判。这一请求在众议院引起了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德·日拉丹先生完全坚持自己所提出的指控,他说他掌握了证据,但拒绝提出人名,因为据他自己讲,他不愿意当告密人。可是他说他已经在私人谈话中向基佐先生三次提起此事,而基佐先生哪一次也没有加以否认,又说有一次他向杜沙特尔先生谈起此事,杜沙特尔先生回答道:“这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后我提出了反对,这是基佐先生干的。”杜沙特尔先生对这一切矢口否认。德·日拉丹先生说道:“那末我来向各位证明,兜揽这种生意是政府的家常便饭。”于是他宣读了亚历山大·德·日拉丹将军(据我所知,他是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父亲,后者是这位将军的私生子)给国王的一封信。德·日拉丹将军在这封信里向国王表示,他感谢赏赐给他的贵族封号,但同时又说,基佐先生后来向他提出了一个受封的条件,要他(德·日拉丹将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制止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反对政府的行为,他(德·日拉丹将军)不同意干这种交易,因此他谢绝这个贵族封号。杜沙特尔先生说道:“噢,要是全部问题只在于这一点的话,那我要告诉各位,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自己曾向我们表示,如果我们给他一个贵族封号的话,他就停止反对政府。但是我们拒绝了他。”Hinc illæ

lacrimae !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至于那封信里所讲的事情,杜沙特尔先生却一字不提。于是众议院议决,艾米包·德·日拉丹先生应受贵族院法庭审判。审判举行了。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对政府的指控,但是他说,既然卖出的贵族封号未经授予,他所指责的只可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贵族院。于是贵族院法庭宣告他无罪。后来日拉丹先生又揭发一件丑事。去年曾有人筹办一个叫做“时代”的大型报纸,该报的任务是支持政府,把一切反对派的报纸都排挤掉,代替索价过高的德·日拉丹先生的“新闻报”来支持政府。这个计谋彻底破产了,德·日拉丹先生本人从中捣鬼也是原因之一。象这种捣鬼的事情没有一件少得了他。被指控对报界实行贿买的杜沙特尔先生,声称政府从未资助过任何报纸。德·日拉丹先生在反驳的时候指出了一件无人不知的事实,即“时代”的编辑们曾屡次向杜沙特尔先生求乞,最后杜沙特尔先生对他们说:“黄金白银我可没有,不过我有什么给你们什么就是了”,——他给了他们一项在巴黎开设第三家歌剧院的特权,“时代”的“贵人们”把这项特权卖了10万法郎,其中6万用来贴补该报,下余的4万则不知去向。杜沙特尔先生又是矢口否认;可是这的确是一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

此外,德·日拉丹先生又讲了几件类似的事情,但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昨天,德·日拉丹先生在众议院又起来讲话,他宣读了几封信,这些信件证明,杜沙特尔先生命令公家出资把关于上述赐予贵族封号一事的辩论印成文件,分发给全国各市政委员会;可是在这份内阁报告里,日拉丹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发言转述得都不正确,相反地,这两个人的发言都被窜改了,使人感觉德·日拉丹先

生是一个可笑的诽谤者,而杜沙特尔先生却象一位十足的正人君子。至于事件的本身,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所讲的一切,并且挑战式地向政府提议,要未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推翻他的指控,要未就以诽谤的罪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他说,在这两种场合下,他必须讲出有关人的名字以及事情的全部细节,这样他既可以证实他的指控又不致落到一个小探子的地位。这些话在众议院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杜沙特尔先生一概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坚持到底;杜沙特尔先生再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再坚持;两个人就在众议院的各个“合唱团”彼此攻讦的喊声中这样翻来复去地争吵不休。其他反对派的议员也向政府挑衅,要求把这件事或是交给一个议会委员会去调查或是交付法庭审理。最后,杜沙特尔先生说:

“如果委托议会去调查,先生们,那就等于首先肯定众议院的多数对政府的廉洁有所怀疑;因此,一旦调查委员会成立,在同一天我们就得让位给别人,如果各位有所怀疑,就请坦白地说明,我们立刻就辞职。”

德·日拉丹先生说:“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此事交付法庭审理了。我随时准备受审。只要你们敢这样做,就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好了。”

司法大臣阿贝尔反驳道:“不,我们不这样做,因为众议院的多数将会公断。”

奥迪隆·巴罗先生说:“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在我们的权限以内,这是法庭的事。既然德·日拉丹先生在他的报纸上诽谤了政府,为什么你们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呢?”

“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很好,可是这里还对其他一些买卖贵族封号的人提出了明明白白的控告,为什么不把他们交付审判呢?至于‘时代’和开设歌剧院的特权这件事情,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参与其事,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参与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的人们交付法庭审判呢?这里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控告,甚至已经有部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系列的罪行;为什么皇家检察官不象自己职责

所要求的那样,对被控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提起公诉呢?”

阿贝尔先生回答道:“我们不提起公诉,因为控告的性质和提出控告的那些人的名声使皇家法律工作人员无法认为这些控告是真实的。”

这些话时时被抱怨、叫喊、敲桌子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嘈杂声所打断。众议院举行的这一次从根本上震撼了基佐内阁的无与伦比的会议,最后以投票表决结束,投票结果证明:虽然多数对内阁的信任可能动摇了,但是他们的投票制度却没有动摇!

“众议院在听取了内阁的解释以后,认为满意,现在转入本日的议程!”

你们觉得怎样?认为哪一个好一些呢?是内阁还是多数?是法国众议院还是你们自己的下院?杜沙特尔先生好还是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好?我敢说你们会感到难以抉择。可是他们之间有一点是不同的。英国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必须和贵族做斗争。因为英国贵族虽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挤掉。英国贵族一向可以在资产阶级本身某些派系中找到一定的支持,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分裂,贵族才得免于彻底灭亡。在目前,国家债权人、银行家、有固定收益的人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船主都支持贵族对工业家进行斗争。整个废除谷物法的运动就是证明。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中先进的部分(我指的是工业家)还能够实行一些加速贵族瓦解的进步的政治措施,工业家甚至将不得不这样做;他们必须扩大自己的市场,要扩大市场就必须减低价格。可是要减低价格就必须先降低生产费用,而这主要地又要依靠降低工资才能办到。要降低工资,再可靠没有的办法就是减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减低税额。就是这样一根逻辑的链条牵着英国的工业家们,使他们必须把国教会消灭掉,必须削减或“公平地调整”国债。只要他们一旦发觉(也势

必会发觉)世界市场已不能经常不断地吸收他们的产品,他们就非实行这两项措施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不可。可见,英国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还必须推翻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僧侣;他们将不得不实行一系列只有他们才能胜任的进步措施。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国既没有世袭贵族也没有土地贵族。革命已经把他们一扫而光。这里也没有享有特权的教会或是国教会;相反地,新教的僧侣们和天主教僧侣们全都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二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法国,工业家不可能和国家债权人、银行家以及船主进行什么重大的斗争,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中,国家债权人和银行家(他们同时还是铁路、矿业以及其他公司的主要股东)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而且自1830年以来,政权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只有很短的几次间隔。工业家在国外市场上被外国的竞争压倒,在国内市场上又毫无把握,他们不可能强大到能够顺利地对银行家、国家债权人进行斗争。相反地,他们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他们的政党从前在众议院占半数而现在只不过占三分之一。从以上可以看出,统治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整个这一阶级还是其中的哪一部分,根本不能做出什么“进步”;可以看出,1830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得完全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就只有逐渐地走向灭亡。它也正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没有向前进,它不得不倒退了,它限制出版自由,取消集会结社的自由,颁布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以便压制工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所揭发的丑闻十分明显地证明,在法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了。

事实上大资产阶级现在处境很尴尬。它好不容易才找到基佐和杜沙特尔替它执政。它支持他们执政七年,每次选举都保证他们

获得更有力的多数选票。现在众议院里所有的反对派都毫无力量,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全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可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内阁中竟暴露出这样多见不得人的事,以致无法再继续执政,即使众议院全体一致支持它也不行了。毫无疑问,基佐和杜沙特尔以及他们的同僚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辞职;他们可能在内阁里再勉强坐上几个星期,但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们下台以后谁上台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可以重复路易十五的话了:“我去后,管它洪水泛滥,国破家亡,天翻地复!”梯也尔不能获得多数。摩莱老朽无用;他将会遇到重重困难,他要想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必须去干那些丑恶的勾当,因此他的下场也会象基佐一样。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今天的选民永远会选出象目前在众议院开会的那样的多数;今天的多数永远需要一个象基佐和杜沙特尔之流所组成的内阁,也就是无所不为的内阁;而任何这样的内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现今的制度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但是象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冲出这个圈子,实行选举改革;可是选举改革意味着准许小企业主参加投票,而这对法国说来就是“末日的开始”。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都非常清楚:让小资产阶级也成为选民不意味着别的,正意味着《LA RÉPUBLIQUE》[“共和国!”]

1847年6月26日于巴黎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1847年7月3日“北极星报”
第506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驻法国首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
“无产阶级革命”第4期

卡·马克思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⁷⁸

布鲁塞尔 9 月 5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⁷⁹第 70 号转载了“莱茵观察家”的一篇文章，正文前面加了这样一句：

“从下面可以看出，第 206 号‘莱茵观察家’在宣传共产主义。”

不管这句话是不是讽刺，共产主义者必须反对这种说“莱茵观察家”好象能够宣传共产主义的论调，特别是要反对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70 号转载的那篇文章好象是在宣传共产主义。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象“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的确有人力图把这些论调强加在德国共产主义者身上，并责备他们和政府结成了联盟。

这种责难是很可笑的。政府不会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同政府联合。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所有的革命党派中间，共产主义者的党是最革命的，这一点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

共产主义者怎能同宣布他们为国事犯而且把他们当国事犯看

待的政府结成联盟呢？

政府怎能在自己的报刊上宣传那些在法国被看做是(这个政府本身也常常这样认为)蛊惑人心、破坏一切社会基石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呢？

这是不能想象的。仔细研究一下所谓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是非常幼稚的。

文章一开头谈到：

“在观察我们的(!)社会状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灾难困苦(!),我们应当承认,是有许多疏忽的地方。这是明显的事实,不过只是(!)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深信,我们的国家制度并没有过错,因为(!)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状况要(!)糟得多。可是(!),自由派认为只有代议制才是灵丹妙药。他们说,如果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机关,就会使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

我们从这几句话看到了活生生的《Beobachter》^①本人的形象；我们看到,他神情茫然,咬着笔杆,不知道如何下笔,他一面琢磨一面写,划掉又重写,最后,用了好长的时间,写出上面这段冠冕堂皇的文字。为了能够攀扯到他的祖传宝物——自由派,他先从“我们的社会状况”谈起,换句确切的话来说,就是从“观察家”自己的社会地位谈起,他的地位当然会有不妙的地方。他从肯定我们的社会状况十分可怜和有许多疏忽这种极其笼统的观察出发,通过运用一系列极其晦涩的辞藻,勉强达到这样一点,即在他面前只有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他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实际上,这位“观察家”没有说明这是什么原因造

① 双关语:德文的《Beobachter》是“观察家”的意思。——编者注

成的,也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不会造成这种现象,他只是说明了他深信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普鲁士的国家制度。他通过果敢的“因为”二字,便从普鲁士国家制度转到法国和英国,从这里他只要轻轻一跳,就到了普鲁士的自由派;他这一跳的确毫不费力,只用了一个根据不多的“可是”就跳到了。这样,他终于到达了自己心爱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大声疾呼地说:“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但同时又十分!!!

难道共产主义者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可以认为上面这些辞藻、这些经典式的转语、这些忽而产生忽而消失的问题以及这些妙不可言的只是、因为、可是,尤其是“但同时又十分”等用语都是他们创造的吗?

在德国,除了“老统帅”阿尔诺德·卢格,有这种写作本领的人是不多的,而为数不多的这些人也全是艾希霍恩先生部里的国教顾问。

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段前言的内容。除了平庸的形式而外,这段话毫无内容,这只是一个入口,从这里进去就是我们这位观察家国教顾问宣扬对自由派实行十字军讨伐的场所。

我们听听他的议论:

“自由派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种比官僚更容易、更吸引人的接近人民的形式(连达尔曼先生或盖尔温努斯也从没有用过这样晦涩费解的文辞)。自由派张口闭口都谈人民的福利、人民的权利。其实它只是把人民当成恐吓政府的工具,人民只是它大举进攻政府当局时的炮灰。把政权搞到自己手里,这才是自由派的真正意图,而人民的福利,对它来说是次要的。”

这位国教顾问先生是不是以为,他在这里向人民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呢?人民,尤其是其中主张共产主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由派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本身的利益,很难指望他们会对人民表示同情。但假如国教顾问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参加政治运动会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用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这样回答他:这在国教顾问看来也许完全近乎真理,但同时又是极端的妄想。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国教顾问先生也许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不会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吧?请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请他看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

但是,编辑“莱茵观察家”的宗教事务部的人士,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却十分独特。这些先生以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或柏林的短工。他们认为,他们答应给人民以 *panem etreli*

gionem(面包和宗教)而不是 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娱乐),也就算考虑得十分周到了。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渴望援助,但未想到,无产阶级除了渴望自己的援助外,并不渴望任何人的援助。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既很了解国教顾问先生们所说的“人民的福利”和沉重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资产者的类似词句的含义。

但是为什么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次要的呢?“莱茵观察家”回答说:

“联合省议会证明了这一点;自由派的背信弃义已经很明显了。所得税问题应当是自由派的试金石,但自由派没有经得起考验。”

这些心地善良的国教顾问们觉得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清白无辜,因而可以用所得税来迷惑无产阶级了!

磨粉税和屠宰税直接出自工资,所得税则出自资本家的利润。国教顾问先生,这不是十分近乎真理的吗?但资本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同意从自己的利润中抽税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竞争本身就会照顾到这一点。所得税推行几个月以后,工资减少的数额就会等于因废除磨粉税和屠宰税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资料的落价而实际增加的数额。

不是用货币而是用满足工人生活需要的物品来表示的工资,即实际工资(不是名义工资),它的水平取决于供求关系。税制的改变会使这种依附关系短时遭到破坏,但不会使这种关系发生长期的变化。

所得税在经济上唯一的优点(这位国教顾问一个字也未提到),就是征收这种税国家花费小一些。但无产阶级并不会从这里赚到什么。

那末,所有这些关于所得税的议论该归结成什么呢?

第一、这件事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或者只有暂时的好处。

第二、政府在征收磨粉税和屠宰税的时候每天同无产阶级直接接触,同他们相对立,为他们所痛恨;但在征收所得税的时候,它却退避起来,要资产阶级单独出面进行这种降低工资招致痛恨的活动。

可见,所得税只是对政府有利,这也说明为什么国教顾问们在所得税遭到否决以后那样懊丧。

我们暂时假定所得税对无产阶级有利,那末这届议会应不应该通过它呢?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它不应该同意任何税收;在政府没有满足它的全部要求以前,它就应该使整个财政制度原封不动。否决税收是所有议会强迫政府向大多数人让步的手段。议会只是在本次坚决否决税收的问题上表现了它的气魄,这一点也激动了失算的国教顾问们,他们想从这一方面在人民面前把它诬蔑一番。

“莱茵观察家”接着说道:“但是,所得税问题正是自由派刊物自己提出来的。”

完全正确,因为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措施。尽管如此,假如这项措施是资产者丝毫不信任的大臣们不合时宜地向他们提出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把它否决的。

但是,这种对所得税著作权的承认我们将予以查照;以后我们要用到它。

国教顾问发表了一通极端空洞混乱的言论以后,突然哽住了,又放出下面一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调:

“什么是无产阶级呢(这也是只是为了不给回答而提出来的问题之一) ?假如我们(即“莱茵观察家”的国教顾问们,而不是其他一般报纸)说,整整 $\frac{1}{3}$ 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 $\frac{1}{3}$ 则每况愈下,这并不是夸大。无产者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流露出一定的反政府情绪的联合省议会,竟这样迅速地开导了这些官员们!政府禁止报纸谈及我们普鲁士也有无产阶级这样一种“夸大”,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特利尔日报”及其他一些毫无罪过的报纸曾受到查封的威胁,说它们居心不良,想让读者知道英法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在普鲁士也同样存在,难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吗?这也只有看政府喜欢怎样了。承认无产者占人民绝大多数,这一点我们也将予以查照。

接着谈道:“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高级会议应不应该取得政权的问题。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既得不到一条铁路,也得不到一所农业银行,赋税也不减轻!多么幸运的人民呵!”

请注意,在国教顾问梳得溜光的头顶上开始露出狐狸耳朵来了。“议会认为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原则的问题。”这条博爱的毒蛇多么圣洁啊!是否允许政府发行 3000 万塔勒的公债,征收事先不能确定数量的所得税,建立农业银行(通过这个银行,它可以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得到 4 亿或 5 亿塔勒);是否要把这一切都交给目前这个消极的反动的政府办理,从而使它永远成为独立的政府,或者相反,用严格的预算控制它,并通过否决税收的办法使它受制于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这位无孔不入的国教顾问称为有关

原则的问题！

大慈大悲的国教顾问问道：“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得不到一条铁路”，因而人民也就不要交纳那些支付公债利息和弥补这条铁路开始经营以后必然遭受的重大损失的税款。

“得不到一所农业银行！”国教顾问的这种说法，使人觉得好象政府准备付给无产阶级地租^①似的。恰恰相反，它是想靠掠夺交纳地租的人民向贵族支付地租。这种银行似乎应当便于农民赎买徭役。但假如还要农民等上几年，那大概也就不需要赎买了。假如封建领主碰上农民的大草叉（这到一定时候是很容易发生的），徭役就会自行消失的。

“得不到任何所得税”，但只要所得税不给人民带来任何收益，人民就可以对它十分冷淡。

国教顾问接着说道：“但是，幸运的人民呵，你们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已经占了便宜！假如你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就让你们的代表讲给你们听吧，你们在听他们的长篇演说的时候，大概会忘掉饥饿的！”

谁还敢说德国出版物没有自由呢？“莱茵观察家”在这里完全为所欲为地用了这样一些词句，如果在法国，许多地方审判官不用考虑就会宣布这些词句是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挑衅，并使罪犯受到惩罚。

然而，国教顾问却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他想讨好人民，但又从来不想让人民了解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勉强装出一付同情饥饿人民的面孔，但又为此进行报复，说他们愚蠢，根本不能参与政治。然而无产阶级很清楚，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① 双关语：《Rentenbanken》是“农业银行”，《Rente》是“地租”。——编者注

他们谴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现,而是因为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谴责议会,是因为它执行防御策略,没有转入进攻,没有大踏步地前进。他们谴责它不够坚决,没有给无产阶级提供参加运动的机会。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

“观察家”接着说道：

“上帝保佑,这个议会可别得到通往政府权力的门路,因为这样一来,一切社会改善就会碰到不可克服的阻碍。”

国教顾问先生可以放心。对这个毫无办法对付普鲁士政府的议会,必要的时候无产阶级是有办法对付的。

国教顾问继续进行观察：“据说所得税会导致革命和共产主义。它实际上也在导致革命,即导致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无限贫困的消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国教顾问在跟读者开玩笑,他使用柏林蹩脚的同音词只是想说明,所得税消灭无限的贫困是为了代之以有限的贫困;或者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无耻的蠢汉。在英国,所得税已经推行了七年,但社会关系并没有因而得到丝毫改造,无限的贫困也没有丝毫减弱,他对这一点并不怀疑。他也不怀疑,在普鲁士,正是在最无限的贫困十分普遍的地方(在西里西亚和拉文斯堡的农村纺织工人中间,在西里西亚、波兹南、摩塞尔、维斯拉河流域的小农中间),实行着级别税即所得税。

但是,这种荒唐的言论难道值得认真批驳吗?下面接着谈道：

“它还会导致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凡是工商业的发展使一切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经常发生变化,以至个人在竞争的巨流中不能确保自身的地方,个人就会由于情况所迫而求助于社会,社会则应当为普遍不稳定的后果给每个人以补偿。社会对自己成员的生活负有连带责任。”

这就是“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样看来,在我们这种任何人的生活都没有保证,任何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都没有保证的社会里,社会却要负责保证每个人的生活。国教顾问先是肯定现存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接着又要它完成这件它所做不到的事。

不论在什么地方,社会在对待个人方面都要改正由于它固有的普遍不稳定而不能预见到的种种疏忽,——这就是国教顾问的观点。

“整整 $\frac{1}{3}$ 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 $\frac{1}{3}$ 每况愈下”。这就是说,有1000万人需要个个补偿。难道国教顾问真的以为,贫困不堪的普鲁士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当然能够,而且正是靠那个会导致“莱茵观察家”认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的所得税来完成!

妙极了!国教顾问对我们说了半天关于冒牌共产主义的废话,声称社会对自己成员的生活负有连带责任,社会应当关心他们(虽然它做不到这一点);他发表了所有这些荒谬、矛盾的议论并提出了实现不了的要求以后,又建议我们把所得税当做一项可以解决一切矛盾、使一切实现不了的要求变成可以实现的要求并使一切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得到恢复的措施。

我们来看看提交议会的冯·杜厄斯堡先生关于所得税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认为,征收到的全部所得税要统统用光,不留分文。这样一来,财政紧迫的政府就不会有半文钱用来补偿每个人

由于普遍不稳定而带来的后果,使社会履行它的连带责任。由于情况所迫而向冯·杜厄斯堡先生求助的即使不是 1000 万人,而总共只有 10 个人,冯·杜厄斯堡先生恐怕也要拒绝他们的。

不,我们错了。除了所得税而外,国教顾问先生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实现他认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

“基督教教理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生就的罪恶和赎罪的教义。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大可能的团结和联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多么幸运的人民呵!极端重要的问题永远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普鲁士的天才和神圣精神的双重庇护下,获得了两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一个是所得税的收入除去日常和非常的国家开支剩下来的余额,这个余额等于零;一个是天上的地产(生就的罪恶和赎罪)的收入,这种收入也等于零。这两个零就是失掉一切生活基础的 $\frac{1}{3}$ 居民谋生的牢固基础,就是每况愈下的另一个 $\frac{1}{3}$ 居民的有力支柱。无论如何,想象中的余额,生就的罪恶和赎罪要比自由派议员的长篇演说更能减轻人民的饥饿!下面接着说道:

“我们在‘我们的主’这篇祈祷中请求上帝‘不要使我们起邪心’。假如我们为自己提出这种请求,那我们本身对自己的亲友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我们的社会条件必然成为人们产生各种邪心的源泉,而极端困苦的生活又迫使人们去犯罪。”

而我们(普鲁士国家的官吏、审判官和国教顾问先生们)就根据这种理由为所欲为,车辗,砍头,监禁,横加蹂躏,“使”无产阶级“起邪心”,然后我们也遭受车辗,砍头,监禁和蹂躏。一定是这样的。

国教顾问先生声称:“基督教国家是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它一定会进行帮助。”

是的,就是通过关于社会的连带责任的谬论、想象中的余额和开给天父、天子等的空头支票来进行帮助。

我们这位进行观察的国教顾问认为:“甚至可以中止本来就是很无聊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了。假如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能够得到那些应该发展这些原则的人发展的话,共产主义者很快就会不作声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它并不需要普鲁士国教顾问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就是这样。

还有:

“我们认为，社会改革是君主制最重要的使命。”

真的吗？过去一直还没有听说过。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君主制应当实现的社会改革又是哪些呢？就是实行从自由派刊物上抄袭来的、可能带来连财政大臣都不清楚的余额的所得税，建立倒霉的农业银行，修建普鲁士的东部铁路，特别是取得由生就的罪恶和赎罪构成的大量资本所带来的利润！

“这是由王权本身的利益决定的”——王权竟落到这种地步！

“这是苦难的社会状况所要求的”——这种状况在目前与其说是要求教义，不如说是要求保护关税。

“这是福音书规定的”——随便什么规定的都可以，只要不是普鲁士国库极端严重的空虚规定的就好，在国库这个无底洞中，三年内就可以把 1500 万俄国人完全吞没。一般说来，福音书规定了很多东西，其中阉割是社会改革用于自身的起点（“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

我们这位国教顾问硬说：“王权和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句话不过是《l'état c'est moi》〔“朕即国家”〕^①这句老话的另一种说法，和路易十六 1789 年 6 月 23 日对举行叛乱的等级所说的：假如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把你们个个送回家去《et seul je ferai le bonheur de mon peuple》〔“我亲自来关照我的人民的福利”〕，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王权既然决定使用这些词句，它的处境一定十分窘迫，而我们这位最有学问的国教顾问也应该知道，法国人民当时是怎样答谢路易十六这番话的。

① 一般认为这是路易十四的话。——编者注

接着,国教顾问先生肯定说:“宝座应当建立在广泛的人民的基础上;这样它才会最牢靠。”

是这样,只要人民还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上层建筑从自己宽大的肩膀上用力甩到深渊里去。

最后,国教顾问先生说道:“贵族使君主制保持了自己的威严并赋予它以诗意的光辉,但却使它丧失了实权。资产阶级既夺去了它的权力,又夺去了它的威严,只留给它王室费。而人民则既保存了君主制的权力,又保存了它的威严,它的诗意。”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非常遗憾,国教顾问先生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御前演说⁸⁰中向自己的人民吹嘘的那番话,看得太认真了。推翻贵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依靠人民的君主制,——这就是他的最后一言。

假如这些要求不是纯粹的幻想,那其中就包含着一次完整的革命。

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要人民在除了资产阶级还有贵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是荒谬绝伦的事。艾希霍恩的国歌顾问的这种论调,不值得我们提出郑重其事的理由来反驳。

有些先生以为,对人民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可以挽救处境极其令人担忧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为了教训这些先生,我们只想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

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因为他们只存在于国王的想象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象霍布斯所说的,是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 ;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瘠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 ,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们一得到这些 ,就会充分加以利用 ,以便尽快地表示他们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诗意的态度 !

假如那时人民能给现在有资格充任王位的人一个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做朗诵员的职位 ,年俸 250 塔勒和每天一杯啤酒 ,那他应该认为是很幸运的了。

假如现在掌握普鲁士君主制和“莱茵观察家”的命运的国家顾问先生们不相信这一点 ,那就请他们什么时候请教一下历史吧。历史给那些向自己人民呼吁的国王所安排的还不如这样的命运。

英国的查理一世也曾抱怨自己的等级而向自己的人民呼吁。他曾号召自己的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议会。但人民却宣布自己反对国王 ,把议会中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赶了出去 ,使因此而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议会把国王斩首。这就是查理一世向人民呼吁的结局。这是 1649 年 1 月 30 日的事 ;1849 年是这个事件的二百周年。

法国的路易十六也向自己的人民发出过呼吁。三年中间他不断地呼吁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 ,并到处寻找自己的人民 ,真正的人民 ,忠于他的人民 ,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后 ,他终于在科布伦茨军营和普奥军队的轻重车上找到了他们。但是他的法国人民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分了。1792 年 8 月 10 日 ,人民把呼吁者关进了腾普尔监狱 ,召集了在一切方面都是人民代表机关的国民公会。

这个国民公会认为自己有权审查前国王的呼吁,经过一番讨论,呼吁者被押到革命广场,并于 1793 年 1 月 21 日上了断头台。

这就是国王呼吁自己人民的结局。至于国教顾问想成立民主君主制的算盘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9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7 年 9 月 12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73 号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弗·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⁸¹

—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 ,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

“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是献给一个富有的家族的。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

为了避免误解 ,诗人称上帝为“HERR” ,称路特希尔德家族为“Her”

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认为黄金是“按照”路特希尔德的“脾气进行统治”的 ;这种幻想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的荒诞想象。

诗人并没有威吓说 ,要消灭路特希尔德的实际势力 ,消灭作为这一势力的基础的社会关系 ;他只是希望比较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他抱怨银行家不是社会主义博爱家 ,不是幻想家 ,不是人类的善士 ,而仅仅是银行家而已。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

⊖ 倍克 :“穷人之歌” ,1846 年莱比锡版 (K. Beck. 《Lieder vom armen Mann》 . Leipzig, 1846)。——编者注

“Her”这个字有宗教意义的“主” ,也有一般的“老爷”、“主人”、“先生”等意思。——译者注。

气。歌颂“穷人”，歌颂 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倍克对路特希尔德家族大加威吓和责难，尽管作者的意图是好的，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比一位卡普勤教士的说教还要滑稽可笑。所以会有这样的威吓和责难，是由于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抱着幼稚的幻想，完全不了解这一势力和现存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对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成为一种势力并永远保存这种势力而必须使用的那些手段持有非常错误的见解。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这就是拨动诗人心弦的缪斯，她们竭力使自己显得威严可怕，然而却徒劳无益，只是显得可笑而已。她们压低嗓子唱出来的男低音经常撕裂成可笑的尖声怪叫；在她们的戏剧性的描绘下恩泽拉德⁸²的伟大斗争变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斗。

“黄金按照你的脾气统治

.....

啊，但愿你的工作是这样美！但愿

你的心象你的权力这样伟大！”（第4页）

可惜，权力是路特希尔德的，而心却是我们的诗人的。“如果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对世界来说就太多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先生的话）⁸³。

第一个和路特希尔德相对立的当然是歌者本人，也就是住在

卡普勤教派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支。“卡普勤教士的说教”充满一本正经的道德教诲。——译者注

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译者注

“高雅而神圣的阁楼”上的德国歌者。

“歌人们唱着歌曲弹着琵琶，
弹奏着正义、光明和自由，
弹奏着三位一体的真正的上帝：
注意倾听的人们跟随着
这些神灵。”(第 5 页)

这位从“莱比锡总汇报”⁸⁴上的题词中借来的“上帝”，单是由于自己的三位一体性，就不能对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发生任何影响，而对德国青年倒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恢复了元气的青春在召唤
.....
兴奋的富有生机的种子
萌芽在千百个壮丽的名字里。”(第 6 页)

路特希尔德对德国诗人的估计则与此不同：

“你把神灵们给我们的歌曲，
叫作对于荣誉和面包的渴求。”

虽然青春在召唤并且出现了千百个壮丽的名字(它们的壮丽就在于它们只限于激发热情而已)，虽然“战斗的号角声响得那样雄壮”，“心又在夜里跳得如此猛烈。”——

“这个愚蠢的心，它感到
一种神灵授胎的苦痛。”(第 7 页)

啊，这颗愚蠢的心，这个圣母马利亚！虽然

“青年人，一个更为阴郁的扫罗”(见卡尔·倍克“扫罗”，1840年
在莱比锡由恩格曼书店出版)，

扫罗——公元前 11 世纪时的以色列国王。他的臣仆大卫非常聪明勇敢，屡次战败非力士人。扫罗因妒嫉大卫的才能而变得阴郁冷酷。——译者注

“怨恨上帝,也怨恨自己”。

尽管这样,路特希尔德仍然维持着武装起来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在倍克看来,也只是以路特希尔德一个人作为凭借。

报纸上所刊载的关于神圣的教皇领地授予路特希尔德救世主勋章的消息,成了我们的诗人证明路特希尔德不是救世主的理由;同样,这个消息也可以成为证明基督虽是救世主但不是救世主勋章的荣膺者的理由,这一证明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是救世主吗?”(第 11 页)

于是他向路特希尔德证明,说路特希尔德并没有象基督一样在可怕的黑夜里战斗,说他从来没有

“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给你的
一个温和的、给人幸福的使命”(第 11 页),

牺牲过骄傲的人世间的势力。

应该责备伟大的神灵在挑选自己的传教士时没有显示出神灵的伟大力量,并且在号召完成为人们造福的事业时找错了对象。它的伟大仅仅在于字很大而已。

路特希尔德没有能力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可以用三个例子,即他对七月革命、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行为来对他做详细的证明。

“瞧,法兰西英勇的儿女起来了”(第 12 页),

一句话,七月革命爆发了。

“你曾否准备?你的黄金曾否象
云雀鸣啭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鸣响
迎接那唤醒了大地的春天?
春天使深深地沉睡在我们胸中的

所有渴念的愿望
又恢复青春,又得到生命。”(第 12 页)

唤醒了大地的春天是资产阶级的春天,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言而喻,黄金(路特希尔德和任何其他人的黄金)就象云雀鸣啭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鸣响。不错,复辟时期的那种不仅沉睡在人们的胸中、而且沉睡在烧炭党人的“温特”⁸⁵里的希望这时已恢复了青春,得到了生命,然而倍克的穷人却无动于衷。可是,一当路特希尔德确信新政府有牢固的基础时,他自然就毫不犹豫地让他的云雀去为寻常的利息而歌唱。

倍克把拉菲特和路特希尔德对立起来,他对拉菲特的崇拜表明,他已经完全沉溺于小市民的幻想中:

“一所授予圣者称号的市民住宅
紧密地蔓延在你令人羡慕的厅堂”(第 13 页),

这就是拉菲特的住宅。这位兴高采烈的小市民引以自豪的是他那路特希尔德的令人羡慕的厅堂相反的简朴的市民住宅。他的理想,即他想象中的拉菲特,当然也应该生活在简朴的市民环境里;拉菲特的大公馆被缩小成德国市民的住宅。拉菲特本人被他看做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心地纯洁的大丈夫;他被拿来和穆西乌斯·赛沃拉⁸⁶相比,他似乎会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本世纪(倍克指的不是巴黎的“世纪”⁸⁷吧?)[⊖]向前迈进。倍克称拉菲特为富于幻想的孩童,最后竟称他为乞丐。他的葬仪被描写得十分动人:

“马赛曲在送殡的行列里
迈着抑制的步伐前进。”(第 14 页)

⊖ 双关语:一家报纸的名称叫做“世纪报”(《Si ècle》)。——编者注

和马赛曲并排走着的是王室的车乘,紧跟着的是索泽先生、杜沙特尔先生和众议院里所有的大腹便便和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在七月革命以后,当拉菲特意气洋洋地把自己的“教父”^①奥尔良公爵请进市政厅大厦,同时说出今后将由银行家来统治了这种令人惊讶的话的时候,马赛曲的步伐应该抑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至于说到波兰人,诗人只限于责备路特希尔德对侨民不够慷慨而已。对路特希尔德的攻击在这里变成了小城市里流行的趣闻,而且在攻击以路特希尔德为代表的金钱势力时所打的幌子也完全丧失了。大家知道,资产者在他们所统治的任何地方对波兰人都是非常客气的,甚至是很热情的。

下面就是表明这种呓语的一个例子:有一个波兰人跑来哀求周济,路特希尔德给了他一个银币,波兰人

“接过来银币,快乐得发抖,
并且为你和你的子孙祝福。”

巴黎的波兰委员会在此以前已经基本上使波兰人摆脱了这种境况。而我们的诗人写出波兰人的这幅景象来,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装腔作势寻找借口而已:

“但是我把这乞丐的幸福
鄙视地抛回你的钱袋里,
以被侮辱的人们的名义。”(第16页)

要能够这样扔到钱袋里去,那就需要有投掷的高度技巧和丰富的经验。最后,万一有人控告倍克犯了侵犯人身的罪,他也可以

① 原文是《kompèe》,来自法文《compèe》,《compèe》有两重意思,一是教父,一是阴谋、冒险的参与者。——编者注

化险为夷 ,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 ,而是以人们的名义行动的。

路特希尔德接受了豪华的奥地利首都授予他的公民权利证书 ,他因这件事还在第 9 页上就已遭到了责难 ,

“在那里 ,你的受迫害的教友
为他的阳光和他的客气付钱。 ”

倍克甚至以为路特希尔德获得了维也纳的公民权利证书 ,也就获得了自由人的幸福。

现在 ,在第 19 页上 ,他质问他 :

“你解放了你自己的种族吗 ,
这永久希望着、永久忍受着的种族 ?”

这样说来 ,路特希尔德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救星了。但是 ,他应该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 ?犹太人把他奉为大王 ,因为他的钱最多。他应该教导他们鄙视金钱 ,“为了世界的幸福而抛弃它”。(第 21 页)

他应该使他们忘记利己主义 ,忘记欺诈和高利盘剥的手段 ,一句话 ,他应当以一个披麻蒙灰劝人行善和忏悔的传教士的姿态出现。我们的诗人的这个大胆的要求无异于要求路易 - 菲力浦教导那些受七月革命养育的资产者废除私有制。假使路特希尔德和路易 - 菲力浦竟这样疯癫 ,那末他们的权力很快就会丧失 ,但是犹太人决不会不做买卖 ,资产者也决不会忘记私有制。

第 24 页上倍克责备路特希尔德榨干了资产者的脂膏 ,好象不应该让资产者的脂膏被榨干似的。

第 25 页上说 ,路特希尔德带坏了君主们。难道他们不应该被带坏吗 ?

我们已经充分地证明了 ,倍克把多么神奇的势力强加在路特

希尔德的身上。可是下面愈说愈 *crescendo* [夸大]。在第 26 页上他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中：如果他(倍克)是太阳的所有者，那末他将能做许许多多事情，就是说，还不到太阳没有他做主人时所能做到的事情的百分之一。在这以后，他突然想到，路特希尔德并不是唯一的罪人，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富人。但

“你能说善辩地坐在讲座上，
富人们在你的学校里学习；
你必须把他们引入人世，
你能够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粗狂放纵——你宽容忍受，
他们伤风败德——是你的罪孽！”(第 27 页)

因此，只要路特希尔德先生稍有良心，他就完全可以阻止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竞争、财产的积聚、国债和投机倒把，简言之，即可以阻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必须真正地具有 *toute la déso-lante naïveté de la poésie allemande* (德国诗歌的全部令人不能容忍的幼稚性)，才敢于刊登这样的童话。路特希尔德在这里变成了真正的阿拉丁。

倍克并不满足于此，他赋予路特希尔德以

“伟大得令人眩晕的使命：
.....
减轻这个世界上全部的苦难。”

这样的使命就是全世界的资本家合在一起也丝毫不能完成。难道我们的诗人没有看到，他愈想装得高尚和有力，就愈变得可

“一千零一夜”“神灯记”中的主人公，他由于得到了一盏神灯，便能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译者注

笑 ;难道他没有看到 ,他对路特希尔德的一切责难都变成了最无耻的阿谀奉承 ,他对路特希尔德的势力的歌颂 ,甚至连最善于吹拍的人都要甘拜下风。当路特希尔德看到 ,他这个渺小的人物在德国诗人的头脑中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纸老虎的时候 ,他也禁不住要为自己鼓掌欢呼。

在我们的诗人给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势力所抱的无知而浪漫的幻想和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信赖披上诗歌的外衣之后 ,在他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得令人眩晕的使命而令人眩晕地大事吹嘘关于这一势力的幻想之后 ,他对理想和现实相违背表示了小市民的愤慨 ,并且是那样慷慨激昂 ,甚至能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信徒 惹得捧腹大笑 :

“我真痛苦 ,在漫漫长夜里(12月21日)

我用灼热的头脑思索这一切 ,

.....

于是我的鬃发都竖立起来 ,

我觉得我好象扯动上帝的心 ,

象钟手扯动救火的警钟。”(第28页)

对这个老头子说来 ,这确实是给他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了。他认为 ,“历史的神灵”在这里授给了他一些绝对不容许泄露出来的思想。于是 ,最后他绝望地决定在自己的棺材里跳康康舞 :

“可是总有一天在霉烂的尸布里 ,

我的尸骨将要快乐得发颤 ,

教友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新教派 ,17世纪产生于英国 ,后流行于北美。教友派信徒举止端方 ,道貌岸然 ,以沉默寡言著称。——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法国的游艺场里的一种下流舞蹈。——译者注

如果这个消息下降到我(尸骨)这里,
说供品在祭坛上冒烟。”(第 29 页)

我开始有点怕卡尔这个孩子了。

路特希尔德家族之歌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按照现代抒情诗人的惯例,下面是一段关于这首歌和诗人在这首歌中所起的作用的押韵的结语。

“我知道,你有力的膀臂
能够把我打得鲜血淋漓。”(第 30 页)

也就是说会打他五十棍。奥地利人是决不会忘记毒打的。在面临着这种危险的时刻,崇高的感情赋予他以勇气:

“正如上帝吩咐,并且毫不迟疑,
我坦白地歌唱着我的胸怀。”

德国诗人总是遵照命令歌唱的。当然,应该负责的是主子,而不是仆人,因此,路特希尔德应该去找上帝而不是找他的仆人倍克算账。下面是现代抒情诗人惯用的方法:

- (1)把他们似乎由于自己的无害的诗而遭到的危险加以夸大;
- (2)挨了打以后,就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这一支歌的结尾是一些吹嘘这首歌的话,关于这首歌,作者自欺欺人地说:

“它自由而骄傲,它可以支配你,
可以告诉你说,它发誓相信什么。”(第 32 页)

就是说,发誓相信那恰好在这几句结语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完善。但是,我们耽心路特希尔德会去控告倍克的这个虚伪的誓言而不

去追究他的诗歌。

啊,愿您能把黄金的天恩普照世人!

诗人号召富人帮助穷人,

直到勤劳为你的老婆孩子
获得一笔更为安稳的财富。

这全都是为了

你能够永久善良,
永久是一个公民、一个男人,

就是说 summa summarum(归根到底)是个善良的小市民^①。于是倍克便回到自己的理想中去了。

男仆和女仆

诗人歌颂两个使上帝高兴的灵魂,如象诗中极其乏味地描写的那样,他们只是在经过了许多年省吃俭用和循规蹈矩的生活以后,才终于纯洁地爬上了夫妇的卧床。

他们接吻?他们羞羞答答!他们调笑?他们小声小气!
啊!花朵的确是花朵,可是花朵开在冰里;
一个拄着拐杖的舞蹈!一只可怜的、迟暮的飞蛾,
一半儿是个神采焕发的儿童,一半儿是个衰颓的老者。

作者并不以全篇诗中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佳作作为结束,在这以后他还让他们为一份小小的财产,为“在自己的炉灶周围出现了自己的家具”而欢欣若狂,而高兴得发抖。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带着

① 俏皮话:德文中《Bürger》的意思是“公民”《Mann》的意思是“男人”;《Bürgersmann》的意思却是“小市民”。——编者注

讽刺的口吻,而是感激零涕,泪下如雨。但这还没有完:

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人,天黑了,他命令星星发光,
他用慈祥的目光观看打碎了锁链的奴仆。

这样一来,任何一点锋芒都幸运地被消除了。胆怯和没有信心经常箝制着倍克,驱使他把每首诗拉长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使他在没有用多情善感证明自己的全部庸俗性以前收不了场。他大概故意选择了克来斯特的六步韵诗体来使读者陷入烦恼不堪的境地,就象一对恋人在长久的实验时期内由于自己的胆怯的道德观念而烦恼不堪一样。

犹太旧货商

在对犹太旧货商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些幼稚可笑的地方:

这个星期飞逝了,这个星期
只把五天供给你的勤劳。
你这喘不过气来的人,赶快吧,
去挣得你每天的酬报。
星期六父亲不愿意工作,
星期天儿子不愿意干活。

但是,在下面倍克便完全陷到自由主义的青年德意志派⁸⁸关于犹太人的空谈中去了。诗在这里消声匿迹,一无踪影,仿佛听到了患着瘰疬病的萨克森等级院中的患瘰疬病的发言:你不能成为手艺人,不能作“小商贩的头目”,不能当庄稼汉,也不能当教授,但是医学的大门对你敞开着。这用诗表现出来就是这样:

他们不准你做手艺活,
他们不给你一块田地。

你也不能向青年们讲话
从一个教师的高高的靠垫上

.....
你可以在乡间给病人治病。

照这样,难道不可以用诗来写普鲁士法典或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先生的诗谱成歌曲吗?

犹太人给他儿子朗诵了下面的诗句:

你必须营谋,必须夺取,
永久贪求产业和金钱,

接着他又安慰他说:

可是你永久是正直的。

罗 累 莱

这个罗累莱无非是黄金罢了。

卑鄙以巨大的波浪
涌进内心的纯洁,
淹死每一个幸福安宁。

在这个内心纯洁的洪流中,在这个幸福安宁的被淹死中,包含着庸俗和夸大的令人沮丧的混合物。接着就是责骂金钱可耻和不道德的庸俗冗长的臭诗。

它(爱) 追求金银,追求宝石,
而不追求心和同心的灵魂

德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美丽的女神,常在莱茵河滨以其歌声引诱水手使船触礁。——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

假如金钱的作用仅限于搞丑德国人对心和同心的灵魂以及席勒式的小小的茅屋(其中有足供一对幸福的恋人居住的地方)的追求,那末早就应当承认它具有革命的作用了。

战鼓之歌

在这首诗中,我们的社会主义诗人又一次表明,他由于已陷入德国小市民的鄙俗风气中,就总是把他给人留下的那点微弱的印象破坏了。

一团队伍在战鼓声中出发了。人民号召兵士和他们一起参加共同的事业。令人兴奋的是,诗人终于鼓起了勇气。但是很可惜,最后我们才了解到,这里所谈的仅仅是皇帝的命名日和人民的呼唤,而这个呼唤也不过是一个参加典礼的青年(也许是个中学生)偷偷地作下的一首幻想的即兴诗:

一个青年这样做梦,火烧着他的心。

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把它们抛到现实的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诗人自己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减到慰藉。不过,布拉格的起义⁸⁹使他有机会来描写和这种滑稽剧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

移 民

我从树干上折下枝条，
看林人就走去报告，
主人把我捆得紧紧，
给我打出来这个伤痕。

所缺少的只是看林人的报告没有用这样的诗写出来。

假 腿

诗人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整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

马 铃 薯

根据“曙光，曙光！”的曲调写成

神圣的面包，
你为了我们的苦难，
你为了苍天的原故
曾经来到人世，解救人民——
再见吧，你如今是死了！

在第二段里他把马铃薯称为

——这点小小的残余，
从伊甸园里遗留给我们的，

并且这样来描写马铃薯的病症：

瘟疫在天使们中间猖狂！

在第三段里倍克劝穷人穿上丧衣：

贫穷的人！
到那里去，披上丧衣，
你现在已经完全定了罪，
啊，你最后的东西消灭了，
哭吧，假若还能够哭泣！

你忧伤的祖国，
你的上帝死卧在沙土里，
可是让人向你说句安慰的话：
没有一个救世主被人打死，
他不能又重新复活！

能哭的和诗人一起放声哭吧。假如诗人不是象他的穷人缺乏好马铃薯那样缺乏精力，他会因为能够喝到去年秋天用马铃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帝、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之一）做的饮料而高兴。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会允许在教堂中唱这首诗，这对他们是毫无损失的。

倍克这样卖力，他理应戴上马铃薯花编的花冠。

老处女

我们不来仔细分析这首诗，因为它长得简直没有个完，一共扯

了 90 页 ,枯燥无味得简直难以形容。在文明国家里多半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的老处女 ,在德国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的扬扬得意的议论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法 ,就是唱这样的高调 :从另一方面来看 ,只要没有穷人 ,那就会万事如意了。这种议论可以被应用到任何对象上去。它的真正内容就是在慈善掩饰下的伪善的小市民的庸俗气 ,它完全同意现存社会的正面 ,使它悲痛的是 ,除了正面外 ,还存在着反面——贫穷 ;这种庸俗气已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 ,而它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现代社会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不要它存在的条件。

倍克常常以极端庸俗的形式在自己的诗中重复这种议论 ,例如 ,关于圣诞节他写道 :

啊时代 ,你慈祥地启迪人心 ,
你会更为慈祥 ,加倍的可亲——
如果在那个穷孩子的胸中
没有嫉妒用它原始的罪恶
疯狂地亵渎神灵 ,
当他无家可归向着阔孩子们的
节日盛装的室内观看的时刻 !
是啊.....
.....在圣诞夜的灯光下
孩子们的欢呼我听来更会甜美 ,
如果没有穷人在潮湿的洞穴
躺在腐烂的草席上挨冻受罪。

不过 ,在这首无定形的、长得没有个完的诗里 ,间或也有一些写得好的地方 ,例如 ,对流氓无产者的描写 :

是谁天天孜孜不息 ,
在传染病疫的阴沟里翻垃圾 ;

是谁象麻雀一般追求食粮，
是谁补锅罐磨剪子磨刀，
是谁僵冻着手指浆洗衣裳，
是谁喘吁吁推着一车重载，
装着些半生不熟的果子，
苦苦地喊着：谁买，谁买？
是谁为一个铜钱在泥土里打架；
是谁天天靠着街角的石壁
歌颂他所信仰的上帝，
几乎不敢伸出手来，
因为行乞不被允许；
是谁双耳聋聩忍受饥寒，
弹着竖琴，吹着笛箫，
在所有的窗前，在每个门旁——
一年又一年奏着同一的曲调——
引起看管儿童的阿姨舞蹈，
这个曲子自己却不能听到；
是谁在夜里使大的城市明亮，
自己在家却没有一点灯光；
是谁负着重担，是谁劈着木柴，
是谁失掉主人，谁受尽主人的虐待；
是谁又祈祷、又搓合男女、又偷盗，
酗酒把良心的残余消磨尽了。

倍克在这里第一次超出了德国市民的一般道德水平，借一个老乞丐的口诵出了这些诗句。这个老乞丐的女儿请求父亲允许她去赴一个军官的约会。在上面这些诗句里，老乞丐向他的女儿描画出她的孩子将列身于其中的那些阶级的充满痛苦的景象，并且直接以她生存的环境为根据把他自己反对的意思表示出来，不过并没有（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向她作道德的说教。

不要偷窃

一个俄国人的道德高尚的仆人(仆人自己把这个俄国人叫做善良的老爷)为了接济他的年迈的父亲,在夜里偷了他那个似乎在打瞌睡的主人的钱。这个俄国人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从背后偷看了仆人写给他父亲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你收下这点钱!是我偷来的!
父亲,你向救世主祈祷吧,
求他将来从他的宝座上
对我的罪给以赦免!
我要多多工作而且挣钱,
从草席上赶走睡眠,
直到我能够给我善良的主人
补偿上这笔偷盗了的钱。

这个道德高尚的仆人的善良的老爷被这个吓人的自白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仆人的头上,为他祝福。

但是这是一个死尸——
在恐怖中他的心都裂开了。

还有谁能写出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东西来吗?倍克在这里降到了科采布和伊夫兰特的水平以下;这出仆人的悲剧比市侩的悲剧更胜一筹。

新的神灵和旧的痛苦

这首诗嘲笑(往往很中肯)的是隆格、“光明之友”⁹⁰、新一代犹太人、理发师、洗衣妇、抱有温和的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市民。最后,

诗人在庸人面前替自己辩白 ,因为他们将要因这一点而控告他 ,虽然他

在风暴和黑夜里唱出了
这首光明的歌。

然后他讲述了一篇用社会主义的词句修饰过的、以特殊的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关于博爱和实践宗教的教义 ,从而把自己的敌人的一种性质和他们的另一种性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 ,倍克就怎么也收不了场 ,直到他再次断送自己为止 ,因为他自己已深深地陷到德国的鄙俗风气中 ,并且过多地考虑自己 ,考虑沉溺于自己诗中的诗人。我们的诗人在现代抒情诗人眼中又成了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不是的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 ,而是一个飘浮在云雾中的“诗人” ,但这些云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蒙胧的幻想罢了。倍克经常由极度夸张的高谈阔论转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 ,从一种向现状开火的小幽默转到和现状实行感伤的和解。他常常忽然发觉他自己原来就是 *de quo fabula narratur* [所讲到的那个人]。因此 ,他的诗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 ,而是

“止血用的
三包沸腾散”(第 293 页)。

所以 ,用下面这样一些表示恭顺的无力的悲叹作为整本书的结尾 ,是很合适的 :

什么时候在这世界上 ,
啊上帝 ,会变得协调 ?
在渴望上我是双重地愉快 ,
在忍耐上我是双重地疲劳。

倍克无疑地比德国文坛上的大多数小卒具有更大的才能和更多的天赋的精力。他的唯一的 不幸就是德国人的鄙俗气,他那装模做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俗气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

二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1846年达姆斯塔德版^①

格律恩先生被他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弄得疲疲不堪,现在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祖国的社会停滞,想借此休息一下。为了丰富多采,他决定这一次“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下歌德老人。他脱下了七哩靴,穿上了拖鞋,披上了睡衣,躺在安乐椅上悠然自得地伸着懒腰:

“我们不是写注释,我们只是看一看近在手边的东西。”(第244页)

他把房里安排得非常舒适:

“我把玫瑰和茶花放在自己房里,把木犀草和三色堇放在打开的窗口。”(第Ⅲ页)“先不做任何注释!……但是在这里,桌上放着一部全集,房间里飘荡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看吧,看我们将前进得多么远……只有骗子才会拿出多于自己所有的东西。”(第Ⅳ,Ⅴ页)

格律恩先生虽然 *nondhalance*(粗心大意),但在这本书中却建立了丰功伟绩。不过当我们听到了他自己的话之后,我们对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他是一个“因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的空虚而感到绝望”(第Ⅲ页)的人,当他“有埋没于过分和杂乱无章之中的危险的时候,他就感到了歌德对他的羁绊”(同一页),他

① K. Grün. 《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Darmstadt, 1846. — 编者注

德国童话中巨人之靴,相传能渡海腾云,瞬息即达。——译者注

具有“属于我们灵魂的那种人的使命的崇高感情,为了这一点就是入地狱也在所不惜”(第Ⅳ页)我们知道了,还在很早以前他就“一度向费尔巴哈的‘人’问过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但对于上述的“人”来说却显然还是非常困难的(第277页);我们看到了,格律恩先生在第198页上怎样“使自我意识摆脱了困境”,在第102页上他怎样甚至希望到“俄国皇帝的宫廷”里去,而在第305页上怎样雷鸣般地向全世界宣告:“谁想借助法律来建立一个必须长久存在的新秩序,谁就应该被诅咒!”——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了。当格律恩先生在第187页上打算“嗅一下唯心主义”,并且把它“变为街头流浪儿”的时候,当他再三考虑如何才能“成为所有者”,“富人,富裕的所有者,以便有可能交纳税金,取得选入人的议会和列入对人和非人的问题做出决定的陪审员名册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了。

既然他立足于“全人类的无名的基础”之上(第182页),难道他还做不到这一点吗?就是“黑夜和黑夜里的可怕的事情”(第312页),如谋杀、通奸、盗窃、卖淫、放荡以及由傲慢而产生的恶习也吓不倒他。诚然,他在第99页上承认,他已经“在人突然发现自己空虚的时候感到无限的痛苦”。诚然,由于下面这句话,他也在公众面前“突然发现自己空虚”:

与你相近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
不是我!¹

事情是这样的:

“在这些字眼里仿佛雷电交加,山崩地裂。在这些字眼里,神殿前的帷幕撕裂了,坟墓裂开了……神的末日和远古的混沌世界来到了……星辰又互相

撞击,彗星唯一的尾巴刹那间焚毁了小小的地球,于是所剩下的就只是一片烟云雾海。即使想象出最可怕的破坏……同隐藏在这几个字眼里的破坏力比较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第 235,236 页)

固然,当格律恩先生到达“理论的边缘”的时候,特别是在第 295 页上,他的“背上就象有好多股冰水在奔流,使他混身上下毛骨悚然”。但是,他完全战胜了这一切,因为他到底是“伟大的人类共济会”(第 317 页)的会员啊!

Take it all in all^①。格律恩先生有了这样的品质,在任何活动中都将取得胜利。在谈到他的关于歌德的大有成效的论断之前,我们先同他一起来巡视一下他的活动的几个次要的方面。

首先来看看自然科学方面,因为“对自然界的认识”,照第 247 页上所说,是“唯一实际的科学”,同时“也是人道的(vulgo[简言之]人的)人完善化的表现”。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格律恩先生关于这一唯一实际的科学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的东西。诚然,他在这里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一科学,而只是在暮色朦胧的房中踱来踱去的时候,慢吞吞地吐出了几句话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他“也”是在制造着“最实际的”奇迹。

关于被认为是霍尔巴赫写的“自然体系”92 一书,他发现:

“在这里无法了解,自然体系是怎样突然中止的,是怎样突然中止在自由和自决应当从神经系统的必然性中冲出来的那一点上的。”(第 70 页)

格律恩先生可以非常准确地指出这个或那个“从神经系统的必然性中冲出来”因而使人的脑袋里面也挨揍的那一点。关于至

① 整个说来,他就是如此(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的改写)。——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今尚未受到注视的那一点,即关于头脑中意识的生产过程,格律恩先生可以提供最准确最详细的知识。但是,很可惜!在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这本书中,“这一点是决不会得到阐明的”。

杜马、普莱费尔、法拉第、李比希至今还天真地坚持这样的意见:氧是无臭无味的气体。然而格律恩先生知道,一切酸性的东西都是会刺激舌头的,所以在第75页上宣布“氧”是“有刺激性的”。同样,他在第229页上用新的事实来丰富声学 and 光学:他在那里造出“能使物体净化的音响和光照”,于是他就确定声和光的净化力是无可置疑的。

格律恩先生并不满足于对“唯一实际的科学”所做的这些辉煌的贡献,不满足于脑袋里面挨揍的理论,他在第94页上发现了一根新的骨头:“维特是个没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到现在为止,人有两打以上的脊椎骨这种错误的见解一直占居统治的地位。现在格律恩先生不仅把这许多骨头简化为标准单位,而且发现这个仅有的脊椎骨有一种能使人成为“主体”的奇妙的特性。“主体”——格律恩先生——理应由于这一发现而获得一个特殊的脊椎骨。

我们这位逢场作戏的自然科学家最后把他的关于自然界的“唯一实际的科学”做了如下的概括:

“难道自然界的核心
不是存在于人的心里吗?”³

自然界的核心存在于人的心里。人心里存在着自然界的核心。自然界在人的心里有自己的核心。”(第250页)

经格律恩先生的许可,我们做个补充:人的心里存在着自然界的核心。在心里存在着人的自然界的核心。在人心里自然界有自

己的核心。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就谈到这个卓越的“实际的”说明为止。现在来谈谈政治经济学,可惜,根据上面所说的来看,它不是“实际的科学”。格律恩先生很瞧不起这门科学,不过就是在这里,他的行动虽然是在碰运气,然而还是非常“实际的”。

“个人反对个人,于是就产生了普遍竞争”。(第 211 页)

这就是说,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普遍竞争”的模糊而玄妙的观念一产生,“于是就产生了竞争”。在这里论据无疑地是不需要的,因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实际的科学。

“金钱在中世纪还受到忠、爱、诚等的约束;16 世纪打碎了这些枷锁,金钱就获得了自由。”(第 241 页)

麦克库洛赫和布朗基过去一直陷于一种谬误,认为金钱“在中世纪受到约束”,是由于没有通往美洲的交通线和花冈岩层把“金钱”的矿脉封闭在安第斯山脉中的缘故。如今麦克库洛赫和布朗基将赞成给格律恩先生致贺词,以感谢他的这一发现。

历史学也不是“实际的科学”,而格律恩先生却企图赋予它以实际的性质,把他自己想象中的一系列事实拿来同传统的事实相对立。

在第 91 页上,“艾迪森的卡托在维特前一百年就在英国的舞台上用匕首自杀了”,可见他表现出了多么惊人的厌世情绪。原来他自“杀”的时候,他的生于 1672 的作者还是个婴儿呢⁹⁴。

在第 175 页上格律恩先生给歌德的日记做了修正,他指出在 1815 年德国各邦政府并没有“宣布”出版自由,而不过是“允许”而已。这样看来,骚爱尔兰德的和 other 地方的庸人们告诉我们 1815

到 1819 年这四个有出版自由的年头里所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们的丑事和丑行怎样全被报刊公布于世，以及最后 1819 年的联邦决议⁹⁵怎样结束了这种公开的恐怖行动，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其次，格律恩先生告诉我们说，自由的帝国城市 法兰克福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第 19 页）。而且在德意志境内决没有什么国家存在；因此，人们现在终于开始“愈来愈明白这种德意志无国家性的独特的好处”（第 257 页）；这首先就是十分容易挨打的好处。这样说来，德意志的专制君主们就可以说：《la société civile, c'est moi》〔“市民社会就是我”〕，可是他们的情况还是很糟的，因为照第 101 页上所说，市民社会只是一个“抽象”而已。

德意志人虽然没有国家，但他们却有着“巨额的真理的票据，并且这张票据一定能兑现，支取，变成硬币”（第 5 页）。毫无疑问，这张票据是可以在格律恩先生交纳“税金，取得选入人的议会的权利”的那个账房里支取的。

我们看到了关于法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实际的”说明，谈到这一革命的“意义”，作者离开了本题，而发表另外一种“独特的言论”。他开头就说出一句神论：历史的法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法之间的对立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二者都是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决不想稍微低估格律恩先生的又新鲜又重要的发现——以理性为基础的法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的意义，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在寂静的房间里同畢舍的“议会史”⁹⁶的头几卷进行的无声的谈话，

见本卷第 52 页脚注。——译者注

应当会告诉他这种对立在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

然而,格律恩先生宁愿详细地向我们证明革命的无用,这种证明最后就归结为一种绝无仅有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责难:革命“没有研究‘人’这个概念”。这样的粗枝大叶真是不可饶恕。假如革命研究了“人”这个概念,那就既不会有热月9日的事件,也不会有雾月十八日的事件了⁹⁷。拿破仑也会满足于将军的官衔,也许在晚年还会“从人的观点”写出一本军队勤务条令来。其次,从关于“革命的意义”的说明中我们知道了,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基本上没有差别,并且也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差别。这使我们可以满意地确信,格律恩先生还没有完全忘记他的黑格尔。例如,请对照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史”第三编第二版第458、459、463页⁹⁸。其次,还是为了说明“革命的意义”,很详细地谈到了竞争(最主要的地方我们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然后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犯罪是国家存在的结果,又从霍尔巴赫的著作中做了长篇的引证,同样又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摘录了大量的话来说明“革命的意义”,而关于这本书又解释说,这本书有先见之明,在1516年就极其精确地描绘了正好是“今天的英国”(第225页)。在整整的三十六页上东拉西扯地谈完了这一切见解和论断之后,终于在第226页上下了最后的判词:“革命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实现。”这真是对所有一切还没有研究过“人”这个概念的人们敲起的一声警钟!

为了安慰除马基雅弗利主义之外就一无所得的可怜的法国人,在第73页上格律恩先生给他们吃了一粒宽心丸:

“18世纪的法国人民是各族人民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用人权来对抗神权。”

这样说来,“人”这个概念”就应该被“研究”过的了,而人权

也不是同神权,而是同国王、贵族和僧侣的权利“相对立”,关于这些我们不打算多加考虑,这些都是小事情,不必管它,我们感到十分沉痛的是,在这里格律恩先生本人犯了“人的”毛病。

这就是格律恩先生忘记了,在他的比较早期的著作里(例如,请参看“莱茵年鉴”第一卷中所载的论“社会运动”的文章⁹⁹及其他等等),他不仅广泛地阐述了“德法年鉴”中关于人权的著名论断¹⁰⁰,使它“通俗化”,而且甚至以道地的剽窃者的热心加以夸张,把它变成了荒谬的东西。他忘记了,他在那里咒骂过人权,说它是小商人、小市民等等的权利,而现在却突然把它们变成了“人的权利”,变成了“人”所固有的权利。在第 251 和 252 页上格律恩先生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他把从“浮士德”中抄袭来的“可惜谁也不肯照管的我们的天赋人权”变成了“你的自然权,你的人权,从内心决定自己的行动和享受自己的成果的权利”,虽然歌德把这个权利直接同“象恶病样遗传的法律和制度”¹⁰¹对立起来,即同 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传统的权利对立起来,而同后者相对立的只是“天赋的、不以时效为转移的、不可让渡的人权”,即革命所宣布的人权,而绝不是“人”所固有的权利。这一次格律恩先生当然应当把过去所写的东西忘掉,以便使歌德不失去人的观点。

不过格律恩先生还没有完全忘记他从“德法年鉴”和其他同一倾向的著作中所学到的东西。例如,在第 210 页上他给当时的法国的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摆脱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质(!!!)”。这个怪物显然是在把“德法年鉴”第 204 和 205 页翻译成现代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习惯用语时,从这几页上的“共同体”^①这

① 俏皮话:德文中《allgemeine Wesen》意即“普遍的本质”;《Unwesen》意即“怪物”;《Gemeinwesen》意即“共同体”。——编者注

一字¹⁰²产生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有一个习惯,当他们遇到一个他们所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正因为如此,“德法年鉴”上的法的“共同体”就变成了上述的哲学上毫无意义的“普遍的本质”;“摆脱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质”这句话成了政治解放即民主在哲学上的简短公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可以把这一公式放到口袋里去,而不用再耽心学问对自己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同样,在第X X VI页上格律恩先生利用了“神圣家族”中关于感觉论和唯物主义所说的话¹⁰³,并且利用这本著作中所指出来的一点,即在上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霍尔巴赫那里可以找到和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合之点,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引用上述的霍尔巴赫的话,并且给这些话加上社会主义的解释。

现在来谈谈哲学。格律恩先生非常瞧不起它。还在第VII页上他就对我们说,他“今后要同宗教、哲学和政治分道扬镳了”,它们全都是“过时的东西,并且在一度解体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又说,在它们里面,特别是在哲学里面,他“所要保存下来的仅仅是人和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本质”。因此,虽然我们因宗教、哲学和政治的一蹶不振的没落而悲伤,但这个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本质和上述的人的人无论如何是足以安慰我们的了。但是格律恩先生是非常温和的。他不但从哲学中“保存了人道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本质”,而且还是一个获得了黑格尔的大量的、虽然是杂乱无章的遗产的幸运儿。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要知道,还在几年前他就不止一次地拜倒在黑格尔的半身象面前了。也许有人

会请求我们不要涉及这些可笑的丢人的 personalia〔私事〕,但是格律恩先生自己却把这一秘密在报刊上透露了。这一次我们将不指出是在哪里。我们已经再三向格律恩先生指明了他的论点的出处,甚至还指明了章节,因此我们可以要求格律恩先生也那样为我们效一下劳,哪怕是一次也好。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愿意为他效劳,我们要告诉他一个秘密,就是他在第8页上所援引的对意志自由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最后解答,是从傅立叶的“论协作”中论意志自由那一章¹⁰⁴里借来的。只有认为关于意志自由的理论是“德国精神的谬误”这种见解,才是格律恩先生本人独有的“谬误”。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歌德。在第15页上格律恩先生证明歌德有存在的权利。歌德和席勒是“没有行动的享乐”和“没有享乐的行动”即维兰特和克洛普什托克之间的对立的解决。“莱辛第一个使人依靠自身”(格律恩先生会不会跟着他玩一下这个把式呢?)。在这个哲学结构中我们立刻就发现了格律恩先生的一切论点的出处。结构的形式,总体的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调和对立的方法。“依靠自身的人”,这是把黑格尔的术语应用于费尔巴哈。“没有行动的享乐”和“没有享乐的行动”(即对立,格律恩先生使得维兰特和克洛普什托克就这个对立演奏了上述的变奏曲),是从莫·赫斯的文集中借来的。我们所没有发现的唯一的出处是文学史本身,因为它与上面所引的那些废话毫不相干,所以格律恩先生完全有理由对它置之不理。

因为我们正好谈到席勒,所以最恰当还是引用格律恩先生的一句话:“席勒可以成为一切,就是不能成为歌德。”(第311页)对不起,不是也可以成为格律恩先生吗?不过我们的作者在这里是

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桂冠据为己有了：

罗马,你缺乏的,那不勒斯有,那不勒斯缺乏的,正好你有;
假使你们两个城联合在一起,对于大地就是太多了。

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莱辛使之“依靠自身的人”只有在歌德的笔下才能完成进一步的进化。在歌德身上发现“人”的功劳正是应该归于格律恩先生的,但这个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辩证的人,是提炼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锅中的 *caput mortuum*^①,是“浮士德”中的侏儒的 *cousin germain*(堂兄弟),总之,不是歌德所说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但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歌德身上除了人的内容外没有别的内容。”(第 X VI 页)在第 X XI 页上我们看到,“歌德把人想象和描写成我们今天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在第 X XII 页上:“歌德在今天(他的著作也是如此)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第 X X V 页)“歌德的诗篇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第 12 页)“歌德不能成为民族的诗人,因为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诗人。”(第 25 页)尽管如此,在第 14 页上“我国人民”即德国人仍然应该把歌德“看成自己本身的变态的本质”。

这里我们看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一个说明,我们完全可以信赖格律恩先生,相信他对“‘人’这个概念”毫无疑问地是有过极其深刻的“研究”的。歌德把“人”描写成格律恩先生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同时还描写了变态的德国人民,因此,“人”不外是“变态的德国人”。这是到处都可以得到证实的。正如歌德“不是民族的诗

① 原意是：“骷髅”，转意是：无用的残渣，经过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后所剩下的废物。——编者注

人”而是“人的诗人”一样,德国人民也“不是民族的”人民而是“人的”人民。因此,在第 X XI 页上我们读到:“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歌德的诗篇……过去和现在都和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人”也是这样,德国人也是这样。而在第 4 页上:“直到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希望替法国造福;而德国的作家却面对着全人类。”(可是“人类”在大多数场合下却不是用“面”而是用身体上离面相相当远并且与面相反的部分“对着”德国的作家)格律恩先生对于歌德希望“从内部把人解放出来”这一点在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自己的喜悦(例如见第 225 页),但是这个纯粹德国人的解放却仍然是“一场空”。

那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一个说明:“人”就是“变态的”德国人。

我们来看一看格律恩先生根据什么认为歌德是“人的诗人”,认为“歌德身上有人的内容”。这种承认将极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我们将看到,正如格律恩先生平常为了想竭力大声压倒自己所有的伙伴而常常向世界说出了其他弟兄们宁肯闭口不谈的东西一样,他在这里泄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隐秘的思想。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人的诗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那时,“人的”这个词主要是用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费尔巴哈赋予这些术语以神秘的哲学内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双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

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①。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

我们将看到,就上述哪一方面来说,歌德的著作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是“完美的人性”,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我们首先来谈谈歌德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然后再来谈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的实际的描述。显然,由于格律恩先生这部书的内容很丰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只能引述一些最独特最出色的地方。

歌德作为社会的批判家实际上是在制造奇迹。他“诅咒文明”(第34—36页),他时常发出一些浪漫的怨言,说文明抹杀了人的一切特点和个性。他在“普罗米修斯”里 *tout bonnement*〔简明地〕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肮脏的牛圈。意思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译者注

① 原意是：“小小的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描写了私有制的起源,从而“预告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来临”(第 78 页)。他(在第 229 页上)是“世界的审判官……文明的米诺斯”。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小事情而已。

在第 253 页上格律恩先生引证“教义问答讲授”：

孩子,想一想,你的礼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能够从你自己那里得来。——
唉,一切都是从爸爸那里。
爸爸又从哪里得来?——从祖父那里。
可是祖父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他是抢来的。

好啊!格律恩先生放开嗓子喊道,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财产就是盗窃)——这才是真正的蒲鲁东!

勒维烈可以带着他的行星回家,并且把他的勋章让给格律恩先生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比勒维烈的发现,甚至比杰克逊的发现和二乙醚蒸气的发现更伟大的东西。谁把蒲鲁东使许多安乐的资产者不安的关于盗窃的话和上述歌德的不伤害人的讽刺短诗混为一谈,谁就应该荣膺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

“市民将军”惹出的麻烦就更大了。格律恩先生把他从各方面打量了一番,破例地紧锁双眉,疑虑地说:“当然……十分无味……革命在这里并未受到指责”(第 150 页)……且住!他终于发现了这里所谈的是什么问题!是关于一瓶牛奶的问题。因此:“不要忘记……这仍然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财产问题。”(第 151 页)

当格律恩先生住的街上有两个老太婆为了一个咸鲱鱼头而争

希腊神话中冥府的审判官。——译者注

拿破仑战争中,授予作战有功的军官、将军和元帅的勋章。——译者注

吵起来时,请格律恩先生不辞辛劳,从他的“飘荡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的楼房里走下来,向她们说,她们所涉及的也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财产问题”。一切善意的人的感谢就是对他的最好的报酬。

歌德写成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维特”绝不象那些“从人的观点”来读欧德的人至今所想的那样,是一部平凡的感伤的爱情小说。

在“维特”里,“人的内容给自己找到了如此恰当的形式,简直无法在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里找到哪怕是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东西。”(第96页)“维特对绿蒂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激情的泛神论的悲剧的杠杆和体现……维特是个没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第93、94页)维特的自杀不是为了恋爱问题,而是“因为他(倒霉的泛神论的意识)无法弄清自己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第94页)“在‘维特’这本书里,用艺术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一切腐败现象,指出了社会弊病的最深刻的根源,它们的宗教哲学基础(大家知道,这个“基础”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以及和它们同时出现的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关于真正人性的纯正、清晰的概念(不过首先是脊椎骨,格律恩先生,脊椎骨!),也就是那种鄙俗气,即那种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周身被蠹蚀了的秩序的死亡。”

这就是在“维特”里用艺术手法揭露“社会的腐败现象”的范例。维特写道:

“奇闻异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虚伪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奇闻异事,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¹⁰⁵

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横跨在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所发出的这种绝望的哀号,

这些完全由于缺乏起码的经验而发出的悲叹,格律恩先生在第 84 页上硬把它们说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格律恩先生甚至硬说,上述引文里所表现出的“生活的无限痛苦,这种想把一切颠倒过来,以便使它们(哪怕是一次也好)改头换面(!)的病态要求,归根到底给自己敷设了法国革命的轨道”。革命在前面被看做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实现,而在这里却仅仅变成了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实现。在革命的广场上树起的断头台原来不过是维特的手枪的可怜的摹制品。

此后我们就用不着惊奇:歌德在“斯苔拉”中,如第 108 页上所说的那样,也研究了“社会的材料”,虽然在这部著作中只描绘了“极其可怜的情况”(第 107 页)。“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所不在,简直赛过我们的主耶稣。只要那里有两三人聚集在一起(虽然决不是因它而聚集起来的),它就出现在那里,并且硬说那里有“社会的材料”。就象它的信徒格律恩先生一样,它同“那种庸俗而又自满的、什么都要过问却什么也不懂得的、无孔不入的人”(第 47 页)是相似得颇为惊人的。

我们的读者也许还记得威廉·麦斯特给他姐夫写的一封信(“修业时代”的最后一卷),他在信中说了些关于生长在富贵人家的优越性等十分庸俗的话之后,承认贵族对小市民的优势地位,确认小市民及其他一切非贵族阶级的不平权的地位在最近期间是不应改变的。只有个别的人在一定情况下方有可能上升到贵族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格律恩先生说:

“如果把社会的上层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看作同一的东西,那末歌德所说的关于上层阶级的优势地位的话,无疑是正确的,而歌德也正是这样做的。”(第 264 页)

这方面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现在来谈一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歌德对政治和法国革命的态度问题。在这里,格律恩先生的这部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就在这里,格律恩先生表现了他的赤胆忠心。

要证明歌德对革命的态度是正当的,歌德自然就应该站在革命之上,应该还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制止它。因此,早在第 X XI 页上我们就已经看到,“歌德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时代的实际发展,因而照他自己的看法,他只能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摈弃它。”在第 84 页上,在谈到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个蕴蓄着 in nuce(处于萌芽时期的)整个革命的“维特”的时候,作者写道:“历史处于 1789 年,而歌德则已处于 1889 年。”同样,在第 28 和 29 页上,格律恩先生迫使歌德“用不多的几句话彻底清除了所有关于自由的喊叫”,其根据是早在 70 年代歌德就已在“法兰克福学术通报”¹⁰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根本没有谈到“空喊家”所要求的自由,而只是说了一些关于自由本身、关于自由这个概念本身的一般的十分平凡的话。其次,由于歌德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每个立法者都有做一种礼拜的义务的论点(歌德本人把这个论点只看做法兰克福僧侣们的粗鄙的对骂所引起的一种滑稽可笑的怪论,而格律恩先生自己却引证了这点),因此就说,“大学生时代的歌德已经把革命的和当代法国的整个二重性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了”(第 26、27 页)。显然,格律恩先生继承了“大学生时代的歌德的穿破了的鞋底”,并且把它们钉在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七哩靴上。

不用说,歌德关于革命的言论我们到现在才完全清楚了。现在我们才明白,高高地站在革命之上的歌德,在革命前十五年就

“清除了”革命并把它“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的歌德,超过了革命整整一个世纪的歌德,是不能同情革命的,是不能关心他在1773年就已与之绝交了的“空喊自由的”人民的。现在格律恩先生什么困难也没有了。让歌德随意地给老一套的传统智慧穿上二行诗的华美的外衣吧,让他去用庸俗短浅的眼光论证它吧,让他在威胁着他那和平的诗人幽居生活的巨大冰流面前体验一下小市民的恐惧吧,让他表现出浅薄、怯懦和下贱吧,——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的耐心的注释者发火。格律恩先生把他举在自己的不知疲倦的肩上,扛着他走过泥泞;不仅如此,他认为踩踏泥泞的事全都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来效力,只要不弄脏歌德的鞋子就行。从“法兰西之战”到“私生女”,格律恩先生毫无例外地把一切都承担在自己的脚上(第133—170页),表现出高度的忠诚,甚至可以使毕舍这种人都感动得流泪。但是当一切都徒劳无益的时候,当泥泞太大的时候,就拿出一套高超的社会性的解释,于是格律恩先生就来解释下面的诗句:

法国的可悲的命运,大人物们要加以考虑,
但是说真的,小人物们更要多多地考虑。
大人物们消灭了;可是谁来保护群众
抵抗群众?这时群众是群众的暴君。¹⁰⁷

“谁来保护?”——格律恩先生竭尽全力地叫喊道,同时加上着重号,打上问号,还求助于一切“激情的泛神论的悲剧的体现”。“也就是说,谁将保护无产的群众即所谓平民以抵抗有产的群众,抵抗立法的平民呢!”(第137页)“也就是说,谁将保护”歌德以抵抗格律恩先生呢?

格律恩先生就是这样逐一解释“威尼斯警句”中所有非常明智

的市民的教诲的。在他看来这些教诲“是海格立斯 的巨掌打的耳光,而它们的声音只是在现在(在小市民没有危险之后)我们方觉得是那样地悦耳,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伟大而苦痛的(对于小市民无疑是非常苦痛的)经验”。(第 136 页)

在“美茵兹的被困”中格律恩先生

“无论如何也不愿忽略以下的地方:星期二……我匆匆地去……向……我的君主请安,同时我很荣幸地侍奉了亲王……我的殿下”等等。

至于歌德把自己的忠诚让普鲁士国王^①的近侍、皮条匠、戴绿帽子的里茨先生肆意践踏的地方,格律恩先生却认为是不便引证的。

关于“市民将军”和“流亡者”我们看到:

“歌德经常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革命的全部反感,是由于这些永无止境的痛苦而引起的,是由于他看到人们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被阴谋者、嫉妒者……所霸占而自己却被赶出来而引起的,是由于这种抢劫的非正义性而引起的……他的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由于所有权的被侵害而被激怒了,这种侵害是用专横的手段造成的,它使大批的人流离失所,陷入贫困。”(第 151 页)

这里无须做任何评述,让文责由“人”来自负吧,他的“爱和平的和善于持家的天性”在“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简单地说,就是正当得来的)地产”中间感到那样的舒适,竟使他把 sans fa on[毫不客气地]扫荡了这些地产的革命风暴宣布为“专横”,宣布为“阴谋者、嫉妒者”等等的勾当。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在读了上面那段话之后,我们就再不会奇怪,为什么市民的牧歌“赫曼与窦绿苔”和它的胆小而精明的小城市居民、它的由于极端害怕长裤汉军队和战争灾祸而哭哭啼啼地四散奔游的农民,竟唤起了格律恩先生的“最纯正的快感”(第165页)。格律恩先生

“甚至心安理得地满足于最终……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狭隘的使命:

继续这种骇人听闻的骚乱,跟着人东奔西闯,
这样的态度和我们德意志人有点不相象。”¹⁰⁸

对苦难时代的牺牲者洒下同情之泪,因这些命运的打击而怀着爱国的绝望仰求苍天,格律恩先生这样做是对的。要知道,本来就有不少腐化堕落的人,他们的胸膛里跳动着的不是“人的”心,他们宁愿在共和派阵营里随声应唱“马赛曲”,甚至在窦绿苔的被遗弃的小屋子里开些猥亵的玩笑。象黑格尔这种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地看待被历史的暴风雨摧残了的“宁静的花朵”,是那样冷酷无情地嘲笑那些为“反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及其完成者”而发出的“对谦逊、恭顺、仁爱 and 慈善等私德的枯燥无味的抱怨”¹⁰⁹,对这种冷酷无情格律恩先生是很恼恨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这样做是对的。他将在天堂里受到应得的奖赏。

我们用下面的话未结束“人”对革命的解释:“真正的小丑会认为国民公会本身是极其可笑的”;而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真正的小丑”之前,格律恩先生在这方面同时给了我们一些必要的指示(第151和152页)。

长裤汉(法文:sans-culottes 是不穿短裤的意思)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贵族对革命者、共和党人所起的绰号,因为他们和穿天鹅绒短裤的贵族不同,穿的是粗布作的长裤。长裤汉军队就是指当时法国的革命的军队。——译者注

关于歌德在革命以后对政治的态度,格律恩先生又给了我们一些令人惊奇的解释。在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知道,“人”的胸中对自由主义者怀着多么深的敌意。“人的诗人”在没有同自由主义者彻底划清界限之前,在没有给韦尔凯尔、伊茨施泰因及其伙伴们留下一定的训示之前,当然是不能进坟墓的。我们这位“自满的无孔不入的人”在“温和的讽刺诗”中的下面一些诗句里找到了这一训示(见第 319 页):

这只不过是旧日的污秽,
你们要变得更聪明!
若要永久不踩这块地方,
你们就继续前行!

歌德发表了这样一种见解:“没有什么比多数更讨厌的了,因为它是由少数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群所组成的。”¹¹⁰这种见解实在庸俗,它的特点是仅仅在德国这样的小国家里才能有的无知和近视,但在格律恩先生看来,它竟是“对最近的(即当代的)法制国家的批判”。这一批判的重要性,可以“在,例如,任何一个众议院里”得到确证(第 268 页)。这样看来,法国众议院之“腹”¹¹¹只是由于无知才那样深切地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同类。在几页以后(第 271 页)就会看到“七月革命”在格律恩先生看来原来是“命定了的”,而早在第 34 页上关税同盟就已经受到严厉的指责,因为它“为了稍事加强王座(!)的支柱,即加强自由主义的金融巨头们的势力(大家知道,在一切关税同盟国家里,自由主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义的金融巨头是同“王座”敌对的),而使得赤身露体的受冻者用以遮盖自己的赤身裸体的破衣褴衫更加昂贵”。大家知道,当问题涉及反对保护关税或资产阶级某种别的进步措施的时候,德国小市民总是把“赤身露体的受冻者”提在前头,而“人”也附和小市民的意见。

关于“人的本质”,歌德对社会和国家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首先,照第 264 页上的说法,“人”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其次,他的特点是极端畏惧一切巨大的群众运动、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时,他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当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苦痛的经验”,但是运动刚一过去,他就从容不迫地站在舞台前面,用海格立斯的巨掌打耳光(这些耳光的声音只是现在他才感到那样的悦耳),并且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同时他全神贯注在“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上面,此外,他具有非常“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他谦逊,知足,希望不要有什么暴风雨来打扰他享受他那微小的宁静的乐趣。“人是乐意生活在狭隘的环境里的”(第 191 页,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他什么人也不羡慕,只要让他安静地生活,他就谢天谢地。一句话,这个“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道地的德国人)渐渐和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了。

歌德对社会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的转述实际上变成了什么呢?“人”认为应该归罪于社会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社会不符合于他的幻想。而这些幻想恰恰是那些喜欢空想的小市民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的小市民的幻想。如果小市民的现实不符合这些幻

想,那不过是因为幻想只是幻想而已。然而,这些幻想本身却更加符合小市民的现实。这些幻想和现实的不同只不过象空想中的某一状态和这一状态本身的不同一样,因而今后也就谈不上使它变为现实了。格律恩先生对“维特”的解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其次,“人”所攻击的是一切威胁德国小市民制度的东西。他对革命的全部攻击就是小市民的攻击。他对自由主义者、对七月革命、对保护关税的憎恨极明显地表现出受压制的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对独立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憎恨。现在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小市民阶层的兴盛是和行会制度分不开的。在第40页上格律恩先生以歌德的即“人”的精神说道:“在中世纪,同业公会把一个强者同其他强者联合起来,从而给前者以保护。”在“人”看来,当时参加行会的市民都是“强者”。

但是行会制度在歌德的时代已经处于衰落状态,竞争已经从四面八方侵入了。歌德这个真正的小市民在他的回忆录中的一个地方(格律恩先生在第88页上引证了这个地方),对正在开始的小市民阶层的分化、富裕家庭的没落、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生活的瓦解、家庭纽带的松弛以及在文明国家里受到应有的鄙视的其他各种市民的不幸,倾泻出令人心碎的哀鸣。格律恩先生在这个地方看出了对当代社会的卓越批判,他喜不自胜,竟把这段引文里的全部“人的内容”加上着重号刊印了出来。

现在来看看歌德身上的实际的“人的内容”。我们现在可以前进得快一些,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人”的足迹。

首先必须指出一个令人高兴的发现:“威廉·麦斯特从父母家

里逃出”，“爱格蒙特”里的“布鲁塞尔市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权”，都不过是为了“成为人”，而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第 X VII 页）。

格律恩先生在蒲鲁东的道路上已经抓住了歌德老人一次。在第 320 页上他幸运地又一次抓住了他！

“他所希望的，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拯救我们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关于这一点歌德说道：

为什么却在最新的世界里

无政府状态是这样中我的心意？

每个人随心所欲地过活，

这也就是我的得获……”¹¹²

格律恩先生简直高兴得有些飘飘然了，因为在歌德那里也能找到由蒲鲁东首创并为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热烈接受的这个真正“人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这一次他失算了。歌德在这里说的是已经存在的“在最新的世界里的无政府状态”，它“是”他的得获，每个人都可以依据它随心所欲地生活，也就是说，他所说的是那种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解体、由于资产阶级兴起和有教养的阶级的社会生活中的宗法制度被废弃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就是从语法上来推究，这里也谈不上格律恩先生所心爱的将来的无政府状态（更高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歌德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东西，而是他所发现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小小的失策算不了什么。我们还可以举出“财产”这首诗来。

我知道，归我所有的，

只是从我的灵魂里

自然流露的思想，

以及良善的命运，
使我彻底享受的
每个幸福的瞬间。

如果看不到，在这首诗里“迄今存在的财产正在象烟一般地消失”（第 320 页），那末格律恩先生的理解力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不过，让格律恩先生的这些细小琐碎的注释游戏去他的吧。它们实在多得不可胜数，而且一个比一个离奇。我们最好还是再来仔细瞧一下“人”吧。

我们已经听到，“人是乐意生活在狭隘的环境里的”。小市民也是如此。

“歌德的最初的一些作品都带有纯粹社会的（即人的）性质……歌德珍视最靠近身边的、最不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东西。”（第 88 页）

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第一件实际的东西，就是他的“最不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平静的小市民生活中的乐趣。

格律恩先生概述歌德的话：“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安静静地和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有足以供养我们的田地，能够有栖身之所，难道那里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吗？”

于是格律恩先生就大声喊道：

“难道这些话不正是确切地表达出了我们今天的期望吗？”（第 32 页）

“人”无疑是穿着 *à la propriétaire*（有产者式样的）大礼服，但同时却暴露出自己是道地的小市民。

谁都知道，德国市民只是在青年时代曾经迷恋过一会儿自由。“人”也有同样的特点。格律恩先生满意地指出，歌德在晚年“咀咒

过”那早在“葛兹”这部“放荡不羁的少年人的著作”里就已迸发出的“对自由的向往”，他甚至 *in extenso*（详尽地）引证了歌德的怯懦的否认（第 43 页）。格律恩先生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他在这里把法国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和歌德在瑞士旅行期间的瑞士人的自由，即把现代的立宪民主的自由和中世纪帝国城市里的贵族和行会的统治，甚至和阿尔卑斯山游牧部落的古日耳曼人的粗野看做同一个东西。伯尔尼高原上的山岳人同国民公会里的山岳派^①就是从名字上来看也毫无区别！

可敬的市民是一切轻佻和渎神行为的大敌。“人”也是如此。作为真正市民的歌德既然在各个地方都谈到这一点，那末在格律恩先生看来，这就是“歌德的人的内容”。为了使读者确信这一点，格律恩先生不但收集这些珍珠，而且在第 62 页上把他自己的某些宝贵启示也补充上去，例如，“渎神者……都是草包和蠢货”等等。这使他的心即“人”和市民的心感到无上的光荣。

市民离了“心爱的君主”，离了亲爱的国父，就不能生活。“人”也是如此。因此，连歌德（在第 129 页上）也把卡尔·奥古斯特视为“卓越的国王”。而英武的格律恩先生在 1846 年还热中于“卓越的国王”呢！

每个事件，只要直接涉及市民的私人生活，市民对它都感兴趣。

“甚至日常的事件，在歌德看去，都成为对他的市民的舒适不有害就有利的外在的对象；它们能够引起他的美学方面的或人的兴趣，但绝不是政治的兴趣。”（第 20 页）

① 双关语：德文中《*montagnards*》这个字的原意是“山民”；同时又用来称呼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即雅各宾党人。——编者注

“因此，”一当格律恩先生发现，某一事物“对他的市民的舒适不有害就有利”，他“就对这一事物感到人的兴趣”。格律恩先生在这里极其直率地承认，市民的舒适对于“人”是最主要的东西。

关于“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格律恩先生写了专门的章节。我们先来看看“浮士德”。

在第 116 页上我们看到：

“歌德只是靠发现了植物结构的秘密”，他才“能够创造出浮士德，他的人道的人”（毫无办法规避“人的人”）。“要知道，浮士德同样……也是靠自然科学才登上自己本性(!)的顶峰的。”

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例子：“人道的人”格律恩先生也是“靠自然科学才登上自己本性的顶峰的”。显然，他的天性就是如此。

其次，我们在第 231 页上看到，第一场里的“兽的骨架和人的骨头”意味着“我们全部生活的抽象”，而格律恩先生总是把“浮士德”看成圣约翰的启示录。大宇宙意味着“黑格尔哲学”，而这个哲学在歌德写这一场的时候（1806 年），也许还只存在于黑格尔的头脑中，至多是在黑格尔当时正在写作的“现象学”手稿中罢了。然而，年代同“人的内容”有什么相干呢？

在第 240 页上，格律恩先生也不深入地研究一下就把“浮士德”第二部里对日趋没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描绘看做对路易十四王朝的描绘，而且他还补充说，“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宪法和共和国。”当然，别人必须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的一切东西，“人”是“自然而然地”就有了的。

在第 246 页上格律恩先生告诉我们，“浮士德”的第二部从它的自然科学方面来看，“是当代的经典，正如但丁的‘神曲’曾是中世纪的经典一样”。我们把这个意见介绍给那些到现在为止还没

有从“浮士德”第二部里得到很多收获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们,介绍给那些从前在这个佛罗伦萨人的渗透了保皇党人¹¹³的党派精神的诗篇里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经典”的东西的历史学家们!看来,格律恩先生是用歌德用来看自己的过去的那双眼睛(据第49页)来看历史的:“在意大利歌德是用贝尔韦德的阿波罗的眼睛来看自己的过去的”,可是, *pour comble de malheur* (非常不幸),这双眼睛是没有眼球的。

威廉·麦斯特是个“共产主义者”,就是说“在理论上是以美学观点为基础的(!)”(第254页)。

“他把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
于是便大胆地占有了世界。”¹¹⁴(第257页)

当然,他有足够的金钱来占有世界,就象任何资产者占有世界一样,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根本用不着努力把自己变为一个“以美学观点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者”。威廉·麦斯特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而且这个“虚无”,如第256页上所说的,还是十分广阔和内容丰富的,——在这样的“虚无”的庇护之下,就可以避免醉后头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格律恩先生“喝干所有的酒杯也不会发生任何不良的后果,也不会头痛”。对于今后可以偷偷地酗酒而不受惩罚的“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了将实现这一切的那个时候,格律恩先生今天就发现,“我把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这首诗,是“真正的人”的真正的饕宴之歌;“这支歌在人类把自己安排得配得上唱它的时候将被歌唱”。于是格律恩先生把它缩短成三节,并且删去了所有不适合于青年和“人”的地方。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艺术的保护者,预言之神,转意是美男子的意思。贝尔韦德是宫殿的名称。——译者注

歌德在“威廉·麦斯特”里确立了

“人类社会的理想”。“人不是教育人的本质,而是活着、行动着并且起着作用的本质。”“威廉·麦斯特就是这样的人。”“人的本质就是活动”(这个本质是人和一切跳蚤所共有的东西)(第 257、258、261 页)。

最后来谈谈“亲和力”。格律恩先生使这部本来就是说教性的小说更加充满了说教的气味,因而几乎使我们以为,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要把“亲和力”推荐为女子中学适用的教科书。格律恩先生解释道:歌德

“把恋爱和结婚区别开来,而且区别是在于:恋爱对于他是结婚的探求,而结婚则是获得了的、完成了的恋爱”(第 286 页)。

因此,照这样说来,恋爱就是“获得了的恋爱”的探求。其次,这就是说,在“青年恋爱自由”之后,作为“恋爱的最终结合”的结婚就一定会到来(第 287 页)。在文明国家里恰好就是这样,贤明的家长为了给儿子以后能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来“最终结合”,先让他尽情地放荡几年。但是在文明国家里早就不把这种“最终结合”看做道德上的约束,恰恰相反,在那里丈夫拥有情妇,而妻子则给丈夫戴绿帽子作为报复,于是小市民又来搭救格律恩先生了:

“如果人有真正自由的选择权……如果两个人的结合是建立在双方理性的意志上的(在这里,关于情欲,关于血和肉连提都没有提),那就需要有浪荡公子的人生观,才能象歌德那样,把这一结合的破坏看做小事情,而不是看做十分痛苦和不幸的事情。然而说歌德放荡是根本谈不上的。”(第 288 页)

这个地方充分说明了格律恩先生有时对道德所做的羞羞答答的攻击。小市民深信,对待青年人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最

放荡的青年人后来都会成为最模范的丈夫。但如果他们在结婚之后还犯什么过失,那时就不能再宽恕他们,怜悯他们了,因为要这样做就“需要有浪荡公子的人生观”。

“浪荡公子的人生观!”“放荡!”“人”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看到,他把手放在胸口,带着愉快和骄傲的感情大声喊道:不,我一点也不轻佻,一点也不“荒淫和放荡”,我从来没有蓄意破坏任何人的平静的家庭生活的幸福,我总是忠诚和正直的,从来没有在朋友的妻子身上打过主意,我不是“浪荡公子”!

“人”说得对。他不是为了勾引漂亮女人而被创造出来的,他从来没有起过勾引妇女和破坏夫妻间的忠实的念头,他不是“浪荡公子”,而是有良心的人,是正直和善良的德国小市民。他是

“……一个性情温和的小商人,
在商店里边抽着他的烟袋;
他怕他的老婆和她傲慢的声音;
他让她在家里统治着一切,
最微小的指使他也默默听从。
他就这样忍辱、挨打而满足地生活。

(帕尔尼《Goddam》第三首歌)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如果我们在上面只是从一个方面观察了歌德,那末这完全是格律恩先生的罪过。他丝毫没有描写歌德伟大的一面。对于歌德的一切确实伟大的和天才的地方,例如,“浪荡公子”歌德的“罗马哀歌”,格律恩先生不是匆匆地一闪而过,就是滔滔不绝地说一通言之无物的废话。但是他却以他少有的勤

《Goddam》是法国诗人帕尔尼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原著是用法文写的。Goddam 这个字是英文的感叹词,有“该死!”、“天杀的!”等等意思,在法国被用做带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人的绰号。——译者注

勉去搜罗一切庸俗的、一切小市民的、一切琐屑的东西,把所有这些收集在一起,用真正文学家的笔法加以夸张,并且每当他有可能利用歌德的权威,而且还常常是被歪曲了的歌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狭隘性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起来。

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历史为此而给歌德的报复,并不是门采尔的叫骂和白尔尼的狭隘的辩驳。不是的,正如

蒂妲妮亚在仙宫,
发现自己在波顿的怀抱里,¹¹⁵

歌德也一度发现自己在格律恩先生的怀抱里。格律恩先生的辩解,他对歌德的每一句庸俗的言语所嘟嘟囔囔地说出来的感激不尽的话,这方是被侮辱的历史所能给予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的最残酷的报复。

不过格律恩先生“死可瞑目,因为他没有玷污做人这个使命。”(第 248 页)

弗·恩格斯写于 1846 年底—1847 年初

载于 1847 年 9 月 12 和 16 日,11 月

21、25 和 28 日,12 月 2、5 和 9 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73、74、

93、94、95、96、97 和 98 各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弗·恩格斯 经济学家会议

大家知道,这里有些律师、官吏、医生、食利者、商人等之类的人,他们在保卫自由贸易协会(与巴黎的组织类似)的招牌下相互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起码知识。上个星期的最后三天,这些先生们走起运来了。他们召集了各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举行了一个伟大的会议。他们感到真是无法形容的高兴,现在已经不是听什么茹尔·巴泰尔斯先生、勒·阿尔迪·德·博利约、法德尔即费德尔^①或者其他不知名之士讲经济方面的道理了,现在是听科学大师们亲自讲解了。他们真幸福,真高兴,真走运,真是飘飘然了。

可是科学大师本身却很不走运。他们本以为斗争将很轻松,但实际上斗争对他们来说却很严酷;他们本以为,他们一来,一交锋,就会取得胜利,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投票时取得了胜利,在争论的时候,第二天就被彻底打垮,第三天只是由于进行了幕后活动才避免了新的更彻底的失败。假如他们那些为幸福所陶醉的听众没有发觉这一切,那他们自己是应该深切地感到这一点的。

我们参加了这个会议。从前我们对这些科学大师也没有特殊敬仰过,他们的学识主要表现在他们之间总是心安理得地相互矛

① 俏皮话: Fader [法德尔]是《fade》(“暗淡”、“庸俗”)一字来的; Faider [费德尔]是经济学家会议一个与会者的姓。——编者注

盾和自相矛盾。有些人的高论(无论是书面和口头的)我们并不很熟悉,因而对他们还可能有一定的敬意,但应该承认,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连一点敬意都没有了。老实说,我们惊奇的是,这次我们竟不得不听这么多庸俗荒唐的言论,这么多举世皆知的陈词滥调。老实说,我们没有想到,除了政治经济学的初步道理而外,科学大师竟没有提出一点新东西;这些初步道理,七八岁的孩子也许会感到新鲜,但对成年人特别是保卫自由贸易协会的成员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熟知的了。但这些先生是比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听众的。

这次会议上表现得最好的是英国人。他们和这次会议的利害关系最大;开辟大陆市场,他们很同意;自由贸易是他们的切身问题。他们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英文,他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从来都不用别的文字讲话,而在这里,为了自己心爱的 free-trade(自由贸易),却甘愿用法文发言。这就明显的说明,这件事是多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们的钱袋。法国人以抽象的思想家和有学识的幻想家的姿态发了言。他们一次也没有显示出法国人的机智和思想的新奇。但至少他们讲的法文很漂亮,这种法文在布鲁塞尔是难得听到的。荷兰人的发言很枯燥,说教似的。丹麦人大卫先生的发言根本无法理解。比利时人所起的作用应当说是消极听众的作用,顶多也只是象该国的工业那样,只能模仿别人。最后是德国人,他们之中除了与其说以德国人不如说以英国人的身份发言的维尔特外,成了整个会议的 *partie honteuse*(污点)。在这方面,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第一把交椅,假如不是一个比利时人为自己国家夺走了他们这个位置的话。

第一天。一般性的讨论。费德尔先生代表比利时人首先发言;

他的整个发言和举止言谈,都暴露出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和散步的地方所看到的那种令人十分厌恶的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费德尔先生开头说了一通空话,然后勉强谈了一些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道理。他那又臭又长的演说占去了我们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不打算把这么多时间花在他身上。

接着走上讲台的是在巴黎担任教授等职务的沃洛夫斯基先生。这位自鸣得意、肤浅的饶舌家,法兰西化的波兰犹太人,他能把这三个民族的缺陷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优点。沃洛夫斯基先生那个事先写好的、满篇全是意想不到的诡辩的演说,唤起了热烈的反应。但可惜,这篇演说并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从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先生的“经济学的诡辩”¹¹⁶中抄来的。热烈鼓掌的布鲁塞尔听众显然不知道这一点。沃洛夫斯基先生曾表示遗憾,说德国保护关税派将反对他,这么一来法国的保护关税派就失去了带头的机会。他曾为此受到惩罚。沃洛夫斯基先生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是极其可笑的。他大谈劳动阶级,他保证贸易自由会给他们带来遍地黄金,并以他们的名义装出激愤的样子抨击了保护关税派。他尽力以激动人心的最高语调大声疾呼地说,是的,这些保护关税派,“这些心里(他拍着自己的大肚子)对劳动阶级没有一点同情的人”,他们妨碍我们实现崇高的理想和帮助工人摆脱贫困,但可惜他的愤怒过于造作了,它对工人席位上的那几个人不可能产生一点影响。

来自科伦的德国代表里廷豪森先生发表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演说,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他是真正德国人的身份发言的。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他带着极其悲痛的表情抱怨德国的窘境,抱怨德国工业的脆弱,简直是哀求英国人,请他们允许德国使自己摆脱他们那种剧烈逼人的竞争。他说,可敬的先生们,当我国直到目前几乎到处都还保留着行会,我们自己还根本不能相互自由竞争的时候,你们怎能在我国实行自由贸易,要我们同所有国家自由竞争呢?

布朗基先生回答了里廷豪森先生。他是巴黎的教授、众议院议员和进步保守派,一本可怜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¹¹⁷和其他蹩脚著作的作者,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法兰西学派”的主将。他是一个胖胖大大、沉着有礼的人,面部表情极其复杂,故意装得既严肃又温和仁慈,cela va sans dire〔显然〕是个荣誉军团勋章的获得者。布朗基先生讲话非常生动,但他话中的生动的思想却非常少,这当然会博得布鲁塞尔的自由贸易派的敬仰。而且他这次讲的比他以前写的还要空洞十倍。我们用不着把时间花费在这些空谈上。

接着发言的是激进派议员包林博士,他是边沁的英明思想的继承人及其骨骼的保管人¹¹⁸。他本人也是边沁的骨骼。显然,选举已经过去了,包林先生认为再用不着对人民让步了,因而才以真正资产者的本来面貌发言。他的法文讲得流利而确切,但英文杂音很重,常用最有力最可笑的手势来加强自己讲话的效果,这种手势我们曾经看到过。最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包林先生宣布,现在应该抛弃自私自利了,应该开始把自己的幸福与自己亲友的幸福连系起来了。显然他曾援引了旧的经济“道理”——可以同百万富翁进行更多的交易,从他身上赚到的钱要比同一个有几千塔勒的人进行交易赚到的更多。最后他带着激动的表情把上天的使者——走私者——颂扬了一番。

接着发言的是瓦朗西恩鼓励国民劳动协会主席杜沙多先生；他针对沃洛夫斯基的意见，为法国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辩护。他十分平静而准确地重述了那些人人都知道的保护关税派的道理，并十分公正地认为，单单这些道理已足以破坏自由贸易派先生们在整个会议过程中的情绪了。他无疑是这天第一流的演说家。

议员尤尔特先生用几乎使人无法理解的法文反驳了他，把在英国几乎每个街头顽童都早已熟悉的反谷物法同盟¹¹⁹的那些陈词滥调重复了一遍。

如果只是按次序来讲，还应该提一下波尔多自由贸易派协会的代表康潘先生。他所谈的尽是一些鸡毛蒜皮，我们一个字也没有记住。

议员汤普逊上校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情形：在某个城市里，车夫拉一趟车得到一个半法郎。后来来了一辆公共马车，同样一段路程它只要一个法郎。车夫们会说，这样一来，每次运程就使交易中少了半个法郎。是不是这样呢？这半个法郎跑到哪儿去了呢？乘客总要用这些钱去买些什么别的东西——肉酱、点心等。这就是说，这半个法郎还是要进入交易中去，这样消费者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为车夫进行辩护的保护关税派和力求推行公共马车的自由贸易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不过善良的汤普逊只是忘了一点：竞争会使消费者很快失掉这点小便宜，它会使你在一个地方沾到的便宜，在另一个地方如数失掉。

最后发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国务参事杜诺瓦耶先生；他写过许多作品，其中包括“论劳动自由”¹²⁰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责备工人生育太无节制。他用国务参事那种激昂的声调发言，但讲的都是废话。杜诺瓦耶先生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秃头顶，脸面发红并且象

狗一样地向前突出 ;显然 ,他不能容忍任何矛盾 ,但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恐惧。关于他对无产阶级的轻率的攻击 ,布朗基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杜诺瓦耶先生向人民述说的这些严酷的道理 ,伏尔泰和卢梭在上一世纪曾奉献给各位君王。 ”

一般性的争论就到此结束。第二天第三天就个别问题进行的讨论 ,我们在最近一期¹²¹上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9 月 19 和 22 日之间

载于 1847 年 9 月 23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7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 和工人阶级¹²²

保护关税派从来没有保护过小工业即手工劳动。在德国,难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经为小亚麻业、手工纺织业、手工业要求过保护关税吗?没有,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他们甚至声称小工业、小资产阶级、小农业、小农的衰退和毁灭固然令人惋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现象。

在德国这个学派繁多的国家,除了李斯特博士的学派而外,还有另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不仅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而且要求实行真正的贸易限制制度。该学派的首脑冯·居利希先生写了一本有关工商业史的真正学术著作¹²³,这本书还译成了法文。冯·居利希先生是个十分仁慈的人,他真心关怀保护手工劳动、国民劳动的问题。好极了!他做了些什么呢?他首先批驳了李斯特先生,证明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李斯特的制度中只是一个骗人的假象,一句空洞的高调;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下列建议:

- 1 禁止外国工业品输入;
- 2 对输入的原料如棉花、丝等,课以极高的进口税,以保护本

国麻纺织业和毛纺织业；

3 对殖民地商品也应采取同样措施,使当地产品把砂糖、咖啡、靛蓝、洋红、贵重木料等从市场上排挤掉；

4 在国内应对机器课以重税,以保护手工劳动不受机器排挤。

可见,冯·居利希先生也属于同意这个制度及其一切后果的那一派。但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这不仅阻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先生和冯·居利希先生体现了这种制度摇摆其间的两个极端。如果这种制度要保护工业的进步,首先就要牺牲手工劳动、一般劳动;如果它要保护手工劳动,就要牺牲工业进步。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不同意冯·居利希先生的幻想的保护关税派本身。

假如他们能用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跟工人阶级谈话,他们就应当这样来说明自己的仁慈观点:受自己同胞的剥削总比受外国人剥削好些。

我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满意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的爱国主义情感颇为浓厚,但它对那些唯一的、活动就是生产财富、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来说,总是有些禁欲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味道。

可是保护关税派会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是保持了社会的现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还保证了工人的工作,不让他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我不打算反驳这种说法,我同意这种说法。可见,保持和固守现状是保护关税派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有利的结果。这很好,但要知道,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把现状转到某种完全相反的方面。

保护关税派还有一个最后的遁词:他们说,他们的制度决不妄

图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手段,但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经济改革以前,仍然需要首先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保护关税制度起初是反动的,后来是保守的,最后成了保守的进步制度。虽然乍一看来,这种理论相当诱人,很实际又很合乎情理,但也相当明显地暴露了本身的矛盾。真是惊人的矛盾!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而主张这种制度的人还以为,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使资本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让步。归根到底,这就等于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说明这个问题。自从保护关税派承认社会改革不是他们制度的组成部分,不是从他们的制度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特殊问题,从这时起,他们就离开了社会问题。因此我现在把保护关税派放到一边,来谈一下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9 月下半月
载于“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
关税的两篇演说”单行本 1848 年哈姆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 1848 年
单行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9月16、17、18日此间(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经济学家、工业家、商人一类人物的会议,讨论自由贸易的问题。出席的各国代表约有150名左右。英国自由贸易派出席会议的有:包林博士(议员)、汤普逊上校(议员)、尤尔特先生(议员)、布朗先生(议员)、“经济学家”杂志¹²⁴编辑詹姆斯·威尔逊等。从法国来的代表有沃洛夫斯基先生(法学教授)、布朗基先生(众议院议员、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政治经济学史等著作)、奥拉斯·萨伊先生(著名经济学家之子)、沙·杜诺瓦耶先生(枢密顾问官,著有许多关于政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等。德国的自由贸易派一个人也没有派来,而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则派有代表出席。马德里的拉蒙·德·拉·萨格拉先生准备前来,但到得很晚。不用说,大批比利时自由贸易派也出席了会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于是,学术界的名流就汇聚一堂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由贸易是否将造福于全人类?您大概会以为在这样一个出色的会议上进行的辩论,经济学界头等名人之间的争辩一定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您大概会以为象包林博士、汤普逊上校、布朗基和杜诺瓦耶这样的人物一定会发表异常高明的议论,提出异常有力的论据,从全新的异乎寻常的角度来论述一切问题。先生啊!要是您出

席了这次会议的话,您一定大失所望。用不了一个钟头,您的美妙的希望和天真的幻想就会化为乌有。我参加过无数次公开的集会和讨论。在我住在英国的期间,我曾不下千百次听到反谷物法同盟的信徒们滔滔不绝地提出他们的论据,可是从来也没有,我担保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令人头痛而且还讲得非常得意的废话。我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失望过。这个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根本不配叫做讨论,简直是茶楼酒肆中的乱扯。这些学术界巨子根本没有敢深入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我不来向您转述头两天会上所有那些陈词滥调。取两三份“同盟”或“曼彻斯特卫报”¹²⁵来看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两天会上的全部发言。或许沃洛夫斯基先生讲的几句听来满有理的名言在报上找不到,可是他那些话都是从巴师夏先生(法国自由贸易派领袖)的“经济学的诡辩”那本小册子上剽窃来的。自由贸易派没有预料到除里廷豪森先生(德国的保护关税派,总的说来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之外会有谁反对他们。可是突然杜沙多先生(法国工业家、保护关税派)起来发言,保护自己的钱包,正象尤尔特先生和布朗先生保护自己的钱包一样。他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以致在辩论的第二天,许多代表,其中甚至也有自由贸易派,都承认他们在这场辩论中被击败了。可是他们在投票表决时进行了报复——决议自然几乎是一致通过的。

第三天讨论了一个您的读者所感到兴趣的问题,即“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南郎卡郡的布朗先生(自由贸易派)用英语做了长篇的发言,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和威尔逊先生是唯一用英语发言的两个人,其他人全都讲法语;包林博士的法语讲得很好,汤普逊上校勉勉强强,尤尔特先生糟透

了。布朗先生用一种很象英国国教牧师讲话的凄怆声调,把反谷物法同盟的一部分老教条重复了一阵。

在他后面发言的是莱茵普鲁士的维尔特先生。你们大概知道这位先生,他是一个年轻的商人,写的诗很著名并且在全德国都享有盛誉。他在约克郡住过一些年头,亲眼看到过工人群众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他在那里的工人群众中间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知道他没有把他们忘掉将会很高兴。因为在会议全部发言中他的发言最能使您的读者感到兴趣,所以我想把它较详细地传达一下。他这样讲:

“先生们!你们在讨论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你们宣称对这个阶级抱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对这一点我很高兴,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你们中间竟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代表。法国的有产阶级,这里有贵族来代表他们;英国的有产阶级,有几位议员来代表;比利时的有产阶级,有前内阁大臣来代表;连德国的有产阶级都有一位先生来代表,他非常忠实地给我们描述了那个国家的状况。然而我请问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哪里呢?我看不见他们;因此,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工人的利益来讲讲话。我冒昧地以工人的名义,首先是以那500万英国工人的名义向你们呼吁;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毕生最快乐的时光中的几年,我了解他们,我爱他们。(鼓掌)先生们,工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对他们的同情。到现在为止,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而是当做牛马看待,不,当做商品、当做机器看待;英国的工业家们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从来不说‘我们雇用工人若干’,而说‘人手若干’。有产阶级本着这一原则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当需要他们的时候使用他们,当他们身上再也榨不出利润的时候把他们赶到街上去。可见这些现代社会的贱民的状况是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请随便向哪里看一看吧:看看罗尼河的两岸,看看曼彻斯特、里子和北明翰的又脏又臭的小巷,看看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山坡土岗或者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你们到处都会看到同样面黄肌瘦、同样愁眉不展的人们,他们在徒劳地争取自己在文明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会场大为轰动)”

接着,维尔特先生又说,在他看来保护关税制度实际上根本不保护工人,而自由贸易(他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这样告诉工人,尽管他自己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他一点也没有自由贸易派的那种幻想:似乎他们的制度付诸实行,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恰恰相反,实行自由贸易,即彻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则,一方面使资本家之间更加展开损人利己的竞争,可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间产生更加尖锐的竞争。彻底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比现在更多的工人。这种自由竞争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自由贸易派硬说实行了自由贸易制度这些可怕的动荡就会停止。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动荡来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可能,甚至毫无疑问,食品价格的降低起初会有利于工人,生产费用的降低会引起消费量的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一点好处很快就会变成灾难,工人们由于相互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饿受穷的生活水平。在提出了上述论据以及其他一些论据(显然这些论据对与会者说来是非常新颖的东西,因为他们听的时候都非常聚精会神,尽管“泰晤士报”记者傲慢地对这些话置之不理,他仅报之以无礼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讥讽,说这是“宪章主义的那一套老生常谈”)以后,维尔特先生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英国工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我是喜爱和敬重这个有智慧有毅力的阶级的。(鼓掌,有人喊“这是恭维话”。)我举些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在座的反谷物法同盟的先生们一直在徒劳地强求工人的支持。工人从来也没有忘记资本

家是他们天生的敌人。他们记得同盟在 1842 年所挑起的骚动¹²⁶,他们也记得企业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所进行的反抗。只是在 1845 年底,宪章派即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部分才和同盟进行了短时期的联合以便击溃他们的共同敌人——土地贵族。可是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而且工人也没有被科布顿、布莱特之流的虚伪诺言所欺骗,也并没有真的指望他们所说的什么面包减价、提高工资、保证就业等等空话会付诸实现。不,工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独自依靠本身的力量,建立由自己的领袖——不屈不挠的邓科布和菲格斯·奥康瑙尔领导的单独的政党。菲格斯·奥康瑙尔,尽管有人那样对他进行诽谤中伤(这时维尔特先生朝包林博士那边望了一眼,包林博士倏地颤动了一下),尽管有人那样对他进行诽谤中伤,可是过几个礼拜以后他就要和你们并排地坐到下院的席位上去了。我代表那千百万不相信自由贸易会为他们造出奇迹来的人们向你们呼吁,请你们想些别的办法来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状况吧。先生们!我是在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向你们呼吁。你们已经用不着惧怕全俄罗斯的皇帝了,你们也不怕哥萨克兵的侵袭;可是如果你们不当心一些的话,你们就有遭到自己的工人袭击的危险,而对你们说来他们比天下一切哥萨克兵都更可怕。先生们!工人不愿再听你们的那些漂亮话了,他们希望你们做出事实来。而且你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异。工人非常清楚地记得,在 1830 年和 1831 年,当他们在伦敦替你们争取改革法案的时候,当他们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大街上替你们打仗的时候,你们向他们频送秋波,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赞不绝口;可是几年以后,当他们要求面包的时候,你们却饬以刺刀和霰弹。(有人喊“噢!没有,没有!”有人喊“有的,有的!在比桑歌,在里昂!”¹²⁷)所以我再说一遍:你们要实行你们的自由贸易,那就实行好了;但是同时你们也要想一些别的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否则你们将会悔之不及的。(掌声雷动)”

维尔特先生讲完以后,包林博士立刻针对着他的话发言。

他说:“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刚才发言的那位可敬的代表不是由英国工人选出来代表他们出席这次会议的。根本不是,在代表工人这一件事上,英国人民照例总是把全权委托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声明,我们才是他们的真正代表。”

接着,他就把自由贸易的好处描绘了一番,他提出的证明是,

自从去年实行新关税以来,英国食品输入量有所增加。输入了多少鸡蛋,多少百磅的黄油、干酪、火腿、咸肉,多少头牲畜等等,除去英国工人谁能吃掉这许多东西?可是包林根本忘记告诉我们英国自从容许外国竞争以来这些东西减产了多少。在他看来,输入量增长是消费量增长的绝对证明,他认为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他一字也没有提起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里子的那些流浪街头,找不到工作的工人,象那些工人哪里有钱来消受这种想象中的消费增长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工人不做工主人就会把鸡蛋、黄油、干酪、火腿和肉白白送给他们。他一字也没有提起当前工商业中的停滞现象,而所有的报纸都把这种停滞称为真正空前的停滞。他好象不知道自由贸易派的一切预言同他们的措施付诸实施以后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对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相反地,他把他们现在的悲惨状况描绘成所能希望的最快乐、最幸福、最安定的生活。

现在让英国工人自己来决定这两个人之中谁是他们的代表吧。随后又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讲了各种各样的题目,什么事情都谈到了,只是没有谈到提出讨论的那个问题。拜尔法斯特(?)选区议员麦克亚当先生大谈爱尔兰的纺麻业,无尽无休地讲个不停,他的统计数字几乎要了在座人的命。荷兰教授阿凯斯戴克先生讲什么古老的荷兰、年轻的荷兰、列日大学、沃尔波尔和德·维特。万·德·卡斯泰尔先生讲的是法国、比利时和内阁。柏林的阿斯海尔先生讲的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还有什么他称之为精神产物的新制品。荷兰人登·泰克斯先生讲的天知道是些什么。后来,当全体到会的人都快要睡着了的时候,沃洛夫斯基先生把大家惊醒了,他回到了原来的话题,答复维尔特先生的发言。沃洛夫斯基先生的

发言,也象所有其他法国人的发言一样,证明了法国资本家是多么惧怕维尔特先生的预言的实现。他们在谈到工人阶级的苦难时假装同情、装模作样、假慈假悲,做得象极了,要不是他们大腹便便的身躯,带着鲜明的伪善标记的面孔,他们所提出的无济于事的办法以及极为显眼的言行背驰,要不是这一切跟他们做出的那付样子显然相互矛盾的话,人家也许真会相信他们是出于真心的。不过他们并没有骗得过一个工人。接着发言的法国贵族阿尔古尔公爵也要求承认出席会议的法国资本家、议员等人有权称自己为法国工人的代表。他们之代表法国工人与包林博士之代表英国宪章派完全一样。随后发言的是詹姆斯·威尔逊先生,他毫不知羞耻地重复着反谷物法同盟的陈腐论据,他的费拉得尔菲亚教友派信徒一般的声调简直使人昏昏欲睡。

从以上这些情况,您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一场多么奇妙的辩论。来自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博士(您知道他是德国民主派最有才干的代表)也曾经要求发言。他准备了一篇演说,他这篇演说如果宣读了的话,出席会议的那些“贵人们”就无法把所讨论的问题付诸表决。可是维尔特先生的反对已经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决心不让那些不能确信甚为正统派的人讲话。所以沃洛夫斯基先生、威尔逊先生这般人的发言都超过规定时间,到四点钟的时候登记发言的还剩下六七个人,主席突然宣布停止辩论,于是名曰政治经济学家会议的这一群小丑、笨伯、骗子们就以多数票对一票(这一票是前面讲过的那位可怜的德国保护关税派傻瓜的)——民主派根本没有参加表决——通过这样的意见:自由贸易对工人极为有利,能解除他们的一切苦难。

鉴于马克思先生的演说虽未发表,但对于这种无耻谎言却是

再也想象不出的最好、最有力的驳斥,又鉴于在英国、尽管在这问题上有人写下了连篇累牍的 pro[赞成]和 contra[反对]的意见,这篇演说内容仍然会令人感到它是非常新奇的,所以我特地从中摘录几节随信寄上。

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 和工人阶级的演说

保护关税派又分两派。第一派在德国以李斯特博士为代表,这一派从来不以保护手工劳动为己任;相反地,他们之所以要求保护关税,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他们总是企图使富豪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公然宣称,小工业家、小商人、小农的毁灭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现象。保护关税派的第二派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关税制度,而且是绝对的贸易限制制度。他们主张保护手工劳动既不受外国竞争,同样也要不受机器的侵犯。他们主张不仅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且还要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本国的原料生产。这一派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不仅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还要禁止本国工业的发展。这样,整个的保护关税制度必然要落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末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而牺牲手工劳动,要末保护手工劳动而牺牲本国工业。保护关税派的第一派,即认为机器生产、分工和竞争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那些人,这样对工人说:“不管怎样,既然你们得受剥削,那就最好认你们的同胞来剥削你们,这总比受外国人的剥削要好些。”这种状况,工人们会长久地容忍下去吗?我想不

会。这些为富人生产各种珍品和全部财富的人们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可怜的慰借。他们要求他们的物质生产所换回的应该是更好的物质上的满足。可是保护关税派说：“到底我们维持着社会的现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算保证了工人得到他们所必需的工作。我们设法使他们不致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保护关税派最多只能宣称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维持 status quo〔现状〕，再大的本领便没有了。但是工人阶级所渴求的可不是维持住他们的现状，而是改善现状。保护关税派还有一个最后的遁词。他会说：他决不反对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可是要保证社会改革的成功，第一件要事就是防止一切可能由外国竞争引起的混乱。他说：“我的这一套做法不是社会改革的办法，但是我们既然要改造社会，何不先从我们自己国内开始，然后再来谈改革我们和别国的关系呢？”当然这些话听来是满有理的，可是在这冠冕堂皇的表面下面却隐藏着惊人的矛盾。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做斗争，这个制度在加强本国资本同外国资本的斗争力量，可是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又深信，这样武装起来和增强了的资本要是跟劳动相较量，就变得温驯软弱，变得那么好对付。而这就是说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要知道，社会改革从来不是靠强者的软弱，而永远是靠弱者的强大来实现的。不过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多讲。只要保护关税派承认社会改革不是他们制度的必然产物，也不是他们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问题，只要他们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就离开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来研究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这个问题。贸易摆脱一切桎梏而获得彻底解放对工人阶级状况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很容

易解决。实际上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讲得不坏的话,那就是工人阶级在自由贸易统治下的命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所阐述的一切规律,只有在贸易的一切束缚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自由贸易实行得愈广泛,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所阐述的这些支配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就愈加灵验、愈加准确,愈不会是空洞的抽象。而且学者们在谈到任何经济学问题时,总是一再地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结论,都是建筑在贸易将摆脱迄今尚存的一切桎梏而获得解放这一前提上面的。他们遵循这样的方法完全正确。因为他们不是采取任意抽象的办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时候把一些偶然的情况摈弃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人,对于未来的社会比对于现存的社会知道得更清楚。他们对于未来比对于现在了解得更多。如果你们想读一下有关未来的书籍,那就请你们翻开亚当·斯密、萨伊、李嘉图的著作看看。你们会发现,他们的著作无比明确地写出了在彻底的自由贸易统治之下等待着工人的是些什么。譬如你们请教一下象李嘉图这样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人劳动的自然正常价格是什么?李嘉图的答复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的工资”。劳动是商品,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时间。要生产“劳动”这种商品需要些什么呢?工人必须吃饭,必须补偿他的体力消耗以便他能够活下去,并且不管怎样还要能够延续后嗣,这一切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商品,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恰好也就是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可是我们决不应该认为工人永远不会上升到这个最低水平以上或

者永远不会降低到这个水平以下。不是这样的。按照这一规律,工人阶级有时能够幸运一些,有时他们得到的会比最低工资多一些,然而多出来的这一点只不过是一笔补偿他在别的时候,即在工业停滞时所少得(和最低工资相比)的附加收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注意到,商业在一定的、永远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时间内,经历着包括有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我们把工人超过最低工资的收入和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拿来平均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仍然会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尽管他们经历了许多灾难,受尽了许多折磨,在工业的战场上抛下了多少尸体。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不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最低工资是“劳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这条规律将随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这个前提的实现而发生作用。我们同意所有那些阐述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发言。生产力是要发展的,全国由于保护关税而担负的赋税是要消灭的,一切商品的售价都将降低。可是李嘉图又怎样讲呢?他说:“劳动既然同样是商品,它也将同样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你们将能够完全象买胡椒买盐那样非常廉价地买到它。正如同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所有其余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都将发生更强烈的作用、应验得更加准确一样,马尔萨斯所讲的人口规律,在自由贸易统治之下,也将获得几乎想象不出的广泛发展。那末请你们来决定一下吧:要末你们把现存的政治经济学全部推翻,要末你们就得承认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听任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去摆布。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自由贸易呢?不是的,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

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9 月底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7 年 10 月 9 日“北极星报”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第 520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第一篇

布鲁塞尔 9 月 26 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借口反驳编辑部的无谓非难，对共产主义者大肆驳斥。

编辑部规劝双方不要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应该把海因岑这篇文章中确实是对责备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反驳那一部分发表出来。即使“海因岑自己没有出版物”，这并不足以说明他就可以利用报纸进行连该报编辑部都认为是荒唐的各种攻讦。

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共产主义者的帮助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过去对任何一个党派的非难从没有象海因岑现在对共产主义者的非难这样荒唐、这样庸俗。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它证明，假如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反对过海因岑，现在就该马上反对了。

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者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象一个党同一个党进行争论一样。他“有权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可以指望”共产主义者一

些什么，“应该要求他们”一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共产主义者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

那末，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早在 1844 年就会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偷偷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的确应该是可以实现而又符合众望的体制。但海因岑先生认为有可能在普鲁士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雅科布·费奈迭很久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作品都比他的好得多）¹²⁸而不得不出走。现在他成熟了。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他成了革命家，当然也是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 *savant s^érieux*（学识渊博的）卢格，后者使他熟悉了自己的贫乏哲学，这种哲学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人道主义、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的杂拌。具备了这一套东西之后，海因岑先生便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成熟了。于是他就右面靠着卢格，左面依着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派转到疯狂的激进派。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能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举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但一当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根本不可能，也不考虑目前德国资产阶级还完全可以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反抗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当他一旦认为退路被切断以后，他就宣称

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是研究德国的情况,从而对德国有个总的了解并由此找出: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具体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是探讨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由此制定出应当遵循的政策的基础,总之,他不是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要求德国的发展适应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直到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庸人和投机文人的避难所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才不幸地靠近了它。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毕生都只是一个平凡的拾人牙慧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拾他牙慧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便成为卢格先生的安慰。卢格先生至少总算找到了一个自认已领会他空洞言论的奥义的人。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美国革命的传统与1793年的传统将和他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结合起来,共和国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¹²⁹。德国由于本国工业萎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它永远不会走在前头,不会首先宣布伟大的革命,没有法国和英国的榜样也不会冒险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不顾文明各国中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似乎可以完全不考虑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而象海因岑先生所说的那样冒险进行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就要到来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幻想(一个比一个荒唐),德国人都要实现!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这种论调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谀献媚,实在到了顶点,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硬说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他们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结论却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肤浅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德国民主派不是极其有害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德国的大动荡时期即30年代,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会有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能够认为人民对这种政治说教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的传单除了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这岂不荒唐吗?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德国民主派刊物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种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活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就是在“揍它,揍它,揍它!”这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城市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查克里、农民战争¹³⁰)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洲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海因

岑先生谈话中间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国家所进行的劳动组织等革命措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奋起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障碍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可能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障碍将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可能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提出这些措施是作为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应当准备任何东西,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以保存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有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的趋势。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由于竞争而破产,使目前的事态重又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 *mesures de salut public* (社会解救办法),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毫无力量的反对意见,就会成为海因岑先生的黑红黄土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致命伤。

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可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象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它能够冒险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的改造,只会是符合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利益的改造。

简单说来,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看做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做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阶级斗争(也是过渡的)本身所决定的过渡的 *mesures de salut public* [社会解救办法]。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手里就失掉了任何合理性,因为在他手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他那里丝毫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自己的草案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他不是力求表述确定不移的生产规律,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规律。

正是这位粗暴地歪曲了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并把它们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追求空中楼阁”和“丧失了现实基础(!)”!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所有的品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满脑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本人诚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论家,单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腾托尔¹³¹的嗓子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就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自己的出走,他还是应该成为党的政论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处于一种很不相称的地位,他为了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所进行的一番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使他有理由认为他是他们的代表,他使自己成为笑料也是代表他们的话,那末这将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在财政上支持他的宣传活动的某些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然而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受到他的鼓舞,为他欢呼,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象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教养有素、善良而有影响的推销人阶级。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要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派资产者的

代表,要他们把他当做激进派资产者的代表和他争论!

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上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上述第77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非难。

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够不上一个党的政论家,我们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他劝我们读一下弗吕贝尔的“新政治”¹³²,可惜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安静地坐下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官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 二 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攻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攻击他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至于为什么发起这个攻击的正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在这整个论争中间,谈的只是下面两点:(1)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或者至少来说,能不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可见,谈的不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

人的妄想。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党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这种分歧完全可以成为理论上争论的问题而丝毫无害于共同行动。甚至也可以谈一谈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由国家负担等等。

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而是后者先同他争论。这个论据十分笨拙,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中制造的无谓分裂”。海因岑硬说,他在三年以前,就曾尽一切力量和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徒劳一番,结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以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是激进派。他当时还是一个自由派,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因此,同他的分歧绝不意味着激进派内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不仅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似乎在政治上是所谓的激进主义者而想要攻击他,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

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必须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因而也就是相信激进派中无谓的分裂的必然性了!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者: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述的暗语,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极其无礼地非难最激进的人士,他们……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甚至……最后他们公开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们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虚伪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相当鲜明的形象——投机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私人之间曾发生过一些误会,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利尔日报”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想压倒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曾想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什么时候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但他从来也没有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一年多以前他甚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完全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作法,后来,他又抓住机会公开地描述了他的真面目。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诬蔑(“卑鄙的虚伪的”),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

争执。这场争执与上面两位先生有关,与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我们连这场争执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暂时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这场争执的有关人士的作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了如指掌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这场争执说成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

假如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不止是针对格律恩先生一人,那他所指的就是其真正反动的理论早就遭到共产主义者否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了。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前进的人都转向了共产主义,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显露头角,他们就加以攻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责难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把他们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以后,对共产主义者发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反对他们时曾提出过的荒谬谴责。其实他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在报刊上激烈反对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己混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真正的社会主义”。卢格先生真是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材和才华四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义的同情(!)。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

海因岑要讲的是“拒绝同情共产主义”。这种表达法说明他的文风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加了(!)。——译者注

已经拒绝给以任何同情。除了下面最后一句话而外，上述所有责难没有一句是针对共产主义者的：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诚实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

海因岑先生这里大概是指的下面这件事，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的道德高尚的言论，嘲笑所有这些神圣高超的思想、高尚、正义、道德等等，而海因岑先生却认为这些是任何社会的基础。这个责难我们接受。尽管这位诚实人——海因岑先生感到道德上的义愤，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笑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真理无论如何都不是基础，相反地，是它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同时，既然海因岑先生预见到共产主义者不会同情那些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人，那么他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又是为什么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只是来自道听途说（这几乎是很明显的），既然他很少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因之要他们对自身做出更确切的解释，要他们向他做个自我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同他们进行争论，该多么无耻呢？

“如果对那些介绍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有了确切的了解，这可能会使大部分奉行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利尔日报’的先生们。”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指望他们相当坚决和真诚地（好一位高尚的庸人！）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离弃那些非共产主义者。应当要求他们

(真是庸人的用语!)不要不知羞耻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毫无根据地认为可能——其实是不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学说(!)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高尚的庸人)是:或者使一切都为所有靠近他们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把他们引到既定的目的,或者同他们一刀两断,不利用他们。”

假如卢格先生也能创造出三个这样的复杂句,那真是大可庆幸了。庸人的要求是和庸人所特有的思想混乱完全符合的:据说庸人关心的只是问题的本质,而绝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他们应当结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产生的(他就是想这样说的)混乱。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字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也就发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失去了思路。共产主义者往往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常见的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可笑又可怜地在各种各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上颠踬,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耍惊人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问题的实质,我们再说一遍,海因岑先生正象正直的德国人一样,他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否定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可以再

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高尚的庸人的本性也绝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暗示出,共产党政论家只是利用共产主义者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他们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离开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做先知、术士或长于密谋的祭司,不过这种智谋只是他们自己享用而不传授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便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使一切都为所有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且不要利用他们,他这些高尚庸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设想出发的:好象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永远愚昧无知,好象他们只是利用他们,就象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¹³³打算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打算批驳。我们请共产主义者工人自己去评判。

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蔑和惊人的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抨击和他的论据。

海因岑先生

“认为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劳动所得也包括在内)和做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使用地力的原则”。

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已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

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该不会不认识到,为了评判共产主义,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前提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可能造成的后果便不会有任何概念。

海因岑先生在最后这个问题上暴露了何等严重的无知,他竟认为“共同使用地力”(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交通工具、世界贸易空前的发展规模使个别资本家越来越不可能进行个人经营,由于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的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由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由于工业、农业、交换的社会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由于这一切,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

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同这种废除的前提本身分离开来,他不把废除私有财产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观察,而只是把它当作书斋里的愚蠢的臆想,这

样一来,这种废除就成了十足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在这上面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是,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暹罗的连体双生子)。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请胸怀宽大的读者留意,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正是海因岑先生自己大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消灭了个性……独立……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消灭的个性!)。共产主义把个人和他的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不可缺少的特征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而对每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高尚庸人的正义感,想把自己赚到的分给每个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有系统地发展获得的财产的原则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已彻底破产。海因岑先生的确永远也不敢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要研究问题,但他不打算这样做。不过他仍然可以

1811年生于暹罗的连体双生子汉克和恩克,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暹罗人。——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来显示自己的获得的财产。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这种非难又是针对谁呢?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词句就越显得笨拙。他十分不善于选择恰当的词汇,因而话语软弱无力,这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原想把他看做自己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固执的信念常常使他说了一些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要说的废说,一种是他不要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的关于君主的威力这种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切无权现象的根源和支柱,他要“尽力”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高尚的品德在这个倒霉领域里的下场就是这样。

受了当代精神的腐蚀,
成了愚昧的长裤汉。
舞跳得虽然不好,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了豪迈;

.....
虽不是个天才,也是一条好汉¹³⁴。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象一个高尚庸人受到凌辱一样感到理所当然的愤慨,但他既不会因而改变自己的文风,也不会改变

他的败坏名声和无的放矢的鼓吹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坚决行动的时刻诉诸绞架,这曾使我们一度感到快慰。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全体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批驳的权利。根据这个理由(而不是根据别的理由),我们认为必须批驳海因岑先生。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①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雷策尔版¹³⁵。海因岑先生写的即使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都是可以欣慰的。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连听都不想听他的土地共和国。还要指出一点,这是工人写的第一本书,作者不是在进行说教,而在尝试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来说明现时的政治搏斗。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9月26日
和10月3日

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① 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弗·恩格斯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 运动。爱尔兰¹³⁶

目前笼罩着英国的商业危机,其尖锐程度确实超过以前一切危机。无论 1837 年的萧条或 1842 年的萧条都没有目前这样普遍的性质。英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在发展的鼎盛时期,突然瘫痪下来了。到处呈现着萧条,到处都是被抛弃在街头的工人。这种情况当然使工人非常激动,他们在商业繁荣的时候受尽厂主们的残酷剥削,而现在又被大批解雇,落到听任命运摆布的地步。这就是怀有不满情绪的工人所组织的集会迅速增加的原因。宪章派工人的机关报“北极星报”用了七栏多的篇幅报道上周内举行的集会,而通知在本周内举行集会的布告又满满占了三栏。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叫约翰·诺克斯的工人出版的小册子¹³⁷,作者直截了当地公开攻击了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

他说:“英国的土地是人民的财产,而我们的贵族却用暴力或欺诈手段把它从人民手里夺走。必须承认人民对财产有绝对的所有权,必须宣布地租是全民的财产并用来满足共同的利益。可能会有人对我说,这是革命的言论。是不是革命的言论,那是无关紧要的;既然人民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那末他们就只好试用非法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宪章派展开了异常有力的活动是毫不足怪的。他们的领袖,著名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久前宣称,他准备在最近期间到苏格兰去,以便在那边的各个城市里召开大会,并发动群众在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民请愿书上签名;这份请愿书是准备递交议会的最近一次会议的。奥康瑙尔还说,在议会开会以前,宪章派将增出一份“民主主义者”日报¹³⁸。

读者大概还记得,在最近的选举中,“北极星报”的主编哈尼先生已被梯维尔顿区造作宪章派的议员候选人;这个区也把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选进议会。但是当帕麦斯顿勋爵要求投票表决¹³⁹时,在举手表决初选中获胜的哈尼先生就放弃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同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梯维尔顿区的居民对该区的一小群议会选举人是何等反感。当市政委员会中有一个缺额时,等级比议会选民繁复得多的地方机构选民就让提哈尼先生当候选人的劳克利弗先生补了缺。应该补充的一点,是宪章派正在全国范围内准备迎接11月初的全国市政选举。

现在来谈谈英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郎卡郡,在那里工业萧条的苦难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为深重。郎卡郡的情况极为紧张,那里大部分工厂已经完全停工,而在那些还继续生产的工厂中,工人在一星期内至多也只能工作两三天。不仅如此,极重要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埃士顿的工厂主已经向工人宣布:一星期后将降低他们的工资10%。这一使工人极为紧张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区。几天以后,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全郡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见厂主,以便促使他们收回成命,取消降低工资的威胁。如果代表团得不到任何结果,郎卡郡棉纺织企业的全体工人将宣布罢工。这次罢工和北明翰冶金工人和矿工的已经开始的罢工联合起来,

很快就会达到象 1842 年爆发的最后一次总罢工那样可怕的规模。对政府说来,这次罢工很可能更为可怕。

同时,饥饿的爱尔兰又痛苦地抽搐着。习艺所已挤满了乞丐,破了产的所有者再不愿缴纳济贫捐,饥饿的人们往往成干地集合在一起抢劫农场主的谷仓和畜圈,甚至抢劫不久前他们还极其敬畏的天主教神甫的谷食和畜圈。

今冬,爱尔兰人看来决不愿再象去年那样默默地饿死了。从爱尔兰进入英国的移民每天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据以往的统计,每年平均有 5 万爱尔兰人移入英国,而今年到英国去的则已经超过 22 万人。9 月份每天有 345 人进入英国,而 10 月份每天就达 511 人。这样,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日趋激烈,如果这次危机所引起的激动强烈到使政府必须同意实行极重要的改革,那是毫不足怪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0 月 23 日

载于 1847 年 10 月 26 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

致“工场”杂志的工人编辑¹⁴⁰

诸位先生！

刚才我读了贵刊 10 月号上一篇题为“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新闻报”的报道谈到了 8 月 29 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所谓的郎卡郡棉纺织业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成了“新闻报”用来证明英国的劳动和资本十分和谐的证据。

先生们，你们对法国资产阶级报纸引自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报道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一点做得好极了。应该承认，这篇报道是很确切的，当时通过的决议正是“新闻报”所引证的那个。报道中只有很小的一个地方说得不够确切，但正是这个不够确切的小地方包含了问题的全部本质：“新闻报”所说的大会不是工人的大会，而是工头的大会。

先生们，我在郎卡郡的中心，而且是在工人中间住过两年。我既看见过他们的群众大会，也看见过他们的人数不多的委员会会议。我了解他们的领袖和演说家，因而敢肯定地向你们说，比郎卡郡的这些棉纺织业工人更忠于民主原则的人，比他们更有决心打碎折磨着他们的剥削者资本家的枷锁的人，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

国家里 ,都是无法找到的。我亲眼看到过工人们在开会的时候把几十个厂主从会议厅的台上哄下来 ,他们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高举起的拳头使聚集在台上的资本家们吓得发抖。请问 ,难道现在这些工人会因雇主们俯允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 ,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 ,就对雇主们感恩不已吗 ?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吧。难道缩短劳动时间对工人来说不是等于降低工资吗 ?显然是等于降低工资 ;无论采取那一种方法 ,工人的境况同样是越来越坏。因此工人对雇主采取第一种办法而不采取第二种办法来减少工人的收入 ,并没有任何理由要加以感谢。可是先生们 ,如果你们翻一翻 8 月底的英国报纸 ,那末你们就会深信 ,棉纺织业厂主宁可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 ,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 ,是有许多原因的。当时原棉的价格上涨了 ;报道那次大会情况的同一号伦敦“地球报”也做了这样的报道 :利物浦的投机商准备操纵棉纺织业市场 ,以便人为地抬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 ,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怎么办呢 ?他们派自己的工头出席大会 ,叫他们通过象“新闻报”向你们报道的那样的决议。这是厂主们在投机商力图抬高棉花价格时所采用的尽人皆知的老办法。它是对投机商的警告 ,警告他们不要企图过分抬高价格 ,否则厂主们将减少对原料的需求 ,而这就必然会使价格下降。因此 ,使“新闻报”欢欣若狂和热烈赞赏的那次大会只是工头们的一次集会 ,这种集会在英国是谁也迷惑不了的。

只有厂主的机关报“曼彻斯特卫报”收到这份决议 ,其他报纸都是转载该报的 ,仅仅指出这一点 ,你们就更可以相信这次大会是资本家一手操纵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北极星报”也引用了这一决议 ,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加了一个足以向工人揭露它的按语 ,即指

出它是从这家资本家的报纸引来的。

此致……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0 月 26 日左右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7 年 11 月“工场”杂志第 2 期

俄文译自“工场”杂志

卡·马克思 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①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单是一个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粗俗文学。目前我们正处在类似 16 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前夜。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对历史发展发生的兴趣不难克服这类作品所引起的美学上的反感;这类作品早在 15、16 世纪就在那些甚至鉴赏力不高的人们中间引起过这种反感了。

16 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伏拉松¹⁴²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在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对立;轻率自满,大发空言,无边无际;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

① 我回答海因岑先生并不是为了击退他对恩格斯的进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¹⁴¹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为海因岑宣言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卡·马·

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16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科尔夫¹⁴³,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愤怒,愤怒式的卤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象大气一样飘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岑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上的攻击共产主义者的宣言,为我们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们根据海因岑宣言来描述以这篇宣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据16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16世纪的作家如“笨蛋传教士”^①一样:

裴朗 藏好你的头,阿基里斯,赫克脱全身甲胄来了。

国王 跟这个人一比,赫克脱不过是一个特洛伊人。

鲍益 可是这是赫克脱吗?

杜曼 我想赫克脱不会长得这么漂亮。

裴朗 这个人决不是赫克脱。

① 托马斯·穆尔纳的绰号。——编者注

杜曼 他不是个天神,就是个画师,因为他会制造千变万化的脸相^①。

但是,毫无疑问,海因岑先生就是真正的赫克脱。

他坦白地说:“很久以来,我就感到难受,我预感到我要被一个共产主义的阿基里斯一手打倒。而现在当我受到瑟息替斯的攻击时,脱险的念头又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气……”

赫克脱只是预感到他要被阿基里斯一手打倒。

其实,海因岑先生这种关于阿基里斯和瑟息替斯的概念也许并不来自荷马而来自施勒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

于是他就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哀杰克斯。

让我们来看看莎士比亚的哀杰克斯吧。

哀杰克斯 你再说,你这发霉的酵母,再说,我要打掉你这丑陋的皮囊。

瑟息替斯 我要骂开你那糊涂的心窍,可是我想等到你能够不瞧着书本念熟一段祷告的时候,你的马也会背诵一篇演说了。你会打人吗?你这害血瘟症的!

哀杰克斯 坏东西,把布告念给我听。

瑟息替斯 我想,它说你是个傻瓜。

哀杰克斯 你这婊子生的贱狗!

瑟息替斯 你打,你打。

哀杰克斯 你这替妖精垫屁股的镜子!

瑟息替斯 好,你打,你打,你这下贱的莽驴子!他们叫你到这儿来打几个特洛伊人,你却给那些聪明人买来买去,好象一个蛮族的奴隶一般……你这没有肚肠的东西。

.....

瑟息替斯 怪事,怪事!

阿基里斯 什么怪事?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参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八册第102页。——译者注)

瑟息替斯 哀杰克斯在战场上走来走去,到处寻访他自己。

阿基里斯 是怎么一回事?

瑟息替斯 他明天必须单人匹马去和赫克脱交战,他因为预想到这一场英勇的厮杀,骄傲得了不得,所以满口乱嚷乱叫,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阿基里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瑟息替斯 他跨着大步,象一只孔雀似的走来走去,踱了一步又立定了一会儿,他那满腹心事的样子,就象一个靠着脑筋打算盘的女店主在那儿计算她的账目;他咬着嘴唇,装出一副深谋远虑的神气,好象说:我这儿有一脑袋的神机妙算,你们等着瞧吧……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①

不管海因岑先生所戴的假面具是赫克脱还是哀杰克斯,他只要一出台,就象雷鸣一样向观众宣布,他的敌手并未使它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带着纯朴的心情,以荷马叙述古代英雄的史诗般冗长的篇幅来讲述他得救的原因,他说:“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有一个天赋的缺陷。”“天赋没有把”我“降低到”敌手的水平。海因岑先生比他的敌手高出两个头,因此他那“小剑子手远远地照准打了”两下都没有触及他那“文艺脖子”。并且特别着重地再三强调恩格斯先生“矮小”,说他是“小剑子手”,说他是“小人物”。接着就是一些古代英雄故事或者关于大汉歌利亚和矮子大卫 的古代民间喜剧中才能见到的用语:“假如您吊得这样高——吊在灯杆的顶端,——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您了。”这就是巨人的荒诞无稽而且耸人听闻的幽默。

①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第二幕第一场,第三幕第三场,参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十册第141—143页,第146,188—189,191页。——译者注)

参看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17章。——译者注

海因岑先生不仅以如此“文艺的”手法显示了自己的“脖子”，而且显示了自己的全部“天赋”，显示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把他那“矮小的”敌手摆在自己身边，以便通过对比来鲜明地突出自己体态的完美。“矮小的”丑儿在小手里拿着刽子手的屠刀——也许是1794年时送给小孩玩的一架袖珍断头台。而他本人却是一名威严的勇士，带着凶恶而轻蔑的冷笑，手中拿的武器不过是一条鞭子，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他早就用这条鞭子来“惩罚”共产主义者这些可恶“儿童”的“轻举妄动”。巨人以师长的姿态和蔼地对待他那“昆虫似的敌手”，没有践踏这有勇无谋的小家伙。他以小孩的朋友的身份和蔼地同他交谈，给他讲解道德，对他的重大毛病，如“撒谎”、“荒谬而幼稚地撒谎”、“蛮横”、“暴躁”、无礼等等年轻人的毛病进行严肃认真的规劝。如果这时满腔师长热情的巨人的鞭子不时在学生头上大声呼啸，如果粗鲁的语句间或中断了滔滔不绝的劝善良言，以至在某些地方完全抹杀这些格言的作用，那末，一刻也不要忘记，巨人并不能象昆图斯·菲克斯莱恩¹⁴⁴一类的学校专任教师那样从事道德教育，不要忘记天性即使从门口被赶出去，又会从窗口跑回来。此外还应当注意，同样的话出自矮子恩格斯之口就是令人生厌的淫秽之言，而出自巨人海因岑之口就美妙得象自然界的音响那样入耳动听令人心醉。况且，以庸俗言论的狭隘尺度来衡量英雄的语言，这恰当吗？当然不恰当，正象荷马说他最喜爱的主人公之一哀杰克斯“顽固如驴”，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荷马下降到了粗俗文学的水平一样。

巨人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7号上向共产主义者显示自己的鞭子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好意的¹⁴⁵而“矮小的”丑儿由于巨人根本不给人以发言的机会，却对他并不那么领情（他对矮子这种

捉摸不透的傲慢无礼,曾多次地表示他那勇士的惊讶)。他埋怨说:“这绝不是进行忠告。”“恩格斯先生渴望我死,他想杀害我,这个恶棍。”

而他本人呢?无论在对待普鲁士政府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是“热情奔放地展开斗争,在军衣下面提出和平的建议,捧着一颗追求人道地调和当代矛盾的心灵”。^①可是,(唉!)“这种热情饱含着诡计多端的刺激性水分”^②。

伊瑟格林残暴凶狠。他爪子一伸,
张牙咧嘴,蓦地冲了上去。
莱涅克机智地迅速闪开,连忙分泌出
强烈的刺激性水分,浸湿了毛茸茸的尾巴,
然后在沙里滚了一身薄泥。
伊瑟格林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把狐狸抓住。
谁知淘气鬼突然用潮湿的尾巴
往他眼睛上一打——狼的视力顿时模糊不清。
这是狐狸常玩的惯技,
已有不少野兽、不少无辜的人
受到过他那尿液的浸蚀。^③

“恩格斯先生,我从干政治生涯开始就是共和主义者,我的信念没有发生过变更和动摇,不象某些共产主义者的脑袋那样,时而朝东,时而朝西”^④。

“不错,现在我才变成了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策略就是这样,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改正的,所以,当敌手在改正自己的时候他们就非难敌手”^⑤。

海因岑先生根本不是变成共和主义者的,他一开始他的政治

① Karl Heinzen 《Steckbrief》(卡尔·海因岑:“逮捕令”)。

② 同上。

③ 歌德:“狐狸-莱涅克”。

④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⑤ 同上。

生涯就是共和主义者。因此,他是前后一贯、坚毅不拔、始终如一的。而他的敌手则是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经常转变。海因岑先生并非一向就是革命者;他是变成革命者的。不错,这一次是海因岑先生在转变;因此,情况就变了样:这些转变不再具有不道德的性质并且今后就叫做“自我改正”。而共产主义者的前后一贯却反而不再具有崇高道德的性质。那末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不可改正”。

固定或者转变两者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从道德高尚的庸人方面来说是道德的,从他的敌手方面来说是不道德的。批评化的庸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何时应当说“白”,何时应当说“黑”,善于在需要的时候说需要的话。

一般认为,无知总是一种缺陷。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看做负数。我们倒要看看庸人的批评的魔杖怎样把精神上的负号变成道德上的正号。

海因岑先生附带告诉我们,在哲学上,他现在同1844年时一样一直是门外汉。黑格尔的“语言”对他来说“始终不容易消化”。

事实就是这样的。接着就是在道德上的加工。

由于黑格尔的语言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一开始就“不容易消化”,所以他不象“恩格斯等人”似的迷住了心窍,一见好机会就不顾道德,高傲地吹嘘自己通晓这种黑格尔的语言,而是象人所共知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样,从来就没有“吹嘘自己通晓”梵文的妄想。但是要知道,真正的道德行为就是要避免为不道德行为造成任何口实;为了防止“吹嘘自己通晓”某种语言这一不道德倾向,便干脆不去了解这种语言,这倒确实是一种最简便的办法!

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海因岑先生自己认为,他没有进过

“学校”请教哲学老师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学校是“人的理智”和“生活深处”。

他带着一种老实人的谦逊的自豪感高声说道：“正因为这样，我才得以免除背弃自己的学派的危险。”

要防止在道德上背弃学派的危险，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加学派！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背弃！批评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些批评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

让道德高尚的庸人毫无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我们就跟他到他在自己的想象中转入“本题”的地方去。我们到处都会碰到这种方法。

“如是恩格斯先生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于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这一点都视而不见的话，我就无可奈何了……凡是对资产者获得金钱表示仇恨而对国王获得权力却听其自然的人，我都把他们叫做糊涂虫和胆小鬼”^①。

“权力也统治着财产。”

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

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国家的权力还没有变成它自己的权力。在那些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阶级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海因岑先生的断言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

这样，海因岑先生以为自己道出了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是独创的真理，其实他只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夺得政权这个事实，也

①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就是说,他所说的和恩格斯所说的是相同的话,但是,他却无意识地满以为他说的是相反的话。其实,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政权的暂时关系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从而表明了怎样把“运动”变成“僵硬的核心”而已。

海因岑先生继续说,“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

或者海因岑先生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上述的压迫,即德国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最神圣的”利益方面所受到的君主专制的压迫,那末他就只是重复了上述的话,或者他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工人的经济状况,那末他的启示就具有如下的含义: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海因岑先生又一次不自觉地说出和恩格斯所说的相同的话,并且又一次天真地自以为所说的是相反的话。他所说的不是他所想的,而他所想的却又没有说出来。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

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

例如,海因岑先生谈到金钱和权力、财产和统治、获得金钱和获得权力不同是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在字面上即已犯了同义反复的毛病,并且还觉得单纯规定字面上的差别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功绩,他自恃眼力过人,拿这种功绩来同那些竟“盲目”到连这种初级的、纯粹儿童的理解都不愿一顾的共产主义者相对比。

“获得金钱”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财产”怎样变成“政治统治”,也就是说,为何不是象海因岑先生所奉为教条的那种硬性规定的差别,而是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合而为一;海因岑先

生要想知道这一切是不难的。问题只是他必须知道,农奴怎样为自己买得自由,公社¹⁴⁶怎样买得自己的市政权;市民一方面怎样利用工商业从封建主的口袋里攫取金钱并通过期票使他们的地产化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君主专制战胜因此而被削弱的大封建主并为自己买得他们的种种特权;然后他们怎样利用君主专制本身的财政危机等等;后来甚至君主专制本身又怎样由于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国债制度而依附于股票大王;在国际关系方面工业垄断又怎样直接变成政治统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就是英国豢养的雇佣兵)等等。

但是,当“人的理智”的傲慢的粗俗性格把获得金钱和获得权力之间的那些差别奉为“毫无疑问”应当“如此这般”去对待的永恒真理,把那些差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的时候,它就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合意的阵地,可以从那里针对这类信仰符号的反对者的“盲目”、“愚蠢”或“卑劣”倾泻自己的道德愤怒。这种吵吵嚷嚷的粗暴发泄一方面引起了他的自我满足,同时不过是用漂亮词句做成的仅仅夹杂着两三个贫瘠真理的羹汤。

海因岑先生可要活到甚至普鲁士的财权力将同政治权力强迫成婚的时候。让我们听下去吧:

“你们想把社会问题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可是你们没有看到,没有任何社会问题比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问题更为重要。”^①

刚才海因岑先生看到的只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别;而现在他看到的却只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统一。其实,他看到的当然还有敌手们的“可笑的盲目”和“可鄙的胆怯”。

①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粗汉天真地以为说出只有在 8 岁儿童用的教义问答中才能碰到的类似观点,就意味着不仅说出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在现代冲突的天平上加了一些重量。

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探讨”的“社会问题”随着我们步出君主专制的领域而日益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¹⁴⁷、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¹⁴⁸一书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

财产问题,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决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照海因岑的说法)重新阐明:“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个别人一般可以拥有某些东西是否公平”,也不能归结为类似的简单的良心问题和关于公平的词句。

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国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

例如,对加里西亚的农民来说,财产问题归结为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 1789 年前夜的法国农民来说,意义是一样的。相反,英国的

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这种经营资本家从自己这方面说由于付给土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发生关系。因此,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消灭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它对谷物法进行斗争,正具有这种意义。对英国农业工人来说则相反,他们和英国工厂工人一样,对他们来说消灭资本乃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

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16至18世纪时期中变成了工业发展的桎梏。

最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财产问题的意义在于消灭因大工业、世界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发展而造成的冲突。

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17、18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19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全世界历史性问题的这个财产问题,只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意义。这种社会愈发达,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就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就愈具备资产阶级性质,那末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例如,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同样,社会的不平等在北美东部各州也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突出,因为在这里社会的不平等不

象在别的地方那样为政治的不平等所掩盖。至于说这里的赤贫现象还没有发展到象英国的那种程度,自有其经济上的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此一一阐述。不过,这里的赤贫现象也是很可观的。

“这里没有特权等级,社会上的一切阶级都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困难正在于阶级的存在),而且我们的人口还远没有达到妨碍生活资料发展的地步,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竟看到赤贫现象这样猛烈地增长,实在令人吃惊。”(梅勒迪斯先生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作的报告¹⁴⁹)

“已经证明:在二十五年的时期中马萨诸塞州的赤贫现象增长了60%。”(摘自美国人奈尔斯的“纪事”¹⁵⁰)

北美的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激进主义者托马斯·库伯建议:

(1)禁止无产者结婚。

(2)取消普选权,他大叫说,因为

“社会是为保卫财产而建立的。由于永恒的经济规律永远得不到财产的人还要求享有颁布关于他人财产的法律的权利,这怎么合理呢?这两个阶级的人怎么能有共同的动机和利益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情绪是不革命的,那末,他就捍卫他赖以生存的业主的利益。例如,在新英格兰最近的选举中,厂主们力图保证自己的选票,把他们的候选人名字印在白布块上,而他们的每个工人都在自己裤子的前档上戴上这样一块白布。

“或者是工人阶级由于共同的集体生活等等而成为革命的,那末,国内的政权迟早要转到它的手里,而在这种制度下任何财产都是没有保障的”。^①

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为名分别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① 托马斯·库伯:“政治经济学讲义”哥伦比亚版第361—365页(Thomas Cooper《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Columbia, p. 361—365)。

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其与本身适应的立宪或共和的代议制国家形式。既然正是在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财产问题”成了最重要的“社会问题”,那末,只有德国小市民的狭隘要求才使得他终于叫喊出什么君主制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样李斯特博士在“国民政治经济学”¹⁵¹的序言中对于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赤贫现象而不是保护关税这一点也表示天真的烦恼。

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差别同时又是战斗双方的个人差别。

“小家伙”以小扒手姿态出现,只同拥有“金钱”的敌人周旋,神话般的壮士与他不同,他是向这个世界上的“权贵”作斗争。

Indosso la corazza,e l' àmo in testa [他身穿铠甲,头戴钢盔。]①

并且喃喃说道:

“不过,在这里阁下比我处境更好。”②

但是,处境最好的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权贵”,当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学生发起如下的进攻时他们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现在您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丧失了鉴别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能力。”③

刚才我们听到伟大人物以惊人的简洁在大体上阐述了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道德说教。当即又以君主制为例直观

① Ariosto 《Orlando Furioso》[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

②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③ 同上。

地教给自己的学生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方法。

他说,君主,即君主制是“一切灾难和贫困的祸首”。在君主制已经废除的地方用这种方法解释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曾使古代共和国走向灭亡、又将在北美合众国南部各州导致可怕冲突的奴隶制^①就会用约翰·福斯泰夫的话高声地说:“啊,要是理由能贱得象乌莓子一样有多好啊!”¹⁵²

但是,首先要明白:君主和君主制是某一个人产生的呢,还是某一个东西产生的?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经必须以最优秀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首领。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们的愚蠢和堕落,这种滥用现象得以维持数百年之久。

即使把欧洲所有的天生健谈之士召集在一起会谈,他们也不能做出另外的回答。如果你们看完海因岑先生的全部文章,你们从里面也找不到别的答案。

坚实的“人的理智”以为宣布自己是君主制的反对者,就是对它做了解释。但是对这个正常理智来说,最困难的似乎应当是说明: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的反对者来自何处,他又怎样把自己那种惊人顽强的寿命延长了好几百年加以说明。这是再简单没有了!没有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这几百年也过来了。换句话说,数百年的理性和道德同君主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以往数百年的这种理性和这种道德。它不了解它们,可是却看不起它们。它从历史的

①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人之一、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杰弗逊的回忆录。

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所以,它在这里也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愤怒的重炮全部放射出来。

正如政治的“人的理智”在这里说君主制的起源和长期存在是由于考虑不周一样,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异教和不信教是由魔鬼一手造成的。同样,非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宗教是由神甫这样一种魔鬼一手造成的。

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用道德方面的老生常谈论证了君主制的起源,那末,得出关于“君主制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结论是十分自然的。请听:

“一个人把整个国家抓在自己手里,使全体人民或多或少地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为他个人和他的亲信牺牲,在人民中造成高低不同的层次阶梯,象区分肥肉瘦肉一样把人民分成等级,并且实质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同一国家的每一成员变成另一成员的公开敌人。”^①

海因岑先生看到君主处于德国社会大厦的最上层。他毫不怀疑:最上层的社会基础就是他们创造的并且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创造这种基础。君主制是社会状况的公开政治表现,要解释两者间的联系,除了把君主说成是这种联系的创造者以外,还能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代表机关同它们所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联系呢?它们创造了社会!例如政治偶像及其机构和层次阶梯创造了罪恶世界,而政治偶像是罪恶世界的至圣物。例如宗教偶像创造了世俗状况,而这些世俗状况反映在宗教偶像中也是一些虚幻的、天上的东西。

以高度热情宣扬类似的简陋智慧的粗汉们自然一定要以惊异

① 海因岑宣言,同前。

而义愤的目光来看待敌手,因为后者挺身而出向他们证明:苹果并不创造苹果树。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相反,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倒是它的社会前提,这种前提的历史渊源人们已经很清楚,没有重提的必要。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关于这个发展之谜可以在工商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德国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骑士等级消灭,农民遭到失败,这一切决定了领主王公最高权力的确立;现代世界市场和大型手工工场出现时,以纯粹中世纪关系为基础的德国工商业衰落了;三十年战争留下了人口绝灭的凄惨景象;振兴的民族工业部门(如小型亚麻生产)具有与宗法关系和情况相适应的性质;由于输出的多半是农产品,因而在物质生活来源上有所增加的几乎全是贵族地主,他们对市民来说,势力也就相对增大,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国民收入以外国人对王公们的接济为主要来源;因此市民就依附于王室;——形成德国社会面貌和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组织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在粗汉的人的理智看来,已变成一些英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国君主”创造了“德国社会”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发源地,而不把德国社会看成是君主制的发源地的那种错觉是不难解释的。

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为初看就非常透彻),发现德国君主们在维持和坚持他们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国旧社会秩序,并且对破坏

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见破坏性因素也在同君主的权力作斗争。于是健全的五官全部出马,证明君主制是旧社会及其等级结构、偏见和矛盾的基础。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种现象只推翻了它无意中为其充当论据的那一幼稚观点。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本身也就消灭^①。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

① 诙谐语:《machen》是“创造”,《abmachen》是“消灭”。——编者注

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但是,海因岑先生把“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仅仅理解为德国君主制同德国的灾难和贫困之间的联系。

从物质方面说,君主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形式一样,直接用捐税来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官吏和僧侣、士兵和舞蹈女演员、教师和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德式的尖塔、王室费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

哪一个饶舌的庸人不会向饥饿的老百姓指出,捐税,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

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贫困,换句话说,就是君主们得以骄奢淫逸、人民以自己的血汗为代价付出的捐税!

对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类救世主,材料是多么丰富啊!

君主制要求庞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北美的国家预算来同我们的 38 个小国为了受统治和被控制所必须缴纳的数目来比较一下吧,这些妄想蛊惑人心的粗暴攻击,甚至无须共产主义者讲话,只要如李嘉图、西尼耳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用三言两语就可以驳倒了。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

必须确定捐税和工资之间有什么关系。

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到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肩负的全部

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

如果说北美的工资高于欧洲的工资,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北美的捐税较轻,而是由于北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工商业的缘故。在那里劳动力求过于供的情况远远超过欧洲。这一真理是每个中学生都早已从亚当·斯密那里就知道的。

对资产阶级来说则相反,捐税的分配、征收和使用的方法之所以成为切身问题,不仅是由于它对工商业起着影响,而且还因为捐税是可以用来扼杀君主专制的一条金锁链。

海因岑先生对“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和“阶级关系”同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如此深刻的说明之后,得意扬扬地大声叫道:

“的确,我在自己的革命宣传中没有犯‘共产主义者的局限性’的毛病——不面向人们,只面向‘阶级’,唆使不同‘行业’的人们互相反对。这是因为我承认‘人性’不总是以‘阶级’或‘钱包的大小’为转移的‘可能性’。”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

海因岑先生把完全从他本身的“生活深处”和他本身的“人的理智”中取来的他本身的“局限性”可笑地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局限

性”。

我们暂且假定,海因岑先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而假定他说的不是钱包的“各种大小”,不是“各行业之间的争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 tiers état(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候,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做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属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于极不明确地对待德国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别,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号召扩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在德国血统的人们中间确立一种差别,因为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面,而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材料进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说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国血统的人们划分为国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这种对立面并且对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来,

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是具有个人胆量、政治头脑、激动的人的感情、严肃态度、远见和值得敬佩的勇敢的明证。如果注意到,臣民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特权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级是降低人格的阶梯,却反而认为它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锁链的臣民(对这些锁链的重压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这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无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却冒出一些“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看出了国君和臣民之间的政治差别,而且看出了阶级间的社会差别。

一分钟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出了差别并给以表述,现在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看不出差别、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盖。表述对立面的言语由革命的语言一变而成为反动的、恶毒地“唆使”被人性团结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对的语言。

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后不久,胜利的资产阶级在九月法令中规定(大概也是为了“人性”)“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为最大的政治罪行,违者囚禁,课以罚金等等。¹⁵³其次,大家知道,英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放弃其他一切告密形式而宁愿责难宪章派的领袖和共和主义者唆使一些阶级的居民去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居民。甚至大家也知道,德国的作家们就是因为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而被活活埋葬在城堡中的。

这一次海因岑先生是不是在用法国九月法令、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和普鲁士刑法典上的语言讲话呢?

不是。善良的海因岑先生担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企图用革命的排毒法¹⁵⁴使君主免除危险”。

比利时的自由派硬说激进派同天主教徒串通;法国的自由派硬说民主派同正统派串通;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硬说宪章派同托利

党人串通 ;同样 ,海因岑先生也硬说共产主义者同君主串通。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 ,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¹⁵⁵。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太晚了 ,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 ,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 ,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 ,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 ;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¹⁵⁶就是一个例子。因此 ,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¹⁵⁷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发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有所反应)做不出别的解释 ,只是说 ,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问 ,这是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 :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 ?工人非常清楚 :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 ,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 ,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

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正如对工人不大了解一样,海因岑先生也不大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他在无意地为他们服务。他认为有必要违背他们的意愿再三重复反对“德国的和善、温顺”的老调。他这位道德高尚的大丈夫对某一个康普豪森或汉泽曼所贩卖的奴才言论信以为真。资产者先生们会嘲笑这种幼稚的。他们哪里有毛病,他们自己更清楚。他们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

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

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正如某些拉利-托朗达尔、穆尼哀、马鲁埃和米拉波的甜言蜜语未能说服路易十六坚决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残余一样,所有这些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海妖之歌也不能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所迷惑。

但是海因岑先生既不同德国资产阶级打交道又不同德国无产阶级打交道。他的政党就是“人们的党”,所谓人们就是指那些以“人类”目的为幌子、为“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但同时又没有意识到理想主义词句与其现实主义实质之间的联系之诚实正直而胸襟开阔的幻想家。

国家缔造者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政党即人们的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安居在德国的人类的党推荐“最好的共和国”,他亲自策划的最好的共和国,即“具有社会制度的联邦共和国”。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马布利也曾为科西嘉岛上的居民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伟大的日内瓦公民找到了一个更伟大的继承者。

“我只能(多么谦卑!)用共和制的因素构成共和国,正如只能用花瓣构成花朵一样。”^①

一个会用花瓣构成花朵,即使是一朵雏菊的人,大概他也能构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①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

成“最好的共和国”吧,不管堕落的人世就这一点说了些什么。

英勇的国家缔造者对一切恶意攻击置之不理而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自己的标本。凡是他认为不体面的,都用他那粗汉之笔删去。结果他就得到了 *in usum delphini* (皇太子用的)^①、也就是为“德国人”谋福利的修订本。于是,当他对“共和国、而且正是已确定的共和国的情景”加以描述之后,就“揪住”这“矮小的”无礼学生的“共产主义耳朵”一把提将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道:这个人是否也能“造出”一个世界、并且是“最好的世界”?他“揪住共产主义耳朵”把“小家伙”一个劲“往上”提,直到后者的“鼻子碰到”“新”世界——最好的共和国的大图时为止。他把他所设计的这幅世界大图小心翼翼地亲自挂上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Cacatum non est pictum*》〔涂抹并不是绘画〕——拒不悔改的“小”蛇发出咝咝的叫声。

共和主义的哀杰克斯在盛怒之下把共产主义的瑟息替斯摔倒在地,并从他那毛茸茸的宽阔胸膛里冲出了可怕的字眼:

“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的确,恩格斯先生!难道您不认为“美国联邦制度”是“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吗”?您摇头!甚么?您根本否认“美国联邦制度”是“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吗?什么,“社会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只 *in abstracto* (抽象地)存在?真是奇怪!

同时,您竟“厚颜无耻,昧着良心”硬要我们认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

① 这是 17 世纪下半期法国皇太子专用的拉丁文书籍的注脚,书中“不道德”之处均被删去并加这样的注脚。——编者注

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红的财富！

您似乎还用您小手里的“刽子手的屠刀”、用 1794 年时送给您玩的袖珍断头台来威胁我们吧。您自言自语地说，巴巴鲁和其余的彪形大汉在玩弄断头台的时期被砍去脑袋，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叫出了“美国联邦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¹⁵⁸。所有那些人，即当欧洲、特别是当完全处于封建割裂状态的德国发生某一民主革命的时候，不去争取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及其归于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企图去培植“美国联邦制度”的歌利亚们，也要得到同样的下场。

我的上帝！公安委员会¹⁵⁹的委员们和支持他们的雅各宾吸血鬼原来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暴徒，而海因岑式的“最好的共和国”却是“历来的治国艺术”为了“人”、为了好人、为了人道的人而“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的确！“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此外，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绝不是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北美的“联邦共和国”。他用“社会制度”将它装饰起来，他许以“在合理的基础上调整财产关系”，而他用来消除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缺点”的七大“措施”绝不是从现代不中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饭馆里讨来的淡而无味的残羹剩饭。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开的“使社会人道化”的药方，应当归功于“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¹⁶⁰，同样，上述他那意味深长的词句不应归功于哲学家波美拉尼亚人卢格，而应归功于英明到头发都发白的“秘鲁人”。可是恩格斯先生把这一切称为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不错，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优秀的人们日益消失”而“最优秀的”总是完全不为人所了解。

譬如,举一个善良的市民为例,让他凭良心说:现代“财产关系”的毛病是什么?这个善良的汉子一定会把食指按在额角上,意味深长地叹两口气,然后“毫不肯定地”说,许多人“一”无所有,甚至没有起码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些人不但搜刮衣不蔽体的无产者而且搜刮可敬的市民,他们象贵族一样手中积累起千千万万的不义之财,这是耻辱。Aurea mediocritas!中庸!——中等阶级的勇士叫了起来!就是要避免极端!哪有可以同这些极端、这些极端、这些最可鄙弃的极端相容的合理的国家制度!

现在来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会制度”以及“使社会人道化”的七大措施的“联邦共和国”。这里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限度”财产(他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作了保证,同时也对他的“最高限度”财产(他至多不能超过这个水平)作了规定。

当海因岑先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诚愿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吗?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不消说,“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极端的爱国志士所竭诚拥护的。

在一个与众不同、不“夸耀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而是相反地,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一直善于保持谦逊朴质,好象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刚刚打算开步走的人面前提出经济学的见解来同他争论,是多么失当啊!正因为这个人虽然受的教育不多,却能煞

有介事地提出 1842 年以来早已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透入德国生活深处的一切¹⁶¹，如替“获得的”财产、“个人自由和个性”担心等等来反对共产主义敌人，所以才是很了不起的。真的，共产主义作家的精神堕落是严重的，其标志就是他们只在对经济学和哲学有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汉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常识教给粗汉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进行辩论。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例如，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指出现代运动的特征，这就是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

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以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可怕的敌人、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讲到作为“运动”之理论表现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位巨人在道德高尚的愤怒之下叫道:“我是想把实际后果弄个明白,我是想使共产主义的‘代表们’承认这些后果,”也就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仅有虚幻概念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同私有制的废除相联系的那些荒谬的后果。他是想迫使恩格斯“为一切荒谬的话辩护”,照海因岑先生的英勇策划看来,这些荒谬的话恩格斯“是会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的”。但是莱涅克-恩格斯使这位道德高尚的伊瑟格林大失所望,他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吞噬”的“核心”,并惊异地自问:“这种现象须怎样加以烹制才能食用?”

善良的大丈夫用花言巧语来自慰的企图没有得逞,例如,他提出历史运动岂不是“人的感情的运动”等等反问,甚至恳求伟大的“卢格”的灵魂为他破这个自然之谜!

失望的汉子叫道:“事情发生以后,西伯利亚的严寒封住了我的心,事情发生以后,我总是感到有人叛变,梦到有人暗算”^①。

实际上,他最后对问题做出的解释是恩格斯“背弃自己的学派”,“胆小而可笑地退却”,“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而殃及全人类”,“在决定性的关头背弃自己的政党或是将其一脚踢开”以及诸

① Karl Heinzen 《Steckbrief》(卡尔·海因岑:“逮捕令”)。

如此类的道德化的疯狂非难。同样,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批判的共产主义之间所制造的差别无非是“叛变”和“暗算”。是的,纯粹是耶稣会教徒式的“事后补作的”差别,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把这些差别告诉海因岑先生,看来,就连生活深处的风暴也丝毫没有把它们吹进他的耳朵!

从表现这些矛盾的文字看来,海因岑先生对它们所作的说明是多么微妙呵!

“魏特林比您要高明一点,确实还可以算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或者是:

“如果格律恩先生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把恩格斯先生赶走,又怎样呢?”

在这以后,不言而喻,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由于完全不能自拔,不能认为诚实和正直(无论它们多么陈旧)是被赋以理性的实体之间完全无用的东西”,于是便开始拿无稽的谎言来款待我们,例如,说什么恩格斯也打算写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文章,但是卡·格律恩似乎比他“抢先一步”,因此,恩格斯就“未能为他这一索然无味的重复之作找到出版商”。海因岑先生还奉送了不止诸如此类的新发现,作为他根据“一定原则”得出的“结论”。

道德化的批评所得到的可怜结果是由这一批评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咎于哀杰克斯·铁拉孟的个人缺点。尽管这位神圣的粗汉非常愚蠢和卑鄙,但是他在道德上却有他自

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亚尔哥斯人的英雄之一铁拉孟的儿子,身躯高大,又称大哀杰克斯。——译者注

我安慰的地方,这就是他在自己的信念上是愚蠢、卑鄙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统一体。

但是不管“事实”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伟大的卡尔·海因岑本人却安之若素,听其“自然”;他在自己正直的胸脯上拍了三下叫道:“我,我坦然地随身携带着我的原则,如果有人向我问起这个原则,我是不会把它扔掉的”。

亨利希七十二世·冯·罗伊斯-施莱茨-艾贝斯道弗有二十年左右也是骑在他的“原则”的背上的。

注意。我们向“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读者推荐一篇斯蒂凡^①写的批评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来说,海因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随使用一个德国的空谈著作家来使真正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辩、谩骂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功的。海因岑先生没有更好的办法答复斯蒂凡,只好庄严地宣称斯蒂凡的文章是一篇坏作品,以此作为本质的批判。由于斯蒂凡其人他并不认识,所以他干脆骂他是街头恶少和商品推销员来为自己开脱。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他的对手还骂得不够恶毒,于是便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他变成警察局的密探。其实,法国警察局大概是经过同海因岑先生洽商没收了100本斯蒂凡写的小册子,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责难究竟有几分公允。

海因岑先生用上述方法向工人斯蒂凡上了一堂实际的道德课以后又用下面那种庸人的口吻向他说:“从自己方面讲,我(无论我怎样乐于同工人进行辩论)不能把无礼当作代替资格的手段”。德

① 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国工人真要受宠若惊了,原来只要他们对待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谦逊有礼,这位伟大人物就会同他们进行辩论。无奈海因岑先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同斯蒂凡先生进行论争,所以他才竭力用他那无耻的攻击来弥补这一缺陷。

卡·马·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10 月底
载于 1847 年 10 月 28、31 日和 11 月
11、18、25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第 86、87、90、92 和 9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¹⁶²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共产主义 ?

答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无产阶级 ?

答 :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 ,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 ,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 ,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 ,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 19 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 :是不是说 ,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

答 :是的 ,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 ,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 ,象上述那种生活条件的穷人、工人 ,即无产者 ,并不是一向就有的 ,正如竞争并不是一向完全自由和不受限制一样。

第四个问题 :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

答 :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 ,这一革命在 18 世纪后半期发生于英国 ,后来 ,相继发生于各文明国家。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 ,改变

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纺织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印花布、印书、陶器和金属品的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却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制造得更快,因而也就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的操作,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一切生产部门都象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地受到了蒸气、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所有的工业部门完全都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工厂制度的统治不仅逐渐地扩展到道地的手工工场,而且也日益侵占了手工业,因为这里大资本家也在不断挤掉小师傅,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厂生产几乎已在一切劳动部门中建立起来,手工业和手工工场几乎到处都被大工业排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层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者,日益破产,劳动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一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阶级的?

答:劳动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象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是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起来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也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于死光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额。但因为买卖总是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象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钱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得到的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的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也体现得愈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产业革命前,劳动阶级是怎样的?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它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正象现代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老是主人的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这种农奴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都还残存着。此外,在中世纪,

甚至在产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者帮工,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就渐渐地出现了受大资本家雇佣的手工工场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做工,他们就是为这个别人生产,从而换得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

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无产者则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①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工场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手工工场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手工工场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乡下,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里,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手工工场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才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产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

①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空白,没有第九个问题的答案。——编者注

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东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东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第三、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愈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愈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产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 :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

答 :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创造了自由竞争 ,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 ,大工业要粉碎它 ,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现今的原则经营 ,就只有依靠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维持生存 ,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 一种威胁 ,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 ,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 ,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 ,——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或者是承认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 ,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 ,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 ,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 ,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 ,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 ,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 ,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 ,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

因此 ,以下各点便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明 :

(1) 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 ,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

(2) 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

答 :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

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

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

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 :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

答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 ,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 ,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 ,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 ,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 ,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为此可能还需要新的斗争 ,但是 ,这次斗争必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 ,那末 ,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

1 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 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 ,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购买的办法 ,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3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

4 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 ,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 ,并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5 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 ,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 ,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

6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 ,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

在国家手里。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7 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铁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地的土质。

8 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

9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10 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11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

12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人民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余额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它会实现这种进步,同时也不会因此(象过去那样)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摆脱了私有制束缚的大工业将来的发展规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象手工工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它的全体成员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

很难运用现有的改良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就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这么一来,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

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民族?

——保留原案¹⁶³。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和日益消灭着。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代社会的苦难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苦难。这一类人的一切主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和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

(1)追求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希望恢复贵族、师傅、手工工场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缺点，但至少会有同样多的其他灾难，而且它也不会开辟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途；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在这种场合下，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现代社会必然产生的苦难，使他们不得不替这一社会的存在耽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代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为此，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

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有的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石,从而保存现代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得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个问题^①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和实行由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

答: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将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都坚持的那些社会主义措施中愈接近共产主义者,即他们愈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愈加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也就愈大。

① 手稿上为空白,指的是第18个问题。——编者注

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所谓激进派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主张全国土地改革的政党。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是共产主义者只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其中瓦得和日内瓦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0 月底—11 月

原文是德文

1914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发行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宪章派土地纲领¹⁶⁴

大约两年前,宪章派工人建立了一个协会,目的是要获得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划为小型农场分配给该会会员。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并成立一个全新的本质上民主的小耕作者阶级,来缓和产业工人间过度的竞争。这个方案的作者就是菲格斯·奥康瑙尔。这个方案极为成功,宪章派土地共用社会员已达二三十万人^①,拥有公共基金6万英镑(合150万法郎),而根据“北极星报”发表的通讯,新近的收入每星期在2500英镑以上。总而言之,这个协会(以后我还要作较详细的报道)的发展已引起土地贵族的惶恐不安;显然,这一运动要是照目前的规模发展下去,最后终将演变为要求全部土地归人民的全民运动。资产阶级对该协会也不会有好感;资产阶级看到协会使人民掌握了杠杆,人民有了这个杠杆不必求助于中等阶级就能解放自己。或多或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尤其反感,他们对土地共用社完全抱着恶意的态度,因为这个阶级现在发觉宪章派已远不如协会成立以前那样需要它的帮助了。而且,激进派不了解人民对他们的冷淡正是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必然结果,他们还在

① 本文在1847年11月6日“北极星报”第524号以英文发表的时候,“会员已达二三十万人”改为“已有大批会员”。——编者注

不断攻击奥康瑙尔先生,把他当作宪章派和激进派团结的唯一障碍。建立土地共用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这就足以遭致激进派,即某种程度上的资产者对该社的憎恨。起初他们对该社置之不理,到不能再施展缄默诡计的时候,他们就企图证明该社的组织原则必然会使它遭致极可耻的破产;到最后,当这种手段也阻碍不了该社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又重新乞灵于十年来一直用来反对奥康瑙尔先生而始终毫无成效的战术。他们企图使人们怀疑他的道德面貌,怀疑他的大公无私,使他无权再称为工人的廉洁公正的全权代表。不久以前,当奥康瑙尔先生发表他的年度结算的时候,六家或多或少属于激进派的报纸就不约而同地起来攻击他。这六家报纸就是“每周快讯”、“地球报”、“非国教徒”、“曼彻斯特观察家”、“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和“诺定昂信使报”。它们控告奥康瑙尔先生犯了最无耻的贪污盗窃罪,从这一决算中引用一些数字,企图作为控告的根据,至少给他加上一个似是而非的罪名。这样还远不解恨,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这位有名的鼓动家的私生活中找岔子。对他的控告接踵而至,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他的敌人们指望他因此就会一蹶不振。可是,奥康瑙尔已经和所谓激进派报纸不断地斗争过十年,尽管这些恶意中伤的抨击纷至沓来,但他并不屈服。他在本月23日的“北极星报”上发表了对六家报纸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在这极似威廉·科贝特的卓越的抨击文章的论战艺术杰作中,他逐一反驳了控告,并进而向六个编辑反击,使他们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并对他们表示了傲然的轻蔑。在人民看来,这已足够说明奥康瑙尔是正确的了。本月30日的“北极星报”上援引了在五十多个地方的公开会议上对奥康瑙尔投信任票的总结。可是,奥康瑙尔希望他的敌人能在人民面前反对他。他要求他们出

席在曼彻斯特和诺定昂举行的公开会议,并要求他们当场列举控告的根据。他们中谁也没有出席。在曼彻斯特一个一万多人的集会上,奥康瑙尔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说,轰鸣的掌声淹没了他的讲话,大家都一致表示对他信任。听众太多了,以至除了奥康瑙尔为替自己辩护而亲自出场的大会而外,不得不在广场上另行组织集会,由几个演说家向不能进入会场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讲话。

会议一结束,奥康瑙尔就宣布征集资金并容纳土地共用社会委员会费,当晚就征集了1000英镑(合25000法郎)以上。

次日,奥康瑙尔在诺定昂召开了一个空前盛大的集会,他的演说在人民中引起了同样热烈的反响。

在资产阶级报纸至少成百次的恶意中伤中,奥康瑙尔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屈不挠的爱国者始终沉着应付所有这些攻击,继续自己的工作;而英国人民对他一致信任,就是他的勇敢、坚毅和廉洁公正的最好的证明。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0月30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47年11月1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宪章派为 1847 年选举而 举行的宴会¹⁶⁵

在前天的信中,我曾经为宪章派和他们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辩护,反击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对他们的攻击^①。今天我以极其满意的心情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证实我就两党的性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法国民主派应该同情哪一方面,是同情宪章派呢,还是同情资产阶级激进派:前者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后者连人民宪章、普选权等字眼也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只声明拥护完全选举权¹⁶⁶。

前一个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宴会来庆祝民主舆论在最近几次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当时曾经邀请了十八个激进派代表,但因为这次宴会是由宪章派发起的,所以除了奥康瑙尔以外,这些先生都没有出席。显然,激进派的这种举动使我们有可能预言,他们将如何忠于他们在最近几次选举时所作的诺言。

没有他们出席也行,何况他们还派了一位可敬的代表埃普斯博士出席宴会了。这是一个懦怯的舍本逐末的改良主义者,他对世界上的任何人,除了那些赞成我们的观点的积极而坚毅的人们

① 见本卷第 375—377 页。——编者注

以外,都很温和,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据他自己说,他热望给人民自由,但不希望人民不通过他的帮助而解放自己。总之,这是一个可敬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信徒。

埃普斯博士提议首先为人民的主权干杯,但是他整篇演说中的冰冷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全场的不满,虽然他也讲了几句比较热情的话。

他说:“我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革命的手段争得。法国人斗争了三天,却被骗走了国家的主权。我也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演说争得。讲得少些的人倒做得多些。我不喜欢那些吵闹不休的人,高谈阔论是做不出大事来的。”

向宪章派发出的这些含沙射影的攻击引起许多人的指责。确实也不可能有什么反反,特别当埃普斯博士补充了下面这段话以后:

“人们在工人面前诽谤资产阶级,好象唯一能为工人取得政治权利的阶级并不是资产阶级。(叫声:“不是!不是!”)不是?难道资产者不是选民?难道不是只有选民才能给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以选举权?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当他可能成为资产者的时候却不成为资产者呢?啊,如果工人愿意戒酒,戒烟,那末他们就会有钱进行政治宣传,因而也就会有力量来促进他们的解放……。”

这就是反对奥康瑞尔和宪章派的那些先生们的演说词!

在埃普斯先生之后起来发言的人慷慨激昂地狠狠地驳斥了激进派博士的奇谈怪论,全场不止一次地响起掌声。

宪章派协会¹⁶⁷执行委员会委员麦克格雷斯先生提醒大家:人民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人民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人民恳求别人把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再施舍给他们,那是有损他们的尊严的。

琼斯先生提醒全场：资产阶级是从来不顾人民的。他说，现在资产阶级看到了民主派的成就，所以极力利用他们去推翻土地贵族，打算一达到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的就立即反过来消灭民主派。

奥康瑙尔先生更直截了当地驳斥埃普斯先生，向他提出问题：使国家担负了无力担负的巨额债务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今晚拒绝了人民邀请的不是那十七位可敬的资产者（民主派轻率地投了他们的票）又是谁？不，不，资本永远都不会成为劳动的代表！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一致的感情和利益，那比猛虎和羔羊媾和还难！

“北极星报”的编辑哈尼先生最后提议，“为我们的弟兄，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为他们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中所努力获得的成功干杯！”他说，全世界的国王、贵族、神甫、资本家都联合起来了，愿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也会这样。现在民主势力到处都在迅速发展。在法国，拥护选举改革的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地举行，运动的规模非常巨大，结果必然是良好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指望群众会从运动中得到益处，而法国人所争得的改革也会比我们在1831年争得的¹⁶⁸更进一步。

在整个主权尚未完全归于民族的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在1793年宪法的原则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不可能有民族的主权。

接着哈尼先生叙述了民主派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成就。最后，他宣布他将非常坚决地清除埃普斯先生所发挥的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奇谈怪论。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1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47年11月6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你们的报上最近发表了一篇稀奇的精心杰作¹⁶⁹。这篇作品明确地分成两个部分：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谈到政治措施，那几乎全部是从1791年宪法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换言之，这些措施是向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倒退。在那个时代，整个资产阶级，连小企业主也包括在内，都分享到政权，而现在却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够参政。那末拉马丁先生提出的政治措施的意义何在呢？这些措施的意义就在于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到下层资产阶级的手里，但表面上要使人觉得是把这种权力给予全体人民（他要求两级选举制的普选权，意义就在于此，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而他的社会措施又是些什么呢？有的是一些只有在革命胜利使政权转入人民手中以后才可能实行的办法，例如普遍实行免费教育；有的是纯粹的救济办法，也就是旨在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办法；也有的干脆就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调，象用非常法令来消灭乞丐，通过立法途径来消灭社会的苦难，设立一个民生部等等。可见，这些措施不是对人民一点好处没有，就是仅仅使人民的需求得到一定限度的满足，以便保证一定的社会安宁；再不然就只是一些没有人能够兑现的空洞诺言，——在后两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好处，而且有害。总之，拉马丁先生不论从社会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

来看,都显示出自己是小企业主的,即下层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者。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也具有这个阶级所特有的错觉,以为他是代表劳动者的。在宣言的末尾,他竟愚蠢得向政府呼吁,要求政府支持他所提出的办法。应该知道,现在的大资本家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但是恰恰做不到这一件事。所以,“改革报”的态度完全正确,它肯定了他的良好愿望,同时又指出(虽然是很善意地)他这些措施本身以及他所选择的实施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改革报”写道:“这固然都是些动听的话,显示着一个伟大的胸怀,显示着一种同情正义事业的精神。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颗博爱的心在跳动。这些字句会象柏拉图的格言鼓舞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似地鼓舞我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可是我们现在和伯利克里已相隔甚远,我们是生活在路特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统治时代,换言之,即金钱、本能的恐惧心理和警察三位一体的统治时代;统治着我们的是利润、特权和市近卫军。难道拉马丁先生指望着自己为人民主权和社会友爱呼吁一声,这个利益紧密交织着的同盟,这个由富豪、官僚、垄断机构组成的分离派同盟^①就会缴械投降吗?应该知道,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个支撑着那个,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即使象马康的议员^②所提出的最高超的纲领,只要它带有任何垄断的胎痣(即对权利和平等的封建式的破坏),也将会象夏天的一阵香风那样逝去,象空洞的喇叭声一样沉寂下来。而且正是在目前,当政府完全处于惊恐万状的时刻,这个特权阶级的同盟就结合得特别紧密。

至于他所提出的这套措施,官场及其领袖人物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哲学上的小玩艺,杜沙特尔先生和基佐先生将会置之一笑。如果马康的议员不换个地方寻求武器,募集战士来保卫他的理想,则他至死也只能唱唱高调而不能前进一步!假如他不是向政府呼吁,而是来向人民群众请教的话,那我们就会告诉地,他走的道路错了,他永远不能够使革命、使有思想的人、使人民赞同

① 指瑞士的分离派同盟——七个天主教州结成的反动同盟。——编者注

② 拉马丁。——编者注

他那一套办法——多级选举制、济贫捐和慈善事业。其实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原理在五十年前就出现了。普选权、直接选举、议员年薪,这都是政治主权的基本条件。平等、自由、友爱,这是一切社会机构均应受其支配的原则。可是看一看济贫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则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软弱无力地)否认了平等原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资产阶级那套权宜的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几天以后,拉马丁先生的第二个宣言发表了,这次讲的是法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个宣言里,他硬说法国政府自1830年以来所奉行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范例。他用美丽的词句来粉饰法国政府的卑劣行径,即先煽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举行起义,后来却把它们丢开不管,让它们去受命运的摆布。我们还是来引证“改革报”对这个悦耳的宣言的有力的回答吧:

“我们争取解放的合法的、唯一的手段——为原则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被拉马丁先生拿来做了和平理论的牺牲品,而这种和平理论,在各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钩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只能是软弱的表现,是撒谎,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的刽子手,把各民族的儿女送上绞架的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顾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把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国家淹没在泪水和血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说来,同这个疯狂的刽子手讲和平就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说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癫疯病人而剥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荡子、今天讨好于耶稣会教徒,明天讨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贵族的、充满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刽子手,从本国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

巴黎的其他各报也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示不同意拉马丁先生的纲领。可是他还在自己的报纸,马康“公益报”¹⁷⁰上继续解释这个纲领中的原则。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众议院对他这个新步骤的反应如何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1 月初
载于 1847 年 11 月 13 日“北极星报”
第 525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瑞士的内战¹⁷¹

对于“自由的摇篮”、“泰尔和文克里特的子孙”、森帕赫和穆尔顿城下英勇的胜利者¹⁷²等喋喋不休的赞誉终于说到头了！原来，所谓自由的摇篮不过是野蛮的中心和耶稣会教徒的温床而已；所谓泰尔和文克里特的子孙除了用炮弹以外，是无法用别的道理来开导的；所谓森帕赫和穆尔顿城下的英勇气概则不过表现了坚决反对文明和进步的粗野而迷信的山地种族的绝望情绪而已。

欧洲民主终于要摆脱这个淳朴而反动的旧瑞士赘瘤了，这真是个大幸。民主主义者只要继续标榜这些阿尔卑斯山牧民的美德、幸福和宗法式的朴实，他们就始终带着反动的阴影。现在，当民主主义者支持文明的、工业的、现代民主的瑞士来反对那些古老的游牧州的那种野蛮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民主的时候，他们到处都成了进步的代表；现在，他们连一点反动形象也没有了；现在，他们证明自己已经懂得了19世纪民主的意义。

欧洲有两个地方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古基督教德意志式的野蛮，几乎还以橡实为食料，这两个地方就是挪威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即旧瑞士¹⁷³。挪威和旧瑞士还提供了一个人种的典型，这种人曾经在条多堡森林用道地的威斯特伐里亚方式，即用木棍和打谷棒歼灭了罗马人¹⁷⁴。挪威和旧瑞士都是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

不过民主有各种各样的,而文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最后有必要拒绝为挪威和旧瑞士的民主负任何责任。

一切文明国家中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只有存在着无产阶级,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产生无产阶级并使资产阶级走上统治地位的工业,才可能有这一运动。

这一切无论在挪威或在旧瑞士都不存在。在挪威我们看到非常著名的农民执政(*bonde-regimente*),而在旧瑞士我们却看到,那里虽然有民主的宪法,但是大批无知的牧民却仍然受着阿比贝尔克等几个富有地主的宗法统治。挪威有资产阶级存在,这只是个例外,而旧瑞士根本就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则几乎完全没有。

因此,文明国家的民主即现代的民主跟挪威的民主或旧瑞士的民主都毫无共同之处。前者所力求实行的既不是挪威的制度,也不是旧瑞士的制度,而是和它们有天渊之别的另一种制度。不过我们仍然要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古日耳曼的民主,看一看首先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旧瑞士。

哪一个德国小市民不赞美祖国的解放者威廉·泰尔?哪一个学校的教员不把莫尔加顿¹⁷⁵、森帕赫、穆尔顿同馬拉松、普拉迪、萨拉密斯¹⁷⁶相提并论?哪一个如癡如狂的老处女不梦想淳朴的阿尔卑斯山青年人的结实的小腿和窄小的臀部?从艾吉迪乌斯·丘迪到约翰·弥勒,从弗洛里安到席勒,他们都不断地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过旧瑞士在勇敢、自由、灵活和力量等各方面的伟大。现在,十二个州的大炮和来复枪就是对这些热烈的赞美歌所加的评注。

瑞士那些旧州的居民在历史上曾经两次引起过人们的注意。第一次是他们光荣地摆脱了奥地利的暴政,第二次是现在,他们为了神,为耶稣会教徒和祖国作战。

就是连光荣地摆脱奥地利鹰的魔爪这件事也经不起光天化日下的仔细考察。奥地利王室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只起过一次进步的作用。那是在这王室的经历的初期,当时它和城市小市民结成联盟来反对贵族,并且企图建立德意志君主国。它的进步性完全是小市民式的,但终究还是一种进步。而当时反对它最为坚决的是谁呢?是瑞士旧州的居民。反对奥地利的战斗、格留特利的光荣宣誓¹⁷⁷、泰尔的英勇射击、永远值得纪念的莫尔加顿城下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顽固的牧民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抗,是顽固保守的地方利益对全民族利益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绝的惩罚。

不仅如此。这些强壮而顽固的阿尔卑斯山牧民还很快遭到了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他们摆脱了奥地利贵族的统治,却又落入了苏黎世、琉森、伯尔尼和巴塞尔小市民的牢笼。这些小市民发现,瑞士土著居民就象他们的公牛那样强壮,那样愚蠢。他们加入了瑞士联邦,从此他们就安闲地坐在柜台后面,而顽固的牧民却拿起武器替他们解决同贵族和公爵的一切冲突。森帕赫、格兰桑、穆尔顿和南锡¹⁷⁸的情形就是如此。同时他们还给这些人保留了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于是这些人就幸福得飘飘然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怎样受着亲爱的盟兄们的剥削。

从那时起就很少听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虔诚地循规蹈矩地忙着挤牛奶,制干酪,忙于修身和唱阿尔卑斯山歌。他们有时去参加

民众大会,他们分成了角党、蹄党和其他以动物的特征为标志的集团,而一切事情必须经过基督教德意志式的热烈争吵才能了结。他们贫穷,但却纯洁无瑕;他们愚蠢,却虔诚仁慈;他们粗野,却健壮魁梧;他们缺乏头脑,却有结实的小腿。有时他们的人显得太多了,于是年轻的人们就“踏上征途”(《rei lanfen》),也就是受雇在外国军队里服役,并且不论何处,只要发生事情他们总是赤胆忠心地捍卫他们所服务的旗帜。关于瑞士人,我们只能这样说:为了薪饷,他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很久以来,这些瑞士旧州的强壮的居民就以丝毫没有背弃祖先的习惯而万分自豪;在数百年的岁月里,他们完整无损地保存了祖先的淳朴、纯真、严峻和仁义的风尚。的确,碰上他们的峭壁峻岩和他们的头盖骨这样的花岗石堡垒,要想开化他们,那是千难万难的事。从文克里特的祖先把永远带着安闲的铃声的母牛赶到菲尔瓦尔施泰特湖畔的处女牧场的那一天起,到神甫为文克里特的末代的武运祈祷的今天为止,他们所有的房屋都是按同一方式建筑的,所有的乳牛都是按同一方式挤奶的,所有的发辫都是按同一方式编束的,所有的干酪都是按同一方式制作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按同一方式生育的。这里,在山地还存在着极乐园,这里还没有罪恶。因此,当阿尔卑斯山的纯洁无邪的儿子踏入开阔的世间,虽然立即受到大城市的引诱,受到腐朽文明的脂粉和魅力的蛊惑,受到那些没有山岗却生长谷物的罪恶地方的恶习的诱惑,不过他的纯洁无邪的天性却根深蒂固,使他永远不会遭到彻底的毁灭。只要牧歌的声音触动了他的耳鼓,即使只是那么两个象狗叫似的音调,他也会立刻激动起来,悔恨交集,急忙挣脱诱惑的纠缠,跪倒在老父亲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父亲,我对故乡山地,对你犯了罪,我

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

近代这个淳朴风尚和原始力量遭到了两次侵袭。第一次是1798年法国人的入侵。法国人虽然到处都传播过一点文明,但是在那些旧州他们却毫无成就。那里丝毫没有留下他们的痕迹,他们丝毫也未能动摇古老的风尚和道德。第二次侵袭发生在大约二十年以后,这次至少还产生了某些后果。这次侵入的是英国的旅行者,伦敦的贵族和大地主,接着还有无数的蜡烛商、肥皂商、食品杂货商和旧货商。这次入侵总算结束了古老的好客风气,而那些几乎不知道金钱是什么的牧舍中的诚实居民变成了世上少有的最贪婪狡猾的骗子手。但是,这一进展丝毫没有触动淳朴的古风。这种不十分纯洁的欺骗行为和纯真、勤勉、忠厚、老实等宗法道德一拍即合,亲密无间。甚至他们的虔诚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因为神甫特别乐于饶恕他们欺骗不列颠异教徒的一切行为。

但是,现在这种淳朴看来终于要彻底消失了。可以设想,讨伐的军队将尽一切可能来结束这种原始力量和淳朴风尚。小市民们,你们悲痛吧!那时,虽然贫穷然而却心满意足的牧民再也不会存在了!他们那种宁静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们只有在星期天,在用菊苣制成的咖啡和黄荆叶制成的茶叶做了六天的投机生意以后,才能想望到一点。学校的教员们,你们哭泣吧!你们再也不能希望出现新的森帕赫—马拉松和其他的丰功伟绩了。30岁以上的如癫如狂的老处女们,你们哀怨吧!使你们孤独的梦想变得甜美的六吋粗的小腿再也不会有了,具有安提诺¹⁷⁹般美貌的强壮的“瑞士小伙子”再也不会有了,使你们神魂飘荡一心向往阿尔卑斯山的结实的大腿和紧身裤再也不会有了。寄宿女校的娇弱的小姐们,你们也叹息吧!你们读了席勒的著作就幻想着猎羚羊的敏捷的猎人

的那种纯洁然而倒很现实的爱情，现在你们的柔情的幻想就要破灭，只好阅读亨利克·斯特芬斯的著作和幻想冷冰冰的挪威人了。

够了！要和瑞士诸旧州的这些居民周旋，我们还得用别的武器，而不能仅仅靠嘲笑。民主不仅要清算他们宗法式的德行，而且还要清算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东西。

是谁在 1789 年 7 月 14 日守卫巴士底狱，抗击进攻的人民？是谁从坚固的城墙后面用榴霰弹和枪弹屠杀圣安东郊区的工人？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是泰尔、什陶法赫尔¹⁸⁰和文克里特的子孙。

是谁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保卫路弗尔宫和土伊勒里宫中的卖国贼路易十六，反对人民正义的愤怒？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靠纳尔逊的帮助镇压了 1798 年的那不勒斯革命？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靠奥地利人的帮助于 1823 年在那不勒斯恢复了君主专制？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在 1830 年 7 月 29 日又一次为叛徒国王^①战斗到最后一刻并又一次从路弗尔宫的窗口和廊柱后面开枪射击巴黎工人？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谁又勾结奥地利人以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镇压了 1830 和 1831 年罗曼内起义？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一句话，是谁直到现在还在镇压意大利人，迫使他们忍受贵族、君主和僧侣的沉重压迫？谁是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一只右手？是

① 查理十世。——编者注

谁直到现在还在让嗜血成性的豺狼那不勒斯的斐迪南有可能压制对他切齿痛恨的人民？是谁直到现在还在他进行大规模枪杀的时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仍然是那些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仍然是泰尔、什陶法赫尔和文克里特的那些子孙！

总而言之，在法国，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爆发了直接或间接对民主有利的革命运动，旧瑞士的雇佣兵总是极其顽固地和革命运动对抗到底。特别是在意大利，这些瑞士雇佣兵经常是奥地利最忠实的奴才和帮凶。这真是对瑞士光荣地摆脱双头鹰的魔爪这件事的公正的惩罚！

不要以为这些雇佣兵是他们本乡的废物，他们的同乡抛弃了他们。琉森人在自己城门口就竖起了一座巨大的用岩石雕成的狮子（冰岛人托尔瓦德森的虔诚的艺术作品），这枝利箭穿心、血流不止的狮子仍至死忠诚不渝，用脚掌掩护着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盾。而且这纪念物正好是他们为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路弗尔宫阵亡的瑞士人建筑的。分离派同盟对自己子弟的那种卖身求荣的忠诚，就是这样来表示敬意的。分离派同盟不仅以买卖人口为生，并且对这种勾当赞美不已。

难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能同这类民主有一点共同之处吗！

就是资产阶级也由于他们的工商业和政治制度力图使只顾自身利益的小地区能脱离闭关自守的隔绝状态，互相联合起来，使利益融合为一，打开狭隘的眼界，消除地方的习惯、装束和见解，并使许多至今彼此独立的各个地方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的利益、习俗和见解的大国。资产阶级已经有了相当的中央集权。无产阶级根本不认为自己因此而受到了损害；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中央集权才使

无产阶级有可能联合起来,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发现民主是适当的政治世界观并且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需要资产阶级最初实现的那种中央集权,而且还应当使这种中央集权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行。在法国革命的短时期内,当山岳派执政的时候,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它用榴霰弹和断头台等一切手段实行了中央集权。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就应当不仅使各个国家也都中央集权化,而且应当尽快地使所有文明国家统一起来。

旧瑞士则相反,它的所做所为恰好是反对中央集权。它简直象牲畜一样顽固地坚持与整个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闭塞性。在欧洲中部只有它还保持着原始的野蛮状态,而所有别的民族,甚至连其余的瑞士人也都已前进了。旧瑞士人象野蛮的古代日耳曼人那样,极端顽固地坚持各州的主权,也就是不管邻居如何受害,硬要永远成为愚昧无知、粗野鄙陋、顽固不化和出卖自己的人。说到他们那种动物般的状态时,是指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多数,否定任何协定和义务。但是在19世纪,同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要是彼此互不往来毫不相干地并存是不可能的。激进的各州对分离派同盟有影响,而分离派同盟对激进的各州也有影响,那里有些地方也还有极其落后的东西。因此,激进的各州希望分离派同盟抛弃它那种愚昧顽固和狭隘保守,但是如果分离派同盟不愿意这样做,那末这种固执将必然被暴力所摧毁。目前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因此,现在爆发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民主事业。在激进的各州里也还相当地保存了古日耳曼的那种粗野,那里的民主也还时而意味着农民的统治,时而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时而意味着两者

的混合物 ;最文明的各州也还落后于欧洲文明的发展 ,只有个别地方慢慢地出现了真正的现代化的东西 ;但是这一切决不足以说明分离派同盟是正确的。这个粗暴的古条顿主义、野蛮迷信、宗法式的淳朴保守和谁出钱多就忠于谁的那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最后避难所 ,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消灭。瑞士议会行动得愈坚决 ,震撼这个僧侣的老巢愈有力 ,就愈能得到所有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支持 ,就愈能证明它了解自己的地位。固然 ,五大列强就摆在那里 ,而激进派自身也担着风险。

对于分离派同盟 ,对于威廉·泰尔的这些真正的子孙来说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不得不向奥地利王室——瑞士的真正的敌人求救 ,而且正好是在奥地利已经衰落 ,比任何时候都更卑鄙龌龊、更为可恨的今天。这也是对瑞士因光荣地摆脱双头鹰的魔爪和过分吹嘘这件事而追加的惩罚。就象是要使这种惩罚达到最严厉的地步似的 ,目前奥地利自身尚且难保 ,对泰尔的子孙更是爱莫能助了 !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1 月 10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7 年 11 月 14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91 号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署名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法国的改革运动

在最近一次的两院会议上,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揭发了无数的行贿丑闻,以为这样就会把政府推翻,可是政府仍然熬过了这场风险;臭名远扬的那 225 位议员^①表示“满意”,相信内阁是清白的,这时似乎已经天下太平。而到快要闭会的时候,议会反对派又象会议开始的时候一样,陷入了有气无力、茫然若失的状态。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之流满意了,可是人民并不满意,就连资产阶级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满意。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能不看到,现在的选民越来越变成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铁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顺仆从了,而政府所唯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懂得,如果不扩大选民范围,他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恢复他们 1830 年以来在两院中日益失去的席位。他们知道,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对他们说来是危险的尝试,然而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金融贵族——巴黎交易所巨头——既收买政府又收买两院,眼看着自己的利益遭到公开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末就得忍气吞声,坐待掌握统治权

① 支持基佐政府的众议院多数派议员。——编者注

的金融大王的鲸吞蚕食而走向破产,要末就得大胆地争取议会改革。他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所以,大约四个月以前,反对派的各色各样人物联合起来组织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运动。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公开的宴会,这次宴会是在7月间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的。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所以这次集会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表现得最积极的民主派显然占了优势。他们提出了一项要求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即不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为人民的主权干杯。委员会知道得很清楚,在法国的这个最民主的城市里,没有民主派参加它是搞不起一个象样的示威运动的,于是不得不表示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也曾经刊登过有关这次宴会的详细报道¹⁸¹。这次宴会从各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巴黎民主派实力的一次无比有力的炫示。

“辩论日报”没有放过机会就这次宴会的事情拚命叫嚣。

“怎么没有为国王干杯而且免去为国王干杯这个项目并不是由于粗心大意,也不是由于不懂礼仪——不,免去这个项目是一部分发起人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而提出的要求!看,那位头脑冷静的、安分守己的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和那位卫道者——拥护君主主义的奥迪隆·巴罗先生竟和什么样的一群好货为伍!天啊!这不光是共和主义,这纯粹是闹革命,是宣传动武,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哼!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认得你们,——我们见过你们的血腥罪行的样本,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先生们,五十年前你们这一伙人曾自称为雅各宾俱乐部!”

第二天,“国民报”引用了路易·菲力浦1790年和1791年的私人日记中许许多多的话来回答这家极端温和的报纸的狂吼怒骂。那位当年的“公民小埃加里泰”每天的日记开头写的都是:“今

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讲了几句话，博得热烈的掌声”，“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分配去看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反对派的中央委员会号召自己的同情者在地方上也照首都这样做，到处举行这类支持改革的宴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几乎在法国的各个地方都举行了许许多多的支持改革的宴会。然而并不是各个地方的各派拥护改革的人都能够同样团结一致。在许多较小的城市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势力相当大，他们还能够坚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从而把民主派排斥在门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自由派想把干杯的形式变个样子以便蒙混过去，即变成“为立宪国王和人民主权干杯”。因为这仍旧不能使民主派满意，自由派便又出了一个花招，把“立宪国王”改成“立宪体制”，“立宪体制”当然暗中把王权包括进去了。目前在地方的自由派中间争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在这一点上也让步，不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变相的方法勉强保留为国王健康干杯这个项目，还是公开地和民主派分道扬镳（如果这样，民主派就会单独举行宴会来和他们竞争）因为民主派坚持最初达成协议的条件，要求根本不要把国王牵扯在宴会这件事内；虽然“国民报”派曾一度有些动摇，可是“改革报”派却坚守着共和主义立场。在所有的大城市里，自由派都被迫让步，至于说在比较次要的地区到底做到了为国王的健康干杯，那是因为这些宴会花钱很多，人民自然无法参加。“改革报”就巴尔勒杜克举行宴会一事写道：

“谁要是以为这样的示威活动表明了法国的舆论状况，那他无疑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些示威活动是资产阶级一手包办的，人民则完全被排斥在门外。如果这个运动局限于巴尔勒杜克宴会那样的范围内，那它将会象一切资

产阶级运动一样地烟消云散,例如自由贸易运动在讲过几句空话以后很快就消亡了。”

继巴黎宴会以后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宴会是在9月初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这次宴会带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派色彩,而且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提议为劳动组织干杯;劳动组织这个名词在法国是表示英国全国职工联合会所争取实现的东西,那就是通过把工业的、农业的以及其他的企业的组织起来的道路,使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项组织任务或是由联合起来的工人们自己执行,或是在一个民主政府下由全国人民来执行。

随后举行的是巴尔勒杜克的宴会,这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示威,终席的时候由市长提议为立宪国王(自然是非常赞成立宪的国王!)的健康干杯;此外还有科尔马、里姆斯和莫市的宴会,在所有这些宴会上优势完全在资产阶级方面,他们在这些二等城市中总是能够自行其是的。

可是圣冈丹的宴会又多少带有民主派的色彩了;而9月底在奥尔良举行的宴会则是十足道地的民主派集会。宴会上曾为工人阶级干杯,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了。巴黎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民主主义者马利先生在响应这个提议时讲了话。他开始是这样讲的:

“让我们为工人,为那些一向被轻视、被遗忘的人们,为那些永远忠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保卫祖国免受外国掠夺者侵犯或保卫我们的制度免遭国内敌人破坏的斗争中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死的人们干杯!为那些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带来了七月的日子的人们,为那些行动时威风凛凛,胜利时慷慨大方,具有非凡的勇敢、诚挚和大公无私的品质的人们干杯!”

他的祝词的结束语是“自由,平等,友爱!”能说明问题的是,奥

尔良的宴会是我们所能证实的唯一为工人设有席位的宴会。

库洛米耶、梅仑和康纳的宴会又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集会。“左翼中心”的人物们,即“立宪主义者报”¹⁸²和“世纪报”的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津津有味地听着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之流贩卖改良的小贩子们讲话。在康纳,民主派公开地反对示威运动,因为这里的发起人坚持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在罗亚尔河畔的拉沙里岱的宴会上,也是由同样的狭隘精神占统治地位的。

与此相反,沙特尔的改革派的宴会又完全是民主派的集会。这里不是为国王干杯,而是为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的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为波兰和意大利,为劳动组织干杯。

本星期内,在利尔、瓦朗西恩、阿温,以及在诺尔省全省都将举行这种宴会。可以预期,至少利尔和瓦朗西恩的宴会民主派将占绝对优势。法国南部、里昂和西部也都在筹备着示威活动。争取改革的运动正方兴未艾。

从这篇报道你们可以看出下面一些情况:1847年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派和民主派互相斗争的特点;在一切比较次要的地区自由派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奥尔良、沙特尔,甚至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圣冈丹,却是民主派的势力大;自由派极力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们采取支吾搪塞的办法或者作出让步,而民主派则无论在哪里都丝毫没有放弃过他们同意给予支持的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民主派参加宴会,他们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做法。因此,到头来整个运动毕竟变得有利于民主派,因为凡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公众注意的宴会都清一色地带有民主派色彩。

改革运动得到了在 9 月间开会的省议会的支持,这些省议会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科多尔、芬尼斯特尔、埃恩、摩塞尔、上莱茵、瓦瑟、佛日、诺尔等省份的省议会都或多或少地要求较为广泛的改革,当然没有一个省议会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围。

你们也许要问,那末是要求改革些什么呢?不同的改革方案很多,有多少种自由派和激进派,就有多少种方案。这些要求之中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所谓“饱学之士”[capacities],或者象你们在英国所谓的知识界,即使不缴纳 200 法郎的直接税(在目前,只有缴纳 200 法郎直接税的人才能成为选民)也享有选举权。此外,自由派还有一些多多少少和激进派的建议相吻合的建议,即:

(1)扩大不得兼任的范围,也就是宣布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人不得同时充任议员。目前在众议院有 150 多个受制于政府的官员,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被解职,因此他们完全要看内阁的眼色行事。

(2)扩大某些选区;其中有的选区里选民还不到 150 人,以致这些选民完全受制于政府,因为政府影响着他们地方上的和私人的利益。

(3)一个省所有议员的选举应该由全省选民集中在省会一次进行。这个办法预计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地方利益包容在全省的共同利益之中,从而使政府的舞弊手段和压力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建议降低各级选举的选举资格。这些建议中间最激进

的一个是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小企业主的机关报“国民报”所提出来的，它主张扩大选举权，把选举权给予每一个属于国民自卫军的人。这项措施将会使整个手工业者和店主阶级获得投票的权利，把选举权扩大到象英国改革法案那样大的范围。然而这项措施的后果对法国却严重得多。在这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受大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非常厉害，所以只要一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不得不立刻采取直接侵犯金融大王的措施。我在几个月以前寄给你们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将会一步深一步地卷入这个运动，甚至要和他们自己的意志相违背，他们将必须有所抉择：或是放弃已经取得的阵地，或是公开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是迟早要导致共和国的^①。小资产阶级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一点。这个阶级大部分都拥护普选权，“国民报”派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提出前面讲过的措施，只是把它看做改革道路上的前奏。然而在巴黎所有的日报当中，只有一家报纸除普选权而外什么也不能使它满足，它不是把“共和国”这个词简单地理解为到头来仍使工人阶级象今天一样受穷的政治改革，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改革，并且是毫不含糊的社会改革。这家报纸就是“改革报”。

我们不应该认为改革运动就是法国今天所进行的全部运动。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宴会，不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民主派的，都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奥尔良的宴会是唯一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宴会。在进行这些宴会运动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秘密地、一步一步地进展着，要不仔细观察，就几乎看不见它。但是现在它正在空前地活跃着。这个情况政府是很了解的。所有那些资产阶

① 见本卷第 206 页。——编者注

级的宴会政府都准许举行,但是当9月间巴黎印刷工人请求准许举行一向是每年一次并且毫无政治性的例行宴会时,却遭到了拒绝。政府非常怕工人,连丝毫的自由也不敢让他们享有。它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人民完全放弃了任何闹事和起义的打算。政府盼望人民闹事,而且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挑动闹事。警察们投掷出装有煽动暴乱的传单的小炸弹,炸弹爆炸以后传单就满街乱飞。圣奥诺莱街工厂事件就被用来当作口实向人民进行最野蛮的进攻,以便激怒他们起来闹事和动武¹⁸³。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几万人聚集在街头,他们受到最卑劣的待遇,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以武力回答武力,但是他们忍耐住了,没有让政府从他们那里找到颁布箝制言论自由的新法律的借口。想想看吧,他们对当时的首要任务该有怎样的领悟,该有怎样一致的认识啊!巴黎的人民要拿出多么大的耐性才能忍受这样卑劣的待遇而不进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巴黎工人所表现的这种坚忍的精神就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要知道,巴黎工人在跑上街头的时候,很少不把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起义看成家常便饭而且干起革命来就象上酒馆喝酒一样地高兴。可是,如果你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的革命热情已开始减退,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然而他们从1830年的经验中懂得,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在击溃敌人以后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措施不仅要摧毁资本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摧毁它的社会力量,不仅要保证工人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社会福利。因此,他们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但同时又认真地从事于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

他们知道只有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为一切人的幸福生活打下巩固的基础。路易·勃朗所著“劳动组织”¹⁸⁴一书,只一两个月就在巴黎工厂工人中间销售了6000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以前已经出过5版了。工人们还读了其他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他们组成10—20人的小组,一起讨论这些书籍里面所阐述的各种方略。关于革命,他们却谈得不多,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课题;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们会立刻出现在大街和广场上,挖断马路,把公共马车、运货的和载客的马车都放倒横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到那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象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到那时,奥迪隆·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及其他叱咤风云的自由派人物的末日就要到了;到那时,人民将要严厉地判决他们,正象他们自己今天严厉地判决保守的政府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初

载于1847年11月20日“北极星报”第526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

弗·恩格斯 宪章运动¹⁸⁵

包括有人民党派重要代表人物在内的新选出的议会的开幕，不能不在民主派的队伍中引起轰动。宪章派的地方协会在普遍改组，群众性的集会多起来了；会上提出并讨论了关于行动方法的各种建议。宪章派协会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了这一运动，在告不列颠民主派书中拟定了宪章派在本届议会任期之内将遵循的行动计划。

书中说：“过几天，公然在人民面前自称为英国下院会议的会议就要召开了。过几天，这个仅由社会上一个阶级所选出的会议就要为（损害工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非正义和卑鄙的活动了。

“必须使人民群众一开始就对这个会议行使窃取来的立法权表示抗议。联合王国的宪章主义者，你们是有办法的，你们应该把这套办法拿出来！我们向你们提供一份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新的全民请愿书。把你们千百万人的名字都签上，努力帮助我们把它作为表达民族意志的文件、作为人民对未经他们同意就颁布的一切法律的严正抗议以及作为恢复多少世纪以来就被剥夺了的人民主权的法案提出来。

“但是单凭请愿是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的。诚然，我们把奥康瑙尔先生送进了议会，因而已在那里取得一个席位。民主派的代表们将会把他当做一个机警的和富有活动能力的领袖。但必须使奥康瑙尔得到外部压力的支持，而这个外部压力、这个强大而有力的公众舆论正是应该由你们来造成。我们协会的各地支部都应该改组；所有过去的会员都应该回到我们队伍中来；各

处都应该召开群众大会；各处都应该把讨论宪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切地方组织都应该收集会费来充实我们的基金。积极行动起来，再次拿出英国人原有的毅力，目前开始的运动就会成为我们为取得民主胜利而进行的一切运动中最光荣的运动。”

几乎包括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民主派兄弟协会”¹⁸⁶也决定无条件地公开参加宪章派的鼓动工作。该协会通过如下的决议：

“英国人民只有在自己取得民主统治以后，才可能有效地支援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的斗争；

“我们的协会是为了帮助各国战斗中的民主派而建立的，我们有责任参加英国民主派的斗争，以便取得以宪章为基础的选举改革；

“鉴于以上两点，民主派兄弟协会’誓以全力支持为实现人民宪章而进行的鼓动。”

这个兄弟协会，由于把居住在伦敦的无论英国或外国的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都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就日益具有更大的意义。协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使伦敦的自由派都认为把它同自由贸易派有名的议员主持下的资产阶级万国联盟¹⁸⁷相对比是不无裨益的。以包林博士、汤普逊上校和其他自由贸易拥护者为首的这个新的组织的目的，无非是在仁爱、自由的幌子下来宣传对外贸易自由。但这个组织的成就看来不会很大。它成立六个月以来，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而“民主派兄弟协会”却公然表示反对一切压迫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来自何方。因此，伦敦的（无论英国的或外国的）民主派代表都倾向“民主派兄弟协会”，同时声明说，他们决不为英国自由贸易派厂主们所利用。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1 月 21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7 年 11 月 22 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 “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

自从我发出上一封信^①以来,在利尔、阿温和瓦朗西恩都举行了宴会。阿温的宴会具有纯立宪主义的性质,瓦朗西恩的宴会具有妥协的性质,而在利尔,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的阴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简要地报道一下关于这一重大集会的几件事。

被邀请的除了一些自由派及“国民报”派外,还有“改革报”的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先生和“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生都应邀出席了宴会。资产阶级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奥迪隆·巴罗先生也接到了邀请。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家正要举杯庆祝的时候,奥迪隆·巴罗先生突然宣称,如果不加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革“是用来保证1830年7月所取得的制度的纯洁和真正精神”,他就不能出席,也不能“为议会改革”干杯。不言而喻,这样的补充就会使共和派不得出席。这一举动使委员会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巴罗先生还是坚持己见。最后,大家同意把问题交由本会议解决。但是,会议非常明确地宣称,它不希望议程有任何更改,也不拟破坏民主派据以出席利尔宴会的条件。奥迪隆·巴罗先生同他手下一伙自由派

① 见本卷第394—402页。——编者注

代表和编辑一起傲慢地退席。弗洛孔先生和赖德律-洛兰先生也被请来了；尽管有自由派的阻挠，宴会还是举行了，而且赖德律先生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样，资产阶级的改革派的奸险阴谋破产了，民主派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奥迪隆·巴罗先生不得不可耻地躲藏起来，再也不敢在民主的城市利尔露面。他用来为自己辩解的唯一论据是：他似乎知道“改革报”的先生们有意利用利尔的宴会来搞革命——在这升平盛世！

过了几天，在阿温的只不过是几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家庭宴会上，巴罗先生算得到了一点安慰。这里，他高高兴兴地为国王干杯。可是在瓦朗西恩他又因为遭到了跟他在利尔宴会上所遭到的同样命运而不得不把他那心爱的祝贺之杯收拾起来。虽然那些随时都能制造革命的可怕人物并没有出席瓦朗西恩的宴会，但是人们却没有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处处碰壁的大人物只得克制自己高尚的愤慨，除非让他再有可能在别的幽静的宴会上当着某个小城市的吃惊的食品杂货商和蜡烛商咒骂“无政府主义”，“暴力”和“共产主义”。

利尔的宴会在报界引起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论战。保守派的报纸因改革派内部发生分歧而欢天喜地。梯也尔先生的陈旧而乏味的“立宪主义者报”和巴罗的“私人”报纸“世纪报”突然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中。

“世纪报”恼羞成怒，向着自己的听众，小店主们大声喊道：“不，不，我们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毫无关系，我们和这些主张恢复恐怖统治的人，这些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信徒毫无共同之处。即使现今的制度再坏百倍，我们也宁愿选择现今的制度而不要他们的血腥统治！”

完全正确！白色睡帽比之雅各宾党人的红色帽子更百倍地适合于这些和平的食品杂货商和腊烛商。同时，这些报纸一方面对“改革报”进行卑鄙恶毒的谩骂，一方面对“国民报”却又毕恭毕敬。的确，“国民报”的态度因而也就暧昧到了极点。在康纳举行宴会时，这家报纸就已经对许多由于席间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不愿出席的民主主义者的行为加以责难。现在它对利尔的宴会又非常冷淡并对使这次示威暂时发生混乱的事件表示遗憾；而“国民报”的许多外省的同盟者公开批评赖德律和弗洛孔先生的行为。因此，“改革报”要求该报更明白地表示态度。“国民报”宣称它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于是“改革报”就问：在利尔的令人遗憾的事件是什么意思？你们感到遗憾的是什么？你们是对巴罗先生的行为感到遗憾呢还是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行为感到遗憾？你们是对巴罗先生的狂妄行为感到遗憾呢还是对他的失败感到遗憾？也许，你们对赖德律先生为保障普选权所作的演说感到遗憾吧？或者，是因为君主主义的失败和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感到遗憾吧？你们是否同意你们外省的同盟者在这一个问题上所说的话呢？你们欣赏“世纪报”的赞扬、赞成它对我们谩骂吗？假如奥迪隆·巴罗先生在奥尔良提出类似的要求，你们会劝告你们的朋友马利先生屈从吗？“国民报”回答说，为党着想，它将避免和“改革报”论战，并且对它的一个“朋友”发送给外省各报的文章将不负责任；至于其他一些问题，“国民报”的过去可以允许它置之不理，不必予以答复。“改革报”引用了整个答复，仅附有一点说明：“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现在，民主派的面前有许多文献，他们可以自行判断一切。他们是这样做了。法国大多数激进派报纸，甚至自由派报纸，都以最断然的措词表示赞成“改革报”。

毫无疑问，“国民报”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这家报纸愈来愈听命于资产阶级了。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它总是在紧要关头背叛民主事业，它不断宣传同资产阶级缔结联盟，而且屡次都是专为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服务。要是“国民报”不立即改变自己的做法，那末，人们将不再认为它是民主派报纸。在这次利尔事件中，“国民报”仅仅由于对那些比它自己更有激进倾向的人的个人敌意，就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为组织宴会而和自由派所缔结的同盟的基本原则。在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报”再也不能在以后的宴会上坚决反对为国王干杯。“国民报”的“过去”也并不怎么光彩，要对同行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那是不行的。这只要想一想它如何为巴黎的那些堡垒¹⁸⁸辩护就够了。

附启：本星期在戎举行了改革派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1300人。这是真正民主派的宴会。自然，根本没有为国王干杯。所有演讲的人都属于“改革报”派。其中主要的有路易·勃朗，弗洛孔，埃·阿拉戈和赖德律-洛兰先生。“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生举杯为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祝贺，同时还以最大的敬意评论了英国的宪章派。下星期我将要寄上他演说的全文，并对这一重大的集会的总的进行情况作一全面的报道¹⁸⁹。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底

载于1847年12月4日

“北极星报”第52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5年的“历史问题”第11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论 波 兰¹⁹⁰

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
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
国际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的演说

各民族团结友爱,这是目前一切党派,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最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

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

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其所以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你们,宪章主义者,不应该仅限于表示有解放各民族的善良的愿望。粉碎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有权感到自豪,是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恩格斯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今天作为一次例外,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讲几句话。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对波兰的解放是特别关心的。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取得利益,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里西亚和波兹南。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波兰和德

国之所以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原因就在于此。我也认为,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进行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促使民主主义获得胜利,欧洲各国求得解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这个斗争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因为对方阵营里的一切压迫阶级也由此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独揽大权的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受资产阶级庇护的。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日益临近了。消灭过去分隔工人各个阶层的那种利益分歧,使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均衡,这一切你们均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的现状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状况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使这一状况均等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目前都关心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均衡,各民族工人党派利益的一致,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

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

载于 1847 年 12 月 9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9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弗·恩格斯 纪念 1830 年波兰革命¹⁹¹

亲爱的公民！

我昨晚来到这里，正巧赶上了纪念 1830 年波兰革命的群众大会。

我曾参加过不少类似这样的集会，但从未见到象这样热情洋溢，在不同民族的人们中间这种开诚相见畅所欲言的和谐气氛。

英国工人阿诺特先生被推选为主席。

第一个发表演说的是“北极星报”编辑厄内斯特·琼斯先生。他虽然抨击了 1830 年起义时的波兰贵族的行为，但是对于波兰为挣脱压迫者的桎梏所作的努力却是热烈赞许的。他的卓越有力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他讲完后，米歇洛先生用法语发表了演说。

接着发言的是德国人沙佩尔先生。他通知会议说，布鲁塞尔的民主协会¹⁹²已派遣一个副主席、德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先生到伦敦来安排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和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之间的通讯联系，同时筹备召开欧洲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

当马克思先生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会上发出了不绝的掌声。

马克思先生用德语演说，由沙佩尔先生翻译。马克思先生宣称，波兰解放的信号将由英国发出。他说，只有当西欧的文明国家

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时候,波兰才会自由。而在这些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民主运动是力量最强,为数最多,最具有全国性组织规模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点,所以这两个社会阶级间的决战,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正是在英国最有可能开始这场战斗,它将以民主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告终,同时波兰的桎梏也将在这场战斗中被粉碎。欧洲其他民主派的成功将取决于英国宪章派的胜利,所以,波兰也将赖英国而得救。

“北极星报”的主笔哈尼先生接着向布鲁塞尔的民主派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一开始就同伦敦的民主派联系,而对伦敦的万国联盟中资产阶级的讨好丝毫不予理睬。这个联盟是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其目的是为了自由贸易的利益而利用外国的民主派,并为了同几乎全由工人所组成的“民主派兄弟协会”进行竞争。

其后发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先生,他宣称,德国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因为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暴政正部分地扩展到波兰。德国民主派应该把推翻有辱德国的暴政看做自己的绝对责任。

来自列日的特德斯科先生说话坚毅有力,他感谢1830年波兰战士们公开宣布了起义的英勇行为。他的演说由沙佩尔先生翻译,不时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查理·基恩先生作了简短的演说后,奥博尔斯基上校代表波兰人致答词。

最后发言的是英国工人威尔逊先生,还在不久前,由于他的坚决反对,差一点没有把万国联盟的大会解散了。

经哈尼和恩格斯两先生的提议,会议以三阵爆裂般的掌声向

欧洲三大民主主义的报纸——“改革报”、“北极星报”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致敬；经沙佩尔先生的提议，三次高呼反对三家反民主主义的报纸——“辩论日报”、“泰晤士报”和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高唱“马赛曲”，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1 月 30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7 年 12 月 5 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驳阿·巴泰尔斯¹⁹³

阿道夫·巴泰尔斯先生说他的社会生活结束了,并且他真的完全钻进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去了。每当某种政治事件发生时,他只是表示抗议和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与事件无关,他巴泰尔斯先生并没有参加运动,运动是违反他巴泰尔斯先生的意志而发生的,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不予最后批准。谁都会承认,参加社会生活采取这种方式或采取其他任何方式是没有丝毫差别的,所有这些宣言、声明、抗议,只是以私人的谦虚的外表把社会的人掩盖起来了。无人了解和无人承认的天才正是这样来显示自己的。

巴泰尔斯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各国民主主义者在组织这个称为民主协会的团体时,目的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和在能够团结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谊的原则方面达到互相了解。在抱有这种目的的协会中,一切外国人的责任当然有义务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每逢他们为履行其所加入的协会的义务而发表意见时,就称他们为老师,那就实在太可笑了。阿·巴泰尔斯先生之所以指责外国人喜欢教训一切人,只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听他自己的说教罢了。

毫无疑问,阿·巴泰尔斯先生还能记得,他甚至在临时委员会中(他是委员之一)建议把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⁹⁴作为新协会的核心。当时我不得不代表德国工人拒绝这个建议。阿·巴泰尔斯先生是不是想乘机为我们设下圈套以便将来自己可以告密呢?

当然,巴泰尔斯先生可以随意骂我们的观点“卑鄙和野蛮”。

他没有批评,没有论证,却来指责,并且忙于指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以表现自己的正统性。

我们比阿·巴泰尔斯先生更善于容忍,我们可以原谅他那一点也不得罪人的“臆想症”。

阿·巴泰尔斯先生与其说是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神政论者,因此他以“布鲁塞尔报”¹⁹⁵为自己的同盟者,是十分自然的。这家报纸责备我们打算“改良人种”。请它放心吧。幸而我们德国人不是不知道,从1640年起“宣传信仰协会”¹⁹⁶就独占了改良人种的权利。我们太浅薄,太渺小,不配在这仁爱的天意方面和可敬的神甫们竞争。请他们费神去比较一下“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的报道吧,他们定会确信,所谓“宪章派……你们将被当作人类的救世主而受到欢迎”¹⁹⁷等话,完全是出自“北极星报”的错误而强加于我的。

“布鲁塞尔报”在更为慈善的心肠的驱使下,向我们提起阿那卡西斯·克罗茨企图比1793—1794年的爱国志士更爱国而丧命于断头台的例子。在这方面,可敬的神甫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从来就不比爱国志士更爱国,相反地,他们随时随地都遭到谴责,说他们力图比反动分子更反动,而且更坏的是他们力图成为比本国政府更道地的政府。当我们想到不久以前他们在瑞士的惨痛教训时,我们承认,他们为了使我们避免另一极端和防止类似的危险而向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是出于早期基督徒的那种可贵的好心肠,为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卡·马克思写于1847年12月17日左右

用法文载于1847年12月19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卡·马克思 拉马丁和共产主义

布鲁塞尔 12 月 24 日。法国报纸又登载了拉马丁先生的信。这一回谈的是共产主义,是诗人兼社会主义者被卡贝所迫最后直率地倾吐出来的。同时,拉马丁答应在最近的将来要充分地研究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过目前他还满足于某些简短的神论格言。

他说:“我对共产主义的见解,可以简单地用感觉(!)来表达,那就是:要是上帝委托我教化一群野蛮人,使他们都成为文明人,那末,我要给他们制定的第一个制度就是所有制。”

拉马丁先生继续说:“人把许多东西占为己有是一种自然规律和一种生活条件。人在呼吸时就把空气占为己有,在活动时就把空间占为己有,在耕种时就把土地占为己有,在繁衍种族时甚至就把时间占为己有;所有制是宇宙中生活原则的组织,而共产主义却会使劳动和全人类毁灭”。

拉马丁先生最后安慰卡贝先生说:“你的幻想对我们这个世界说来是过分美好了。”

拉马丁先生就是这样反对共产主义的。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而且拿起武器来捍卫“私有制的万古长存”。因为他的“感觉”告诉他三种东西:(1)所有制可以教化人们;(2)所有制是宇宙中生活原则的组织;(3)所有制的对立面,共产主义,对这个腐败的世界说来是过分美好的幻想。

毫无疑问,拉马丁先生“感觉”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生活原则”是按别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上,“占有”终究是生活的条件。

我们没有必要借分析拉马丁先生的模糊感觉来揭露他特有的矛盾。我们只指出一点。拉马丁先生提出,所有制根本就是从野蛮状况到文明状况的过渡阶段,并解释说,所有权是进行呼吸和生儿育女过程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社会现存的私有财产的先决条件。他以为这样就证实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万古长存。

拉马丁先生正象没有看到“占有”空气和“占有”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别一样,没有看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区别,就象两个时代都是“过渡时代”一样,反正两者都是“占有”!

毫无疑问,拉马丁先生在他那反对共产主义的“充分的”论战中一定会发现有可能从他的“感觉”所产生的这些一般词句里“合乎逻辑地”引伸出一系列更为一般的词句。那时,也许我们也有可能来“更加充分地”研究他的词句。可是目前我们却只想把天主教君主主义报纸用来同拉马丁先生的感觉相对峙的那种“感觉”转告我们的读者。例如,昨天的“君主同盟报”就发表了反对拉马丁先生的感觉的意见:

“我们看到这些人类的启蒙者是怎样使人类失去领导者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夺去了穷人借以安慰自己的上帝;他们夺去了穷人的天;他们只留下一个贫穷和困苦的人。接着他们又过来说:你想占有土地;土地不是你的。你想过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是别人的。你想得到一份财产,这是不可能的,管你贫困,管你赤身露体,管你颠沛流离,死了活该!”

“君主同盟报”用上帝来安慰无产者。“公益报”,即拉马丁先生的报纸却用“生活原则”来安慰他们。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12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7 年 12 月 26 日“德意志—布
鲁塞尔报”第 103 号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弗·恩格斯 “改革报”和“国民报”

利尔的宴会引起了“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论,使得两家报纸现在已彻底决裂了。

事实是这样的:

在为改革而举行的宴会运动开始以后,“国民报”就比以往更为露骨地倒向王朝反对派¹⁹⁸。在利尔,“国民报”派的德若尔日先生同奥迪隆·巴罗一起退出了宴会。“国民报”本身对利尔宴会的意见是异常含糊的。当“改革报”要求它更直率地说个明白时,它就借口不希望同这家报纸论战而拒绝了。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拒绝说清事实真相的理由。总之,“改革报”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最后它向“国民报”的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涅-帕热斯开了火,因为他在一次演说中否定了阶级的存在,并用 *citoyens français*(法国公民)这种笼统的说法抹煞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到这个时候,“国民报”才终于声明说,它要保护自己的朋友,不让报纸诬蔑所有象卡诺、加尔涅-帕热斯那样正直的爱国人士。

不久,“国民报”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失败,于是它除了责备“改革报”宣传共产主义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了。

“你们让什么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那些模糊的意图、理论和体系,你们谴责我们,说我们公开攻击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共产主义意图。好,那你们就

直截了当地表明吧：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要大声地宣称：我们和共产主义者（那些否定财产、家庭、祖国的人）毫无共同之点。一旦发生战斗，我们不会同这些心怀叵测的人站在一起，而是要反对他们。我们和这些可怜的空想是没有和解可谈的，我们对它，对这种把人变成畜生、把人贬到野兽状态（le r éduit à l' état de brute）的荒谬而残忍的（sauvage）体系是不能宽容的。你们以为人民会和你们在一起么？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们辛辛苦苦赚到的一点财产，抛弃家庭，抛弃祖国呢？你们以为人民总有一天会相信，无论是奥地利使我们屈从它的专制制度或是法兰西为列强所瓜分，对他们说来反正都是一样么？

“国民报”不仅提出了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而且还提出了它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邮政改革、财政改革、奢侈品税、国家礼助金、废除入市税¹⁹⁹、自由竞争。

“国民报”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想法是不值一驳的。滑稽的只是，“国民报”仍然用什么“列强”侵犯法兰西的经常威胁这类话来吓唬人，仍然以为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那边有千百万的刺刀对看法兰西，千百万大炮瞄准着巴黎。对于这一点，“改革报”回答得完全对，它说：在国王们侵犯的情况下，能保护我们的将不是巴黎的堡垒，而是人民自己。

“改革报”在回答上面所引用的“国民报”的文章时声明说：“

我们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者，正是由于共产主义没有重视生产的规律，也没有考虑到有必要为全社会生产足够的东西。但是，共产主义者在经济方面的建议，对我们说来，比那无条件地接受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国民报’的建议要接近得多。我们今后仍然要保护共产主义者，使他们不受警察和‘国民报’的迫害，因为我们承认他们至少有权自由辩论，因为工人自己的学说永远值得注意。”

我们感谢“改革报”，因为它如此刚毅地反对“国民报”，捍卫了真正的民主。我们感谢它，因为它在同这家报纸的斗争中保卫了

共产主义。我们很满意地指出,当政府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它总是为他们辩护。当德朗格尔先生通过法庭迫害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²⁰⁰的时候,所有巴黎报纸中只有一家“改革报”起来为他们辩护,卡贝先生则差点没有出来替政府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行为辩护。使我们高兴的是,共产主义目前虽然还不十分发展,“改革报”却已看到其中包含着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自己更相近的东西。然而,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够向“改革报”证明,它们捍卫的原则比起法国人迄今所熟悉并部分地传播到国外的那种共产主义,倒更接近于我们所捍卫的共产主义。

其实,“改革报”对“国民报”的指责,只是表达了在德国、英国和比利时民主派中,一句话,除法国以外在所有民主派中早已形成的意见而已。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2 月底
载于 1847 年 12 月 30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0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

“北极星报”在报道第戎宴会的时候批评了路易·勃朗先生的演说,我们完全同意这一批评²⁰¹。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我们转载“北极星报”的意见,是为了表示我们也反对那些偏见和幻想,这些东西和现代民主主义的愿望是截然相反并完全敌对的,因此,如果希望各国的民主主义者的团结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就应当摒弃那些偏见和幻想。

勃朗先生在第戎宴会上说道:

“我们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一点上迷失方向。我们思想,我们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法国,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法国的将来就是全人类的将来。其实,我们所处的地位是非常优越的,我们一方面仍然是属于本民族的,一方面却又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且我们身上世界主义的成分要比民族的成分强。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同时又想做一英国人,那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英国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向就是为了利己主义而反对《fraternité》[“友爱”]。同样,法国人如果不想同时做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也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法国除了让有利于全世界的思想获得胜利之外,永远不会让别国的思想占上风。可敬的先生们!在十字军远征,欧洲进军夺取圣墓的时候,是法国卫护了这一进军。以后,当天主教神甫打算强迫我们套上教皇最高权力的枷锁的时候,是教皇权限制派的主教们捍卫了信仰自由。是谁在旧君主制的末日里支持了年轻的共和政体的

美国是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我所说的话对君主政体的法国来说都是正确的,那末对共和政体的法国来说又怎么能不对呢?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在本国的疆土上和刑场上流尽了鲜血,但为了巴达维亚弟兄们,却仍然不惜流血牺牲,历史上哪里能找到哪怕有一点类似这种惊人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的例子啊!无论在失败的时候或是在胜利的时候,法国天才的光芒总是照耀着一切甚至连敌人也包括在内!让欧洲开拔十六个集团军来进攻我们吧,我们将以自由来回答欧洲!”

关于这一点,“北极星报”说道:

我们完全不想抹煞法国革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也不想减少全世界对共和国伟大活动家应有的谢意。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上述引文以世界主义的观点来比较法国和英国的地位,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根本否认强加在革命前的法国身上的世界主义的^①性质。路易十一和黎塞留的时代就是明证!路易·勃朗先生对法国所说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法国除了让有利于全世界的思想获得胜利之外,永远不会让别的思想占上风。”但是,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同于法国或可能不同于法国的国家,勃朗先生在世界上是连一个也举不出来的。就以勃朗先生用来直接和法国对比的英国为例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们认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就是这样!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末,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谁呢²⁰²?法国曾经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参加了一定的斗争,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基础的又是谁呢?是英国,就

① 这里所用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等不是指路易·勃朗演说中遭到本文批判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里是“全人类的”、“摆脱民族偏见的”等意思。——编者注

是这个英国 如果说 ,法国支援过美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放斗争 ,那末早在二百年前 ,英国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兰共和国。如果说 ,法国在上世纪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 ,那末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事实 :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做出了这个榜样 ,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向英国学习呢。至于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阐明的那些思想 ,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 我们决不能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利舍夫茨别利的法国继承者比他们的先辈更为出色便忘了他们的先辈 !

勃朗先生肯定地说 ,“英国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 ,那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

那又有什么呢 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应当否定本国的历史 ,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负任何责任。法国人还是不要在其他各国的民主主义者中间标新立异吧 !不要为他们过去的国王和贵族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吧 !因此 ,勃朗先生认为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缺点 ,我们倒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大优点 ,那就是他们应当抛弃过去而只展望将来。

勃朗先生说 ,“法国人必然是世界主义者”。是的 ,只要在法国的影响 ,法国的道德、风尚、思想和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 ,就的确如此 !只要在每个民族都习染了法国民族性的世界里 ,就的确如此 !然而 ,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决心抛弃本民族的粗卤的一面 ,同时希望法国人也能这样做。他们非常不满意法国人的武断 :既然是法国人 ,就自然是世界主义

者。这样的武断等于要求所有别的人都成为法国人。

我们拿德国来做比较吧。德国是印刷机等许多发明的诞生地。德国产生的卓越思想和世界主义思想比法国和英国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实际上,德国却总是受到侮辱,总是陷于失望。德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说明,法国的世界主义究竟是什么。法国可以埋怨英国政策的背信弃义,可是德国也同样领略过法国从路易十一到路易-菲力浦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如果我们采用了勃朗先生的标准,那末德国人就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然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奢望。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2 月

载于 1847 年 12 月 30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0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宪章派的鼓动

议会开幕以后,宪章派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他们准备请愿书,召开群众大会,派专人到全国各地。除了有大批人签名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民请愿书(这次可望征集到400万人签名)之外,另有两个关于宪章派的土地共用社的请愿书刚刚才提交人民裁夺。其中第一个请愿书由奥康瑙尔草拟并发表于本周“北极星报”,内容大致如下:

“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可敬的议会代表。

诸位先生!

我们这些签名的人是宪章派土地共用社社员,按地位是工人,我们考虑到,用我们劳动果实来进行无止境的投机、无限制的竞争和机械生产资料的不断增加,已使我们的劳动到处都丧失了销售市场;

随着机械生产资料的增加,手工劳动减少了,工人失去了工作;

由于你们最近通过关于暂时停止铁路工作的决议,成千上万的工人将失去工作,充斥劳动市场,厂主则可借此而再次降低早已多次降低了的工资;

但是,我们只求有可能靠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生活;

我们反对任何种类的济贫捐,认为这是侮辱,这种措施只是使资本家掌握一批后备军,他们随时都可以把这批后备军抛入劳动市场,利用工人相互间的竞争来降低工资;

要是工厂工业已不能给它所产生的广大无产者以工作,农业生产却还有供我们运用劳动的广阔场所,因为在适当耗费劳动的情况下,我国土壤的肥

沃程度至少能增加四倍,那是已经证明了的;

因此,我们建立了能获得一定土地的共用社,以便我们每一家都能在这些土地上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既不增加教区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负担,也不必去参加竞争从而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资;

监于以上各点,我们在这一请愿书中吁请你们诸位先生,颁布一条免除土地共用社印花税以及砖瓦、建筑木材和其他材料税的法律,并批准即将提出的有关法案。”

这一法案也是奥康瑙尔起草的,最近即将由他提交议会讨论。

第二个请愿书要求把属于教区的荒地还给人民。三十年来大块大块地卖给大所有者的这些土地,应根据请愿书提出的要求分成小块出租或以优惠条件卖给当地工人。这个请愿书是在伦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因为奥康瑙尔忙于议会事务没有出席,在大会上为请愿书做解释的是“北极星报”的编辑哈尼先生和琼斯先生。不久以前这请愿书又在诺里奇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被通过了。在这次大会上,英国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琼斯先生再次起来为请愿书作了解释,发表了一篇无可辩驳的出色的演说。

最后,全民请愿书不久前便在伦敦的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这次会上发言的主要是基恩先生、沙佩尔先生(德国人)和哈尼先生。后者的演说以其民主派的气魄而显得特别突出。

他说:“我们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无非是为无耻的寄生者和骗子手的利益服务的一大堆虚伪和欺骗。

“请看看教会吧。一方面大主教和主教领高额的薪水,另一方面牧师(教会的劳动者)一年才只有几英镑。千百万英镑是以什一税的形式从人民那里勒索来的;这种什一税过去主要是用来维持教堂和救济贫民的;现在作为这方面开支的已有特别税,而教会却把全部什一税都装到自己的衣袋里去了。我请问你们,教会不就是有组织的欺骗么?(鼓掌)

“请看看我们的下院吧。那里所代表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贵族和资产

阶级；它把我国^{6/7}的成年男子从政治上沦为奴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这种下院不就是合法的欺骗么？（掌声大作）

“请看看这些可敬的勋爵吧。他们对全国人民的绝望的呼声置之不理，却在每晚的例会上冷静地等待下院送特别法草案给他们。谁能告诉我，这种养老院对不可救药的人有什么好处，谁敢起来为这种传统的欺骗辩护，你们中能找到这样的人么？（掌声）

“自然，为了尊重君主制，即尊重我们祖先的英明的光辉的象征，我只能用最忠顺的话来评论象维多利亚女王那样有趣的女人，她每年按时生产一篇女王演说和一个至尊的婴儿。（笑声）女王演说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至于那个婴儿，如果可以相信报纸的话，到明年三月我们就有了。陛下广施仁政，体察民情，赞扬人民耐心，俯允再生一子。咳！她在这一点上从来也不食言！（笑声大作）其次，我们还有一位阿尔伯特亲王，他能发明新式女帽，养肥猪，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元帅，就因为这些功劳他每年得到8万英镑的报酬。啊，公民们，不是的，君主制决不是欺骗。（笑声，鼓掌。）”

演讲人把官方社会的情景同人民疾苦的情景作了对比，最后他建议与会者通过要求实现宪章的全民请愿书。请愿书获得一致通过。等请愿书传到全国各地以后，邓科布先生就会把它递交下院。一俟原文到手，就把译文寄给你们。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底
载于1847年12月30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
“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
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
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
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
“改革报”和“国民报”

法国的两院会议已经开幕了,很快我们将有幸知道争取改革的运动对那 225 位“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将会知道他们对基佐在瑞士问题上使法国成为全欧洲笑柄的这种做法是否也同样满意。然而这些肥头硕脑、贿赂往来、投机倒把、招摇撞骗、吸人膏血、胆小怕事的多数派议员恰恰是一些连这种事情也能忍在肚里的人;当帕麦斯顿为雪西班牙联姻问题之耻而玩弄自己可尊敬的同僚基佐²⁰³时,他们却表示“称意”,竟能宣称法国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伟大、这样光荣、这样可敬、这样“满意”。

恰好目前所有的巴黎报纸,从“辩论日报”起以至“改革报”,都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公开地议论着一旦路易-菲力浦死去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辩论日报”担心多数派议员中间发生分裂,所以它每天都向他们发出警告说,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无论在什么

时候发生,都会成为所有政党大会师的信号;“共和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会从地洞里冒出来,到处散布灾难、恐怖和毁灭;除非秩序之友(自然是基佐先生那一伙人)严厉地压制这些思潮,否则法兰西必趋灭亡,自由、安全、财产都将毁灭,这个危险的时刻随便在哪一天都可能到来;如果不帮助基佐先生保住他的位置,那就一切都完了。而其他的报纸——“新闻报”、“立宪主义者报”、“世纪报”——则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它们说将来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到国王死去的时候,这个卑鄙下流的贪官基佐还没有为这三家报纸各自的政治人物所代替,即为德·日拉丹先生、梯也尔先生或奥·巴罗先生所代替,流血革命的恐怖将会笼罩全国。激进派报纸,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从另外一种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

可见,就连“辩论日报”也间接地承认了“满意的”法国只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来证明自己的不满,其方式将会象惊恐万状的“辩论日报”的资产阶级本能在吓昏头脑的情况下所胡思乱想的那样。然而这对那 225 位“满意的”议员说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如果人民满意,那自然没有理由改变现存制度。而如果人民不满意,那正说明有必要更加巩固这个制度,因为只要稍一退让,就会使充满恐怖的革命突然爆发。不管怎样,这些资产者总会做出一个结论,即他们是国家的最好的统治者。

可是基佐还是打算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他想把“鲍学之士”,也就是一切持有大学学位证书的人——律师、医生以及诸如此类的骗子都列为选民。真正是了不起的改革!然而,这却足以解除“进步保守派”(或者叫做“保守反对派”,这是他们自己今天所用的名称,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可做,于是就每三个月把名称改变一

下)的武装。这个方案同时还能够打击梯也尔先生。梯也尔先生一面派遣自己的亲信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去参加改革派的宴会,一面偷偷地准备自己的改革方案,他指望借此在两院中一鸣惊人,而他这个改革方案却和他的对手基佐现在所要提出的一模一样。

看来在两院中总要有了一番哭喊吵闹;但是我并不认为基佐先生真的会担心他的忠实的 225 位议会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官场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改革派的宴会以及“国民报”和“改革报”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反对派联盟,即左翼中心(梯也尔先生那一派人)、左派(奥迪隆·巴罗先生那一派人)和“明智的激进派”(“国民报”),在加斯特尔、蒙彼利埃、纽堡和其他一些地方举行了宴会;极端民主派(“改革报”)则在沙隆举行了宴会。蒙彼利埃和纽堡的宴会上主要演说者是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几年前故去的一个著名民主主义者[○]的兄弟。可是小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根本不象他的哥哥;他丝毫没有象那位已故的法国民主派领袖所借以获得如此显要地位的那种毅力、那种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在纽堡,小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发表了一连串武断的言论,这些言论说明他对于社会的实际状况根本一无所知,因而对于改善社会状况的方法也全然不懂。尽管全部现代民主主义都是以下面这一最重要的事实为出发点的:现代社会已无可挽回地分裂为两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的资产阶级和除去唯一的生活手段即劳动而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后一个阶级受到前一个阶级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尽管世界各国现今的民主派的

○ 埃蒂耶纳·约瑟夫·路易·加尔涅-帕热斯。——编者注

众所公认的意图是要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因为后者在人民之中是占压倒多数的——尽管如此，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却不愿这一切事实，竟妄自断言，在现实中人们根本没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分；他说这不过是基佐先生为了在人民中间制造分裂而恶意捏造出来的东西；他说他和基佐先生相反，认为所有法国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全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在法国只存在着法兰西公民！那末，照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说法，资产阶级垄断全部生产工具，听凭无产者受工资经济规律的摆布，工资规律把工人所得减少到最少的一点点食物，这也是基佐先生捏造出来的了！现在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里都进行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殊死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同盟、工联、暗杀、暴动和流血起义等不同的阶级，在里昂、普累斯顿、兰根比芬、布拉格被枪杀的无产者²⁰⁴就证明了这种斗争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斗争，照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说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只不过是一位法国教授的谎言罢了！这就是说，“让资本家继续垄断全部生产力，让工人照旧靠极少的几个钱去过活；但是为了补偿他所受的苦难，我们赠之以公民的称号”。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话除了这样一种解释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不错，在某些情况下，而且附上某些保留条件，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或许也会同意给人民以选举权；但只是不要让他们妄想利用这个礼物采取一些根本改变现行的物质财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措施，即迟早会把全国的生产力交付到全体人民手里并把所有的“雇主”都一律打倒的措施！“改革报”把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叫做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是完全正确的。

极端的民主派，我前面已经讲过，只举行了一次宴会，但是声

势浩大,这一个宴会抵得过联合党派的十几个宴会。在索恩河畔的沙隆出席宴会的有两千多个公民。“国民报”派也被邀请,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出席。因此“改革报”的代表们就成了这一场合的全权主人。被“国民报”指为极端民主党的领袖的赖德律-洛兰先生,在这里就担当起这个角色。他把1789年以来法国民主发展的各个阶段做了一个出色的简要介绍,来说明自己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党的态度。然后,他反驳了“国民报”对他的攻击,他自己又反过来抨击这家报纸并建议成立一个由全法国各个地方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两派各出同等数目的代表)来解决“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吵。他说:

“法国民主派在解决了这一内部问题以后,如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派建立关系,那将是一件不坏的事。目前在欧洲,在一切备受压迫、受苦挨饿的人们中间,正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现在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撑腰打气,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时候了。让我们来召开一次世界各国民主派大会,而且就是在现在,在君主们的大会已经垮台的时候召开!在欧洲有一个共和国,它是刚刚在自己土地上取得了民主胜利的,这个国家就是瑞士,它是一个有资格在自己的自由土地上接待世界各国的民主派的国家。现在,公民们,请允许我最后在我的‘为法国革命团结干杯’的祝词之外再加一句祝词:‘为全世界民主派团结干杯’”。

这篇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确是受之无愧的。我们衷心地为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艺术在沙隆所获得的成功而高兴,但同时我们必须对演说中的一句失慎的话(我们深信他不是对任何人怀有恶意的)提出异议。赖德律-洛兰先生说,对法国民主派说来,是安慰其他国家受苦工人和给他们撑腰打气的时候了。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派需要人安慰,不管是谁所给予的安慰。各个国家的民主派赞美法国民主派的革命自豪感,但是他们

也有权保有同样的自豪感和独立性。400万英国宪章派无疑是强大的,他们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任务。法国民主派热情地抓住了召开民主派大会和建立世界各国民主派联盟的这一思想,对这一点我们固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所期望的首先是完全的互助和平等的关系。任何联盟,如果它不以这种平等关系作为自己的基础,那它本身就是反民主的。不过我们深知“改革报”的同仁对民主的珍爱,所以我们相信,毫无问题,他们会完全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只希望他们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把那些陈词滥调丢掉,这些东西是“国民报”还是法国民主派唯一代表者的时期的遗迹,根本不表达他们的真实情感。

在同一个宴会上,弗洛孔先生讲了话,他赞成“为人权和公民权利干杯”。他把国民公会所颁布的权利宣言²⁰⁵读了一遍,他说权利宣言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真正民主原则的精确表述。他把现今的金钱关系统治制度拿来和这些他所谓的真正法国式的原则相对照;在现今的制度下人被贬低到比牛马还低的地位,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存在着过剩的人口,而当人的劳动不为人所需要的时候,他所消耗的要比他本身所能提供的多。他把这个制度叫做英国的制度,因为它最初产生于英国。他说:

“看啊,在革命的故乡采用英国的制度,而英国人自己则竭力要从自己脖子上除下这个制度的枷锁,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响亮的口号:‘自由、平等、友爱!’这样,最先把真理公诸于世的这个国家就要重蹈历史复辙,再次陷入黑暗和无知的状态从而不久将只好从邻国汲取它本身所未能保持下来的革命传统。难道我们会落到那样的地步吗?不会的,永远不会,只要有象你们一样的民主派、有象今天这样的集会,就不会落到那种地步!不,我们决不支持连英国人都不愿再支持的英国制服这座腐朽了的建筑物!(喊声:‘决不!决不!’)既然如此,那末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吧,以色列人!你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站在自己的旗帜下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这边 在我们的阵营里 ,是民主派和需要他们去解放 ,被他们以公民、弟兄相称 ,平等相待并看做自由人的 2500 万无产者 ;那边是乌七八糟的反对派以及它的垄断组织和资本贵族 !他们宣传把选举资格降低一半 ,我们则提出人权和公民权 ! (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 ,以全场合唱《Chant du départ》²⁰⁶而告终。)”

很遗憾 ,由于篇幅的限制 ,我们不能把这次出色的真正民主派的宴会上的其余演说一一引述。

“改革报”终于迫使“国民报”和它来进行论战。“改革报”虽然宣称它赞同加尔涅 - 帕热斯先生在蒙彼利埃宴会上就法国革命所发表的演说中的那些原则 ,但是并不承认象加尔涅 - 帕热斯先生这种曾把民主派的利益出卖给奥迪隆·巴罗先生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人有资格充当革命原则的代表者。这终于使得“国民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答 ,同时对赖德律 - 罗兰先生也进行了攻击。“国民报”受到的谴责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 ,这家报纸赞成在巴黎周围建立堡垒 ,从而把革命的遗产置于 1200 门大炮的监视之下。第二 ,去年它对卡诺先生的那本小册子未置一词 ;卡诺先生在那本小册子里曾向民主派建议 :参加左翼中心和左派 ,尽快地使它们的代表人物取得政府职位 ,暂时放弃共和主义的原则而为了在宪章²⁰⁷所允许的范围内争取扩大选举权展开宣传。大约在同时 ,小加尔涅 - 帕热斯先生提出了类似的原则 ,所以那本小册子上说它所反映的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众议院中一个党派的意见。“改革报”既批评了加尔涅 - 帕热斯先生的演说又批评了卡诺先生 (著名的国民公会代表兼共和国军事部长^①之子)的小册子 ,竭力地引逗“国民报”讲话。但是“国民报”仍旧保持沉默。“改革报”说得对 ,两位

① 拉查尔·尼古拉·卡诺。——编者注

议员提出这一政策,就是为了把民主派完全置于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的控制之下,然后把这个作为独立政党的民主派根本消灭掉。第三,在支持改革的宴会运动进行的期间,“国民报”派实际上奉行的是卡诺先生所提出的政策。第四,“国民报”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但是却不提出任何现实而有效的办法来改善工人阶级的困苦状况。

争论进行了不下一个星期。最后,“国民报”派终于放弃了他们所进行的太不成体统的斗争。他们彻底失败了,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接受了赖德律先生提出的组织民主派仲裁委员会的建议。

对于“改革报”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只有表示完全赞同。“改革报”保住了法国民主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所具有的光荣、独立性和力量。它捍卫了处于“国民报”奉行的那种政策威胁之下的革命原则。它奋起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使其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它撕破了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假面具,这些人企图使人民相信阶级压迫是不存在的;他们不愿意承认现代社会中残酷的内战,即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工人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些空话而已。“改革报”一直没有停止斗争,最后终于迫使骄傲的敌手打破沉寂,迫使它动摇,使它不得不背弃自己讲过的话,做出解释,乃至终于不得不退却。我们认为“改革报”对民主事业做了很好的贡献。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初

载于 1848 年 1 月 8 日“北极星报”
第 533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²⁰⁸

爱尔兰特别法于上星期三生效了。爱尔兰总督便毫不迟疑地行使这一新法律赋予他的专制权力；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都已普遍地实行了非常法，这一法律在克勒尔郡、瓦特福德郡、科克郡、罗斯考门郡、利特里姆郡、卡万郡、朗弗德郡和国王郡²⁰⁹中的许多地区也同样有效。

但是这一卑鄙措施将引起什么结果还不得而知。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听到了爱尔兰土地占有者，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这一措施的那个阶级的意见。他们在自己机关刊物上大声疾呼：结果将等于零。为此竟实行了全国戒严¹/₁₀的爱尔兰的议会代表竟为此都背弃了自己的祖国！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变节带有普遍的性质。甚至奥康奈尔一家在讨论法案时也发生了分裂：约翰和莫里斯，已故的“解放者”[⊖]的儿子是忠于他们的祖国的，可是他们的弟兄摩尔根·奥康奈尔却不仅投票赞成法案，而且在辩论时还屡次起而为其辩护。投票赞成无条件地否决法案的代表不过 18 人，投票赞成伦敦郊区一位宪章派代表韦克利先生的修正案的也只有 20 人。韦克利要

⊖ 即丹尼尔·奥康奈尔。——编者注

求在实施特别法的同时也能采取特别措施来减少所要杜绝的那种犯罪的原因。就是在这 18 个和 20 个投票者中间,四五个代表是英国激进主义者,两个是被英格兰地区的代表们选举出来的爱尔兰人;因此,在由爱尔兰派到议会去的 100 个代表中,坚决抵制这一法案的,勉强才有 12 个人!

从奥康奈尔去世以来,关于爱尔兰问题这是第一次重要的争论。这次争论一定会弄清楚,谁配做一个伟大鼓动家来领导爱尔兰。在议会开幕以前,约翰·奥康奈尔先生在爱尔兰已被默认为他父亲的继承者。但是在这些辩论开始以后不久,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他是不能成为党派的领导者的;另一方面,约翰·奥康奈尔所遇到的又是菲格斯·奥康瑙尔这样一个厉害的敌手。后者是民主派的领袖,关于他丹尼尔·奥康奈尔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情愿把菲格斯·奥康瑙尔赠送给英国宪章派”。正是这个人马上就成为爱尔兰派的领袖。是他提议无条件地否决特别法草案;是他把所有反对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使他们起来反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尽可能地拖延投票;是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概括了反对派反对这一法案的全部理由,最后,是他首次在 1835 年以后重新提出取消合并²¹⁰的提案,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爱尔兰议员都做不到的。

爱尔兰的代表们很不愿意承认奥康瑙尔是自己的首领。他们的思想深处是纯粹的辉格党人,他们对奥康瑙尔的那种民主派的气魄是深为恼恨的。奥康瑙尔不让他们再利用取消合并这种宣传来为辉格党的利益而推翻托利党,然后,当辉格党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就把“取消”两字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主张取消合并的爱尔兰代表没有象奥康瑙尔这样的领袖是怎么也不行的;虽然在爱尔兰他们总是企图破坏他新的声望,但在议会里却不得不服从他的

领导。

当议会常会一闭幕,奥康瑙尔就可能去爱尔兰,以便加紧宣传取消合并和建立爱尔兰宪章派政党。毫无疑问,要是奥康瑙尔实现了这一计划,不出半年他就会成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这样,当他一手掌握三个王国的民主派的领导权的时候,他就会获得包括奥康奈尔在内的所有鼓动家都未曾有过的地位。

读者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两个岛国民族不久结成联盟,那是多么重要。不列颠民主派如能吸收 200 万勇敢而热情的爱尔兰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就一定会更快地前进,而不幸的爱尔兰最后也必然会向自己的解放迈进一大步。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4 日

载于 1848 年 1 月 8 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

1848年“北极星报”第1号登载了英国宪章派著名的领袖和他们的议会代表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一篇告爱尔兰人民书。这一文件是值得每个民主主义者通读一遍并好好地领会的,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把它刊载出来。

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避而不谈。对爱尔兰人民的这个强有力的号召很快就会显示出非常实际、鲜明和可以感觉到的后果。菲格斯·奥康瑙尔本身是爱尔兰人、新教徒,十余年来一直是英国伟大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支柱,今后同样应该被认为是爱尔兰合并取消派和改革派的真正首脑。人们可以这样称呼他首先就是由于他在下院反对新近通过的卑鄙的“爱尔兰特别法”。此后,他还为爱尔兰的利益而继续进行鼓动,这证明菲格斯·奥康瑙尔正是爱尔兰所需要的人。

对他来说,千百万爱尔兰人的幸福是真正切身的事情,对他来说,Repeal(取消合并,换句话说,要求爱尔兰议会独立)决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为自己和朋友们取得有利地位并谋取私利的幌子。

他在告人民书中向爱尔兰人民证明,丹尼尔·奥康奈尔这个政治骗子十三年来怎样欺骗爱尔兰人并用“取消合并”这样的字眼蒙蔽他们。

他把约翰·奥康奈尔的行为揭露无遗。约翰·奥康奈尔是他父亲的政治继承人,并且象他父亲一样,使千百万轻信的爱尔兰人为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个人利益而牺牲;约翰·奥康奈尔在都柏林的“调停大厅”²¹¹的全部演说、全部口是心非的保证和花言巧语都不能洗雪他从前,特别是目前在议院讨论“爱尔兰特别法”时造成的耻辱。

爱尔兰人民终究应该觉醒,而且必然会觉醒,到那时他们一定会把这伙自命为合并取消派的人,这伙抚摸着装得满满的钱袋而私下窃笑的人统统一脚踢开;到那时狂热的天主教徒和政治扒手约翰·奥康奈尔就必然会遭到最沉重的打击。

要是告人民书的内容仅限于此,那末我们倒不必予以特别重视。

可是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因为在这里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仅是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而且还——甚至主要是——作为一个英国民主主义者、作为一个宪章主义者发表意见的。

他用最朴质的人也能理解的明白的语言向爱尔兰人民证明必须竭尽全力同英国工人阶级,同宪章派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人民宪章”的六点(每年改选议会、实行普选权、进行无记名投票、取消任何财产资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数划分选举区)而斗争。只有这六点获得之后,实现“取消合并”才能给爱尔兰带来实际利益。

接着,奥康瑙尔指出:正是英国工人早就征集了350万人签名²¹²上书请愿,要求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爱尔兰,而现在仍然是英国宪章派在无数请愿书上提出抗议,反对“爱尔兰特别法”,最后,英国和爱尔兰的被压迫阶级或者将来一起斗争,一起获得胜利,或者

今后就一起遭受同样的压迫和贫困、同样依赖于资本家特权统治阶级。

毫无疑问,今后爱尔兰人民群众将会愈来愈紧密地同英国宪章派团结一致并按照共同计划行动。这样,英国民主主义者的胜利以及爱尔兰的解放就一定会提早很多年。奥康瑙尔告爱尔兰人民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初
载于 1848 年 1 月 9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5 年“历史问题”杂志第 11 期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²¹³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凡是厂主们谈到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 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费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说来，人们要求自由贸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林，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

现在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

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代表交纳的工资税；你们贫困的原因是在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 3 辨士；可是，在 1815 年到 1843 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 28 先令降到 5 先令，而在 1823 年到 1843 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 20 先令降到 8 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 3 辨士。而在 1834 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向我们所说的千真万确的话，同时你们还制订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规定工资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发生的竞争。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也许你们还想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末，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工人们的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们荒废了本国的农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向我们的工厂定货。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那末，就让我们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说,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们遭致任何损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粮价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莱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

包林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轻粮食跌价给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²¹⁴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

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末,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话,那末,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²¹⁵

先生们,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较贱时仅仅收入 4 法郎还是象过去一样收入 5 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谓的。

难道说,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损失。

当粮价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资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约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①上,包林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

① 见本卷第 276—281 和 285—296 页。——编者注

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工人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五苏了。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

法国旧铜幣名,等于 $\frac{1}{20}$ 法郎。——译者注

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而且规模还更大得多。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工人之间的竞争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

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 448 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 1829 年的 1088 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 53353 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 1848 人;也就是说,技术设备的改进使 1100 个工人失了业。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业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林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 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 5 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用以安慰他们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林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有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致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现在手工织工已经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 600 万到 800 万匹当地手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 100 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 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 80 万匹。1830 年印度所输出的棉布还不到 4000 匹。而在 1800 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 100 万匹。到 1830 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 2 万匹。

“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人则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见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象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林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其措词和自由贸易的信徒们的其他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所说的这种劳动部门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看作完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门都总有一天要经受手工织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重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工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中（英文叫 *throstle-mills*），纺纱的尽是些 16 岁及 16 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骡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²¹⁶，是对包林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林先生谈到一些个别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别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贫苦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暂时的苦难”，而且并不讳言，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苦难，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从生产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

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于承认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安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工人),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末,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这就是说,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

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

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末它所得的总额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尽管工人阶级忍受了一切苦难和贫困,尽管工人阶级在工业战场上抛下了许多尸体,但是工人阶级依旧作为一个阶级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工人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更廉价的生活资料。于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维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前提)的逐渐实现和成为生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的假定做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同意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全部灾难。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

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这些诡辩完全值得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先生去论证。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

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末即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两三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

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
发行于布鲁塞尔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1848年版译的

共产党宣言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共产党宣言²¹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2月—1848年1月
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
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90年德文
版并曾与1848年、1872
年和1883年版本核对

共产党宣言

Ma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C. Burghard.

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

“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扉页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都为神圣地骗除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那些当权的敌人咒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骂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的敌人呢？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了。

现在，共产党人已经应该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的党的宣言来对抗那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了。

为了这个目的，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就集会于伦敦，拟定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兰德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 资产者与无产者^①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① 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㉔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是,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㉔ 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在 1847 年的时候,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的历史发展所由发源的社会基础,从而逐渐搞清楚,土地公有的村社乃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在部落中的地位,才把这个原始共产社会的典型的内部结构弄明白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抗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试图在《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2 Aufl.,Stuttgart,1886〔“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 年,斯图加特,第二版〕一书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²¹⁸

㉕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他是行会内部的工匠,而不是行会的首长。(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 ;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 ,美洲的殖民化 ,对殖民地的贸易 ,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 ,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 ,因而也就促进了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

以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已经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的需求了。于是 ,就有工场手工业取而代之。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层等级排挤掉了 ;各个同业公会间的分工也就从此消失 ,由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所代替了。

但是 ,市场总是在扩大 ,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这种需求了。于是 ,蒸气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中的革命。现代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工业中的百万富翁 ,一批批产业军的统领 ,即现代的资产者 ,代替了工业的中层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 ,同时 ,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 ,资产阶级也越发发展了 ,它越发增加自己的资本 ,越发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

由此可见 ,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 ,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 ,在公社^①里面是一个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 ,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在另

一些地方又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①；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

① 在法国新兴的城市，甚至在它们还没有从封建领主手争取得地方自治权和“第三等级”各项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看成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看成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的。（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购买或争得了最初的自治权利以后，把自己的城市团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在经恩格斯校订过的 1888 年的英文版中，“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后面加有“（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在“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面加有“（如在法国）”。——编者注

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中世纪那种深受反动派称许的蛮悍勇武举动,自然是和怠惰因循习气相辅相成的。它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

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几

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在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

现在,在我们眼前又发生着类似的运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象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象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即反抗那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周期性的而且愈

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每次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也被毁灭掉了。在危机期间,发作了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转瞬间回复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大饥荒、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争,完全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是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破坏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可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就愈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他们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

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如同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增加,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他所担任的只不过是一些极其简单的、极其单调的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也就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命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²¹⁹的价格,都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但如此,机器的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细,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操作过程的加速,等等。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本厂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横制度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那末它就愈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

手工劳动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的工业愈发达,那末男工劳动也就愈受到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排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是劳动工具,仅仅因为他们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需要有多寡不一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们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们终于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间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高利贷者等等,纷纷奔向工人们了。

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家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那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进口货,捣毁机器,放火烧毁工厂;他们力图用强力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处、因为相互竞争而联合不起来的人群。这时候,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联合,而仅仅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经不得不发动,并且暂时还能够发动整个无产阶级投入运动。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无产阶级还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余孽、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这些人作斗争。因此,这时的全部历史运动都操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胜利。

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集

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①;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

工人们有时也得到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实成果并不是直接得到的成效,而是工人人们的越来越大的团结。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有了联系。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只在地方范围内发生而性质又都相同的斗争汇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的斗争了。本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因为交通梗阻而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因为铁路交通便利而只消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生,并且每一次都显得更加强大,更为坚固,更有威力了。它乘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互相争执的机会,迫使他们用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人们的个别利益。英国颁布过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就是一

①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同盟”后面添了“(工会)”。——编者注

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免要向无产阶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①授予了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是已经提高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改为“自己的一部分政治知识和普通知识”。——编者注

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私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是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完全不同的;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也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经使无产者失去任何民族性了。法律、道德和宗教,在他看来全都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必须加以保护的东西,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那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总是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当然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经挣扎到公社社员的位置,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下的小资产者曾经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说,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①原则。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②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

^①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特殊的”改为“宗派的”。——编者注

^②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改为“最先进的”。——编者注

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①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挣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吗?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什么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改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亦即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演进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员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

由此可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所以,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为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直接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决不打算消灭它,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我们要消灭的仅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

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但是,资产阶级却硬说消灭这种关系就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呢!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

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

可是,买卖一旦消灭,自由的买卖也就会随之消灭。我们的资产者高谈自由买卖的论调,也如同他们其他所有一切高谈自由的大话一样,本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些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今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成员中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在十分之九的成员中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是的,我们确实要这样做的。

你们声明说,从劳动不能再变为资本、货币和地租的时候起,简单地说,从劳动不能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即从个人的所有制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那末,你们自己承认,你们所认为个性的,不外是资产者,即不

“共产党宣言”原稿的一页
(马克思的手稿,头两行是燕妮·马克思的手迹)

外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该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旦消灭,一切活动都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代之而兴。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切顾虑,都归结为这样一句同义反复语:一旦没有了资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罢了。

然而,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见解来衡量我们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吧。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颇观念,驱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历史性的关系夸大成为永久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而你们的这种偏颇观念原是过去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一谈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敢去理

解你们在谈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能理解的那种道理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恶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

或者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废止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甘愿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难道你们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阶级中间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话，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他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连想也想不到,问题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那是再可笑也没有的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就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乐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而消灭。

其次,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

①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改为“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编者注

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哲学和一般思想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我们详细地探讨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人们说,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这样说只不过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败了。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然而”,——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的等等观念,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改变过的了。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却是始

终保存着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却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它们革新;可见,共产主义是同过去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

这种责难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切世纪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不谈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①,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 1 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 3 废除继承权。
 -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 9 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②逐步消灭。
 -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

①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在“越出本身”后面添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② 在 1848 年的版本中是“城乡之间的对立”。在 1872 年的版本中和以后的历次德文版本中,“对立”改为“差别”。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改为“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实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写出一些讽刺的小品来攻击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和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到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上的斗争了。然而就是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代^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怀自身的利益,仅仅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向资产阶级声罪致讨了。他们引为快事的是:写出一些刺激的文字来

^①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英国 1660—1689 年间的复辟时代,而是法国 1814—1830 年间的复辟时代。(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讥讽自己的新统治者,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出一些不祥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

一部分法国正统主义者和“青年英国”²²⁰,就都排演过这种滑稽剧。

如果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是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不同,那只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本来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了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如果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只是他们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很少隐讳自己那一套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恰好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所以,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不顾自己所吹嘘的那一套堂皇动听的论调,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不惜信义、爱和名

⊙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黄金果”前面加有“从工业树上落下来的”。——编者注

誉,靠经营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获取暴利^①。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了。基督教不是曾经竭力表示,它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的吗?为了代替这一切,它不是提倡过积德和行乞,独身和绝欲,修道和信教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浇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唯一的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渐渐恶化和消失的阶级。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辈。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兴发着的资产阶级身旁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

① 这里主要是指德国说的,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地主通过自己的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大部分地产,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酿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会出现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他们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就是这类文献的头面人物。

这种社会主义很会揭示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伪善的辩护伎俩。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间的歼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

可是,按其积极内容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力谋恢复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就是力谋重新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硬塞进已被这些资料突破而且必然要突破的那种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在前后两种场合,它都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

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语。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胆怯的怨声^①。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胆怯的怨声”改为:“最后,当确凿不移的历史事实使幻想的安慰作用消灭无余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可怜的怨声”。——编者注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一种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准哲学家和一班爱说漂亮话的人们,贪馋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作品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变成了纯粹著作界的一个流派。它必然表现为一种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例如,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意味着纯粹意志即正当意志、真正人类意志的规律的表现。

德国著作家的全部工作,只是要把法国的新思想同他们自己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正确点说,只是要从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去领会法国的思想。

这种领会,如同一般领会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面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用自己的哲学辞令贗造法国理论的戏法,他们叫做“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就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满以为自己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就满以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

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曾把自己那一套笨拙的小学生作业看得极为郑重庄严,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现在它却渐渐失去了它那种自命博学的天真了。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简短些说,自由主义的运动——已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评(德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批评的可怜回声)原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相当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

从——僧侣、学监、顽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枪弹给德国工人起义苦头吃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那末它同时也就成为直接表现反动的利益,即表现德国市侩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各种形态再三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全这个小资产阶级,那无异就是保全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自己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增长。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一箭双雕。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象瘟疫一般地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的真理”披上这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神秘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班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自己也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充当这班市侩的堂皇的代表。

它把德国的民族标榜为模范的民族,把德国的市侩推崇为人的模范。它给这班市侩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一种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既然一贯到底,就公然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横蛮破坏”的倾向,并且肆口扬言,说什么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所有现时在德国冒充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流行的东西,除了极

少数的例外,都是这一类卑鄙龌龊、令人萎靡的作品^①。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要想把社会的疾病治好,以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中间有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生活改进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禁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微小改良主义者。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定成一些完整的体系了。

我们且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为例。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统治着的世界当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一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加工,制定成或多或少完整的体系。它号召无产阶级来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只不过是要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们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比较不完整、但是更为实际的形式,它力图使工人阶级对一切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硬说能给工人阶级

① 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扫除净尽,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不高兴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格律恩先生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和典型人物。(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种行政上的改良,这种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使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有所改变,至多也只能替资产阶级缩减它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仅仅是一套演说辞令的时候,才算给自己找到了最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囚室!——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且不谈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的著作等等)。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立,看出统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既然阶级对抗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发明家同样也还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那应该能够造成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向前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全世界的历史都归结为他们那些社会计划的宣传和实现。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计划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却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

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论,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①,消灭家庭,消灭私人发财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单纯的管理生产的机关等,——所有这些原理无非都是表明消灭阶级对立的必要,但是由于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发展,它们当时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无定形的模糊表现。因此,这些原理也就还带有完全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继续向前发展的事实,还是死守着他们的老师们的一些陈旧观点。所以,他们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在梦想用试

①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这一处改为“它们所提出的一些实际措施,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验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梦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梦想建立所谓“国内移民区”,梦想创立小“伊加利亚”^①即创立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去央求资产阶级放软心肠,解囊施舍。他们渐渐地堕落而与上面讲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只在于他们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

所以,他们就忿怒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的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派,后者反对改革派²²¹。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了第二章之后,就可以明白共产党人对于已经形成的各个工人党派的态度,即他们对于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态度了。

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联

① 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的称呼;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Home-colonies)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叫做法伦斯泰尔。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空想臆造国叫做伊加利亚。(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会社会主义民主党^①去反对保守派的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放弃对于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他们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派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支持曾经发动过 1846 年克拉柯夫起义的那个政党。

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俗。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

① 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R éforme》)。他们所发明的名称——社会主义民主党,是他们曾经用以表明民主党或共和党中一部分多少涂上社会主义颜色的人的。(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法国以社会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所以,它同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有如天渊之别。(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弗·恩格斯 1847年的运动

1847年无疑是我们历年来最动荡的一年。普鲁士颁布了宪法和实现了联合省议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出乎意料地迅速活跃起来，普遍武装起来反对奥地利；瑞士发生了内战；英国产生了带有鲜明激进色彩的新议会；法国产生了争吵和举行了支持改革的宴会；在美洲，合众国征服了墨西哥；这就是近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系列大变动和事件。

1830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而在英国来说，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比利时和瑞士的一部分也步其后尘，资产阶级在这里也获得了胜利²²²。波兰起义了，意大利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德国到处发生了骚动。所有国家都准备进行一场大搏斗。

但是1830年以后一切都后退了。波兰垮台，罗曼内起义的人们东奔西散²²³，德国的运动被镇压。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本国的共和主义者，出卖了本来由于它自己的唆使而发动起义的其他国家的自由派。英国自由党内阁则毫无作为。最后，到了1840年反动势力的气焰已非常嚣张。波兰、意大利、德国在政治上死气沉沉，在普鲁士，“柏林政治周刊”高踞王座²²⁴，在汉诺威废除了达尔

曼先生的高明的宪法²²⁵ ;1834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²²⁶充分发挥了力量。在瑞士保守派和耶稣会教徒获得胜利,在比利时天主教徒掌握了政权,在法国基佐获得了胜利,在英国辉格党的政府在皮尔日益增长的威力的压力下作最后挣扎,宪章派在1839年一败涂地后重新改组的打算落了空。反动派处处胜利而一切进步党派完全崩溃。历史运动停止了,看来这就是1830年大搏斗的最终结果。

但是,正象1830年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顶峰一样,1840年是反动势力的顶峰。从1840年起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这些运动往往遭到失败,但却逐渐争得越来越多的阵地。在英国宪章派又重新组织起来,而且空前地强大有力;皮尔不得不屡次背叛自己的党,宣布废除谷物法而使本党受到致命的打击,最后不得不下台。在瑞士激进派获得成功;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自由派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在比利时自由派也在184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只有法国在1846年的选举中反动的内阁获得了空前的多数,意大利直到庇护九世(1846年底他作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改革尝试)即位时止,仍旧是死气沉沉。

于是,1847年来到了,这一年几乎给各国的进步党派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即使在那些党派遭到失败的地方,失败也比立刻胜利更为有利。

1847年没有决定任何事情,但是却使各党各派彼此尖锐而鲜明地对立起来了;这一年没有彻底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却提出了一切必须马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1847年最大的事件和变化是发生在普鲁士、意大利和瑞士。

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终于不得不颁布宪法。桑苏

西宫 中绝后的唐·吉诃德经过长期搏斗和痛苦以后生产了宪法,按他的意思,这一宪法应该保证封建的、宗法的、专制的、官僚的、僧侣的反动势力永远胜利。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坚强,能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反对他和社会上一切反动阶级的武器。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首先拒绝借钱给国王,这使国王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拒绝借钱以后,最初可以说,普鲁士根本没有国王;普鲁士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而不自觉。幸而出现了 1500 万的俄国贷款;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又重新成了国王,议会中的胆战心惊的资产者便立刻屈服;革命的风暴消失了。普鲁士资产阶级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它仍旧前进了一大步,它争得了集会场所,向国王显示了力量,并使全国动荡。普鲁士的统治权应该属于谁,应该属于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官僚、僧侣的联盟呢,还是应该属于资产阶级?不是前者,即是后者,这一问题现在必须解决了。过去在联合省议会中,双方还有协商的可能,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他们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此外,各个委员会(柏林宪政制造者的倒霉发明)²²⁷正在召开。这些委员会无疑地会把原来就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搞得更乱,使得谁也无法彻底弄清。它们会把问题变成一团只有快刀才能斩断的乱麻;它们必须完成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准备工作。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这一普鲁士革命的开始。到 1849 年,不管国王愿不愿意,必须重新召开联合省议会。我们给予国王陛下的期限只到这时,不能再多。那时,他必须把王笏和著名的“万世的”王位²²⁸让给本国的基督教的和犹太的资产者。

桑苏西宫(Sanssouci)在波茨坦,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行宫。——译者注

因此,1847年是普鲁士资产者在政治方面最顺利的一年,尽管他们遭到暂时的失败。德国其余各邦的资产者和小市民也看出这一点,并对普鲁士资产者深表同情。他们知道,普鲁士资产者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在意大利我们亲眼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全欧洲最反动的人、中世纪顽固思想的代表——罗马教皇^①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首领。运动转瞬间具有了巨大的规模,迫使托斯卡纳的奥地利大公^②和撒丁的叛徒查理-阿尔伯特也参加了运动,动摇了那不勒斯斐迪南的王座,运动的浪潮席卷了伦巴第,冲击到了提罗耳和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区。

当前意大利的运动和1807年到1812年普鲁士的运动性质是相同的。就象当时的普鲁士一样,问题在于以下的两方面:对外的独立和内部的改革。目前要求的还不是宪法,而只是行政改革,暂时避免和政府发生任何严重冲突,以便在占优势的国外势力面前保持最大的统一。但这究竟是些什么改革呢?这些改革对谁有利呢?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出版受到优待,官僚制度被迫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例如撒丁的改革,罗马咨询会议²²⁹和重新改组内阁);资产者在地方行政机关中获得更大的势力,贵族和官僚的专横受到限制,资产阶级获得了市民自卫军这样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一切改革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且只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同拿破仑时期普鲁士的改革相比。那时候的改革也带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很多方面还更前进了一步,例如:那时的行政当局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和官僚的专横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② 托斯卡纳的公爵列奥波特二世。——编者注

受到抑制,城市实行自治,后备军建立起来,徭役也已经废除。现在的意大利和那时的普鲁士一样,由于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特别是由于工商业对于全体人民生活的作用日益加强,资产阶级成了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主要阶级。

因此,意大利的运动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切醉心于改革的阶级(从王公贵族到皮费拉利和拉察罗尼²³⁰)暂时都以资产者身份出现,而目前教皇还扮演着意大利第一个资产者的角色。但是这些阶级一旦永远摆脱奥地利的束缚,就会大失所望。当资产者战胜外部敌人时,资产者就会在自己家里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于是公爵和伯爵就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奥地利,但为时已晚了,那时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的工人会知道,他们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

最后谈谈瑞士。瑞士在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中第一次在欧洲各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瑞士第一次敢于坚决行动,第一次鼓足勇气不作为彼此各不相关的二十二个州的混合物出现,而是作为联邦共和国出现。瑞士非常坚决地消除了内战,保证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瑞士中央集权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中央集权将在不久以后的盟约改革中取得合法化。

我们仍旧要问:战争的结果,同盟的改革以及分离派同盟各州的改组究竟对谁有利呢?显然是对胜利的政党有利,对1830年到1834年在某些州占得上风的党派如自由派和激进派有利,也就是对资产者和农民有利。由于七月革命,从前帝王城市的贵族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凡是后来实际上恢复贵族统治的地方,如伯尔尼和日内瓦,1846年都爆发了革命。凡是贵族统治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地方,如城市巴塞尔,在那一年这种统治也剧烈地动摇了。

城市巴塞尔是瑞士的一个州名。——译者注

在瑞士封建贵族是不多的,而在他们还存在的地方,他们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牧民的同盟来维持的。这是资产者最后的、最顽强的、最凶狠的死敌。他们是自由主义各州的反动分子的支柱,在耶稣会教徒和虔诚派教徒的帮助下,他们用反动的阴谋密网缠住了整个瑞士(例如在瓦得州)。他们破坏了资产阶级在瑞士议会中的一切计划。他们妨碍了彻底摧毁从前帝国城市中的市俗贵族统治。

瑞士资产者的这些最后的敌人于1847年被彻底粉碎了。

瑞士资产者早就几乎在所有各州的工商业中有相当大的活动自由。行会还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但它们对资产阶级的发展没有多大妨碍。内部税关则几乎全都没有了。凡是资产阶级得到某种程度发展的地方,政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资产阶级在某些州有极大发展并获得支持,但是它恰恰缺少最主要的东西——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庸俗气味是在彼此隔绝的各省和在某些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而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它需要的是一个瑞士,而不是二十二个小州。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种政权应该消除封建的、宗法的和庸俗的立法残余,并积极保卫瑞士资产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利益。

资产阶级得到了这样的中央政权。

难道农民没有参与摧毁分离派同盟吗?当然是参加了的。至于农民,现在他们对资产者仍将扮演他们长期对小市民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将仍然是供资产者剥削的工具,替他们打仗,给他们纺

纱织布,为他们补充无产阶级的队伍。那末农民还要作什么呢?农民和资产者一样是私有者,现在几乎在各方面都同资产者有共同的利益。他们所能实行的一切政治措施给资产者带来的利益比给他们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多。但是和资产者比较起来,农民是软弱的,因为资产者富裕得多,并且手里掌握着当代一切政权的杠杆——工业。农民跟随资产者还可以得到许多东西,要是反对资产者,便什么也得不到。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关于这点暂且不提。

驱逐耶稣会教徒及其信徒,驱逐资产阶级的这些有组织的敌人,普遍实施世俗的教育以代替宗教教育,把大部分教会财产转归国家,这些都是首先对资产者有利,这是自不待言的事。

因而 1847 年三个最著名的运动彼此有共同之点,就是这些运动首先主要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的党派到处都是资产者的党派。

事实上,这些运动的特征是:正是那些在 1830 年落后的国家去年却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来达到 1830 年的水平,即取得资产阶级的胜利。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1847 年是资产阶级最光辉的年份。

我们再往下谈。

在英国出现了新议会,根据教友派信徒约翰·布莱特的说法,新议会是一往召开过的一切议会中最道地的资产阶级议会。约翰·布莱特本人是所有英国人中最道地的资产者,因而在这个问题

上他是最理想的权威。但是资产者约翰·布莱特却不是统治法国的资产者,不是口出不逊大肆攻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资产者。约翰·布莱特所说的资产者就是厂主。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从1688年起就已经掌握政权,但为了使自己易于夺得统治权,他们把有名无实的政权留给依附他们的债务人——贵族。由此可见当时英国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某些派别——食利者和厂主之间的斗争,不过厂主还可以把这一斗争说成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要时说成贵族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厂主决不希望给贵族保留统治的假象,因为那些勋爵、从男爵、乡绅没有欠他们一分一文。相反地他们非常希望消灭这种假象,因为随着这种假象的消灭,食利者将失去最后的据点。这一任务将由目前的资产者或厂主的议会来完成。这个议会将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它将使英国宪法接近法国式的或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个议会将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资产阶级就会更进一步,因为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会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

法国似乎是唯一的例外。1830年整个大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一年年越来越限于最富有的大资产者的统治,限于食利者和股票投机分子的统治。他们使大多数大资产者服从他们的利益。以部分厂主和船主为首的少数变得越来越不足道了。现在这少数人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小资产者联合了起来,在支持改革的宴会上隆重地宣布了这一同盟。这少数人已经不相信有一天能靠现在的选民上台执政。因此经过长期动摇后,他们决定允许比他们地位低的资产者,例如律师、医生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参加政权,认为这

是最没有危险的一伙人。诚然 ,这少数人还远不能执行他们的诺言。

因此 ,我们看到在英国几乎已经结束了的资产阶级内部斗争 ,现在即将降临法国 ,所不同的只是 ,在法国 ,情势和往常一样总带有更明显更革命的性质。这样坚决地分为两个营垒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进步。

在比利时资产阶级在 1847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天主教的内阁被迫辞职 ,这里直到现在仍然是自由资产者在执政。

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 ,这使我们十分高兴²³¹。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 ,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 ,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 ,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 ,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 ,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益的。合众国因兼并加利福尼亚而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 ,这是符合整个美洲发展的利益的。但我们仍旧要问 ,首先从战争中获利的是谁呢 ? 只有资产阶级。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得到了新的地区 ,他们在这些地区将得到新的资本 ,即培植出新的资产者并使现有的资产者大发其财 ,因为现代所获得的全部资本总是都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去的。而渴望从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运河²³²中获利的不是美国船主又是谁呢 ? 从太平洋的统治中获利的不是这些船主又是谁呢 ? 将来以工业品供应被征服的土地上新出现的消费者的不是美国厂主又是谁呢 ?

因此 ,在美洲资产者也有了巨大的成绩 ;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所以反对战争 ,那只是证明他们怕在某些方面为这些成绩所付的代价太高。

甚至在极不开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有了成绩。在俄国,工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甚至贵族也逐渐变成资产者。在俄国和波兰,农奴制已受到限制,这意味着贵族的削弱和自由农民阶级的出现,前者有利于资产者,后者则为资产阶级到处所需要。迫害犹太人,这是定居的基督教市民深为称意的事,因为行商使他们的生意遭到损失。在匈牙利封建主逐渐变成谷物、羊毛及牲畜的批发商,他们在议会中的发言带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不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实现着预言家的话:“为主开路……打开大门,敞开世界之门,好让光荣的皇帝进来!”谁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资产者。

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资产阶级到处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它昂首阔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资产阶级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作到了这一点。

我们并非资产阶级的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我们很希望他们胜利。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对似乎微不足道的少数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到处实现他们的愿望。

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资产者在几乎处处都是得心应手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俨然不可一世、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们不禁要报以冷笑。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们是在替自己干。他们鼠目寸光,以为他们一胜利世界就会最后改变面貌。可是很明显,他们到处都只是为我们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他们充其量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也会被打倒。资产者的背后到处

都有无产阶级,他们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象在意大利和瑞士那样;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却逐步地准备推翻资产者,象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有时他们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

但我们还可以作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直截了当地告诉资产者,可以向他们摊牌,让资产者事先知道,他们的努力只会使我们获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停止对君主专制和贵族僧侣的斗争。他们必然是要未取得胜利,要未立刻灭亡。

在德国他们很快就会来向我们求援。

那末,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

“刽子手就站在门前”²³³。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20 日左右

载于 1848 年 1 月 23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7 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弗·恩格斯 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已故的皇帝弗兰茨曾说过：“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如果梅特涅不想让他的主子落得吹牛大王之名，那末他就应该趁早死掉。

由继承和窃得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这个由十种语言和民族构成的混乱局面，这堆由绝然矛盾的习惯和法律乱七八糟凑成的东西，终于开始土崩瓦解了。

可敬的德国市民多少年来一直都在竭力恭维管理这架支离破碎的国家机器的人，恭维那个懦怯的骗子手和背信弃义的凶手梅特涅。达来朗、路易·菲利浦和梅特涅（这是三个极其平庸的人物，因而非常适合于当前的平庸时代）在德国市民的眼里是三十年来象傀儡戏中提线人似的左右着全世界历史的三位神明。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这些可敬的市民把历史仅仅看成酒店里的密谋和妇人的谗言诽谤，只不过规模稍大一些而已。

诚然，革命的激流和拿破仑的三次侵袭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象对奥地利那样不留丝毫痕迹。诚然，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象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梅特涅干的吗？

奥地利王室之所以强大、稳固而富有生命力，原因是什么呢？

早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德国的北部和西部都已纷纷摆脱了封建的野蛮状态,那里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商业扩大了,城市兴起了,市民取得了政治努力,在这样的时候,德国的一部分却落后于西欧的发展水平。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内地,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中于远离海洋的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维亚山脉而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绝,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唯一反动的河流的流域之内。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们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将它们和更加粗野的地区连接了起来。

既然西欧由于资产阶级文明而形成了一些大君主国,那末多瑙河上游的那些国家也该联结成一个君主政体的大国才是。仅仅为了防守就需要这样做。在这里,在欧洲中部,操各种语言的各族野蛮人都集结在哈布斯堡王室的王笏之下了。这一片野蛮地区的核心就是匈牙利。

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这就是奥地利的野蛮和奥地利君主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一度支持过市民反对贵族,支持过城市反对王公,那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大君主国一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存在。如果说这个王朝后来又一次支持小资产者,那也是由于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这些小资产者本身对于大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起着反动的作用。哈布斯堡家族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援助小资产者都抱了一定的反动意图。不过现在这种手段已无济于事了。

可见,奥地利王室一开始就是欧洲的野蛮、保守和反动的代

表。因山区交通阻塞而更加巩固的宗法关系产生愚昧,野蛮又造成冥顽鄙野,而奥地利王室的权力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风俗习惯、性格、制度绝然不同的一打民族由于对文明有着共同的反感而团结起来了。

可见,只要奥地利王朝的臣民不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奥地利王朝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威胁着它的只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渗入。

然而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危险。资产阶级文明可能暂时被阻止;它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适应并屈从于奥地利的野蛮。但是资产阶级文明迟早总会征服封建的野蛮状态,而唯一串联那些习性殊异的地区的纽带也就会绷断。

奥地利政策之所以消极动摇、胆小如鼠、卑鄙龌龊、阴险奸诈,原因就在于此。奥地利已不能象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野蛮了,因为它每年都得向文明让步,而且一年年地愈来愈不能信任它的臣民了。每一个坚决的步骤在国内或邻邦都会引起某种变化,而每一种变化又都会成为奥地利借以勉强抵御现代文明浪涛的堤坝上的裂痕;一旦发生任何变化,第一个牺牲者将是跟野蛮形影不离的奥地利王朝本身。在1823年和1831年奥地利还能用炮弹把皮蒙特、那不勒斯和罗曼内的起义者轰跑²³⁴;到1846年,在加里西亚它就不得不使尚未发展的革命因素——农民也投入运动²³⁵;到1847年奥地利则不得不把它的军队停止于费拉拉城下而在罗马城内搞阴谋活动²³⁶。反革命的奥地利竟然使起革命的手段,这显然证明它已快完蛋了!

1831年的意大利起义和1830年的波兰革命都已经被镇压,法国资产者也保证以后要规规矩矩,现在弗兰茨皇帝可以安息了;

看来,连他的没有头脑的后代^①也能站得住脚的平凡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这个加冕的白痴的帝国暂时还不受革命的威胁。但是谁能担保它不产生引起革命的原因呢?

只要工业还保存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只要每一农户或至少每一农村所需的工业品都还是自行生产而极少仰求商业,那末工业本身就始终是封建性的工业,并且同奥地利的野蛮状态正好合拍。只要这一工业还停留在工场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水平,只输出少量的内地产品而很少进行对外贸易,它就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区域并且很容易适应于奥地利的 *status quo* (现状)。既然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才只形成了少数大资产阶级,那末在人口稀少而偏僻的奥地利它至多只能形成一些中层等级,而且还仅限于个别地方。只要手工劳动一直都占统治地位,奥地利就能平安无事。

但是机器发明了,而机器又引起了手工劳动的衰落。工业品价格的暴跌,首先引起了工场手工业的崩溃,然后又使最古老的封建的家庭工业也渐渐瓦解。

奥地利企图用彻底执行保护关税制度来躲避机器。但是枉费心机。保护关税制度恰好促使机器输入奥地利。波希米亚的棉纺织工业发展起来了,伦巴第的机器丝纺业发展起来了,在维也纳甚至开始出现了机器制造业。

后果也就接踵而来了。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断绝了生路。工场手工业地区的居民全被迫放弃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从过去的小市民中产生了大资产者,他们支配着千百个工人,就象他们的邻居

①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公爵和伯爵们支配着千百个徭役农民一样。徭役农民,由于旧工业的瓦解就丧失了原有的副业,由于新工业的发展却出现了新的需求。封建的农业经营方法已经无法同现代工业并存。徭役已必须取消。农民和地主间的封建关系已不可能继续存在。城市相继兴起来了。行会已使消费者受到限制,对行会会员不利并使工业家无法忍受。必须逐步准许竞争了。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起了根本的变化。那些旧阶级已越来越让位于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

这就是奥地利个别地区——波希米亚和伦巴第使用机器的后果。它们又或多或少地反过来影响了整个君主国;它们到处摧毁了旧的野蛮状态的基础,因而也就摧毁了奥地利王朝的基础。

1831年,当受过严格训练的奥地利士兵在罗曼内用榴霰弹回答《Viva l'Italia》(“意大利万岁!”)的呼声的时候,英国却建筑起了第一条铁路。正如机器一样,铁路也立即成为欧洲各国所必需的了。因此无论奥地利愿意与否,它也必须接受。为了使本来就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的势力不再扩大,政府就亲自动手来建筑铁路。然而这却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政府为了防止资产者成立强大的股份公司,只好向他们借款来建筑铁路,因而也就成了路特希尔德、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辛纳等的债务人。

奥地利王室更不可能避免建筑铁路所引起的后果了。

过去,崇山峻岭使奥地利君主国同外界隔绝,使波希米亚同莫拉维亚以及奥地利隔绝,使奥地利同施梯里亚隔绝,使施梯里亚同伊利里亚隔绝,使伊利里亚同伦巴第隔绝;现在,这种屏障在铁路面前粉碎了。过去各地借以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闭关自守的生

活的花岗石岩壁现在再也不能起屏障的作用了。大工业即机器生产的产品飞快地而且几乎不花运费便浸入到君主国的穷乡僻壤，摧毁了古老的手工劳动，铲除了封建的野蛮。各地相互间的贸易，和其他文明国家的贸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流向落后地区的多瑙河已不再是帝国的主要干线；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仿佛已不再存在；一条新的干线从的里雅斯特伸展到汉堡、奥斯坦德和哈佛尔，远远地伸出帝国的境界，跨过山脉，一直绵延到遥远的北海和大西洋岸边。参与全国的共同事务和干预外界的事态，已经成为必需的了。地方性的野蛮习俗日益消失。在某一些地方利益是分歧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融合为一。有的地方民族彼此分离，有的地方则结合在一起，在一堆杂乱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地区，又产生了具有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的某些相当大的集团。

“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气。蒸气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气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气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国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这是非常有趣的场面。在意大利一些封侯起来反抗了，而奥地利却不敢吭声；自由主义象瘟疫一般传遍了伦巴第，而奥地利却犹豫不决，在自己的臣民面前胆战心惊。在瑞士，奥地利过去的叛逆者（瑞士旧州的居民）却受到奥地利的保护；他们受到了攻击，但奥地利却被奥克辛本的豪言壮语吓得呆若木鸡。奥克辛本说：“只要一个奥地利士兵踏上瑞士的国土，我就开两万人到伦巴第，宣布成立意大利共和国。”于是奥地利竟徒劳无益地向它所轻视的慕尼黑

宫廷、斯图亚特宫廷和卡尔斯卢厄宫廷求救来了！在波希米亚各等级拒绝交付5万盾的税款，奥地利想追收这笔税款，但是无法从阿尔卑斯山脉抽出军队，只好向各等级作平生从未有过的让步，放弃了5万盾！在匈牙利，议会正在拟定革命的法案，而这一法案预计会得到多数的拥护；奥地利在米兰、摩地纳和巴马都需要匈牙利的轻骑兵，奥地利自己向议会提出了革命的法案，虽然它很清楚这意味着自身的死亡。这个不可动摇的奥地利，这座野蛮习俗的永久靠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才好。它浑身上下都发出了极可怕的斑疹：搔了前面后面痒，搔了后面又前面痒。

于是随着这一阵奇痒奥地利王室就要呜呼哀哉了^①。

如果老梅特涅并不急于追随他的“正直的”弗兰茨而去，他还可能看到他那勉强保全的帝国崩溃，看到帝国的大部分落入资产者手里；他还可能遇到那种闻所未闻的耻辱：“庸俗的成衣匠”或“庸俗的杂货商”在普拉特²³⁷就不再向他脱帽致敬，而只称他“梅特涅先生”了。只消再有几次动乱，几次费用浩大的备战，整个奥地利君主国就会落入沙尔·路特希尔德的钱袋。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资产者对奥地利帝国的胜利。我们只希望真正卑鄙齷齪、道地犹太人的资产者能把这个可尊敬的帝国买下来。这个可憎的、以棍棒服人的、“家长制的”、恶劣透顶的政府应该被真正恶劣透顶的、满身疥疮的、发出恶臭的敌手所征服。不过，梅特涅先生可以相信，以后我们也会无情地对付他的敌手的，就象这个敌手不久将无情地对付梅特涅本人那样。

① 原文是一句俏皮话：《Und mit diesem possierlichen Kratzen kratzt das Haus Östreich ab》——编者注（德文中“痒”《der Kratz》和“死亡”《abkratzen》在字形上是很相似的。——译者注）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奥地利的没落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奥地利的罪过是它使我们落得一个压迫其他民族、充当各国反动雇佣兵的臭名。德国人在奥地利的旗帜下奴役着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从塞拉库斯到特里延特,从热那亚到威尼斯,德国人都被当做专制制度的卑鄙的雇佣兵而遭到仇视,这一点我们应感谢奥地利君主国。谁只要亲眼看到过意大利人对 tedeschi〔德国人〕的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那种完全正当的切齿痛恨的复仇心理,他就必然会对奥地利恨之入骨,为这座野蛮习俗的靠山、德国的这种耻辱局面的崩溃而拍掌欢呼。

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德国人一定会为了洗雪奥地利加在自己头上的耻辱而向奥地利报仇。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将来摧毁奥地利的统治并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扫清走向自由的道路的,必然是德国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牺牲品已经倒下,只等刀子刺入它的咽喉。愿德国人这一次不放过时机,愿他们有足够勇气说出连拿破仑都没有敢说出的话:

《La dynastie de Habsbourg a cessé de régner》〔“哈布斯堡王朝再不能统治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25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 月 27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8 号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署名:弗·恩·

卡·马克思 2月6日的“社会辩论报” 论民主协会

2月6日的“社会辩论报”²³⁸替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和它的分部做了辩护。我们想对这个辩护的方法提出几点意见。

也许,比利时激进党是想证明给天主教徒看,他们责难比利时激进党的行动是违背自身利益的。也许,比利时激进党是想把下层僧侣和上层僧侣加以区分,并把全体僧侣恭维一番,以弥补由于它对一部分僧侣说明了真理而引起的后果。究竟为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我们只是感到奇怪,“辩论报”怎么会没有发现,弗兰德斯的天主教报刊对民主协会的攻击会立即转载在“独立报”²³⁹上,据我们所知,“独立报”并不是天主教的报纸。

“社会辩论报”声称,比利时人力图通过民主协会来达到政治改革。

我们认为,“辩论报”一时忘记了民主协会的国际性。关于这一点,它恐怕已经忘记不止一次了。“辩论报”只记得:一个力求促使民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的团体,首先应该在本国发挥作用。

“社会辩论报”并不满足于声称比利时人希望靠民主协会来实现的是什么。它还进一步谈到他们不希望靠民主协会来实现的是什么,因而也就是说,作为比利时人,为达到政治改革而建立的协

会的成员所不应该希望的是什么。Avis aux étrangers !〔外国人注意 !〕

“辩论报”说：“比利时人想靠民主协会来达到政治改革，这绝不是某些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的幻想，在那些国家里社会制度不允许存有实行真正改革的希望，因而要想获得已经得到自由的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就象水中捞月一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无论幻想发百万大财，或是幻想取得一百塔勒的地租或利润，都可以想入非非。”

显然，“辩论报”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者。

我们要问“辩论报”：“自由”英国的“些微福利”是不是表现在济贫捐比人口增长得快这一点上？

我们要问“辩论报”：它所说的“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是不是指弗兰德斯居民的贫困？

我们想要知道“辩论报”用 100 塔勒的利润或地租来顶替工资的秘密。大概它是把“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理解成自由的资本家和地主的些微福利了！

最后，我们还要问“辩论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有没有委托它去揭露那些不相信“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的空想家的谎言呢？

不过，“社会辩论报”所议论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共产主义者，而是德国共产主义者，他们由于本国的政治发展既不可能组织德国的同盟，也不可能组织德国的自由协会²⁴⁰，在绝望中只好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

我们要请“辩论报”注意，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是英国和法国，而不是德国。

德国共产主义是一切空想主义的死敌，它绝不轻视历史发展，

恰恰相反,它以历史发展为凭借;我们暂且向“社会辩论报”证明这一点,以回答它的证明。

德国在政治发展方面落后了,在这方面它还必须走过漫长的道路。我们完全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认为一个拥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要闹革命的话,是不会到自由小国家的激进主义那里去寻找衡量本国运动的准绳的。

或许,“辩论报”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特别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吧?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而是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社会了。

我们知道,罗伯特·皮尔曾经预言过由于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必然会爆发可怕的危机。我们知道,甚至基佐也认为,他在“文明史”²⁴¹中所描绘的只是阶级斗争的某些形式而已。但是,皮尔和基佐都是空想主义者。而实际主义者倒是那些一提到社会现象就认为是违反循规蹈矩的处世秘诀的人。

“社会辩论报”可以随心所欲地称颂北美和瑞士,美化它们。

我们要问“社会辩论报”,北美的政治制度能不能有一天不经过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在欧洲得到实现呢?我们认为,例如(请“辩论报”原谅我们的放肆)要使英国的宪章不是由某些梦想普选权的人来提出,而是由一个全国性的大党来提出,那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把英国工人联合成一个阶级;那时,这个宪章的目的就会完全成为另一个样子,它所引起的社会结果也会和美国以及瑞士的宪法所争取和导致的完全两样。在我们看来,空想主义者正是把政治形式和它们的社会基础分隔开来并把它们当做一般的抽象的教条的那些人。

当谈到民主协会因自由贸易问题而引起争论的时候,“社会辩

论报”对于不满足于“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的“某些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排斥,这也就向我们表明它是打算怎样来为协会辩护的。

“辩论报”说:“为讨论这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已开了六次会,本城各工厂的许多工人所提出的一些论据,即使在去年9月布鲁塞尔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会议上也不能认为是不正当的。”

在这以前,“社会辩论报”肯定说,协会几乎一致认为各民族间的绝对自由贸易就是民主的目的。

在这以后,“辩论报”在同一号上刊登了勒·阿尔迪·德·博利约先生的一篇由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残羹剩饭凑合成的非常平淡的演说。

而在结束时称赞了科布顿。

原来协会大多数人所支持的自由贸易就是经济学家会议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就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所理解的自由贸易,经过“社会辩论报”这一番阐述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2月10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2月13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13号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三个新宪法

说实在的,我们关于资产阶级即将获得胜利的预言^①应验得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快。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丹麦、那不勒斯和撒丁)都变成了立宪国家。

在意大利,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教皇领地、托斯卡纳、撒丁,一个接着一个站到了这一运动的最前列;一个国家推动着另一个国家前进,一个进步的举动每次都引起了某种新的进步举动。意大利的关税同盟²⁴²是组织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步骤,意大利资产阶级坚决地领导了民族运动,它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了。资产阶级几乎获得了君主专制时代可能获得的一切;代议制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然而意大利资产者的困难也正是在于使立宪制度获得胜利。君主们并不欢迎这些制度,资产者也不能过分地威胁他们,以免重新把他们推向奥地利的怀抱。参加关税同盟的意大利人如果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得到西西里岛起义的支援的话,那就还得等待一个很长的时期。巴勒摩的人民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赶跑了城里的国王军队^②。

① 见本卷第 505—515 页。——编者注

② 巴勒摩的 20 万居民战胜了 13000 士兵,巴黎的 100 万居民在七月革命时期战胜了七八千士兵。——编者注

阿布卢齐、亚浦利亚和卡拉布利亚再度进行了起义的尝试，就在那那不勒斯城里进行了战斗的准备。嗜血成性的斐迪南四面楚歌，依靠奥地利军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成了意大利君主中第一个被迫同意颁布宪法和允许出版完全自由的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热那亚和都灵，两个城市都要求撒丁不落在那那不勒斯的后面。查理-阿尔伯特被深深地拖入了运动，以致后退不得，又加上缺少对付奥地利的军事准备费用，就被迫在都灵人和热那亚人的非常强硬的要求面前让步，也同意了颁布宪法。毫无疑问，托斯卡纳一定会跟上来，就连庇护九世也得做新的让步。

在巴勒摩街头，意大利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它胜利了，接着应该做的就是：全面地利用这一胜利，保卫胜利的成果免遭奥地利的侵犯。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这一胜利对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新的失败。老梅特涅想必是暴跳如雷了！他早就预料到那不勒斯会发生革命，曾多次坚决要求教皇和托斯卡纳允许他的军队通过，可是却仍然不得不动他的潘都尔兵和克罗地亚兵，滞留于波河北岸。那不勒斯接二连三地派来了信使，斐迪南、科克勒和德尔·卡烈托不断向他求援，而梅特涅，这个曾在1823年和1831年作为一个万能的统治者统治过意大利的英雄今天却无能为力了。他只能静静地眼看他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最忠诚的同盟者被粉碎、遭污辱，眼看革命把整个那不勒斯放到不利于奥地利的天平盘上去。而他的15万士兵却停留在波河北岸，但是英国并没有睡觉，奥地利人跨过波河就会成为他们占领威尼斯和轰炸的里雅斯特的信号，因此残暴的

以残暴著名的从前的匈牙利步兵。——译者注

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和骠骑兵建立以前匈牙利轻骑兵的称号。——译者注

梅特涅匪帮只好手执武器,踏步不前,眼巴巴地看着那不勒斯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在意大利发生这一切事变的时期,英国的举止是非常体面的。其他的列强(无论是法国或俄国)都千方百计地援助梅特涅,只有英国站在意大利运动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奥意的保护关税协定瓦解,而反过来促使在意大利建立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反奥关税同盟。这也就是英国支持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原因,而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发展,目前也需要自由贸易,因而也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同时奥地利正在武装自己。这种军备扩展使它的财政彻底破产了。奥地利没有经费,只好向路特希尔德借债;路特希尔德声明,他不希望战争,因而不能资助战争。既然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进来干预,还有哪一个银行家会借钱给腐朽透顶的奥地利君主国来从事战争呢?因此,梅特涅再要指靠资产阶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俄国皇帝几年前靠乌拉尔和阿尔泰矿山以及谷物贸易也成了大资本家,这位白色沙皇帮助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500 万银卢布,看来已经完全变成一切没落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路特希尔德了。现在,梅特涅就向他求救。听说沙皇尼古拉答应给 7500 万,当然是以俄国利息和可靠的保证为条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沙皇除了本国的花费之外,还要抵偿普鲁士和奥地利王朝的费用,如果他的钱要浪费在无益的反对意大利的军备上,那末他的财富很快就会耗尽。

奥地利敢不敢发动战争呢?我们认为未必敢。它的财政破产了,匈牙利在激烈的骚动中,波希米亚也不可靠。而在战场上,在伦巴第,地下到处都会冒出游击队来。但是梅特涅最害怕的是英

国。目前帕麦斯顿勋爵是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立场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这次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在欧洲的另一端,在丹麦,国王^㉑已奄奄一息。他的儿子^㉒,愚蠢的快活的酒鬼立刻召集名士、等级代表委员会来开会,讨论公国^㉓和丹麦的统一宪法。为了让德国人到处出丑,公国就应当声明不愿接受这个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会使它们脱离自己的大德意志祖国!²⁴³

这件事的确可笑。公国的居民要比丹麦的居民少得多,却仍然得到同等数量的代表席位。他们的语言无论在会议上或是在记录里,确实是到处都同样有权使用。简言之,丹麦人对德国人做了一切可能做的让步,而德国人却固执地不愿放弃庸俗的民族自负心。德国人在民族利益和进步利益相符合的场合,从来也不坚持民族立场;可是在民族的和进步的相对立的时候,他们却总是坚持民族立场的。在应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场合,他们扮演起世界主义者的角色;而在没有必要直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时候,他们却又坚守民族的立场到荒唐的地步。他们在各方面都成为人的笑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公国的居民都是能干的人,并且他们在自己的发展方面超过了丹麦人,那末他们在等级院里就会获得对丹麦人的优势,因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或者他们,德国笨汉们不论在工业和政治的发展方面都落后于丹麦,那末早就应该让丹麦人拖着他们走了。强壮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向4000万德国人求援以反对丹麦人,并且拒绝走上战场,其实在那

㉑ 克里斯提安八世。——编者注

㉒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㉓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编者注

里他们所要遇到的战斗条件是和自己的敌人所处的战斗条件完全相同的,这真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他们向德意志联邦的警察求援以反对宪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正如那不勒斯的宪法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打击一样,丹麦的宪法对于普鲁士来说也是一个打击,虽然丹麦的宪法本身只不过是2月3日的一次没有成功的普鲁士宪法试验的反应而已。普鲁士政府除了已有的许多困难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困难,这就是和一个新的立宪国家毗邻;可是却失去了一个忠诚的藩臣和同盟者。

因此,意大利和丹麦都列入了立宪国家的行列,而德国却落在后面。各族人民都在前进;最小的和最弱的民族总是能够在欧洲的事变中找到便利的时机,不顾强大而反动的邻邦的意志而在本国实施一连串现代化的制度。只有4000万德国人原封未动。固然他们已不再沉睡,但是却仍然在说空话,玩弄毫无意义的政客伎俩,而不去进行实际工作。

但是如果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这种害怕行动的心理上,那它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德国人将最后出动,因为他们的革命将完全不同于西西里岛的革命。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非常清楚,在他们的背后站着日益壮大的无产者,无产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提出完全不是这些资产者和小市民所希望的要求。因此,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才表现出胆怯、犹豫和动摇,他们害怕冲突的程度并不亚于政府。

德国革命的意义比那不勒斯革命的意义重要得多。在那不勒斯互相对抗的只有奥地利和英国;在德国革命中将是整个西方对抗整个东方。那不勒斯的革命只要争得激进的资产阶级制度就算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德国的革命在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却只

是刚刚开始。

因此,德国人首先必定会在其他一切民族的面前把自己的名声弄得一败涂地,他们必定会比今天更加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必须迫使他们起来革命。到那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站起来,不过那不是胆怯的德国庸人们,而是德国的工人,他们将起来彻底结束肮脏的和摇摇欲坠的德国当局的统治,而通过激进的革命来恢复德国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2 月中旬

载于 1848 年 2 月 20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论波兰问题²⁴⁴

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的演说

先生们！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柯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柯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在于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柯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柯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末，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20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柯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

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们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什一税,不服劳役,也就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柯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柯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

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²⁴⁵。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恩格斯的演说

先生们!

今天我们纪念的这次起义并没有获得成功。在几天的英勇抵抗以后,克拉柯夫陷落,波兰的血淋淋的幽灵一度在它的凶手的眼前出现,现在又进入了坟墓。

克拉柯夫革命结果是失败了,这次失败是非常惨痛的。让我们对牺牲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对因这次失败而遭受更大奴役的2000万波兰人民,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

但是,先生们,难道我们应该做的就只有这些吗?在不幸的国家的墓地上痛哭一场,并发誓永远痛恨奴役波兰的人,同时却毫无作为,难道这就算完事了吗?

不,先生们!克拉柯夫起义的纪念日不仅是悲痛的日子;对我们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因为失败本身就包含着胜利,而且这一胜利的果实我们已经巩固地取得,失败只是暂时的。

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年轻的民主的波兰对老朽的贵族的波兰的胜利。

是的,在波兰为反对外国奴役者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前,波兰内部就已进行着隐蔽的、秘密的,但又坚决的斗争,这是被压迫的波兰人反对压迫的波兰人的斗争,波兰的民主政治反对波兰的贵族政治的斗争。

比较一下1830年和1846年,比较一下华沙和克拉柯夫吧。1830年波兰的统治阶级在立法会议上表现得那样自私、狭隘和懦弱,但在战场上却又表现得那样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满怀着坚毅和勇气。

1830年的波兰贵族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卫已得的权利不受帝王方面的侵犯。贵族把起义局限于维也纳会议乐于称为波兰王国的一块不大的地区;不让波兰其他地方也爆发起义;农民的农奴身份原封未动,依旧过着非人的牛马生活;犹太人依旧处于屈

辱的地位。如果在起义过程中,贵族不得不向人民让步,那也只是在最后,当起义已经注定要失败了的时候。

直截了当地说,1830年的起义既不是民族革命(波兰的 $\frac{3}{4}$ 没有卷入起义),也不是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这次起义一点也没有改变人民的内部状况;这是一次保守的革命。

可是在这次保守的革命的内部,就在国家的政府中,有人尖锐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目光短浅。他提出一些确实是革命的措施,这些大胆的措施使议会里的贵族感到惶恐。他号召整个旧波兰拿起武器,把波兰独立战争变成欧洲战争,赋予犹太人及农民以公民权利,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改造波兰,——他通过这些号召摸索着变民族斗争为争取自由斗争的道路;他力图使一切民族的利益和波兰人民的利益等同起来。这个人的天才订出了如此广泛而又简单的计划,要不要提一下他的名字呢?这人就是列列韦尔。

1830年,多数派贵族利令智昏,总是拒绝这些建议。但这些思想在十五年之久的奴隶生活考验下成熟起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看到克拉柯夫起义的旗帜上就写着这些原则。在克拉柯夫,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可能经受巨大损失的人了;那里已经完全没有贵族了。每一个既定步骤都具有民主勇气,这种勇气,我可以很象无产阶级的勇敢。无产阶级除了贫困以外,什么也不会失去,而得到的则是整个祖国,整个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犹豫和怀疑的余地。三个强国立刻发起进攻,宣布农民的自由、土地改革、犹太人的公民平等,绝不因为这会触犯一些贵族利益而踌躇不前。

克拉柯夫革命既不想恢复旧波兰,也不想保持外国政府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古代波兰制度;这次革命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

保守的。

不,克拉柯夫革命敌视波兰本身,敌视这个以奴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陈旧的、野蛮的、封建的、贵族的波兰,更甚于敌视波兰的外国压迫者。克拉柯夫革命绝不是要恢复这陈旧的波兰,而是要彻底消灭它,并且在它的废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阶级,依靠广大人民,建立新的、现代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为19世纪的波兰,要波兰真正成为捍卫文明的先进战士。

1830年和1846年之间存在着差别;遍地血腥,任人宰割的极端不幸的波兰有了巨大的进展;投入祖国压迫者怀抱的波兰贵族完全和波兰人民分离;波兰人民坚定不移地转到民主方面;在波兰,正如在我们这里一样,出现了阶级斗争这一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克拉柯夫革命的民主胜利就在于此,起义的结局就在于此,而当起义者为失败而雪耻时,目前的结局还会带来更多的果实。

是的,先生们,由于克拉柯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问题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已由过去的同情对象变成与一切民主主义者有切身关系的问题。1846年以前,我们应该对罪行报仇;而现在,我们应该拥护同盟者,而且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我们德国首先应该为波兰涌起的民主浪潮而高兴。我们自己在最近期内也将完成一次民主革命;我们将要同奥地利及俄罗斯的野蛮匪帮进行斗争。在1846年以前,我们还可以怀疑,如果德国发生民主革命,波兰将站在哪一边。现在,克拉柯夫革命把一切疑虑都打消了。从今以后,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便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压迫者,因为俄罗斯政府也象压迫波兰人一样地压迫着我们。无论是解放德国,无论是解放波

兰,其首要条件是根本改变德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把俄罗斯逐出德涅斯特河和德维纳河之外。

因而,我们两个民族的同盟既不是什么美梦,也不是什么幻想;不,先生们,这个同盟是我们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所绝对必要的,而且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它已成了一种必然的东西了。迄今为止,德国人民对自己事业的热心几乎只表现在口头上。为了我们波兰兄弟的利益,现在应该见诸行动了;并且象我们在座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向波兰民主主义者伸出手来一样,所有德国人民将庆祝在第一次战斗的战场上同波兰人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共同的力量将战胜我们共同的压迫者。

载于 1848 年 3 月布鲁塞尔出版的“布鲁塞尔庆祝 1846 年 2 月 22 日波兰革命两周年纪念文集”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文集

弗·恩格斯 致“改良报”²⁴⁶

鲁卡的“改良报”回答了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的一篇卑劣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总汇报”经常按照维也纳宫廷总务府的指示所发表的论文中的一篇。

下流的雷赫报纸²⁴⁷不仅把奥地利 518000 兵士对他们昏君斐迪南的忠诚捧上了天,而且还断定这些兵士(波希米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海杜克、瓦拉几亚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等)想望着德国的统一,只要皇上有意于此,他们就愿为统一而捐躯!

好象糟糕的并不是当奥地利还存在的时候,德国就必须冒险让海杜克、克罗地亚人、瓦拉几亚人来保卫自己的统一;好象当奥地利存在的时候,德国的统一除了同克罗地亚人、瓦拉几亚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统一而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改良报”非常中肯地回答那个“极下贱的”[⊙],斥责它那种说

匈牙利的一种马札儿人雇佣步兵。1605 年德兰士瓦尼亚公爵斯蒂芬·博奇科伊由于他们在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1276—1918)的斗争中有功,赐给他们贵族特权,并授以大片领土。——译者注

⊙ 俏皮话,《Allgemeine Zeitung》是“总汇报”,而《All-Gemeine》,则是“极下贱的”。——编者注

什么奥地利在伦巴第保卫着德意志民族利益的谬论,最后,“改良报”把 1848 年的意大利运动和 1813 年及 1815 年的德国解放战争相提并论,对德国人发出号召。

显然,“改良报”想借此对德国人恭维一番,否则,它决不会作出违心之事,竟把现代进步的意大利运动和这些反动的战争相提并论。正是由于这些反动的战争,意大利才受到奥地利的奴役,德国又回复了过去的极度混乱、分裂和暴政的统治,而整个欧洲则订下了 1815 年可耻的条约。

“改良报”可以相信我们,德国不仅已从这些战争的结果,而且从这些“光荣”时代的英雄们的凄惨的下场里清楚地认识到解放战争的性质。只有卖淫式的官方报纸才会竭力称颂这如醉如狂的时代。众人对此则嗤之以鼻,甚至铁十字勋章也将为之赧然。

正是这些报纸,正是这些 1813 年的以吞掉法国人为快的人,现在又象他们过去对法国人那样,对意大利人狂吠,颂扬奥地利、基督教德意志的奥地利,并鼓吹发动一次十字军远征来惩治拉丁民族的狡猾和轻率,因为意大利人本来就和法兰西人一样都属于拉丁民族!

如果意大利人想举例说明,他们从解放时代的那些拙劣的吹牛家身上能指望些什么,这些红头发的幻想家对意大利民族又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引用奥·阿·路·福伦的一首著名的歌曲²⁴⁸给他们:

来,我们来赞美边疆,
那里有曼陀令和吉他的低奏,
金色的橙子透过茂密的叶丛中闪闪发光;
我爱那德意志李子红得发紫,

也爱那勃斯多尔夫 苹果的红光

以及诸如此类的永远明达的人的诗意的狂妄的果实。然后就是关于匪徒、七首、火山、拉丁民族的狡黠、意大利妇女的不贞、臭虫、蝎子、毒药、毒蛇、凶手等等极可笑的概念。道貌岸然的李子爱好者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会产生不少这样的错觉。最后,好幻想的庸人感谢着他的上帝,因为他处在爱情与友谊的国家里,处在用板凳腿打架的国家里,处在碧眼而忠实的牧师的女儿的国家里,处在正直和纯朴的国家里,总而言之在德意志式的忠实的国家里。1813年英雄们的脑子里填满了这种对意大利的迷信的幻想,不用说,他们是从未见过意大利的。

“改良报”和从事意大利运动的所有活动家可以深信,德国的舆论坚决支持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民也和意大利人民一样,迫切希望奥地利垮台。德国人民对意大利人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欢欣鼓舞,同时,我们希望在适当时机,德意志人民将为永远结束整个奥地利的统治而投入战斗。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2 月 22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2 月 24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6 号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署名: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巴黎的革命

1848年的情况很顺利。抱着一套套宪法的西西里革命刚刚一闪而过,巴黎就发生了胜利的起义。

反对派代表公开宣称要以勇敢的游行示威来捍卫集会权,以防基佐、杜沙特尔和阿贝尔对它的侵犯。

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餐厅已布置好,正待客人赴宴。当行动时刻到来时,忽然间,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左派胆小鬼,和往常一样,怯懦地退却了。

宴会停止了。但是巴黎人民是不甘心退却的,因为他们受了众议院吹牛大王的刺激,对这些庸人的怯懦心理极为愤慨,并对持久的普遍失业现象表示不满。

星期二^①晌午时分,所有巴黎居民都拥到街头去了。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人民冲向基佐的官邸,军队都几乎保护不了,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

群众同时又向奥迪隆·巴罗家拥去,大声呼喊:“打倒巴罗!”他家的窗户玻璃也同樣被打得粉碎。巴罗先生,即这位吓破胆的肇事罪魁,就要求政府……派遣警卫队保护!

① 即 1848 年 2 月 22 日。——编者注

军队站在一旁,并没有加以干涉。只有市近卫军开了枪,并且行为异常残暴。市近卫军主要是从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即半德意志人中招募来的,每人每天的薪金是三个半法郎;他们的身材高大而且喂得很肥壮。市近卫军是当时所有军队中最卑鄙无耻的军队,他们比宪兵还坏,比旧日的瑞士近卫军还坏;一旦人民获得胜利,这支军队就得倒霉。

傍晚时分,人民起而反抗。他们建筑街垒,攻下前哨防御工事并纵火烧毁。在巴士底广场上,一个警察密探被杀死。武器铺也被捣毁。

五点钟时,国民自卫军接到了总攻击的信号。但是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而且这些人还高喊“打倒基佐!”的口号。

入夜,一切都重新平静下来。最后一些街垒被占领了,骚动似乎已告结束。

但是星期三的早晨,起义又重新爆发。蒙马特尔街以东巴黎市中心的一大块地区都筑起了街垒;从十一点钟起,军队就不敢向那儿接近。国民自卫军聚集了大批兵力,但只不过是迫使士兵放弃向人民进攻,以便宣布:“打倒基佐,改革万岁!”

按照热拉尔元帅制定的防御计划²⁴⁹,巴黎的5万名士兵也投入了战斗,于是他们就占领了全部战略据点。可是这些据点太多了,使得所有军队只能招架不能还手。除市近卫军外,几乎没有一支军队采取过攻势。热拉尔的宏大计划原来对起义倒有莫大好处;它使军队瘫痪,使这些本来就处于被动的军队更加陷于被动。彼此隔绝的堡垒反而对政府不利。而那些堡垒里又必须留卫戍部队,这就拖住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能进入战斗。谁也没有想到轰击,甚至连这些炮垒是否存在都根本记不得了。在大城市的群

众起义面前,一切防御计划都毫无用处,那是自不待言的!

晌午时分国民自卫军队伍里对内阁不满的怨声极为强烈,以致许多校官在土伊勒里宫发出通告说,如是内阁仍然执掌政权,他们就不能担保自己军队的行动。

下午二时,年老的路易-菲力浦不得不把基佐免职,另组新阁。这一消息刚一宣布,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就欢天喜地,四散回家,装起彩灯以示庆祝。

但是建筑街垒、冒着枪林弹雨同市近卫军进行斗争的人民,即工人,决不是为了摩莱先生和比约先生²⁵⁰而战的。他们还是继续斗争。当意大利大街正兴高彩烈欢喜若狂的时候,圣阿瓦街和朗比多街上却子弹横飞。斗争持续到深夜,直至星期四的早晨还没有停止。巴黎四周所有铁道全被破坏,就证明工人是普遍地参加了这一斗争的。

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他们推翻了基佐,并结束了大交易所经纪人的独占统治。但在目前的第二场斗争中,已经不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相对峙:目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相对峙了。

* * *

刚刚传来的消息说,人民已经获得胜利,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巴黎的无产阶级会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临时政府中有三个委员是属于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是“改革报”。有一个委员是工人[⊖],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

⊖ 即阿尔伯。——编者注

家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其余的委员是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和“国民权”的两个活动家²⁵¹。

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

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

应该相信，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德国现在如果不从屈辱中振作起来，将来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力、尊严和勇气，那末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2 月 25—26 日

载于 1848 年 2 月 27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5 年

“历史问题”杂志第 11 期

弗·恩格斯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由于法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就比平时更加引人注目。所以我要赶忙把2月25日星期五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告诉给您的读者。

那天晚上整个布鲁塞尔都处在不安和激动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但谁也没有认真听信。车站上挤满了各阶层的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新消息。法国大使，从前的吕敏尼侯爵也在那里。夜里十二点半到站的列车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说星期四那天爆发了革命；所有的人忽然一致热烈地高呼：《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星期六一天平静无事。但是星期日街道上挤满了人群，每个人都想知道，民主协会和同盟这两个组织将采取什么措施。这两个组织在晚上都召开了会议。同盟（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团体）决定再等等看，因而脱离了运动。民主协会则通过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议，从而使自己处于运动的前列。他们决定把每星期集会一次改为每天一次，并向市政委员会递送了请愿书，要求不仅把武器发给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军，而且发给每个地区所有的公民。晚上街道上发生了一些骚动。人们高呼：《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并聚集在市政厅大

厦的周围。许多人被逮捕了,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情。

被逮捕的人当中有两个德国人,一个是政治流亡者沃尔弗先生,另一个是工人。您一定知道,布鲁塞尔这里有一个德意志工人协会。这个协会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且发行一份德文的民主主义报纸^①。大家知道,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都是非常积极的不屈不挠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几乎都是民主协会的会员,而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副主席马克思博士也是民主协会的副主席。

政府非常了解,在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的相当一部分居民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是比较浓厚的,于是它就立刻利用这种情况散布谣言,说什么所有为争取共和制度的鼓动都是一些德国人搞起来的,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的,他们由于自己的卑劣行为已经被三四个国家驱逐出境,他们打算独揽他们所预谋的比利时共和国的大权。这个惊人的消息星期一就传遍了全城。不到一天的功夫,组成市民自卫军的全体小店主便异口同声地叫嚷着反对那些想把他们幸福的比利时祖国拖到革命中去的德国造反者。

德国人曾指定一个咖啡馆为集会的地点,每个人应当把巴黎的最新消息带到这里来。但是,由于小店主喧嚷得太厉害,由于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风声,说政府要如何如何对付德国人,所以德国人甚至不得不放弃这种与人无损的交往办法。

星期日晚上警察已经警告咖啡馆的老板、即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在地的房东,今后他不得再让德意志工人协会在这里举行任何会议。

①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编者注

德国人在这整个期间表现得非常好。虽然他们遭到警察的最卑鄙的迫害,但他们仍然坚守岗位。他们每晚都出席民主协会的会议。他们避开街道上一切喧嚷拥挤的人群,但是他们表示,即使本身遭到不幸,在危急的时刻他们绝不会抛弃自己的比利时弟兄。

过了几天,星期日和星期一那种不寻常的激昂情绪平息了,人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政府也从第一次惊恐中恢复了常态,这时候又发生了一系列迫害德国人的事情。政府颁布了许多命令,根据这些命令,所有失业的外国工人将被立刻驱逐出境,而所有身份证不妥贴的外国人也要遭到同样的对待。除了采取这些措施外,政府同时还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使企业主也反对所有的外国工人,结果德国人便无法找到工作。连那些原来有工作的德国人也失掉了工作,从此就听候驱逐出境法令的支使了。

政府不但迫害失业的工人,而且还迫害妇女。一个年轻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丈夫的资格和一个法国女子同居(这是符合法国和比利时的风俗习惯的),大概由于他在布鲁塞尔的居留使警察局感到不安,于是便突然遭到了迫害,这迫害表现在对他的情人的追究上。借口她没有身份证(哪一个住在比利时的人以前曾想到向一个妇女要身份证的事!),就威胁要把她立刻驱逐出境,警察局还声明说,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她本人,不如说是由于和她同居的那个人。三天内警官就到她家里去了七次。她被叫到警察局好几次,最后,由一个警察把她带到了警察总局。要不是有一位有威信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出面干预,她必然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迫害工人,放风声说某某人将被逮捕,星期二晚上将在城市所有的咖啡馆里搜捕德国人,——所有这一切,我再重复一遍,和我现在所要告诉您的事情比较起

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星期五^①晚上,马克思博士(还有其他一些人)接到了国王的一道命令,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国境。夜里一点钟,当他收拾行李准备启程的时候,一个警官带着十个武装警察,违反在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公民住宅不可侵犯的法律,闯入马克思的住宅,逮捕了他,把他押解到市政厅监狱。除了说他的身份证不妥贴(虽然他至少给他们拿出了三个身份证,并且他在布鲁塞尔已经住了三年)外,没有说明逮捕他的任何理由!马克思就这样被带走了。他的妻子非常惊惶不安,立刻跑到一位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那里去。若特兰先生总是乐于帮助被迫害的外国人,我在叙述前面那件事情时所提到的正是他的友谊的干预。马克思夫人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位比利时友人日果先生。他送她回家去。到家时,他们看到两个曾逮捕马克思的警察站在门口。马克思夫人问道:“你们把我的丈夫带到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如果您跟我们走,我们就告诉您他在哪里。”警察把她和日果先生一起带到市政厅,但是,他们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反而把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交给了警察局,于是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就被关进监狱。马克思夫人的三个小孩子被留在家里由女仆照管,她自己被关进一间囚着一群最下流妓女的牢房,她便和这些娼妓在一块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被移到另一个根本没有生火的房间,在那里一直待了三小时,冷得直打哆嗦。日果先生也被扣留起来。马克思先生同一个狂暴的疯子关在一个牢房里,因此他必须时刻提防着这个疯子。所有这些卑鄙的行为还不算够,看守人也用最

① 原文中误为“星期六”。——编者注

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

下午三时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终于被提审,法官很快就释放了他们。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游荡罪,因为他们两个人没有随身带着身份证!

马克思先生也被释放了,但是命令他在当天晚上离开国境。原来给他料理私事的二十四小时中,有十八小时他被非法关在监狱,在这期间,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妻子也被迫离开他们的三个孩子(其中最大的女孩还不满四岁);最后,他来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被驱逐出境了。

日果先生在被捕的前一天才从监狱释放出来。他上一次是在星期一早晨六点钟和三个列日的民主主义者一起在旅馆里被逮捕的,他们全部是被加以游荡罪名而被逮捕起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带身份证。星期二就已经下令释放他们,但仍然非法地把他们扣留到星期四。他们之中的特德斯科先生直到如今还在监牢里,而且谁也不知道究竟给他加的是什么罪名。他和沃尔弗先生俩人不是即将被释放,就是在这个星期内提交法庭审判。

但是,我必须指出,比利时的工人和比利时的许多民主主义者,尤其是若特兰先生,对被迫害的德国人的态度是非常好的。他们已经摆脱了一切狭隘的民族感情。他们不是把我们看作外国人,而是看作民主主义者。

我听说,政府已经下令逮捕比利时工人、英勇的民主主义者德·居阿斯科先生。昨天法庭审讯了被指控为参加叛乱而在上个星期日被捕的另一个民主主义者达希先生;可是还没有宣判。

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没有更坏的遭遇的话,因为谁也不能预料这个俄国式的比利时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手

段。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这就是德国民主主义者在这个“自由的”、如报纸所说,比法兰西共和国毫不逊色的国家里的处境。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您的老朋友

3月5日于布鲁塞尔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1848年3月25日
“北极星报”第54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给“改革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比利时政府现在已经完全倒向支持神圣同盟政策的那一边去了。它的反动的怒火驱使它极端暴虐地对待德国民主主义者。如果不是这些针对我们的迫害激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怒，我们真要嘲笑罗日埃内阁，嘲笑它的可笑的处境——它怪罪一些德国人违背比利时人自己的愿望企图强迫他们接受共和国；但在我们所指的那桩事上，可鄙甚于可笑。

编辑先生，首先应该告诉您，几乎所有的布鲁塞尔报纸都是法国人编辑的，他们大多是为了躲避祖国对他们的可耻的惩罚而逃出来的。这些法国人在1833年曾出卖了比利时的独立²⁵²，现在他们对保卫比利时的独立却表示无限关切。国王、大臣和他们的仆从利用这些报纸来加强这种看法：似乎比利时的具有共和精神的革命本来只是francequillonnerie^①，而目前比利时境内已可感觉到的民主鼓动，则全是好激动的德国人搞出来的。

德国人绝不否认他们公开地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但他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由于什么激动。但是在皇家检察官看来，

① 弗拉曼特语中表示轻视的说法，意思是：“毫无意义地模仿法国的一切”。——编者注

这等于煽动工人反对资产者,等于挑拨比利时人不信任他们心爱的德籍国王,这就是德国人为法国的侵略打开比利时的大门。

3月3日傍晚五时,我接到了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国的命令。当天夜里,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警察闯进了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时前才给我的。

编辑先生,我的被捕和遭到的粗暴对待甚至在奥地利都是难以想象的,否则我也不谈这些了。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特兰先生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陪她一起去警察局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先生对警官提出这些荒谬而无礼的问题表示愤怒,但警察禁止他说话,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十一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

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详细了。只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满,我们不得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48 年 3 月 6 日左右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8 年 3 月 8 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卡·马克思 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²⁵³

2月27日星期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了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事前就已知道,出席大会的将有大批工人,他们对协会所认为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将坚决地积极加以支持。

政府方面散布出空气,好象只要人民愿意,国王列奥波特就准备逊位。这是对比时民主派设下的圈套,目的是使他们不要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来反对这样慈祥的国王,因为国王一心渴望卸下王权的重负,只求遵照礼节给他一笔可观的养老金就是了。

这时候,王国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份被认为犯有破坏社会秩序罪而必须当晚逮捕的名单。经与暗探局局长奥迪先生策划,在该名单中确定应将外国人列为无中生有的所谓骚动的主谋人,他的用意是要转移人们的视听,使人们不大注意大批公认为坚决的共和主义者的比利时人的被捕,并挑拨民族感情。这便说明为什么在不久以后罗日埃先生阁下(他之不是比利时人正如列奥波特国王陛下之不是法国人一样)就发表了指令,要所有地方当局严密监视法国人(罗日埃的同国人)和德国人(列奥波特的同国人)。这个指令在形式上很象嫌疑法。

对2月27日晚上被捕的人来说,一切所谓煽动挑拨都是莫须

有的罪名,因而实施这一布置得非常周密的计划也就显得更为卑鄙,更为恶毒。

逮捕这些人可以说只是为了任意折磨他们和尽情地嘲弄他们。

他们被捕后就立刻遭到拳打脚踢和军刀的痛殴。这些共和主义者的脸上被吐口水,他们在慈善家奥迪面前横遭侮辱,而这位慈善家则因为能使外国人知道自己的厉害而得意忘形。

既然找不到控告他们的任何罪证,那只有将他们释放。可是,并不是这样!他们却在监狱里关了六天之久。然后,又用监狱的马车把这些被捕者中的外国人直接押上火车。那里,他们都被关进囚车,互相隔离,然后发送到基埃夫兰,被比利时的宪兵逐向法国边境。

最后,他们发觉自己已在自由的土地上,才有些清醒过来,那时他们口袋里除了一份填有被捕前夕日期的驱逐令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被逐者之中有一位是法国人阿拉尔先生。

就在这个时候,比利时小国之王的政府在下院宣布:比利时王国,包括两个弗兰德斯在内,是可能有的共和国中最好的共和国,它有着象奥迪先生这样的人所统领的模范警察,旧共和主义者,傅利叶主义者和新出现的列奥波特的信徒在奥迪先生一人身上都兼而有之。下院高兴得流泪,而天主教报纸和自由派报纸对国王列奥波特的私德和他的家仆罗日埃的公德则备加赞扬。

比利时民意倾向于共和政体。列奥波特只有在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耶稣会教徒、官僚以及那些被逐出法国后成为比利时行政及新闻界首脑人物的前法国人中间,才有他的信徒。

梅特涅由于碰巧就在法国边上有了象科布尔克家族的代表这

样一个法国革命的死敌而喜不自胜。可是,他忘却了目前人们只有在婚姻问题上才考虑到科布尔克家族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3 月 10 日左右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8 年 3 月 12 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比利时的状况²⁵⁴

3月18日于布鲁塞尔

两星期前,比利时资产阶级拒绝了人民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而现在这个阶级却准备发起争取共和国的运动。它还不敢公开宣布,但整个布鲁塞尔都已在窃窃私语:“列奥波特必须下台,这是肯定的。只有共和国才能拯救我们,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象样的共和国,在那里既没有劳动组织和普选权,也没有工人方面的干涉!”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不久前竭力反对一切模仿法兰西共和国的企图的可敬的布鲁塞尔资产者,已经尝到了巴黎财政危机的恶果。他们痛骂在政治上模仿别人,可是自己却沉湎于在财政上模仿别人。他们盛赞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可是自己却看到比利时的交易所完全屈从巴黎的交易所。南部国境线上的军事警戒线,挡不住有价证券狂跌的怒潮以排出倒海之势涌入有保证的中立的比利时领土。

事实上,布鲁塞尔的交易所几乎完全麻木了。许多中小商人因破产而毁灭,有价证券再也找不到买主,交易所牌价徒有其名,现金比在巴黎还消失得快,商业完全停顿,大多数企业家已在解雇工人。这里举几个证券普遍跌价的例子:几天以前,一个实业家想

出售 150 张票面 100 法郎的唐德尔河流域铁路的股票 ;二月革命前 ,在伦敦交易所中这种股票的市价是高于票面价格的。第一天他不肯按每股 45 法郎的价格出售 ,第二天又不肯按每股 35 法郎出售 ,到第三天 ,他只得按每股 10 法郎售出 ! 两年以前价值 6000 法郎的土地 ,现在甚至连 $\frac{1}{3}$ 的价钱也卖不到 !

正当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 ,政府要求先预征 $\frac{2}{3}$ 的直接税 ,然后发行五、六千万强制公债。这些措施在原来就因预算不断增长而不满的纳税人中间引起了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可敬的资产者不能不相信 ,由于他们拜倒在君主政体面前 ,虽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一点在法国已经获得的好处 ,但是却必须完全分担由法国的情况所引起的一切忧虑。这就是共和主义精神在他们中间活跃起来的真正原因。

可是 ,工人们决不甘沉寂。几天来根特发生了骚动 ,前天在布鲁塞尔工人们纷纷集会 ,向国王递出请愿书。列奥波特只得屈尊往迎 ,亲自从长满老茧的手中把请愿书接过去。接着就发生了气势更加浩大的示威游行。每天都有大批工人失业。只要工业危机再延长一些时候 ,只要工人阶级的情绪更为炽烈一些 ,比利时资产阶级 ,就会象巴黎资产阶级一样 ,同共和国结成“利害婚姻”。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3 月 18 日

原文是法文

本文原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院于 1932 年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补 遗

弗·恩格斯

英国谷物法史

在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输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贵,许多耕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发明,正在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发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输入粮食。由于革命时期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输入发生困难,迫使英国用粮多少局限于本国所生产的。战争所造成的输入困难起了保护关税的作用。谷物价格上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租也就增加到以前的两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因此,不久前变成牧场的大部分土地,又重新种植谷物了。英国土地占有者(顺便说说,他们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左右从男爵和出

这篇文章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新发现的,发表于1965年8月“统一”(《Einheit》)杂志第8期。本文按写作日期应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俄文版因当时第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因此作为补遗收入第四卷,我们也由于来不及编入第二卷,暂时仍按俄文版收入第四卷中,待再版时改正。——编者注

身于非贵族的乡绅)的收入大大增加,于是他们追求起豪华奢侈挥霍无度的生活来,这样,即使他们地租有所增加,也很快就入不敷出。不久他们的庄园就为重债所累。1814年的和平清除了输入上的障碍,因而粮价下跌,由于租金过高,租佃者的收入已不足抵偿粮食的生产费用;当时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土地占有者降低地租,或是实行真正的保护关税来代替过去实际上起了保护关税作用的东西。土地占有者,他们不仅在上院和内阁里占着优势,同时在下院也几乎有绝对的权力(在改革法案实施以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于是不顾资产阶级以及当时还受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激愤,于1815年借助刺刀实行了谷物法。1815年的第一个谷物法规定,在英国粮价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达到这种价格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许可从国外自由输入粮食。然而,这个法律不仅不符合工业居民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农业居民的利益,于是在1822年又做了若干修改。但是,这次修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近几年来粮价总是低廉,从来没有到过许可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水平。虽然历次修改法律,议会又屡次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租佃者仍然不能补偿自己的生产费用,于是哈斯基森和坎宁终于发明了著名的Sliding-Scale(调节制),这一制度后来被他们的内阁继任者订为法律²⁵⁵。依据这一调节制,进口税随着国内粮价下跌而提高,随着粮价上涨而降低。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英国租佃者获得一个高昂而固定的粮价,使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支付高额地租。然而,这一措施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一制度日益使人不堪容忍,从实施改革法案以来,在下院占统治地

夸特是英国的容量单位,约合2 909公石。——编者注

位的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反对谷物法了,于是罗伯特·皮包爵士在组阁一年以后,就不得不降低关税。

反对谷物法的反对党也组织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粮食腾贵而不得不给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代表农业利益的旧统治(而且这种统治使其他国家易于同英国工业进行竞争)的最后遗迹。1838年底,曼彻斯特的几个大厂主创立了一个反谷物法协会;这个协会的势力在曼彻斯特近郊和其他工业地区迅速展开来;反谷物法协会后来称为反谷物法同盟,它组织募捐,创办杂志(“反谷物税通报”²⁵⁶),并出资派遣演说家到各地去,利用一切英国惯用的鼓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谷物法同盟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正好是处于萧条状态的那四年),其言论是极端激烈的。当1842年初萧条变为真正的商业危机而使全国工人阶级陷于可怕的贫困时,反谷物法同盟就成为真正革命的同盟了。它的口号就是耶利米的格言:“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它的机关刊物明确地号召人民去造反,并以“长枪和火把”威胁土地占有者。它的巡回鼓动家们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处宣传鼓动,他们所用的语言,比之他们的机关刊物也并无逊色。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召开,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一份接着一份散发,而且正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同盟也就在紧靠议会大厦的隔壁同时召开代表大会。当皮尔不顾所有这一切,对谷物法只作修改而拒绝废除时,这个代表大会就声明说:

“人民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们应当只靠自己;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停止政府机器车轮的转动;使用言语的时刻已经过去,行动的时刻

见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9节。——编者注

已赶到来 ;应该相信人民不愿再为穷奢极欲的贵族而活活饿死 ,如果这一切都不行 ,还有一个能够迫使政府让步的办法 :必须(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大厂主和市政官吏的这个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声明的)把人民派遣到产生各种贫困的农业区去 ;但是人民不应该象一群温顺的‘贫民’似的而要象‘去仇敌那里扎营’似的开进去。”

厂主们想采取一种巨大措施 ,于二十四小时内就在曼彻斯特赛马场召开一次 50 万人的集会并发动一次反谷物法的起义 ,这就是关闭他们的工厂。

七月里情况开始好转。定货数量增加了 ,厂主们发觉危机即将结束。但是人民仍然愤愤不平 ,贫困现象到处都是 ;既然反正总是要出事 ,那就应该马上行动。一个斯泰里布雷芝的厂主当情况已经好转而本应提高工资的时候 ,反而突然降低了工人的工资 ,这便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求把工资保持在从前的水平上。于是这件事便成为工人起义的信号 ,工人使城内和近郊的全部工厂停了工 ,他们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 ,因为厂主(全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一反往常 ,并就有加以任何阻挠。工人召集会议 ;会上厂主亲自担任主席 ,他们企图把工人的注意力转到谷物法上。1842 年 8 月 9 日 ,即起义后四天 ,工人进入了曼彻斯特 ,在那里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就使全部工厂停了工。反对他们的只有一个厂主 ,他是保守党人 ,是同盟的敌人。起义扩展到了所有工业区 ;市政当局(大家知道 ,在英国 ,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由市政当局决定)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员 ,他们哪里也没有反对起义者。这期间 ,同盟的活动家一直是为所欲为的。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失算了。他们为了要用强力废除谷物法而把人民拖到起义中去 ,可是

人民却很少想到这些谷物法。人民所要求的是 1840 年水平的工资和实现人民宪章。同盟发觉这一点以后,就立即掉转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同盟者。同盟的全体成员都报名当了特别警察,他们宣了誓,组织了一支镇压起义的新军队——一支为他们所敌视的政府服务的军队。人民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突然爆发是出于人民意外的,因为人民根本就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起义);谷物法依旧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资产阶级或人民又都受了一次教训。反谷物法同盟为了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因起义失败而被彻底打垮,于 1843 年又掀起一个巨大运动,号召盟员募集 5 万英镑;在一年内,同盟就超额地募集到这笔款项。同盟重新开始了鼓动,但不久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听众。它总是吹嘘,从 1843 年起,在工业区已无事可做,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转向农业区了。但是症结却正在于此。1842 年起义以后,曾经被无耻地出卖过的人民愤慨万分,那时同盟的代表人物已无法在工业区召开公开会议,否则就会被人民打得头破血流,狼狈地赶下讲台。因此,他们为了替自己的那一套言论找市场,就不得不到农业区去。这里同盟是有某些实际功绩的,它使租佃者因以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羞愧情感,并使农业阶级成为关心整体利益的阶级。1844 年,同盟在前次募捐获得成就的鼓舞下,宣称将开展一次总额为 10 万英镑的新的募捐。第二天,曼彻斯特的厂主曾聚集一堂,半小时内就认捐了 12000 英镑,1844 年 11 月认捐总额达 82000 英镑,其中 57000 英镑已经付款。几个月以后,展览会在伦敦开幕了,它也会使同盟有一笔巨额的收入。这一巨大的运动从曼彻斯特扩展到整个英国,吸引了英国极大多数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再说一遍)丝毫也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同情;如果我们问一

下：这个运动的动因是什么，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首先是大不列颠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私利。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其次，资产阶级还要求把这一措施作为改革法案的补充法。改革法案规定采用选举资格，废除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旧有的选举特权，这在原则上应该使资产者富豪阶级掌握政权；但在实际上，土地占有者阶级在议会中还保存着相当大的优势，他们派到议会去的代表直接的有各郡产生的 143 人，间接的有小城市产生的几乎所有代表，此外，大城市的托利党人代表也是代表他们的。农业利益的这种优势，使皮尔在 1841 年建立了托利党人的内阁。废除谷物法会给下院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势力以致命打击，换句话说，实际上会给全部英国法律以致命打击，使租佃者不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独立。废除谷物法意味着宣布资本为英国的最高权力，而英国宪法就会根本动摇；立法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土地贵族的一切财富和一切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前途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措施。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废除谷物法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秋

载于 1845 年 12 月“德意志电讯”
杂志第 193 和 194 期

编辑部附注中说明作者为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电讯”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附 录

附 录

马克思所做的关于 1847 年 8 月 5 日 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 和区部的记录

8 月 5 日。建立新支部。

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日果当选为秘书兼财务员。

区部委员会：日果、荣格、马克思、沃尔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²⁵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 同盟

第一条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第二条 盟员的条件：

- (a)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 (b)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 (c)承认共产主义；
 - (d)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 (e)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 (f)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 (g)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 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见第八章)。

第三条 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四条 盟员皆有盟内代号。

第五条 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第二章 支部

第六条 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条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财务,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 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九条 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 各支部均须有特别称号。

第十一条 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章 区部

第十二条 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 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 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 各独立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 总区部

第十六条 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 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按省划分同盟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第十八条 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该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 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

第二十条 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五章 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第六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 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 每年9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 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领导。

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 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

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

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

第七章 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 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 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

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 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 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 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第八章 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条 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见第二条),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

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条 开除盟籍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 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各别盟员离盟,但必须立即报告上级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

第四十条 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重新入盟问题,须由中央委员会根据区部的提议处理。

第四十一条 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 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第九章 盟的经费

第四十三条 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反缴纳的最低盟费。

第四十四条 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和组织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六条 地方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七条 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费，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暂时离盟。

第四十八条 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经费分配情况和盟的收支情况。任何滥用盟的经费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十九条 特别费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费用由特殊收入开支。

第十章 接收盟员

第五十条 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员宣读和说明章程的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入盟者应尽的义务，然后向他发问：“那末，你愿意加入这个同盟吗？”如果后者回答：“愿意！”那末主席就要他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他编入支部。

受 1847 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之委托公布。

秘书

主席

签名：恩格斯

签名：卡尔·沙佩尔

1847 年 12 月 8 日于伦敦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伦敦 “民主派兄弟协会”

去年 12 月的来信收到 ,我们立即讨论了关于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以及贵会和我会每月进行通信的建议。²⁵⁸

你们考虑到将来要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 ,因而建议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这里召开 ;你们建议我会在今年比利时革命纪念时举行第一次会议 ,并由我会委员会准备会议议程 ;这些建议都已一致热烈通过了。

你们表示准备每月和我会进行定期的通信 ,我们同样竭诚欢迎。

现在 ,概括地叙述一下我们的成就和我们事业的一般情况。

我会正在蓬勃发展 ,实堪欣慰。会员人数每周都有增加 ,所有公众 ,尤其是工人阶级 ,已愈来愈关心我们的活动。

但是 ,足以更好地证明我们的成就的却是我们的运动在比利时各省所引起的关注。比利时一些最大的城市向我们提出要求 ,希望我们派遣代表帮助他们建立象我们这样的民主协会 ,并和首都的协会建立经常的联系。

我们立即对这些要求作了答复。为了召开大会以建立协会的分会 ,我们派遣了代表团到根特。到会的人数极多 ,大会以不可名

状的热情接待了我们由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代表团。立即通过了建立民主协会的决议,并编制了会员名单。此后,我们得到根特来的消息,知道协会终于成立,而且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到会人数比第一次大会更多,情况也更为热烈。出席会议的有三千多公民,令人高兴的是其中大多数是工人。

我们认为狂根特所取得的进展是我们在比利时的事业的最大成就。根特是比利时的主要工业城市,居民达十万以上,可以说是弗兰德斯所有劳动居民的中心。根特所处的地位对整个比利时工人运动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比利时的曼彻斯特的工厂工人的那种再接再厉展开纯民主运动的决心,体现着、预示着比利时大多数无产者的同样决心。

在下次信中,我们想报道一些我们在比利时其他城市中的进一步成就,这些成就将逐渐恢复比利时的强大、团结而有组织的民主党。

你们最近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²⁵⁹中关于“国防”问题的见解,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希望,这篇告工人书将使英国人民充分认识清楚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我们对英国宪章派的大多数为了最后建立爱尔兰人民和大不列颠人民的紧密同盟所采取的步骤,同样感到非常的满意。爱尔兰人民由于成见,对英格兰的被压迫阶级和两国的压迫者毫无区别地都一概加以憎恨,我们觉得现在消除这种成见的可能性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希望,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人民运动将很快由菲格斯·奥康瑙尔一人统一领导起来,同时我们认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被压迫阶级在民主旗帜下形成的这种团结将是我们整个事业的最重要的成就。

最后,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敬意。

民主协会委员会:

主 席 律·若特兰

副 主 席 卡·马克思

律师兼秘书 阿·皮卡尔

1848年2月13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 1848 年 3 月 4 日
“北极星报”第 54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民主协会 1848 年 2 月 20 日 会议的报道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2 月 20 日会议。主席为马克思先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个发言，他抨击了法国政府在“巴黎通报”上发表的关于他被驱逐出法国的文章。恩格斯简短地叙述了他被驱逐的情况²⁶⁰。

协会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说明表示非常满意。许多发言人都作了这样的表示，同时还补充描述了法国政府以前驱逐外国人的情形。

这些发言都已编入民主协会的正式文件汇编。

载于 1848 年 2 月 24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致“北极星报”编辑、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 朱利安·哈尼先生

巴黎刚发生了光荣的革命,这是你们已经知道的。

我们应该告诉你们,这个重大的事件促使民主协会在这里采取和平的、但是有力的宣传,以便利用比利时政治制度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条件来取得法国人民刚刚争到的幸福。

在热烈赞同下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民主协会将每晚举行会议,吸收公众参加。
- 2 以协会的名义向法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我们同情 2 月 24 日的革命。
- 3 向布鲁塞尔的市政委员会提议建立市的武装力量,以避免任何流血事件并维持社会安宁,这支武装力量基本上由市民自卫军组成,即由平时持有武器的资产者和在非常时期依照国家法律必须加以武装的手工业者所组成。这样,就能将武器均等地分发给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关于以后的步骤和成就我们将尽可能地经常通知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也很快就能使人民宪章成为你们国家的一种法律,并希望这将有助于你们取得新的进一步的成就。

最后,我们建议你们在这个紧要的时期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

系,把你们国家中发生的、可能对比利时人民有利的一切新东西告诉我们。

委员会委员们签名

1848年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 1848年3月1
日“社会辩论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辩论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们和 临时政府委员们

公民啊！

民主协会怀着崇高的敬意祝贺你们，祝贺法兰西民族最近完成的功绩，并感谢你们对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本会以团结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谊为目的，我们的协会不久以前已在布鲁塞尔成立，它由欧洲各民族的代表组成。我们正同比利时人一起在他们的领土上利用那些早就允许自由地公开发表任何政治宗教见解的制度，进行工作。

我们也曾向瑞士人致敬，祝贺他们最近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动就是各民族解放事业的开端。落在你们肩上的使命就是以全力来继续这一事业，英勇的巴黎人民每当执行自己使命的时候总是这样表现的。我们坚信，不需很久，我们就会以对瑞士人所致的敬意向法国人致敬。法国已离我们向它祝贺的时候不远了。至于说希望各民族今后急起直追你们，那就自不待言了。

我们认为完全可以相信，同法兰西紧紧毗邻的民族将最先追随法兰西走上它刚刚走过的道路。

法国所完成的革命首先巩固了法国和各民族的联系，而并没有威胁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估计。我们向 1848 年 2 月的法国致敬，因为它是各民族的模范，而不是各

民族的统治者。从今以后 ,法国不再需要别的敬重了。

我们看到 ,命运操在你们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伟大民族 ,真正是在普遍的信任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公民们 ,我们也看到 ,这个伟大的民族 ,甚至和一向被其视为争雄对手的其他民族重新建立起曾为少数人的腐朽政策所破坏的联盟。英国和德国重新向你们伟大的国家伸出了手。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也将振奋起来 ,或者在你们联盟的庇护下享受安静和自由。象拉撒路一样 ,波兰定会从死中复活 ,响应你们以三种文字向她发出的号召。

最后 ,甚至俄国也必然会发出西方和南方人民还很不熟悉的呼声来响应你们。法国人 ,荣誉和光荣归于你们 !你们奠定了各民族联盟的基础 ,这种联盟是你们不朽的贝朗热早就预言式地歌颂过的。

公民们 ,我们怀着不可动摇的兄弟友谊 ,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以团结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谊为目的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

签名 :主席律·若特兰律师 ,副主席卡·马克思 ;
名誉主席梅利奈将军 ,根特民主协会主席
斯皮特霍恩律师 ;布鲁塞尔大学教授迈因
茨 ;列列韦尔 ;财务员巴兰 ;副书记巴泰 ;
工人佩列林 ,批发商拉比奥。

1848年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载于1848年3月4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48年3月3日的决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伦敦中央委员会已卸除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并将其所在地迁到布鲁塞尔，本此决定布鲁塞尔总区部的区部委员会即被确立为中央委员会；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

鉴于：

在目前形势下，要在布鲁塞尔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合是不可能的；

布鲁塞尔的同盟领导人员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都有被驱逐出比利时的可能；

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

目前的形势要求要对同盟进行非常有力的领导，为此无疑地必须使领导人员有权自行处理一切事务；

因此决定：

1 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

2 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盟员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这项工作他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委员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负责。

3 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一俟情况许可，就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应是最适当的盟员，为此甚至可以将不住在巴黎的盟员召去。

4 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

本决议于 1848 年 3 月 3 日在布鲁塞尔通过。

中央委员会

签名：恩格斯，弗·费舍，日果，

亨·施泰因根斯，卡·马克思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1册 1853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第1册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年3月8日会议记录

1848年3月8日支部会议记录

选出 主席 :卡·沙佩尔

秘书 :卡·马克思

沙佩尔提议我们组成巴黎区部而不单是一个支部。

马克思等表示同意。通过。

海尔曼被通过。

讨论关于重新接受本支部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问题。

波尔恩汇报了“欧罗巴”咖啡馆的会议情况,斯特尔比茨基也做了同样的汇报。多数票决定不到德克尔和费奈选举行会议的这个咖啡馆去。

恩格勒、布赫芬克和福格勒(魏特林派)被一致通过。

一致决定 :委托上述三位盟员吸收魏特林支部中他们认为可以吸收的人员加入本支部。

席林被一致通过。

批准下列几人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负责人 :

主席 :亨·鲍威尔

副主席 :海尔曼

秘书两人 :波尔恩和福格尔

财务员 :莫尔

干事三人 :布赫芬克 ,沙佩尔 ,霍尔奈。

决定主席应用“朋友们”来称呼别人 ,其他人自便。

委托马克思起草工人团体的章程。

公开团体应该命名为德国工人俱乐部²⁶¹。

威廉·赫格尔被接受为盟员(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并有亨·鲍威尔附议)。

公开团体的地址应在市中心。委托盟员数人去寻找适当的地址。

同盟会议定在圣奥诺莱区圣路易街6号举行。

斯特尔比茨基提议海尔是为候选人 ,通过。

秘书 卡·马克思 主席 卡·沙佩尔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3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年3月9日联席会议记录

3月9日晚九时举行

马克思把他起草的章程草案²⁶²提交会议讨论。

第一条以大多数票对两票通过。第二条全体一致通过。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也同样全体一致通过。

这样,章程草案就无修改地通过了。接着秘书宣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新入盟的盟员听完章程后,声明他们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提议全体盟员报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决议:同盟的每一个盟员要报告他在这里所用的名字和他的住址。

沙佩尔提议除主席和秘书外,再选出五个人组成巴黎区部委员会。

四个支部中每个支部应该选出一人,选举延到下一次会议举行。

沙佩尔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决定每一个人发言时必须起立并脱帽。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同

盟的总的情况的报告。

波尔恩曾被派往骑术学校开会并汇报会议情况。三刻钟后他即返回 ,描述了协会²⁶³的糟糕情景。

下一次会议定于本星期六 8 时在圣奥诺莱区格列涅尔街“比利时”咖啡馆举行。

闭会前盟员向秘书报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马克思提议全体盟员都缠上红色布带。全场一致通过。

通过了沙佩尔的建议 :指定一个人给大家代购鲜红色布带。这一任务委托公民查克斯去执行。

卡尔·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3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本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发出的通告之一,正如恩格斯在“论共产主义者同盟史”(1885年)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通告是“在论及当时形成中的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时发出的。

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在通告中受到尖锐的批判,由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要求,他不得不于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23号和24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该通告于1846年也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7月号上发表,然而该杂志主笔、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之一奥托·吕宁别有用心地加以改动,他擅自增加了一些东西并修改了很多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1929年版第五卷)所载的通告,是根据“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的文章译出的,其中许多地方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而是吕宁写的。本版的译文是初次按原稿翻译的。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页。

- 2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立的周报。出版时间从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第3页。
- 3 “青年美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组织。该组织是1845年创立的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曾经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盖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那种反动的空洞思想,引诱德国侨民脱离争取民主的斗争。——第9页。

- 4 指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出版的艾·约·西哀士写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中的一段：“什么是第三等级？都是。它在政治方面直到现在有何作为？无所作为。它希望什么呢？希望有所作为。”——第 17 页。
- 5 埃萨伊是古犹太宗教教派(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3 世纪)。——第 19 页。
- 6 指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这是 1772 年在普鲁士设立的贸易信用协会。该协会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的贷款,实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银行家和财政经纪人。1904 年该协会正式改为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 21 页。
- 7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和其他一些文件一样,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建立联系,以便为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这封信是答复爱北斐特的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的信(1846 年 6 月 10 日)。古·阿·克特根曾打算把乌培河谷(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和爱北斐特两个城市的总称)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联合起来。但由于这些人的思想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信中提到的关于在乌培河谷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想法,未能实现。——第 23 页。
- 8 指 1846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些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英国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即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 年的法案的通过,表明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反谷物法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第 27 页。
- 9 指宪章派的领袖奥康瑙尔在 1846 年 7 月的选举会上进行举手表决时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候选人霍布豪斯一事。英国在 1872 年前,候选人提名那天,表决是以举手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也可以参加表决。但是在正式选举那天(在举手表决时已被否决的候选人也有被选权),有投票权的仅限于具有大量财产和长久居住期限等资格的少数“合法”选民。

尽管有这种反民主的制度,奥康瑙尔在 1847 年 8 月的投票选举

中仍然获得了多数票而被选进议会。——第 27 页。

- 10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 6 点:普选权(年满 21 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 年和 1842 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1847—1848 年,宪章派又展开了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群众性运动。——第 28 页。
- 11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 年创刊,1852 年停刊;该报最初在里子出版,从 1844 年 11 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瑙尔,40 年代乔·哈尼也曾任该报主编。1845 年 9 月至 1848 年 3 月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28 页。
- 12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30 页。
- 13 “国民报”(《Le National》)是从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40 年代它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改革报”(《La R éforme》)是一家法国日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于 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1847 年 10 月到 1848 年 1 月期间,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31 页。
- 14 指小册子“高利贷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的富有教益和有趣的故事”,1846 年巴黎版(《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de Rothschild l - er , roi des juifs》Paris,1846)。该小册子的作者是若·玛·德恩威尔。——第 32 页。
- 15 指 1847 年 2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所谓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国王圣谕。根据这些圣谕,联合省议会应该是 1823 年确立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省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权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议会的会期是根据国王的意见决定的。
联合省议会在 1847 年 4 月 11 日开幕,但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拒绝表决新的贷款,所以在 6 月就被解散了。——第 33 页。

- 16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

“地球报”(《The Globe》)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3页。
- 17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在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3页。
- 18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普鲁士在这个同盟里起了领导的作用。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35页。
- 19 1846年2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变以及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国王管制的克拉柯夫共和国,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波兰小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许多场合挑起了起义的农民和起义的波兰小贵族的队伍之间的冲突。克拉柯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接着奥国政府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1846年11月签订了条约,把克拉柯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41页。
- 20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2页。
- 21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15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40年代中叶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就是该

- 报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的影响,因而受到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批评。——第 42 页。
- 22 指比·约·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 1—2 卷(《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 42 页。
- 2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派撰稿。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 42 页。
- 24 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3—268 页)。——第 42 页。
- 25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月刊。1845 年 1 月—1846 年 12 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 年 1 月—1848 年 3 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 43 页。
- 26 马克思对 1845 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K Grün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Darmstadt, 1845)一书的评论是“德意志思想体系”的一章,这一章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发表的(参看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德意志思想体系”第 2 部分第 4 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3 卷第 489—534 页)。这篇评论登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1847 年 8 月号 and 9 月号上。——第 43 页。
- 27 K Grün 《Bausteine》Darmstadt, 1844。——第 44 页。

- 28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44页。
- 29 “新轶文集”(《Neue Anekdoten》)收集了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等人的文章,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于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44页。
- 30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本来预备于1847年以单行本在德国发表的。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印成。这篇文章的原稿(保存下来的不全)于1929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6页。
- 31 这里指的是“改革报”(《Reform》)的支持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第48页。
- 32 法国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主义者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第49页。

- 33 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销,拿破仑于 1806 年宣布这样一项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其中也包括普鲁士)和英国进行贸易。——第 52 页。
- 34 二月三日圣谕。——见本卷注 15。——第 66 页。
- 35 恩格斯这里把柏林以西的施潘道要塞(普鲁士实行兵营训练的中心之一和拘留“国事犯”的地方)的名字,用来象征普鲁士反动国家制度。——第 66 页。
- 36 指 1846 年克拉柯夫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普鲁士政府同意把克拉柯夫并入奥地利帝国(见本卷注 19)。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把克拉柯夫列入奥地利的税界,使普鲁士的商品负担高额关税。——第 66 页。
- 37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极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是卡·马克思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比·约·蒲鲁东的主要作品。1846 年 12 月底,马克思在读了出版不久的蒲鲁东所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以后,就决定批判严重地阻碍在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蒲鲁东观点,同时从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阐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和策略问题。马克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给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表明了许多极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为反驳蒲鲁东而写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从恩格斯在 1847 年 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1847 年 1 月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回答蒲鲁东。至 1847 年 4 月初,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并已付印(见本卷第 42 页)。1847 年 6 月 15 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于 1847 年 7 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该书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该书德文版第一版于 1885 年出版,译文曾经恩格斯校订,他专门为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恩格斯在校订德文版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在 1876 年 1 月 1 日送给娜塔丽雅·吴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尼·伊·吴亭的妻子)的一本 1847 年法文版上的修正。1886 年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维·查苏利奇翻译的“哲学的贫困”俄文版第一版。该书的德文版第二版于 1892 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纠正原

- 文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见本卷注48)。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版第二版于1896年出版,该版也根据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一本上的修正作了更正。——第71页。
- 38 马克思引自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Simonde de 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T. I—II, Bruxelles, 1837—1838)。——第81页。
- 39 Lauderdale.《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Traduit de l'anglais, par E. Lagentie de Lavausse. Paris, 1808, p. 33。——第81页。
- 40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有让·巴·萨伊的解释性和批判性的注。1835年巴黎版第2卷第65页(D. Ricardo.《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 S. Constanci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 Say. T. II, Paris, 1835, p. 65)。——第81页。
- 41 指亚·安德森的著作“商业史”(A. Anderson.《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第1版于1764年在伦敦出版。——第83页。
- 42 安·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4卷(H. Storch.《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T. I—IV. Paris, 1823)。马克思引用的是第1卷。——第85页。
- 43 指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的时期。——第89页。
- 44 亚当·斯密“原富”(A.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1版于1776年在伦敦出版。——第

90 页。

- 4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6—625页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69—587页。——第95页。
- 46 布阿吉尔贝尔的文章，引自欧仁·德尔编的“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文集附有编者所加的作者史略和评注（《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第108页。
- 47 W Atkin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0. ——第109页。
- 48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Th. Hodgskin.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7）。
原文误作霍普金斯（Hopkins）。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门格尔曾经利用这一点，说马克思的这段引文毫无根据。在1892年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第二版中，恩格斯改正了这一错误。他写了如下的序言：
“对于这第二版，我只想说几句断：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这个名字误作霍普金斯，现已改正；又威廉·汤普逊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改为1824年。希望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的图书学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于伦敦”——第110页。
- 49 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London, 1824.
T. R. Edmonds.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8. ——第110页。
- 50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第110页。

- 51 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16页。
- 52 马克思引自伏尔泰所著的“议会史”(《Histoire du parlement》)一书中的一章;该章题目是“摄政时期的财政和约翰·罗的制度”。——第122页。
- 53 指萨伊为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所做的注(见本卷注40),第2卷第206—207页。——第126页。
- 54 N.W.Senior.《Political Economy》In:《Encyclopaedia Metropolitan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Knowledge》.Vol.VI, London, 1836.——第127页。
- 55 J.St.Mill.《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44.
托·图克“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年伦敦版第1—2卷(Th.Tooke.《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Vol.I—II, London, 1838)。——第127页。
- 56 Th.Cooper.《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第1版于1826年在哥伦比亚出版;第2版增订版于1831年在伦敦出版。——第128页。
- 57 M.Th.Sadler.《The Law of Population》.Vol.I, London, 1830, p.83, 84.——第129页。
- 58 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经济著作:“经济表”1758年版(《Tableau économique》1758)和“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版(《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1766)。——第139页。
- 59 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1770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说明”(《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第139页。
- 60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3卷;全集1841年柏林第二版第5卷第320页(G.W.F.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III;

- Werke, 2- te Aufl., Bd. V, Berlin, 1841, S. 320)。——第 141 页。
- 61 这几个字马克思引自卢克莱茨的诗篇“事物的本性”(第 3 册第 869 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 vitam mors immortalis ademit》)。——第 144 页。
- 62 A. de Villeneuve—Bargemont. 《Histoire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该书第一版于 1839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153 页。
- 63 马克思引用的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的法文本:《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T. I, Paris, 1802, p. 33—34. ——第 160 页。
- 64 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 年巴黎版(《Raison, folie, Chacun son mot; 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à la portée des vieux enfants》. Paris, 1801)。
- 马克思引证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响”(Infl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勒蒙特在这一著作里引了上一著作。——第 160 页。
- 65 A. Ferguson. 《Essai sur l'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T. II, Paris, 1783, p. 108—110. ——第 161 页。
- 66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3 年巴黎版第 230 页(Ch. Babbage. 《Traité sur l' 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Paris, 1833, p. 230)。——第 168 页。
- 67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Bruxelles, 1836, t. I, première partie, chapitre I. ——第 171 页。
- 68 P. Rossi. 《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 T. I—II, Paris, 1840—1841. ——第 178 页。
- 69 J. Stuart.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T. II,

- Paris, 1789, 190—191. 该书英文第一版于 1767 年在伦敦出版。——第 180 页。
- 70 伏尔泰“有四十个埃巨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ecus》)。——第 181 页。
- 71 威·配第“政治算术”(W. Petty. 《Political arthmetick》), 见他所著“政治算术论文集”一书, 1699 年伦敦版(《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 London, 1699)。——第 191 页。
- 72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 如 1791 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制宪会议通过的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订的刑法典, 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 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 对职工会的禁令到 1884 年才撤消。——第 194 页。
- 73 全国职工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Trades)是工联的组织, 1845 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 60 年代初, 但是 1851 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第 196 页。
- 74 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第 198 页。
- 75 “扬恶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是理·谢里敦所写的一个五幕喜剧。——第 199 页。
- 76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 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 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祸害散布出来。——第 201 页。
- 77 指法国众议院里面支持基佐政府的反动多数。——第 201 页。
- 78 卡·马克思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 是为回答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人士想通过宣传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 并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而写的。当时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后来的保守党领袖之一海·瓦盖纳(马克思批判的这篇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 仗着宗教、教育、

医务部大臣艾希霍恩的庇护，进行了这种宣传。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派向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的阿谀谄媚时，把这篇文章当做论证工人政党对“普鲁士国王政府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立场的文献（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23 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是一家保守的日报；1844 年起在科伦出版；德国 1848 年 3 月革命后停刊。——第 207 页。

- 79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 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 年 1 月创刊，1848 年 2 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 1847 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 年 9 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 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 207 页。
- 80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7 年 4 月 11 日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国王在这篇演说中宣布，他永世也不会让“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上的”关系，让“写满了字的纸”来代替“亘古以来神圣的忠诚”。——第 220 页。
- 81 恩格斯在 1846 年底开始写“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评论。到 1847 年初恩格斯写成了一篇评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的文章（即本文第二部分的基础）。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加以修改后补入他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一章（见恩格斯 1847 年 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不过本文只是以单篇文章发表在 1847 年 9 月至 12 月的许多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第 223 页。
- 82 恩泽拉德（或恩克拉德），古希腊神话中和奥林帕斯山上诸神战斗的巨

人之一。——第 224 页。

- 83 这是按照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二行诗”中的两句改写的。
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诗是典型的词藻华丽而毫无内容的诗，这些诗后来已被完全遗忘了。——第 224 页。
- 84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 年创刊。19 世纪 40 年代初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在普鲁士境内于 1842 年 12 月 28 日由内阁下令禁止发行，而在萨克森该报则出版到 1843 年 4 月 1 日为止。该报的题词是：“真理和权利，自由和法律”。——第 225 页。
- 85 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团体是以意大利同一名称的团体为榜样，于 1820 年底—1821 年初成立。这个团体的支部称“温特”。把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联合在自己队伍里的法国烧炭党人的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1822 年密谋策动在许多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等）的驻军里同时举行起义。烧炭党人团体在密谋失败和几个领袖被处死刑后，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 227 页。
- 86 穆西乌斯·赛沃拉是古代罗马的传奇式的英雄，相传他当着于公元前 507 年围困罗马的伊特刺斯坎王的面，焚烧自己的右手，以证明罗马人的勇敢和爱国精神。——第 227 页。
- 87 “世纪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 19 世纪 40 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 227 页。
- 88 青年德意志派是 19 世纪 3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海涅和白尔尼对这一团体有很大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的一些代表宣传犹太人解放的思想。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 234 页。

- 89 指 1844 年 6 月后半月布拉格纺织工人的自发的起义。布拉格事件在捷克其他许多工业中心（列勃里兹、捷克的菩提树等）引起了工人骚动。在运动中发生了破坏工厂和捣毁机器的事情。这次运动被政府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第 236 页。
- 90 “光明之友”是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第 241 页。
- 9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场（“夜”）（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7 页。——译者注）。——第 245 页。
- 92 恩格斯指的是“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一书，法国科学院常任秘书和该院四十个委员之一米拉波先生著，1770 年伦敦版（《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Par M. Mirabaud, Secrétaire Perpétuel et l'un des Quarant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ondres, 1770）。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亨·霍尔巴赫。为了不暴露自己，他在自己的书上署了 1760 年逝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米拉波的名字。——第 246 页。
- 93 引自歌德的诗“哀的美敦书”（“上帝和宇宙集”）。——第 247 页。
- 94 英国作家艾迪森的悲剧“卡托”写于 1713 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写于 1774 年。——第 248 页。
- 95 1819 年的联邦决议是 1819 年 8 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上制定的一系列反动的决议。这些决议规定在德意志各邦内实行书报预先检查制度，对大学实行严格的监督，禁止组织学生团体，成立中央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反政府的嫌疑分子（所谓“蛊惑人心者”）。鼓吹实施这些警察措施的人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第 249 页。
- 96 指毕舍和卢·拉维涅出版的“法国革命议会史，或 1789 年到 1815 年

- 的国民议会日志”1834—1838年巴黎版第1—40卷(《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 en 1815》. T. I—XL, Paris, 1834—1838)。——第249页。
- 97 热月九日是1794年7月27日法国反革命政变的日子,在这一天颠覆了雅各宾党人的政府,建立了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雾月十八日是1799年11月9日政变的日子,在这一天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政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第250页。
- 98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义”第3编;全集第二版第15卷1844年柏林版(G.W.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h. III; Werke, 2. te Aufl., Bd. XV, Berlin 1844)。——第250页。
- 99 指格律恩的“政治和社会主义”一文。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杂志是激进政论家海·皮特曼办的;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取得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阵地,就必须利用杂志。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弗·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602—626页和第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思想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第7—544页)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第251页。
- 100 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6—443页)。——第251页。
- 10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见郭沫若译“浮士

- 德”第一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93 页。——译者注。——第 251 页。
- 102 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40—442 页）。——第 252 页。
- 103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158—170 页）。——第 252 页。
- 104 沙·傅立叶“论家务农业协作”第 1—2 卷，1822 年在巴黎和伦敦两地出版（Ch. Fourier. 《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 T. I—II, Paris- Londres, 1822）。——第 253 页。
- 105 歌德“瑞士来信”第一部分。这本著作是歌德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以后以书信（这些信是假设在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的书信中出现的）的片断形式写成的。——第 259 页。
- 106 “法兰克福学术通报”（《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是德国杂志，1772 年在法兰克福创刊，1790 年停刊；1772 年歌德、海德及其他进步作家和学者等为该杂志的编辑委员。——第 261 页。
- 107 引自歌德的诗集“威尼斯警句”。——第 262 页。
- 108 歌德“赫曼与窦绿苔”第 9 首歌（见郭沫若译“赫曼与窦绿苔”195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91 页。——译者注。——第 264 页。
- 109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义”绪论（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Einleitung）（参看 1956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历史哲学”第 108 页。——译者注。——第 264 页。
- 110 歌德“论自然科学。一些见解和格言”（引自“散文中的名言集”）。——第 265 页。
- 111 法国众议院之“腹”——见本卷注 77。——第 265 页。
- 112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 4 节。——第 268 页。

- 113 保皇党人是 12 世纪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一个政党。成员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它和教皇的政党即教皇党人(意大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阶层上层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保皇党和教皇党一直存在到 15 世纪。但丁认为皇帝的权力是克服意大利的封建割据的手段,他从 1302 年参加了保皇党。——第 272 页。
- 114 歌德的诗“虚无!虚无中的虚无!”(《V anitas !vanitatum vanitas 》)中的两句的改写。——第 272 页。
- 115 引自歌德的“警句集”中的四行诗“警告”(蒂妲妮亚 [Titania] 和波顿 [Bottom] 是歌德借自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蒂妲妮亚是个仙后,波顿是个愚蠢的小人物的形象。参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 年作家出版社版第一册。——译者注)。——第 275 页。
- 116 F .Bastiat .《Sophismes économiques》.该书第一版于 1846 年在巴黎出版。——第 278 页。
- 117 阿·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A .Blanqui .《Histoire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 à nos jours》)。该书第一版于 1837 年在巴黎出版。——第 279 页。
- 118 指边沁会委托包林把他的骨胳应用于学术方面,这里即指包林为完成这一委托应负的责任。——第 279 页。
- 119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本卷注 8),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第 280 页。
- 120 沙·杜诺瓦耶的“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 年巴黎版第 1—3 卷(Ch .Dunoyer .《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 ou Simple expos é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les forces humaines s' exercent avec le plus de puissance》T. I— III, Paris 1845)。——第 280 页。

- 121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未再发表有关该会议的其次几次会议的报道。关于这些会议，可以参看恩格斯发表在“北极星报”上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本卷案 285—296 页）。——第 281 页。
- 122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一文是马克思准备在布鲁塞尔的经济学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说全文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会议上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议闭幕以后，他就把演说整理了一下，发表在 1847 年 9 月 29 日的比利时报纸“民主工场报”上。传到我们手里的只是这篇演说头一部分的德译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约·魏德迈 1848 年曾在哈姆把这部分译文和马克思 1848 年 1 月 9 日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另一篇演说（见本卷第 444—459 页）的译文一起发表。魏德迈曾把演说最后一部分删掉，理由是这部分的内容和 1 月 9 日的演说是重复的。恩格斯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也引用了马克思这篇演说内容（见本卷第 292—296 页）。——第 282 页。
- 123 指古·居利希的“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1845 年耶拿版第 1—5 卷（G.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s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I— V, Jena, 1830—1845）。——第 282 页。
- 124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285 页。
- 125 “同盟”（《The League》）是英国资产阶级杂志，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刊物；于 1843—1846 年在伦敦出版。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从 1821 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 286 页。

- 126 1842年8月,反谷物法同盟企图利用宪章运动来同政府及大地主进行斗争,于是就怂恿工人行动起来。然而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坏了自由资产阶级,结果它支持对工人的镇压。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挑拨行动加速了宪章派和他们的决裂。——第289页。
- 127 指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以及1847年初在比桑歇(属安德尔省)饥饿的工人因抢劫投机商贩的粮车和仓库而遭到政府军队的屠杀。——第289页。
- 128 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Heinzen.《Die Preussische Bürokratie》.Darmstadt,1845)和雅·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J·Venedey.《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Mannheim,1839)。——第298页。
- 129 海因岑想象中的未来的德国是与瑞士联邦类似的自治区共和联邦。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正是把这一内容加进了德国统一的口号,统一的象征就是黑红黄三色旗。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解释德国统一的口号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性和不能坚决反对分离主义和分散主义的表现。与此相反,他们提出了在德国建立统一的集中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第299页。
- 130 恩格斯列举了中世纪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1381年)和杰克·凯德起义(1450年)、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查克里)和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后来,恩格斯在研究农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史和农民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举行革命发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他在“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出版)等著作中,指出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解放性质及其在摇撼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第301页。
- 131 斯腾托尔,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一个有不平常的高嗓子的勇士。——第304页。
- 132 指尤·弗吕贝尔的“社会政治体系”,“新政治”1847年曼海姆第二版第1—2卷(J·Fröbel.《System der socialen Politik》.Zweite Auflage

- der 《Neuen Politik》. Th. I—II, Mannheim, 1847)。以“新政治”为书名的第一版于 1846 年用笔名尤尼乌斯出版。——第 305 页。
- 133 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 1776 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靠近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的成员。该团体是由不满国王专制制度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的。同时伊留米纳特的一个特点是害怕一切民主运动;他们的章程也反映了这一点:该章程把普通会员都变成了领导人员的盲目工具。1784 年,该团体被巴伐利亚当局捣毁。——第 311 页。
- 134 海涅的“阿塔·特洛尔”第 24 章。——第 314 页。
- 135 《Der Heizen'sche Staat. Eine Kritik von Stephan》. Bern, 1847. Gedruckt bei E. Rätzer. ——第 315 页。
- 136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316 页。
- 137 约·诺克斯“贵族的土地占有权”1847 年伦敦版。(J. Noakes. 《The Right of the Aristocracy of the Soil》. London, 1847) ——第 316 页。
- 138 出版宪章派日报“民主主义者”(《Democrat》)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第 317 页。
- 139 只有极少数享有选举权的人才能参加投票表决(见本卷注 8)。——第 317 页。
- 140 “工场”(《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 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 319 页。
- 141 指 1847 年 10 月 21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4 号上发表的一篇海因岑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Ein Repräsentant der Kommunisten》)。——第 322 页。
- 142 伏拉松是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太监”中的人物,是一个好吹嘘的糊涂军人。——第 322 页。

- 143 索洛蒙和马科尔夫(或莫罗尔夫)是14、15世纪德国滑稽剧(短篇讽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洛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贤明而不切实际的君主,通过马科尔夫的形象描写一个机智的农民。——第323页。
- 144 昆图斯·菲克斯莱恩是让·保尔(约·保·弗·李希特尔的笔名)的小说“昆图斯·菲克斯莱恩的一生”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第326页。
- 145 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9月26日第77号)上登载的一篇卡·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该文攻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为此,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进行反驳。——第326页。
- 146 关于中世纪的公社参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恩格斯注(本卷第468页)。——第333页。
- 147 马克思指“真正平等派”(“真正平均主义者”),亦即“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334页。
- 148 菲·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182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Ph. Buonarroti. 《Conspiration pour l' égalité éditée de Babeuf》. T. I—II, Bruxelles, 1828)。他这本书使工人革命运动中重新恢复了巴贝夫的传统。——第834页。
- 149 马克思引证的是以梅勒迪斯为主席的济贫法实施调查委员会于1825年1月29日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众议院提出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1828年8月的“宾夕法尼亚纪事报”。——第336页。
- 150 “奈尔斯氏每周纪事”(《Niles' Weekly Register》)是美国一种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问题的综合性周刊,1811—1849年在巴尔的摩出版。——第336页。
- 151 指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

- 版 (F.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und Thübingen, 1841)。——第 337 页。
- 152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参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 作家出版社版第十二册第 194 页。——译者注）。——第 338 页。
- 153 指 1835 年 9 月法国政府颁布的反动法令。该法令限制陪审法庭的活动，并采取了严厉措施对付出版物。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期刊的押金，如果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国家制度的言论则处以囚禁和课以巨额罚金。——第 345 页。
- 154 排毒法是用人工刺激皮肤的表面而引起溃疡，中世纪的医术认为这是排出“病毒”的办法。——第 345 页。
- 155 见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52—467 页）。——第 346 页。
- 156 指 1844 的 6 月 4—6 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 1844 年 6 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见本卷注 89）。——第 346 页。
- 157 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 1832 年 5 月 27 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国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宪制改革而斗争。——第 346 页。
- 158 指 1793 年夏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政党）掀起的反革命暴乱，他们打着保卫各省的自治权和联合权的旗帜反对雅各宾政府。暴乱平息以后吉伦特派有许多领袖（包括巴巴鲁在内）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 350 页。
- 159 公安委员会是法国革命政府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的中央机关。——第 350 页。
- 160 指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学家约·亨·康培所写的儿童读物，具体指他的

“美洲的发现”一书,其中有一节是讲秘鲁的印加族和西班牙人占领秘鲁的故事。——第 350 页。

- 161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种反动日报,1798年创刊;1810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0—134页)。——第 352 页。
- 162 弗·恩格斯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关于以问答方式拟定纲领的问题,早在正义者同盟进行改组和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6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就进行过讨论。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把“共产主义问答”分发给同盟的各个区部和支部。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痕迹的文件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意,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在巴黎拟走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们满意。10月22日,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决。恩格斯受委托起草新的草案。这个草案就是很快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
- 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仅仅看成是纲领的初稿,他在1847年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应当以“共产主义宣言”的形式来起草纲领的想法,而抛弃那陈旧的问答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大会委托他们以宣言的形式拟定纲领。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运用了“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原理。——第 357 页。
- 163 在手稿中,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以及下面一个即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等字样。显然,这是说答案应当仍维持原案,即仍照已失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初步草案之一中业已拟定的答案。——第 372 页。

- 164 本文是恩格斯为“改革报”写的,同时也刊载于1847年6月6日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第524号。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75页
- 165 指1847年10月25日在伦敦为庆祝宪章派领袖菲格斯·奥康瑞尔及几个激进派活动家当选议会会议员而举行的宴会。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78页。
- 166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们曾要求实行所谓的完全选举权,完全选举权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可作各种解释。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这个要求,是企图使工人脱离为实现宪章派的社会纲领和政治纲领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工人运动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第378页。
- 167 1840年7月建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会员曾达4万名之多。协会的活动表明协会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后,协会趋于衰落,至50年代完全停止活动。——第379页。
- 168 指1831年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上院终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80页。
- 169 1847年10月30日“北极星报”第522号刊登了拉马丁宣言的摘录。——第381页。
- 170 “公益报”(《Le Bien Public》)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于1843年8月至1848年12月间出版(最初在马康,从1848年5月起改在巴黎)。拉马丁参加了报纸的创办和出版工作。——第384页。
- 171 本文是因瑞士爆发七个天主教州所发动的内战而写的。这些经济上落后的州在1843年就已成立了分离的同盟(分离派同盟),目的是抵

制瑞士先进的资产阶级实行的各种改革并保卫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分离派同盟的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的上层贵族。该同盟的反动企图遭到了 40 年代中叶已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占居优势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 年 7 月议会通过了解散分离派同盟的决议,分离派同盟就以此为借口在 11 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11 月 23 日分离派同盟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所粉碎。由于这一胜利和 1848 年通过的新宪法,瑞士由国家联盟改成为联盟国家。——第 385 页。

- 172 威廉·泰尔是 13 世纪末到 14 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据说,他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

文克里特是传说中的瑞士战士;相传在 1386 年 6 月 9 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属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

穆尔顿是瑞士夫赖堡州的一个城市;是 1476 年 6 月 22 日瑞士人同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军队作战的地方,这次战役瑞士人获得最终的胜利。——第 385 页。

- 173 恩格斯所说的“旧瑞士”是指 13 世纪到 14 世纪构成瑞士联盟雏形的瑞士的山地各州。——第 385 页。

- 174 指日耳曼部落为反抗罗马征服者跟罗马人在条多堡森林进行的战役(公元 9 年)。战役以罗马军团的溃灭而告终。——第 385 页。

- 175 1315 年 11 月 15 日在莫尔加顿城下发生了瑞士的义勇军和哈布斯堡列奥波特的军队之间的战役,结果瑞士人获得胜利。——第 386 页。

- 176 马拉松、普拉迪和萨拉密斯是波希战争(公元前 500—449 年)时期的几次大战的地方,这些战斗都以希腊人得胜而告终。——第 386 页。

- 177 格留特利的宣誓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这个联盟的基础是 1291 年由山地的三个州即什维兹、乌利和下瓦尔顿缔结的协定所奠定。相传这三个州的代表于 1307 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草地会

- 合，宣誓要忠于联盟，共同反抗奥地利的统治。——第 387 页。
- 178 格兰桑是瓦得州的一个城市，1476 年 3 月 2 日瑞士的步兵在这个城的附近打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
南锡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477 年 1 月 5 日大胆查理的军队在该城下为瑞士人、洛林人、亚尔萨斯人和德国人所歼灭。——第 387 页。
- 179 安提诺是罗马皇帝阿德里安（公元 2 世纪）的近侍，以异常的俊美而著名。——第 389 页。
- 180 什陶法赫尔是 13 世纪末到 14 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中的传奇人物；据说他是瑞士联盟的奠基人之一。——第 390 页。
- 181 关于在红宫里举行的宴会的报道载于 1847 年 7 月 17 日“北极星报”第 508 号。——第 395 页。
- 182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 年到 1870 年每日在巴黎出版；40 年代它是奥尔良派中温和的一派的机关报；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 12 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98 页。
- 183 恩格斯所描写的巴黎事件发生在 1847 年 8 月底和 9 月上半月；起因是圣奥诺莱街的皮鞋工厂的工人由于厂主企图扣一个工人的工资而和厂主发生冲突。——第 401 页。
- 184 L.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该书第一版于 1840 年在巴黎出版。——第 402 页。
- 185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03 页。
- 186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 1845 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 1845 年 9 月

22 日各国民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离开伦敦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 1847 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

1848 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 1853 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第 404 页。

- 187 万国联盟，或人民万国联盟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派 1847 年在伦敦成立的团体。托·库伯、威·福克斯、约·包林以及民主派政论家、诗人和艺术家威·林顿都参加了联盟的创立工作和活动。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中某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团体，例如朱·马志尼就是该联盟的发起人之一。1848 年联盟的活动（组织群众大会、讲解国际问题以及散发批评文章）即告停止。——第 404 页。
- 188 1840 年法国政府借口巩固国都以防外敌入侵，在巴黎四周着手建筑许多孤立的堡垒。七月王朝的统治集团企图以这些堡垒来对付人民的起义。民主主义集团坚决反对在巴黎建筑新的“巴士底狱”。但是大部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包括“国民报”的拥护者在内，却以巩固国防为由，替建筑堡垒辩护。——第 408 页。
- 189 恩格斯关于法国改革运动的下一篇通讯，载于 1847 年 12 月 18 日的“北极星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也发表过类似内容的通讯。本卷所刊载的是根据“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的那篇通讯译出的（见本卷第 423—426 页）。——第 408 页。
- 190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09 页。
- 191 恩格斯的这篇通讯是以书信形式写给“改革报”编辑的。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13 页。
- 192 民主协会于 1847 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

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拘捕了协会中最革命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413页。

- 193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阿·巴泰尔斯向侨居比利时的革命流亡者发动的并被反动僧侣集团所利用的诽谤运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16页。

- 194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末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416页。
- 195 “布鲁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侣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年开始出版。——第417页。
- 196 宣传信仰协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是17世纪时神甫所创立的大主教组织,目的是在各国传播天主教以及和异教作斗争。协会是罗马教皇及天主教集团的反动政治工具之一。——第417页。

- 197 马克思指的是 1847 年 12 月 4 日“北极星报”上关于 1847 年 11 月 29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的会议的报道。该报道对马克思在会上的演说作了删减,并且转述得不确切。1847 年 12 月 9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所发表的演说词比较完整确切(见本卷第 409—410 页)。——第 417 页。
- 198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中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王朝反对派的领袖是奥迪隆·巴罗。——第 420 页。
- 199 入市税是城市对输入的日用品所征收的税。——第 421 页。
- 200 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工人创立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会员。他们都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派和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奥多·德萨米的思想影响。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的审判发生于 1847 年 7 月,结果他们被判长期监禁。——第 422 页。
- 201 1847 年 12 月 18 日“北极星报”发表过恩格斯的一篇通讯“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的宴会”,后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又以“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为题发表了这篇通讯的摘要。——第 423 页。
- 202 路易·勃朗以为似乎法国是独一无二的文明传播者,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就集中注意力揭露这个民族主义的论点,没有打算在同勃朗的论战中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传播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在论述印度、爱尔兰、中国、伊朗等的书信和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之被拖入资本主义关系之中,是由于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奴役,使它们成为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属地,是由于殖民者无耻地掠夺它们的天然财富并残酷地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3 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因为在故乡它还装出一付

道貌岸然的模样，而在殖民地它就一点也不加掩饰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334 页）。——第 424 页。

- 203 1846 年，基佐政府达到了使西班牙女王王位继承者和路易-菲力浦的幼子结亲的目的，破坏了英国打算使科布尔克公爵列奥波特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联姻的计划。在 1847 年瑞士内战时期，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设法洗雪了英国外交上的这一耻辱。他一面怂恿基佐提出五国干涉计划来支持分离派同盟，一面却在暗地里拆后者的台。基佐的外交手腕全盘失败。——第 430 页。
- 204 屠杀里昂工人的事件发生在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时候。
1842 年 8 月在普累斯顿英国工人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事件是当时英国许多工业基地汹涌澎湃的自发的宪章运动浪潮中的一个插曲。
兰根比劳是西里西亚的一个村镇，1844 年 6 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中心之一，也是政府军队屠杀织工的地点。
1844 年夏天在布拉格 政府军队屠杀了起义的工人。——第 433 页。
- 205 指附在 1793 年共和国宪法前面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这部宪法是法国 1792 年 8 月 10 日推翻了君主国以后所召开的国民公会制定的。——第 435 页。
- 206 《Chant du départ》（“进军曲”）——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后来在法国人民群众当中也非常流行。——第 436 页。
- 207 指宪法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这个宪章是法国在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制定的，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第 436 页。
- 208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38 页。
- 209 国王郡即奥法里郡（爱尔兰中部），16 世纪中叶英国侵略者为了纪念女王玛丽·都铎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采用了这一名称。——第 438 页。

- 210 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 1798 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 18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取消合并 (Re- peal of Union) 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奥康奈尔等人) 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 年奥康奈尔和英国的辉格党勾结后，就根本停止了这种鼓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 1840 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 (合并取消的拥护者) 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 第 439 页。
- 211 “调停大厅” (《Conciliation- hall》) 是都柏林的公共集会场所。—— 第 442 页。
- 212 指 1842 年 5 月宪章派向议会递交的全民请愿书；请愿书中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取消 1801 年的英爱合并。请愿书未被议会接受。—— 第 442 页。
- 213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 1848 年 2 月初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发表的，就在同年，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 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第一版的附录刊印，自此以后，就作为该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俄译文，于 1885 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以单行本首次发表，译者为普列汉诺夫。1889 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 1888 年 7 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 (《Die Neue Zeit》) 杂志。—— 第 444 页。
- 214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注 51。—— 第 448 页。
- 215 马克思引证了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Des principes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 impôt》. Traduit de l' anglais par F .- S .Constantino ,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 .- B .Say .T .I . Paris , 1835 . p . 178—179 . —— 第 449 页。

216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T, I. Bruxelles, 1836. p. 34. — 第 454 页。

217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献。“这虽然是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它的价值却不下于整整的好几卷书: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并推动着文明世界整个有组织的和战斗的无产阶级”(列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最初于 1848 年 2 月在伦敦用共有 23 页的单行本发表。1848 年 3 月至 7 月,“共产党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上连载。德文原本也是 1848 年在伦敦再版的,这是一个共有 30 页的小册子;这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错的字,并改进了标点符号。这一原本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为以后各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的基础。1848 年“宣言”同时又被翻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弗拉曼特文和瑞典文)。在 1848 年的各个版本中未提“宣言”作者的名字。1850 年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登载“宣言”的第一个英文译文时,该杂志的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

1872 年“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作者作了某些不大的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这一版本以及后来在 1883 年和 1890 年出版的各个版本,都是以“共产主义宣言”为题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译本是由巴枯宁翻译的,1869 年在日内瓦出版,他在许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内容。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译本消灭了第一个版本中的缺陷。普列汉诺夫的译本给“宣言”的思想在俄国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特地给这一译本写了一篇序言。

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宣言”出版了多种曾经由恩格斯校阅过的版本,例如在 1883 年出版了附有恩格斯写的序言的德文版;在 1888 年出版了由赛·穆尔翻译的英文版,这一版本是由恩格斯校订过的,并附有恩格斯补写的序言和附注;在 1890 年出版了附有恩格斯写的

序言的德文版。在最后的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也曾加上了几个附注。1885年，在“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上发表了“宣言”的法文译文，这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并由恩格斯校阅过。恩格斯曾给1892年的波兰版“宣言”和1893年的意大利版“宣言”分别写过序言。——第461页。

218 恩格斯也曾经把这一个附注加在1890年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去，只是省去了最后的一句话。——第466页。

219 在比较后期的各种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等等比较确切的概念（这是由马克思开始采用的）分别代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等等概念（见本卷说明第Ⅺ页）。——第473页。

220 法国正统主义者和“青年英国”见本卷注32。——第492页。

221 改革派见本卷注31。——第502页。

222 指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1830年秋），这次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尼德兰王国，并在比利时建立了以科布尔克王朝为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

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以后，瑞士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也加强了。在许多州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用自由主义精神修改了地方宪法。——第505页。

223 1831年2月在摩地纳、罗曼内（教皇领地东北部）和巴马，发生了起义，这是由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统一意大利、驱逐外国人的口号下发动的。这次起义为奥地利军队及意大利各邦政府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镇压。——第505页。

224 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1831年到1841年间出版；该报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第505页。

- 225 1833年在汉诺威实施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下制定的宪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达尔曼积极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1837年汉诺威国王依靠反动的地主集团废除了宪法,1840年实行了新法律,使代议机关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第506页。
- 226 德意志各邦大臣参加的维也纳会议,在奥国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当权人物的倡议下于1834年召开,会议的目的是采取措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和民主运动。会议决定在具有代议机关的德意志各邦内限制代议机关的权利,加强书报检查,对各大学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并迫害参加反对派学生组织的分子。——第506页。
- 227 指省议会代表组成的所谓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为讨论新刑法草案而于1848年1月召开的。普鲁士政府召开这些委员会,是企图用准备改革的幌子来缓和日益激昂的舆论。委员会的活动因三月初在德国展开的革命发动而中断。——第507页。
- 228 指1847年4月1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联合省议会的开幕词中的声明,他说,他是“万世的王位的继承人,也应该把万世的王位传给自己的继承者。”——第507页。
- 229 罗马咨询会议或罗马国家参议院,是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在1847年底成立的咨议机构。由自由派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第508页。
- 230 皮费拉利(因意大利的吹奏乐器“皮费罗”而得名)是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坡地带的牧民。
拉察罗尼是那不勒斯王国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鄙称;拉察罗尼不止一次被保皇派反动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509页。
- 231 指1846年至1848年美国 and 墨西哥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的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领土的侵略野心所挑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掠夺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地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几年内详细地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和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侵略史。1861年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中把美国统治阶级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政策称作侵略政策,这种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夺取新地盘来扩大奴隶制和奴隶主的统治权。——第513页。

- 232 美利坚合众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运河以连接太平洋和墨西哥湾的计划,企图控制中美的商业干道和市场。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家认为还是投资于化费较少的墨西哥铁路建设较为合算,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第513页。
- 233 摘自海涅的诗歌“骑士奥拉夫”。——第515页。
- 234 指19世纪20年代初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王国的革命事变和1831年2月罗曼内的起义(见本卷注223)。1820年7月在那不勒斯,资产阶级革命者烧炭党人为反对专制制度举行了起义,争得了温和的自由主义宪法。1821年3月撒丁王国(皮蒙特)爆发了起义。领导起义的自由派宣布宪法,企图利用运动来反对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把国家统一在皮蒙特的统治者萨伏依王朝的政权之下。由于神圣同盟列强的干涉,由于奥地利军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因而这两个国家里又恢复了专制制度。——第518页。
- 235 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时期加里西亚农民和波兰小贵族的起义部队的冲突,这次冲突是奥地利当局挑拨起来的。——第518页。
- 236 1847年7月驻意大利的奥地利当局因罗马国(教皇领地)人民运动的强大而感到不安,把军队开到了教皇领地的边境城费拉拉。在罗马,奥地利人支持企图废除庇护九世的自由主义改革的那些反动集团。费拉拉的占领在整个意大利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使奥地利政府不得不立刻撤军。——第518页。
- 237 普拉特尔是维也纳的一个公园。——第522页。
- 238 “社会辩论报”(《Le D bat Social》)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它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1844年至184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524页。

- 239 “独立报”（《L'Indépendance》）是比利时一家资产阶级日报“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的简称；1831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524页。
- 240 同盟（建立于1841年）和自由协会（建立于1847年）都是比利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组织。——第525页。
- 241 弗·基佐“罗马帝国崩溃至法国革命期间的欧洲文明通史”（F. Guizot.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一次刊载于弗·基佐“近代史教程”1828年巴黎版（F. Guizot. 《Cours d'histoire moderne》. Paris, 1828）。——第526页。
- 242 指1847年11月由撒丁国王、教皇和托斯卡纳公爵所缔结的关于召集意大利各邦代表会议来建立关税同盟的协定。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的草案是和意大利大资产阶级想以教皇或萨伏依王朝为首的君主同盟形式“从上面”来统一意大利的意愿相符合的。但是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变的进程和1849年反革命的胜利，使这些计划成为泡影。——第528页。
- 243 1848年革命前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德国居民反对为丹麦和公国制订的统一宪法（宪法草案公布于1848年2月28日）的运动，就其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分离主义的运动，并没有超出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小的德意志邦作为反动的普鲁士的仆从国。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变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革命的解放的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持。——第531页。
- 244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34页。
- 245 指1847年1月由爱尔兰民族运动中不满奥康奈尔的妥协政策而脱离

- 合并取消派协会的激进派和民主派所创立的爱尔兰同盟。其中大多数人属于“青年爱尔兰”这一由爱尔兰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42 年组成的团体。爱尔兰同盟的革命左翼支持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并竭力把爱尔兰独立斗争和民主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爱尔兰爆发的起义被英国当局镇压以后，爱尔兰同盟就在 1848 年夏天中止活动。——第 537 页。
- 246 “改良报”（《La Riform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7 年 11 月至 1850 年初发行于鲁卡。——第 542 页。
- 247 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该报出版于雷赫河岸的奥格斯堡。——第 542 页。
- 248 阿·福伦是乐谱的作者，歌词是诗人弗里德里先的作品。——第 543 页。
- 249 指热拉尔元帅所制定并于 1840 年通过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了政府军队在巴黎起义时的布置和行动。——第 546 页。
- 250 1848 年 2 月 23 日基佐政府倒台以后，奥尔良王朝的支持者曾企图由以摩莱伯爵为首的温和君主主义者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比约等）组织内阁。但由于巴黎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这一维护奥尔良君主政体的企图就破灭了。——第 547 页。
- 251 在 1848 年 2 月 2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克莱米约、阿拉戈、马利和恩格斯提到的两位“国民报”的活动家——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马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品而已。——第 548 页。
- 252 指 19 世纪 30 年代初法国奥尔良派在比利时问题上的口是心非的立场。这些人暗中策划并吞比利时，同时又鼓动比利时人争取脱离荷兰。同时，在伦敦五强（英、法、俄、奥、普）会议上，他们牺牲比

- 利时的利益,和支持荷兰的强国勾结在一起。因此,比利时人不得不和荷兰国王缔结对自己不利的条约(1833年5月最后签署),并割让一部分领土。——第555页。
- 253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58页。
- 254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61页。
- 255 调节制实施草案是由坎宁的托利党内阁于1827年制定的,经某些修改后于1828年由威灵顿的托利党内阁作为法律实施。——第564页。
- 256 “反谷物税通报”(《The Anti- Bread- Tax Circular》)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刊物,原称“反谷物法通报”(《The Anti- Corn- Law Circular》);1839至1843年在曼彻斯特每两周出版一次。——第565页。
- 257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于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拟定。这个章程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届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批准。——第572页。
- 258 指“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该信发表于1847年12月11日的“北极星报”及1847年12月26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建立各国民主派之间更正规的联系以及准备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的建议,1847年11月底至12月间“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代表曾经和代表民主协会委员会的马克思讨论过,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伦敦。——第578页。
- 259 1848年1月3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刊载于1848年1月8日的“北极星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集团正在宣传沙文主义并放出风声说,似乎法国准备进攻不列颠岛,以便使工人阶级脱离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告工人书在谈及英国国防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告工人书中号召工人坚决反击“力图挑拨工人的阴谋家,这些人制造卑劣的谎言,把不同国家的人说成是‘天生的敌人’”。告工人书中指出,要真正加强英国的防聊力量,就应该给英国人民以民主权利和自由。——第579页。

260 驱逐恩格斯的借口是说他 1847 年 12 月 31 日在巴黎德国革命流亡者新年宴会上发表了演说。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出席了这次宴会，恩格斯在他们中间进行了革命宣传，因而使法国当局感到恐慌。1848 年 1 月底，巴黎警察当局借口恩格斯的演说中有反政府性质的政治暗语，而对他进行迫害。同年 1 月 29 日，恩格斯接到了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法国否则就把他解交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指令。在恩格斯被驱逐的同时（警察当局夜间曾闯进了恩格斯的住宅），有共产主义者嫌疑的德国工人流亡者也遭到了逮捕。尽管政府报刊大肆进行诬蔑宣传，反对派的报纸还是透露出了恩格斯被驱逐的真正原因。

“巴黎通报”（《Le Moniteur Parisien》）是 19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每日晚报，半官方刊物。——第 581 页。

261 德国工人俱乐部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提议于 1848 年 3 月 8—9 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攻入德国的冒险计划。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第 589 页。

262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的章程草案。——第 590 页。

263 1848 年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的会议都在骑术学校举行。领导这个协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德克尔等曾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攻入德国。他们打算用这种方法在德国进行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斥责了这种冒险计划。——第 591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6年5月—1848年3月)

1846

- 春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争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先进人物，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
- 5月5日 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法通讯员并参加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接到蒲鲁东5月17日的回信后确信他同蒲鲁东的意见有根本分歧，因而放弃通过蒲鲁东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
- 5月11日 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通告。该通告分发给所有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 夏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思想体系”各主要章节。在德国由于书报检查条件以及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反对，手稿未能付印。
- 6月1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古·阿·克特根，准备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乌培河谷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之间建立经常的通讯联系。
- 7月1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该文发表于7月25日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

- 8月1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出版商卡·威·列斯凯完成“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书的计划。该书后来没有写完。
- 8月15日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准备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中间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
- 8月15日到19日之间 恩格斯结识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埃·卡贝。
- 8月19日 恩格斯寄信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谈在巴黎的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出版物的情况。以后恩格斯经常向委员会报道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德国工人小组的情况。
- 9月1日左右 恩格斯写关于法国状况的文章，该文发表于9月5日“北极星报”。
- 9月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 10月 恩格斯在巴黎德国工人的三次集会上批评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庸俗思想。由于恩格斯的活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成员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 10月中旬左右 恩格斯研究路·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一书，并记下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要点。
- 10月20日左右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拟就第二个反对克利盖的通告，该通告由马克思签署。原文没有保存下来。
- 12月 巴黎当局派警察暗中监视恩格斯。
- 12月28日 马克思写给俄国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信中批判了他刚刚读完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

哲学”一书，同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

1847

- 1月—6月 15日 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
- 1月—4月 恩格斯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作为“德意志思想体系”第二卷的补充。
- 1月 20日 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派代表约·莫尔到布鲁塞尔见马克思，并到巴黎见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信同盟领导者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做为纲领基础之后，就同意参加同盟。
- 2月底 恩格斯写“普鲁士宪法”一文。该文发表于3月6日“北极星报”。
- 3月—4月 恩格斯写关于德国制宪问题的著作。
- 4月 3日 马克思写短评驳斥由卡·格律恩煽动起来的“特利尔日报”对他的诬蔑性攻击。该短评发表于4月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4月9日“特利尔日报”。
- 6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前同盟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代表大会结束后恩格斯返回巴黎。
- 6月 26日 恩格斯写“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该文发表于7月3日“北极星报”。
- 7月初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
- 7月 27日左右 恩格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问题。

- 8月5日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及区部委员会委员。
- 8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并在协会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 8月—9月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单独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中的一章，内容为对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的批判。
- 9月12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马克思的论文“‘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和恩格斯的文艺批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开头一部分。从这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经常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在他们的影响下，该报成了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 9月16日—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马克思本来准备发言，可是由于怕他鼓吹革命，会上没有给他发言的机会。这篇会上没有发表的演说后来登载于9月29日布鲁塞尔“民主工场报”；恩格斯发表于10月9日“北极星报”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中也附有这篇演说。
- 9月27日 恩格斯参加了布鲁塞尔民主派的国际宴会。宴会上通过了成立民主协会的决议。
- 10月3、7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恩格斯的两篇论战性的文章，总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 10月中旬 恩格斯自布鲁塞尔返回巴黎，着手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他受托从事同盟区部委员会的通信工作。
- 10月下半月 恩格斯和以“改革报”为中心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建立了

- 联系。他和该报编辑部约定供给有关英国和德国情况以及宪章运动发展的文章。恩格斯第一次为“改革报”写的一篇关于英国商业危机的文章发表于10月26日，以后他继续为该报撰稿直至1848年1月止。
- 10月18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建议布鲁塞尔区部派代表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希望马克思出席代表大会。
- 10月22日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所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委员会委托恩格斯拟定新的纲领草案。
- 10月底 马克思写“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一文。该文分期发表于10月28日至11月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 10月底—11月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为同盟草拟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
- 11月初 恩格斯写“法国的改革运动”一文。该文发表于11月20日“北极星报”。
- 11月14日 恩格斯被同盟巴黎区部选为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 11月15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当选为协会副主席。
- 11月23日—24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建议以宣言形式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并称该纲领为“共产主义宣言”。
- 11月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在奥斯坦德会面并在那里讨论了同盟的纲领问题。

- 11月2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国际大会。马克思把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件交给“民主派兄弟协会”，该信建议在两个组织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关于大会的报道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载于12月4日“北极星报”、12月5日“改革报”及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 11月29日—12月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他们的观点为全体代表所接受。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形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并批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 11月3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发表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报告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 12月7日 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
- 12月9日到12月底之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写“共产党宣言”。
- 12月13日左右 马克思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
- 12月15日左右 恩格斯写文章批评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该文发表于12月18日“北极星报”和12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曾经略作修改）。
- 12月17日 恩格斯从伦敦到布鲁塞尔。
- 12月下半月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除了其他准备讲演的材料以外，马克思还拟定了“工资”大纲。

- 12月20日左右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委任恩格斯为驻巴黎代表。
- 12月20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上报告了伦敦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大会的情况,并宣读“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贺词。在这次大会上,恩格斯当选为民主协会驻巴黎的代表。
- 12月底 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巴黎。
- 12月31日 马克思出席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新年宴会。
恩格斯在巴黎德国革命流亡者新年宴会上发表演说。

1848

- 1月9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公众大会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大会通过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的演说的决议。这本小册子于1848年2月初问世。
- 1月下旬 马克思写完“共产党宣言”。手稿于1月底寄往伦敦。
- 1月23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了恩格斯的“1847年的运动”一文。
- 1月27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了恩格斯的“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一文。
- 1月29日 恩格斯因在巴黎工人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
- 1月31日 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
- 2月 马克思整理他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准备付印。这些讲演一部分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为题发表于1849年4月“新莱茵报”。
- 2月13日 马克思出席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的问题,并通过给伦敦“民主

- 派兄弟协会”的回信,信上签名的有马克思和协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
- 2月20日 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上恩格斯报告了法国政府迫害民主主义者的情况以及他自己被驱逐出巴黎的详细经过。
- 2月22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为纪念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的演说在1848年3月发表于克拉柯夫起义纪念文集上。
- 2月24日左右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 2月25日—3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比利时的共和主义运动,这次运动是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马克思自己出钱去武装布鲁塞尔工人。
- 2月25日—26日 恩格斯写“巴黎的革命”。该文发表于2月2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 2月27日左右 由于法国爆发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将全权授予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
- 2月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市政当局武装布鲁塞尔工人。这次会上同时还通过了每日召开协会例会以及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建立定期联系的决议。
- 2月28日 马克思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签署致“北极星报”编辑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乔·哈尼书,以及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贺信。
- 3月1日左右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斐·弗洛孔书面通知马克思撤销基佐政府对马克思的驱逐令,并请他返回法国。
- 3月3日 马克思收到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的敕令。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同盟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巴黎。马克思受委托在巴黎组织新

- 的中央委员会。
- 3月3日夜 马克思准备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闯入住宅,逮捕了马克思。3月4日燕妮·马克思也被逮捕。经过十八小时的监禁后,马克思全家被迫立即离开比利时。
- 3月5日 马克思到达巴黎。
恩格斯积极参加抗议比利时迫害马克思及其他政治流亡者的运动,他写信给“北极星报”编辑部揭露比利时政府的阴谋。恩格斯的信在3月25日发表。
- 3月6日 马克思出席了由于法国革命事件而召开的巴黎德国工人大会。
- 3月6日—3月中 马克思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等)所提出的冒险计划,他们主张由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组成武装部队攻入德国,在德国完成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的意见是德国工人应该单个地回到德国,参加当地的革命运动。
- 3月8日 “改革报”发表马克思叙述他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经过情形的信件。
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会议,会上通过决议:成立同盟巴黎区部和建立名为德国工人俱乐部的公开的工人组织。会上委托马克思拟定俱乐部章程草案。
- 3月9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会议通过由马克思拟定的德国工人俱乐部章程草案。
- 3月11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在布鲁塞尔的恩格斯被缺席选入中央委员会。
- 3月19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会寄给在巴黎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共产党宣言”1000册。

人名索引

三 画

- 万·德·卡斯泰尔(Van de Castele)—
利尔厂主,自由贸易派。——第 290
页。
- 大卫·克利斯提安·格奥尔格·纳坦(Da-
vid, Christian Georg Nathan 1793—
1874)—丹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
活动家,自由派。——第 277 页。

四 画

- 巴泰(Bataille)—比利时工人,比利时工
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会员。——第 585 页。
-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
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 年 2 月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
派领袖;1848 年 12 月—1849 年 10 月
领导了保皇派党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
持的内阁。——第 31、203、398、402、
405—408、420、431、432、436、437、545
页。
- 巴兰,费里克斯(Ballin, Felix 约生于 1802
年)—比利时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布
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 585 页。
- 巴巴鲁,沙尔·让(Barbaroux, Charles
Jean 1767—1794)—18 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吉伦特分
子。——第 350 页。
-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

- 1797)—真名为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çois Noël),法国革命家,空想平
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平等派”
密谋的组织者。——第 334、499 页。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狂热的辩护者。——第
278、286 页。
- 巴泰尔斯,茹尔(Bartels, Jules)—比利
时律师。——第 276 页。
- 巴泰尔斯,阿道夫(Bartels, Adolf)—比
利时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自 1844 到
1846 年为“社会辩论报”的编辑。——
第 416、417 页。
- 日果,菲利浦(Gigot, Philippe 1820—
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
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 年
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3、4、
24、25、29、552、553、556、571、587 页。
-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性而
著称;在 1848—1849 年革命之前,对基
佐政府采取反对派的立场。——第
199—203、394、431 页。
- 日拉丹,亚历山大·德(Girardin, Ale-
xandre de 1776—1855)—法国将军;
艾米尔·德·日拉丹(Emile de Gi-
rardin)的父亲。——第 201 页。
- 尤尔,安得鲁(Ure, Andrew 1778—1857)

- 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169—171、454页。
- 尤尔特,威廉(Ewart, William 1798—1869)——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第280、285、286页。
-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Juvenalis, Decimus Junius 生于1世纪60年代—死于127年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101页。
- 比约,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Billault, 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君主主义奥尔良分子,1851年后成为波拿巴分子。——第547页。
- 毛勒,格典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德国社会制度的研究者。——第466页。
- 邓科布,托马斯·斯令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40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199、429页。
- 孔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Constancio, Francisco Solano 1772—1846)——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他曾把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文。——第81、90页。
- ### 五 画
- 弗格森,亚当(Ferguson, Adam 1723—1816)——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161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405—408、430、435、548页。
- 弗洛里安,让·比埃尔(Florian, Jean-Pierre 1755—1794)——法国作家和诗人,贵族颓废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关于威廉·泰尔的诗篇。——第386页。
-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刊发行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代表,属于左翼;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305页。
-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国皇帝(1792—1835),1806年前膺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第516、518、521、522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c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531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第263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33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21、24、26、33、35、36、39—41、66、67、220、221、348、505—507、512、530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298页。
- 布朗,威廉(Brown, William 1784—

- 1864)——英国商人和银行家,自由贸易论者。——第 285—287 页。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他的职业是印刷工人。——第 110—115、117 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立者之一;自 60 年代末起为自由派政党领袖之一;在自由党内阁中曾历任大臣职位。——第 444、511、512 页。
- 布朗基,阿道夫(Blanqui, Adolphe 1798—1854)——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94、248、279、281、285 页。
- 布赫芬克(Buchfink)——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588 页。
- 布莱辛顿,玛格丽特(Blessington, Marguerite 1789—1849)——伯爵夫人,英国自由派女作家。——第 28 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前驱者,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 108、127 页。
-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1794 年参加热月 9 日的反革命政变。——第 436 页。
-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 420、436、437 页。
- 卡尔·奥古斯特(Karl-August 1757—1828)——萨克森—魏玛大公。——第 270 页。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 6、47、418、422、502 页。
- 加莱尔,阿尔芒(Carrel, Armand 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始人和编辑之一。——第 200 页。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 Louis 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420、430、432、433、436、548 页。
- 加尔涅-帕热斯,埃蒂耶纳·约瑟夫·路易(Garnier-Pagès, Etienne-Joseph-Louis 1801—1841)——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0 年革命后领导了共和党反对派。——第 432 页。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348、425 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代表,属于左翼,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209、298、299、308、310、350、353 页。
- 卢克莱茨,梯特·卡尔(Lucretius, Titus Carus 约公元前 99—55)——杰出的罗

- 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第144页。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841—1846),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506、526、565、568页。
- 皮卡尔,阿尔伯(Picard, Albert)——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580页。
- 包林,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论者;50年代他是在远东实施英国殖民政策的高级官员。——第279、285、286、289—291、404、444、448、450、453—455页。
-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第279页。
- 丘迪,艾吉迪乌斯(Tschudi, Agidius 1505—1572)——瑞士的年代志作者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宗教改革的敌人,代表瑞士归州的宗法贵族集团的利益。——第386页。
- 汉泽曼,大卫(Hanseman, David 1790—1864)——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月至9月任普鲁士的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347、348页。
-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8、257、275页。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罗斯皇帝(1825—1855)。——第530页。
- ## 六 画
- 达希(Dassy)——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553页。
-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第209、505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 - 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法国代表;以政治上毫无原则性和自私自利著称。——第516页。
- 达兰贝尔,让(D'Alembert, Jean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425页。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第539、585页。
- 列奥波特一世(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第556、558、559页。
- 列奥波特二世(Leopold II 1797—1870)——托斯卡纳的大公(1824—1859)。——第508页。
- 艾迪森,约瑟夫(Addison, Joseph 1672—1719)——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先驱者之一。——第248页。
-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国家

- 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医务大臣(1840—1848)。——第209、220页。
- 艾德门兹,托马斯·娄(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110页。
- 西尼耳,纳骚·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庸俗经济学家,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127、342页。
- 西哀士,艾曼纽尔·约瑟夫(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国神甫,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17页。
- 西蒙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第81、107、109、161、494页。
- 米歇尔洛(Michelot)——法国民主主义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413页。
-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益的代表者。——第348页。
- 伊茨施太因,约翰·亚当(Itzstein, Johann Adam 1775—1855)——德国政治活动家,巴登邦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之一。——第265页。
- 伊夫兰特,奥古斯特·威廉(Iffland August Wilhelm 1759—1814)——德国演员和戏剧活动家,著有美化德国反动制度和充满小市民道德的剧本。——第241页。
- 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198页。
- 安德森,亚当(Anderson, Adam 约1692—1765)——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贸易史的著者。——第83页。
- 迈因茨,卡尔·古斯塔夫(Maynz, Karl Gustav 1812—1882)德国法律学家,布鲁塞尔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585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曾经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而斗争。——第122、181、425页。
-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Thorvaldsen, Bertel 1768—1844)——著名的丹麦雕刻家。——第391页。

七 画

- 杜马,让·巴蒂斯特(Dumas, Jean-Baptiste 1800—1884)——法国化学家。——第247页。
-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 Jacques 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40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548页。
- 杜沙多(Duchateau)——法国工业家,保护关税政策的拥护者。——第280、286页。

- 杜沙特尔·沙尔(Duchâtel, Charles 1803—1867)——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1839—1840, 1840—1848年2月)。——第30、199—206、228、545、556页。
- 杜韦尔瑞·德·奥兰,普罗斯比尔(Duvergier de Hauranne, Prosper 1798—1881)——法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432页。
- 杜诺瓦耶,沙尔(Dunoyer, Charles 1786—1862)——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103、280、281、285页。
- 杜厄斯堡,弗兰茨(Duesberg, Franz 1793—1872)——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46年到1848年三月革命期间为财政大臣。——第216、217页。
-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 Hermann 1820—1850)——德国记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40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第1、6—20页。
- 克特根,古斯塔夫·阿道夫(Köttgen, Gustav Adolf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诗人,在40年代时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第23、24页。
- 克罗茨,阿那卡西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接近左翼雅各宾党人;革命前是普鲁士的男爵。——第417页。
- 克莱斯特,亨利希(Kleist, Heinrich 1777—1811)——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反动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第234页。
-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初期代表人物之一。——第253页。
- 克里斯提安八世(Christian VIII 1786—1848)——丹麦国王(1839—1848)。——第531页。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卓越活动家,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50、553、571页。
-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德国政论家,1846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从德国逃亡出来,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3、4、24、25页。
- 沃尔波尔,罗伯特(Walpole, Robert 1676—17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721—1742),创立了不受国王支配而依靠议会多数的内阁制度;他广泛地使用了贿赂手段。——第290页。
- 沃洛夫斯基,路易(路德维克)(Wolowski, Louis[Ludwig] 1810—1876)——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原籍波兰。——第278、280、285、286、290、291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79、81、89—94、97、99、106、110、125、126、132、138、156、181—186、294、295、342、352、449、455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

- 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第247页。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282、283、292、337页。
- 麦克亚当(MacAdam)——爱尔兰亚麻改良协会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第290页。
- 麦克格雷斯,菲利浦(MacGrath, Philip)——宪章运动的活动家,19世纪40年代为国民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379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248页。
- 贝朗热,比埃尔·让(Béranger, Pierre Jean 1780—1857)——法国最著名的民主主义大诗人,政治讽刺文的作者。——第585页。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28页。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杰出的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425页。
- 里廷豪森,摩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第一国际委员,后来成为(1884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278、279、286、291页。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 1822—1827)首相(1827)。——第564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271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约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时期为“左”倾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重又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413—415、428、577、588—591页。
- 吕敏尼,玛丽·伊波利特(Rumigny Marie-Hippolyte 1784—1871)——侯爵,法国外交家。——第549页。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506、508、509、529页。
- 劳克利弗,威廉(Rowcliffe William)——英国激进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靠近宪章派。——第317页。
- 希尔迪奇,理查德(Hilditch, Richard)——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第187页。
- 邦纳罗蒂,菲利浦(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战友。——第334页。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约185—159)——著名的罗马剧作家。——第322页。
-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

- 艾贝斯道弗(Heinrich LXXII Reu - Lo - benstein - Ebersdorf 1797—1853)——德意志一小邦弟系罗伊斯的大公(1822—1848)。——第 355 页。
- ## 八 画
- 阿尔伯(Albert)(真名是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1815—1895)——法国工人,七月王朝时期曾参加秘密革命团体,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548 页。
- 阿拉尔(Allard)——法国民主主义者。——第 559 页。
- 阿诺特,约翰(Arnott, John)——宪章运动的活动家。——第 413 页。
- 阿贝尔,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Hébert, Michel - Pierre - Alexis 1799—1887)——法国法律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曾任司法大臣(1847—1848 年 2 月)。——第 204、545 页。
- 阿拉戈,埃蒂耶纳(Arago, Etienne 1803—189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邮政总管,属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第 408 页。
- 阿特金森,威廉(Atkinson, William)——19 世纪 30—50 年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反对者,保护关税论者。——第 108、109 页。
- 阿斯海耳,卡尔·威廉(Asher, Karl Wilhelm 1798—1864)——德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经济学家。——第 290 页。
- 阿尔古尔,弗朗斯瓦·欧仁·加布里埃尔(Harcourt, François - Eugène Gabriel 1786—1865)——公爵,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贸易自由的拥护者。——第 291 页。
- 阿凯斯戴克(Akersdyck)——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90 页。
- 阿比贝尔克,约翰·泰奥多尔(Abyberg, Johann Theodor 1795—1869)——瑞士政治活动家,瑞士什维兹州的保守党领袖。——第 386 页。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大诗人。——第 337 页。
- 拉·萨格拉,拉蒙·德(La Sagra, Ramon de 1798—1871)——西班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自由派。——第 285 页。
- 拉利-托朗达尔,特罗菲姆·热拉尔(Lally - Tollendal, Trophime - Gérard 1751—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 348 页。
- 拉比奥(Labiaux)——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 585 页。
-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 30、227、228 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律师,倾向于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的奠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创立了反对派。——第 95 页。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40 年代为自由派,温和的资

- 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第381—384,418,419,548页。
-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annais, Fe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甫,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8,18页。
- 罗西,佩勒格里诺(Rossi, Pellegrino 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法国居住很久。——第94,178页。
-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199页。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第555,558,559页。
- 罗德戴尔,詹姆斯(Lauderdale, James 1759—1839)——伯爵,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批判了亚当·斯密的理论。——第81,92,132页。
- 波蒙·德·拉·蓬尼尼埃尔,古斯塔夫(Beaumont de la Bonnière, Gustave 1802—186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1848—1851年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398,402页。
-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 1824—1898)——真名为西蒙·布特米尔希(Simon Buttermilch),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他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315,355,588,589,591页。
- 波旁王朝(Bourbons)——法国王朝名(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第391页。
- 居利希,古斯塔夫(Gülich, Gustav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保护关税的拥护者。——第282,283页。
- 居阿斯科,德(Guasco, de)——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的职业是木匠。——第553页。
- 居比耶尔,阿梅德·路易(Cubières, Amédée Louis 1786—1853)——法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1839和1840年为陆军大臣,1847年因贪污受贿及参与投机勾当被降级。——第199,200页。
- 杰克逊,查理·托马斯(Jackson, Charles Thomas 1805—1880)——美国医生和化学家,他把乙醚用作麻醉剂。——第258页。
- 杰弗逊,托马斯(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美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在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集团的思想家,美国总统(1801—1809)。——第338页。
- 杰罗尔德,道格拉斯·威廉(Jerrold, Douglas William 1803—1857)——英国资产阶级幽默作家和剧作家。——第28页。
- 帕尔尼,埃瓦里斯特·德吉烈(Parny, Evariste Désiré 1753—1814)——子爵,法国诗人。——第274页。
-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Palmerston, Hen-

- iv John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依靠的是该党最反动的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317、430、531 页。
- 弥勒, 约翰 (Müller, Johann 1752—1809)——德国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和瑞士史,代表保守的市民集团的观点。——第 386 页。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00、502 页。
- 佩列林, 让 (Pellerin, Jean 1817—1877)——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他的职业是靴匠。——第 585 页。
- 奈尔斯, 海泽凯 (Niles, Hezekiah 1777—1839)——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奈尔斯氏每周纪事”杂志的出版者。——第 336 页。
- 法拉第, 迈克尔 (Faraday, Michael 1791—1867)——著名的英国学者,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第 247 页。
- 门采尔, 沃尔弗干格 (Menzel, Wolfgang 1798—1873)——德国反动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民族主义者。——第 257、275 页。
- 舍夫茨别利, 安东尼 (Shaftesbury, Anthony 1671—1713)——伯爵,英国道德论哲学家,自然神的卓越的代表人物;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 425 页。
- 舍尔比利埃, 安都昂·埃利泽 (Cherbuliez, Antoine E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第 187 页。

九 画

- 哈林, 哈罗 (Ha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第 14、16、19 页。
- 哈维, 威廉 (Havey, William 1578—1657)——英国著名的医生,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第 177 页。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 317、380、414、428、429、582 页。
- 哈斯基森, 威廉 (Huskisson, William 1770—183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23—1827),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第 194、564 页。
-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农奴主反动分子。——第 466 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 508、529 页。
- 查克斯 (Sax)——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591 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在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221 页。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191页。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第390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第527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为争取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了斗争。——第376页。
- 科采布,奥古斯特(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国反动的作家和政论家。——第241页。
- 科克勒,切列斯提诺·玛丽亚(Cocle, Celestino Mary 1783—1857)——意大利神学家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接受忏悔的牧师。——第529页。
- 科布尔克——见列奥波特一世。
- 施蒂纳,麦克斯(Stiner, Max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43、298、313页。
- 施托尔希,安得列·卡洛维奇(亨利希)(1766—1835)——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委员,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第85页。
- 施勒格尔,奥古斯特·威廉(Schlegel, August Wilhelm 1767—1845)——德国诗人,翻译家和文学史家,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324页。
- 施泰因根斯,祖伊特倍尔特·亨利希·海耳曼(Steingens, Suitbert Heinrich Hermann 约生于1817年)——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他的职业是画匠。——第587页。
- 威尔逊(Wilson)——英国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414页。
-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第285、286、291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冯(Westphalen, Edgar von 生于1819年)——燕妮·马克思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第3、4页。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1848—1849年革命的活动家,站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上。——第402、408、423—426、503、548页。
- 勃多,尼古拉(Baudeau, Nicolas 1730—1792)——法国神甫,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拥护者。——第139页。
- 韦克利,托马斯(Wakley, Thomas 1795—1862)——英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438页。
-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律家,自由主义政论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议员,属于右派。——第265页。
- 昂利,约瑟夫(Henry, Joseph 约生于1795年)——法国企业主;1846年7月曾谋杀路易·菲力浦;被判终身苦役。——

- 第 30 页。
- 拜比吉, 查理 (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168 页。
-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 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律家和政论家, 40 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主席。——第 552、553、556、580 页。
- 科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 (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法国国家活动家, 财政督察长 (1665—1683), 实际上他领导了法国的内外政策, 奉行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策。——第 175 页。
- ## 十 画
- 马利, 亚历山大 (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397、407 页。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传记材料)。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为冯·韦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卡尔·马克思的妻子, 马克思的忠实的朋友和助手。——第 552、553、556、557 页。
- 马鲁埃, 比埃尔·维克多 (Malouet, Pierre Victor 1740—1814)——法国政治活动家,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 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 348 页。
- 马布利, 加布里埃尔 (Mably, Gabriel 1709—1785)——卓越的法国社会学
- 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348 页。
- 马拉斯特, 阿尔芒 (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 “国民报”编辑;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第 548 页。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 反动的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295 页。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236、314、515 页。
- 海尔曼 (Hermann)——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588、589 页。
- 海尔堡, 路易 (Heilberg, Louis) (生于 1818 年)——德国新闻记者, 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 1846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第 3、4 页。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理论家,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 297—315、322—334、337—342、343—356 页。
-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在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42—45、244—275、307、308、354、498 页。
- 格莱格, 威廉·莱斯本 (Greg, William Rathbone 1809—1881)——英国工业家和政论家, 自由贸易论者。——第 446—448、457 页。
- 格莱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

- 1861)——英国的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温和的托利党人),1841—1846年为皮尔内阁的内务大臣。——第199、204页。
- 席林(Schilling)——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8页。
-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236、253、256、386、389页。
- 泰勒,瓦特(Tyler W at 死于1381年)——1831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第301页。
- 泰克斯,科尔奈利·安奈·登(Tex, Cornellis Anne den 1795—1854)——荷兰资产阶级法律学家,他还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第290页。
- 库伯,托马斯(Cooper, Thomas 1759—1840)——美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代表人物。——第128、336页。
- 库伯,托马斯(Cooper, Thomas 1805—1892)——英国诗人和记者,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40年代初参加宪章运动,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传教士。——第28页。
- 恩格勒(Engler)——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8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传记材料)。
- 让·保尔(Jean Paul)——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的笔名,德国小资产阶级讽刺作家。——第326页。
- 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第191页。
- 索泽,让·比埃尔(Sauzet, Jean - Pierre 1800—1876)——法国律师和保守的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众议院议长(1839—1848年2月)。——第228页。
- 埃普斯,约翰(Epps, John 1805—1869)——英国医生和社会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378—380页。
- 纳尔逊,霍雷修(Nelson, Horatio 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卓越的海军统帅。——第390页。
- 热拉尔,埃蒂耶纳·莫里斯(G éard Etienne - Maurice 1773—1852)——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第546页。
- 特德斯科,维克多(Tedesco, Victor 1821—1897)——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参加者,1847—1848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414、553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 - 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52、53、145、250、257、508、516、521、523、535、537页。
- 倍克,卡尔(Beck, Karl 1817—1879)——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40年代中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223—243页。

十一画

- 毕舍,菲利浦(Budhez, Philippe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249、262页。
- 康潘(Campan)——波尔多贸易局委员,

- 贸易自由拥护者。——第 280 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 162、256 页。
- 康培,约阿希姆·亨利希(Campe, Joachim Heinrich 1746—1818)——德国资产阶级作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著有儿童和少年读物。——第 350、351 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 年 3—6 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347、348 页。
- 勒维烈,乌尔本·让·约瑟夫(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 1811—187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第 258 页。
- 梅利奈,弗朗斯瓦(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原籍法国;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名誉主席。——第 585 页。
-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狂热的反动分子,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465、505、516、521、522、529、530、537、559、560 页。
- 梅勒迪斯,威廉·莫里斯(Meredith, William Morris 1799—1873)——美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国家活动家。——第 336 页。
- 莫尔,托马斯(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上院议长,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第 250 页。
-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 1812—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牺牲。——第 589 页。
- 盖斯纳,萨洛蒙(Ge ner, Salomon 1730—1788)——瑞士诗人和艺术家,脱离实际生活的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第 329 页。
-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派。——第 209 页。
- 基恩,查理(Keen, Charles)——宪章运动的参加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414、428 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 年至 1848 年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30、199—201、204、206、431—433、465、506、526、535、545—547 页。
- 勒·阿尔迪·德·博利约,让·沙尔·玛丽·约瑟夫(Le Hardy de Beaulieu, Jean - Charles Marie Joseph 1816—1871)——比利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第 276、527 页。
- 勒蒙特,比埃尔·爱德华(Lemontey, Pierre Edouard 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

-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接近立法会议(1791—1792)的反革命右翼。——第160、161、171页。
- 荷马(Homerus)——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324—326页。
- 悉尼·艾尔杰楠(Sydney Algernon 1622—1683)——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复辟时期辉格党反对派领袖之一,君主立宪制度的拥护者。——第425页。
- 密尔顿,约翰(Milton, John 1608—1674)——杰出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共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425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1840)及共和国总统(1871—1873),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刽子手。——第31、206、406、408、431、432、437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246、323—325、338页。
- ## 十二画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79、88—91、99、121、156、160、161、167、170、179、294、343、352页。
- 斯特芬斯,亨利克(Steffens, Henrik 1773—1845)——德国自然科学家,谢林派哲学家和作家,原籍挪威;著有描写挪威生活的小说。——第390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179、180页。
- 斯皮特霍恩,沙尔·路易(Spilthoorn, Charles Louis 1804—1872)——比利时律师,民主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根特民主协会主席。——第585页。
- 斯特尔比茨基(Sterbitzki)——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8、589页。
- 费舍,弗·(Fisher, F.)——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6页。
-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cob 1805—1871)——德国激进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左翼;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298、588页。
- 费德尔,维克多(Faidler, Victor)——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276—278页。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43、245、253、255、298、299页。
- 汤普逊,威廉(Thompson, William 约178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欧文的信徒。——第110页。
- 汤普逊,托马斯·培伦涅特(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的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280、285、286、404页。
- 博纳德,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鲁阿兹(Bonald, Louis Gabriel Ambroise 1754—184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

- 论家,君主主义者,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第 536 页。
- 博林布洛克,亨利(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第 425 页。
- 菲尔希隆,让·克劳德(Fulchiron, Jean Claude 1774—1859)——法国大资本家和保守的政治活动家,金融贵族的利益的积极维护者。——第 394 页。
- 菲利浦一世(Philippe I 约 1052—1108)——法国国王(1060—1108)。——第 122、123 页。
-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第 519、542 页。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第 391、508、529 页。
- 凯德,杰克(Cade, Jack 死于 1450 年)——1450 年英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英国南部举行反封建起义时的领袖。——第 301 页。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80、413、428 页。
- 隆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牧师,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第 241 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18 世纪卓越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253、254 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53、500、502 页。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会议中的左翼领袖之一,70 年代接近社会民主党。——第 304 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 138、139、141—143、145—146、148、250、252、253、255、264、271、298、328 页。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后为波拿巴分子,1849—1867 年曾数次担任财政部长之职。——第 30、394 页。
- 普莱费尔(Playfair 1818—1898)——英国化学家。——第 247 页。

十三画

- 奥迪(Hody)——布鲁塞尔暗探局局长。——第 558、559 页。
-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 438—441、537 页。
- 奥康奈尔,约翰(O'Connell, John 1810—1858)——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第 438、439 页。
- 奥康奈尔,摩尔根(O'Connell, Morgan 1804—1885)——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 反对为取消 1801 年英爱合并而进行斗争,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第 438 页。
- 奥康奈尔,莫里斯(O'Connell Maurice 死于 1853 年)——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第 438 页。
- 奥康瑙尔,菲格斯(O'Connor, Fe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 27—29、317、375—380、427、428、439—443、579 页。
- 奥克辛本,约翰·乌尔利希(Ochsenbein, Johann Ulrich 1811—1890)——瑞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1847 年内战时期的瑞士激进派和自由派的领袖之一,联邦政府的首脑(1847—1848)。——第 521 页。
- 奥尔良公爵(Orleans)——即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
-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arski, Ludwig 1787—1873)——伦敦的波兰政治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 414 页。
- 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第 558、559 页。
- 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 31、32、206、228、229、395—398、406—408、426、430、431、516、547 页。
-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第 424、426 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 127、271 页。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 138、206 页。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219、221、348、390 页。
- 路特希尔德,沙尔(Rothschild, Charles 1788—1855)——路特希尔德银行的代表之一。——第 522 页。
- 路特希尔德,索洛蒙(Rothschild, Solomon 1774—1855)——维也纳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 520、530 页。
-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 30—32、206、394 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各国拥有许多银行。——第 223—233 页。
- 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1825—1828)。——第 224、235、254 页。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00 页。
- 载勒尔,塞巴斯提安(Seiler, Sebastian)——德国政论家,1846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3、4 页。

十四画

维特,杨·德(Witt, Johann de 1625—1672)——尼德兰国家活动家,荷兰地

- 区的真正统治者(1653—1672),大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第290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5、277、287—291页。
- 维丝特·克利斯托夫·马丁(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作家。——第253页。
- 维尔纽夫·巴尔热蒙,让·保尔·阿尔班(Villeneuve-Bargemont Jean-Paul-Alban 1784—1850)——子爵,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153页。
- 赫斯,莫泽斯(He,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40年代中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第253页。
- 赫格尔,威廉(Höger,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9页。
-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44、247、248、251—276、327页。
- 魁奈,弗朗斯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职业是医生。——第138、139、455页。
- 福伦,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Follen, August-Adolf-Ludwig 1794—1855)——德国政论家和诗人,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5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第543页。
- 福格尔(Vogel)——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9页。
- 福格勒(Vogeler)——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8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8、42—44、71、75—91、92—108、110、115、118—153、158—165、167—170、172—183、185—194、258、268、313、498页。

十五画

- 德·梅斯特尔,约瑟夫(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法国作家,君主主义者,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死敌。——第536页。
- 德尔,欧仁(Daire, Eugène 1798—1847)——法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第108、127页。
- 德尔·卡烈托,弗兰切斯科·萨韦里奥(Del Carretto, Francesco Saverio 约1777—1861)——意大利反动的政治活动家,那不勒斯王国的警务大臣(1831—1848年1月)。——第529页。
- 德克尔(Deck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588页。
- 德萨米,德奥多(D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人物。——第8页。
-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法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温和的君主主义者奥尔良分子;1851年后为波拿巴分

- 子；外交部长（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398页。
- 德罗兹，弗朗斯瓦·克萨维埃·约瑟夫（Droz, François - Xavier - Joseph 1773—1851）——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94页。
- 德若尔日，弗雷德里克（Degeorge, Frédéric 1797—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第420页。
- 德朗格尔，克劳德·阿尔丰斯（Delangle, Claude- Alphonse 1797—1869）——法国法律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1847年到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为总检查长。——第422页。
- 摩莱，路易·马蒂约（Molé, Louis Mathieu 1781—185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总理（1836—1837，1837—1839），1848—1851年为保守的君主主义的“秩序党”领袖之一。——第206、547页。
- 摩尔斯，阿瑟（Morse, Arthur）——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第446、447、457页。
-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ouis Henry 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作者，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466页。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接近古典学派；他批评了李嘉图的货币论。——第127页。
- 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 Rollin, Alexandre -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405—408、430、434、436、437、503、548页。
- 黎塞留，阿尔芒·让（Richelieu, Armand Jean 1585—1642）——法国专制制度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424页。

十六画

- 霍普，乔治（Hope, George 1811—1876）——英国农场主，主张保护贸易自由。——第446、457页。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220页。
-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Hobhouse, John Cam 1786—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27页。
- 霍尔巴赫，保尔·亨利希（Holbach, Paul Heinrich 1723—1789）——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246、250、252页。
- 霍尔奈（Horne）——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9页。
-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110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一，资产阶级

激进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3页。

鲍威尔,亨利希(Bauer, Heinrich)——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职业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洲。——第588、589页。

诺克斯,约翰(Noakes, John)——英国激进主义政论家。——第316页。

十七画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第187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继承者。——第127页。

穆尼哀,让·约瑟夫(Mounier, Jean-Joseph 1758—1806)——法国政治活动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348页。

穆尔纳,托马斯(Murner, Thomas 1475—

1537)——德国讽刺作家和神学家,他反对宗教改革,被路德主义的拥护者称为“笨蛋传教士”。——第323页。

谢里敦,理查·布林斯利(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激进派的代表人物。——第199页。

十八画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81、89、99、125、126、160、294页。

萨伊,奥拉斯(Say, Horace 1794—186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第285页。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接近托利党。——第128、129页。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缝。——第3页。

期刊索引

二 画

- “人民杂志”(The People's Journal)——
伦敦出版。——第 28 页。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 Tribun)——
纽约出版。——第 3—5, 7—12, 14, 16,
17, 18, 20 页。

三 画

- “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
(L'Atelier, organe spécial de la classe
laborieuse, rédigé par des ouvriers ex-
clusivement)——巴黎出版。——第
319, 321 页。

四 画

- “公益报”(Le Bien Public)——马康出
版。——第 384, 419 页。
“巴黎通报”(Le Moniteur Parisien)——
第 581 页。
“反谷物税通报”(The Anti- Bread- Tax
Cir- cular)——曼彻斯特出版。——
第 565 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鲁塞尔出版。——第 524
页。

五 画

-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
第 227, 398, 406, 407, 431 页。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伦
敦出版。——第 22, 26, 28, 29, 32, 33,

39, 41, 206, 296, 316, 317, 321, 375,
376, 380, 381, 384, 395, 402, 408, 413—
415, 417, 423, 424, 427, 428, 437, 441,
549, 554, 580, 582 页。

“布鲁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
第 417 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巴黎出版。——第 398, 406, 431 页。

六 画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
ler)——伦敦出版。——第 33, 320,
376 页。

“同盟。自由贸易主义的喉舌和全国反谷
物法同盟的机关报”(The League The
Expon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Free
Trade, and the Organ of the National
Anti- Corn- Law League)——伦敦出
版。——第 386 页。

七 画

“时代”(L'Époque)——巴黎出版。——
第 202 页。

“改革报”(La R éforme)——巴黎出
版。——第 31, 33, 47, 318, 377, 380,
382, 383, 396, 400, 404, 405—408,
415, 420—422, 429, 430, 432—436,
437, 440, 503, 547, 555, 557, 560,
585 页。

“改良报”(La Riforma)——鲁卡出

版。——第 542—544 页。

“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伦敦出版。——第 376 页。

“君主同盟报”(L'Union monarchique)——巴黎出版。——第 419 页。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 376 页。

八 画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 31、33、200、395、396、400、405、407、408、420—422、430、432、434、436、437、548 页。

“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伦敦出版。——第 376 页。

“奈尔斯氏每周纪事”(Niles Weekly Register)——巴尔的摩出版。——第 336 页。

“法兰克福学术通报”(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第 261 页。

“社会辩论报, 民主派机关刊物”(Le Débat Social organe de la démocratie)——布鲁塞尔出版。——第 524—527、583 页。

九 画

“星报”(Star)——即“北极星报”。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第 352、415、542 页。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第 505 页。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帕德波恩出版。——第 43 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 33、395、415、430、431、535 页。

十 画

“纪事”(Register)——即“奈尔斯氏每周纪事”。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 33、288、415 页。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第 42、45、213、307 页。

十一 画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286、320 页。

“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第 376 页。

十二 画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科伦出版。——第 207、208、210—216、221 页。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第 225 页。

“莱茵—摩塞尔日报”(Rhein- und Mosel-Zeitung)——科布伦茨出版。——第 42 页。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251 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 42 页。

十三 画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 200、202、319、320、431 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 285 页。

十五画

“德法年鉴”(Deutsch - 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44、94、251、252、346页。

“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汉堡出版。——第568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 Brüsseler - Zeitung)——第37、45、69、207、222、275、281、297、305、315、323、326、

330、333、337、348、355、356、393、412、415、417、419、422、426、443、515、523、527、533、544、548、550、581页。

十六画

“诺定昂信使报”(Nottingham Mercury)——第376页。

二十一画

“辩论日报”(Débats)——即“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译 后 记

本书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有关的原文翻译的。其中“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请朱文叔先生从中文上提过修辞意见。“哲学的贫困”一文在译校过程中曾参考了何思敬同志的译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冯世熹、王燕华、汤钰卿、张文焕、任田升、朱中龙、张植芳、沈渊等同志。译文最后由樊以楠等同志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